

基辛格傳

第一章

哈佛逸材

1923年5月27日。傍晚。

一阵狂风夹杂着暴雨横扫了德国的南部地区。风呼呼地吹着，豆大的雨点像断了线的珍珠噼噼啪啪洒落在大地上。

距慕尼黑市100多公里的犹太人聚居地菲尔特市，人们没有像往日一样在街头漫步、聊天，而是静静地呆在家里。女人们一边做着针线活，男人们吸着烟卷，一边倾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以及不时传来的树枝折断的声音。

“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汇进了风雨声中。亨利·基辛格就诞生在这座著名的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里。

基辛格的父亲路易·基辛格当时35岁，在一所专为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班主任。早先，路易的父亲也是当教员的，犹太教的传统在父子间承袭了下来，基辛格的父亲总是按犹太传统过安息日、新年和赎罪日的。基辛格的父亲是一位好老师，胸襟开阔，非常和氣，从不粗暴惩罚学生。母亲葆拉·丝特恩·基辛格，生基辛格的时候才21岁。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做得一手犹太好菜，在家里是“管家的”。他们夫妇俩的第二个男孩名叫瓦尔特·伯恩哈德，比哥哥小一岁。一家人住在马蒂尔登大街一所公寓的二楼，有一套五间的套房。家里藏书不少，还有一架钢琴。基辛格小时候喜爱读书，却从不摸琴。

基辛格7岁那年，希特勒的青年暴徒在他故乡巴伐利亚州菲尔特镇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谁是犹太人，谁就成了他们行凶的对象。基辛格和他的犹太同学常常遭到毒打。事隔多年，基辛格还对一位采访者讲起，那几年，只要一见街上有一帮小伙子迎面走来，他就躲到马路对面去。

幼年时的基辛格，顽皮而又活泼，喜欢踢足球，特别喜欢同女孩子厮混。他常扯人家的小辫儿，后来稍大一点，又喜欢让姑娘们陪他一道在街上溜逛，而且总是挑最漂亮的姑娘。

基辛格一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常常一块去做礼拜。基辛格是自愿去的，做礼拜时完全沉浸在一片虔诚的气氛之中。他祷告起来十分认真。

读小学时，他在班上很活跃，常常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而且当他知道问题答案的时候，也爱回答问题，但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生。

在基辛格家这一对男孩日渐长大的时候，纳粹势力也日益猖獗起来。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纳粹党在巴伐利亚一带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在1930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员就耀武扬威地掌握了菲尔特的权力。

当希特勒开始实行他那蓄谋已久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时，德国大约有50万犹太人。在菲尔特的8万居民中，犹太人约占3000人。在希特勒眼里菲尔特长期来允许犹太人存在，这对亚利安人的纯洁性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挑战。他把这个小城镇看成是个犹太国。当时，德国各地的犹太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辛格一家也不例外。说实在的，连死去的犹太人也未能幸免。镇上的犹太人公墓就被纳粹分子挖掉了。那座“犹太大教堂”，还有另外一座小一点的，也都在同一天被夷为平地。犹太人的铺子全部关闭。卐字旗取代了六角星旗。反犹主义的包围圈一天紧似一天了。

基辛格当时亲眼目睹了他所认识的菲尔特人被纳粹分子杀害。他后来写

道：“美国人很难想象民族灾难是怎么回事。”就连他父亲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人，在 1933 年也被解雇了。他一时简直不能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只盼着这场恶梦早日结束。

基辛格家小弟兄俩踢足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后来干脆就没有了。他俩同其他犹太孩子一起，从原来的中学里被赶了出来，转到一所专收犹太人的学校。一时，街道变成了战场。成群结队的德国青年到处寻衅闹事。这些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取得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资格。他们专在基辛格、瓦尔特以及他们的犹太同学身上恣意逞凶。

青少年的本性往往会同他们所处的纳粹恐怖环境发生冲突，因此做父母的不得不告诫孩子，让他们懂得一时的任性，可能闯出大祸。

基辛格的母亲不许孩子跟外面的孩子一块玩，成天把他们关在院子里。那时，菲尔特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排着队在街上唱歌，穿着制服游行。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看着那些孩子，弄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小哥儿俩只好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基辛格未满 14 周岁以前，他就有 12 位亲人死在纳粹手中。他的父亲在失去教师的工作，从而也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之后，还曾经以为这种反犹疯狂或许能很快过去，因此还曾竭力忍耐熬过。他的母亲一直掌管着家中的大事，这是因为父亲路易斯总是埋头读他的那些书籍和沉湎于他的梦想之中。迫害最终变得不堪忍受，于是母亲保拉劝说父亲路易斯离开德国。出于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全家生存的考虑，他们全家于 1938 年去了伦敦，幸亏为时尚不算太晚。保拉在伦敦的姑母又帮他们去了纽约。

基辛格一家总算走得及时，使自己免于站在纳粹分子在整个欧洲杀掉的 600 万犹太人之列。1933 年，希特勒正式上台那年，菲尔特有 3000 名犹太人，但到 1941 年举行战后的第一次宗教仪式时，只剩下 70 个了。基辛格一家是在 1938 年 8 月逃离那里的。过了 3 个月，11 月 9 日和 10 日，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迫害犹太人风潮”，希特勒青年团员和冲锋队员在整个德国把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摧残殆尽。

基辛格那年 15 岁，应当已经记得当时所受的谩骂、毒打和侮辱了。然而，他总是尽量把这些往事对自己的影响说得轻一些。他曾对一位德国记者说：“我在菲尔特的那段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想不起有过什么值得回味和高兴的时刻。”他对别的采访者也讲过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话。他说：“我的那段童年生活，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不痛快，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受并不强烈。对于孩子来说，那些事情往往并不那么严重。现在有一种时髦的做法，就是用精神分析法来解释一切。可是我要告诉你，童年时代经历的那些政治迫害，并没有决定我的生活。”

人们对基辛格这种态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是“好心的遗忘”，有的说是“逃避现实疗法”。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德国逃生的犹太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好像基辛格总想摆脱纳粹给自己留下的精神创伤，以免使人觉得他的外交观是受个人经历所支配，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然而，即使在疯狂的德国度过的岁月曾在少年基辛格的心灵里留下过什么印象，也早已为他后来的各种经历和成就所磨灭了。基辛格一家到美国以后，住在纽约曼哈顿北头华盛顿高地的一座公寓里，那里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德国难民聚居区。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些中产人家，居民的血统和宗教信仰五花八门，其中有许多是一两代以前从沙皇俄国的反犹大屠杀下逃出来的犹太移

民，他们入了美国籍，并已在美国生儿育女。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形形色色的社会里，新到的难民也是一眼就识别得出来的。他们男的穿着色调灰暗的衣服，女的则是 30 年代德国所流行的那种近乎男式的装束。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许多犹太移民来说，这些新到的难民也是外来人。宗教信仰固然一样，文化教养却不相同。那些从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区逃来的人，大都是工人，他们讲犹太语。而从德国来的犹太人则可以抬出德意志帝国（他们曾经以为这个帝国承认了他们的地位）的几个最有名的学者来夸耀一番。他们的第一语言是德语。早先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对于从希特勒统治下逃生的难民的苦难虽然深表同情，但他们难以忘怀 19 和 20 世纪交替时期他们初到美国时，那些比他们更早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对待他们的那种傲慢态度。

基辛格一家要变成美国人那样，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工作、学校，一切都是新的，不好办。基辛格的父亲发现自己原来在德国的学历到纽约后并不怎么吃香，只好凑合着当一名办事员，这使他灰心丧气。基辛格的母亲保拉·基辛格精于烹饪，正因如此，家道殷实的犹太移民在操办什么事情时总是请她下厨帮忙，她的名气也就渐渐传开了。从最初为附近邻居们偶尔帮帮忙开始，后来发展成为一项专业性的职业。保拉开始承办“犹太教坚信礼”、婚宴甚至一些非犹太人家的节日酒宴。事隔多年，当基辛格在学术界成名以后，她还偶尔重操旧业，帮老主顾做上一席好菜，不过这时她改用了个当厨师的假名，而不再用“基辛格太太”这个称呼了。

孩子们到美国不久就都上学了。基辛格当年便插入了乔治·华盛顿中学的秋季班。根据学校档案记载，这名新生“有语言上的困难”。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他在该校期间一直很腼腆，感到孤独。虽然后来他在掌握和使用英语方面博得了全世界外交家的赞赏，可是他的口音却直到成年也改不过来。一位德国出生的朋友曾说他是“很滑稽的巴伐利亚腔，而不是普鲁士口音”。他多年后还说：“我对于这一点，是深有自卑感的。”

尽管如此，亨利却很快在学业方面取得了好成绩。过去纳粹主义使他无法好好读书，现在美国却使他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了。他成了一名门门满分的优等生。尽管他后来为增加家庭收入而改读夜校，利用白天时间做工，他的成绩还是一直名列前茅。他的数学成绩比历史成绩还好。他在演算中等代数和三角习题方面表现了很高的天分，以至于他一度打算去当会计师。对一个难民来说，那是最容易找到的职业。

亨利求学时期，在曼哈顿一家毛刷厂找到了工作。最初他干的活是挤净鬃毛上的酸水，后来被提升为送货员。

这个送货员拿到中学毕业文凭之后，便很想去学一门专业。基辛格回忆道：“当个会计师就是我那时最大的抱负了。”由于在中学里成绩优异，他进入了免缴学费的纽约市立大学。会计课要到第 23 街分校去上，从华盛顿高地去那里要坐很长一段地铁。

离他 20 岁生日还有几星期的一个晚上，基辛格上完簿记课回到家里，收到一封使他的一生为之改观的公函，劈头写着“致敬”两个大字。这是美国政府宣布某人被征入伍时一种讨好人的手法。于是，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便同几百万青年一起，脱下蓝呢便服，穿上黄布军装，参加了美国陆军。这样一来，基辛格就加速成长起来了。

从 1943 年 2 月起，基辛格在北卡罗来纳州受了 16 个星期的入伍训练。

军事课程的内容很多，要学钻铁丝网、放步枪等。1943年6月19日，基辛格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但堡加入美国籍。同年夏天，他又乘火车北上，到了设在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经过一系列新兵考试，证明基辛格具有相当高的智力水平，于是他便同其他3000名优秀青年一道接受大学专门训练。基辛格在半年时间里学习了各种科目，唯独没有学习会计。岂知这种训练班来得突然，停得也突然，原因是：当士兵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时候，另一些士兵却在这里学习，公众纷纷对此表示反对，高级当局只好下令停办这种训练班。

于是，基辛格回到了射击场——这一回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尔布恩营，在第八十四步兵师当一名步兵。就是在这种枯燥无味的大兵生活中，基辛格遇见了一位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那是194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基辛格正在操练。一名中尉驾驶的吉普车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个列兵，他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权威架势，厉声吼道：“谁在这里负责？”只见一名中校走过去，站到那个吓人的列兵面前。中校说：“我在这里负责，列兵。”这位列兵又提高嗓子吼道：“长官，将军派我到你们连队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战争。”

这个列兵叫弗里茨·克雷默尔，当时35岁。他是10年前从越来越纳粹化的德国逃出来的。老家住在莱茵河附近的一座庄园里，是个新教家庭。他先前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纳翰·沃尔夫冈学院得过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罗马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珍珠港事件以后，他应征入伍，编入美国陆军，接着就为第八十四师的官兵举办一个军政学习班。

中校明白他的来意后，把部队集合起来，听他的讲演。克雷默尔滔滔不绝讲了一通同纳粹作战在道义上如何必要。这位性格外向的克雷默尔，给了性格内向的基辛格很大影响。基辛格听后热血沸腾，忍不住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写了一封表示钦佩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克雷默尔列兵，昨天我听了你的讲演，真是讲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是否能帮你干点什么呢？”署名是“列兵基辛格”。克雷默尔读了大为感动。他后来回忆道：“读其文如见其人，信中毫无矫揉造作，没有我所讨厌的‘令人振奋’、‘真了不起’之类的陈词滥调。那时我就说，‘这个人既有纪律又有闯劲’。”这两个前德国人的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它却影响到以后的好几十年。克雷默尔在给人讲过不止一次的故事中说：“我同亨利初次交谈了20分钟，就有一种十分惊奇的感觉。我遇到的这位20来岁的青年，虽然见的世面不多，却什么都懂。当然我是心里这样想，并没有对亨利这样讲。要是真这样讲，就未免欠机智了。你不能对一个20来岁的青年讲，‘你见的世面不多’。但是，他的才智一望而知，是个天生的奇才”。我心里说，‘真了不起！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有第六官能——历史感的官能’。这倒不是说他的知识渊博，他还年轻；而是说，他急于要知道的并不是一些表面事物，而是产生那些事物的根本原因。他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

这便是克雷默尔同“这个20来岁的犹太难民”初次见面得到的印象。“而他的本族人民对于吞没他们的那股历史巨流却还一无所知。”许多年后，人们常把克雷默尔说成是“发现”基辛格的人，然而这番恭维却惹恼了克雷默尔。他自负地吼道：“不是发现，那样说未免太狂妄了。我所做的——不，我只不过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我对他说，‘亨利，你是别人绝对没法比的，你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天赋’。我当时只不过起了思想催化剂的作用罢了。”

克雷默尔当即为他这个宠儿说项，让他在第八十四师调往欧洲时担任师长的德文翻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基辛格所属的那个部队开到了德国，这个列兵果然得到了这个职务。7年前基辛格离开德国时是个被人鄙视的犹太难民，现在却成为一名美国公民，随着胜利的大军荣归故里了。

第八十四师开进了克雷菲尔德，那是一个被战火摧毁了的城市，在北来因—威斯特伐利亚州，人口20万。基辛格奉命在这个混乱的城市担任恢复秩序的工作。克雷默尔向负责驻守该市的美国将军夸下海口，说基辛格有“非凡的才华和无比的独特见解”，更不用说他讲的德语多么流利了。

这位才21岁的青年走马上任后，不消两三天功夫，就把市政工作恢复了，而且恢复得极好。在这个两天前还为纳粹所控制的偌大城市里，基辛格不出三天居然就搞起了一个能办事的市政府，让克雷默尔大为叹服。

基辛格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卓越才能，使他不到一年功夫便从第970反特队的成员一跃而为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负责人。他把总部设在菲尔特镇以西只有100哩的一座山腰城市本斯海姆。基辛格的权力很大，甚至可以不经盘查就抓人。但是，在处理纳粹分子的时候，基辛格表现了人道精神和自我克制。

当时，基辛格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乘坐一辆从纳粹分子手中没收过来的1938式白色本茨轿车入城。只见他驶过一幢幢中世纪式的房子，最后在当地税务局门前停了下来。他对还站着岗但被吓呆了的德国兵说：“我是反特队的亨利先生，现在我来接管……”他治事有方，连打败了的德国人也不得不敬他三分，尤其是当了他的秘书的伊丽莎白·海德夫人更是如此。过了好多年，她还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来这儿报仇的。”她说：“要知道，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采取这种态度的啊！”

基辛格住在一所叫做“阿道夫·希特勒”的郊区别墅里，一有空他就开着那辆本茨车到当地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对于禁止同德国人进行任何友好活动那条纪律，他执行得非常坚决。海德夫人说：“他善于同人保持距离。他充满自信，十分威严，连他的美国朋友也不敢在他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到桌子上。”

贝格斯特拉斯的老百姓请求美国当局把基辛格留在本斯海姆，可是后来他（这时已升为军士）还是被调到上阿迈尔高的欧洲美军司令部情报学校去了，那里离他的故乡下远。这次升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才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克雷默尔（这时已是中尉）在背后替他使劲。基辛格除担负别的工作外，还负责给校官们讲授如何挖出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他把当地的盖世太保迅速地一网打尽，并为此获得了一枚勋章。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只要了解德国人的心理，这其实并不费事。我只不过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通告，说凡曾当过警察而现在愿意就业的德国人，均可在第二天某时到连部登记。于是，就有几十个盖世太保来报到了。”

据一个同伍士兵后来回忆说，基辛格是一个“孤独的军人，既不随便跟人攀谈，也不随便结交朋友”。基辛格虽然性格腼腆，但在课堂上却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1946年5月退伍之后，校方仍然把他作为文职教员留下来教德国历史。基辛格的军人生涯为他赢得了不少奖品，其中有一枚铜星勋章和两个奖状。现在他又带着陆军军事情报预备役上尉衔和一万美元的年薪开始了新的文职生活。对于一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青年来说，尤其是在德国，可算是高官厚禄了。

然而基辛格并不感到满足。他对克雷默尔说：“我想回国去受第一流的教育。现在我只知道我在学校里教的那套东西，其他则一无所知。”克雷默尔表示赞成，对他的雄心壮志大加鼓励。克雷默尔替基辛格出点子说：“你家住在纽约，只怕这样你很可能就到纽约本地的什么大学去求学。因此你回国后，一定要到全国最棒的一所大学去。”“亨利啊”，他一本正经地说，“大丈夫可不能在纽约本地上大学啊！”

1947年春，基辛格回到美国。他向好几所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但回答都说秋季招生已经结束。当年9月，基辛格根据美国战时“士兵权利法案”，获得纽约州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进了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也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它创建于1636年，因清教徒牧师约翰·哈佛捐赠资产帮助建校而得名。它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查尔斯河畔，校园建筑上布满了常春藤。哈佛大学的毕业文凭，被当作美国官场的敲门砖与护身符。基辛格此刻既有奖学金和军人法案的资助，又有名师的鼓励，再加上本人求知心切、雄心勃勃，于是便决心在哈佛大干一番。过了三年，到1950年，他获得了最优等文学士学位。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再次得到奖学金，两年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再过两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1949年2月，他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便同安·弗莱谢尔结了婚。她跟他一样，也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

亨利·基辛格在其一生的重要转折关头，准能遇到恩人。在哈佛大学，他遇到了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就埃利奥特来说，发现年轻的基辛格也是一大快事。基辛格进入哈佛时，埃利奥特不过50岁，但已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政治学教授，脾气很大，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在那个认为只要有地位就算有专长的世界里，是一个大老爷”。埃利奥特是田纳西州人，早年在范德比尔特是全美橄榄球队的一名健将，20年代毕业于牛津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战时动员署的重要人物，40年代是著名的冷战武士，在国际事务方面顽固主张采取强硬的反共立场，并且一贯认为美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应该起一种特殊的作用。有些同事认为，埃利奥特从未履行过自己的诺言，有点夜郎自大；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哈佛的一位有力人物。他很快就感觉到，基辛格比最聪明的学生还要胜过几分。埃利奥特说，基辛格“不像学生，倒像个老练的同事”。

基辛格则协助利奥特做各种行政事务工作，这种工作每学期都有增无已，他也做得十分尽心。这是讨得教授们欢心的一手。在那些冷战的年代，哈佛大学一直在扩充学术研究机构，几乎每学期都要增设一个新的机构，例如俄国问题研究所等，这样也就需要一批不怕搞点行政事务工作的学者。于是，基辛格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他的前程也越来越宽广了。

有些与基辛格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的这种作风有点拍马屁的味道。哈佛的一位同班同学说：“他总爱跟上层人物拉关系，而不同地位相似的人往来。大家都承认他是个能干透顶的人，可也是个混帐透顶的家伙！目空一切，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我记得他是个清瘦结实的人，推小平头，颇有军人风度，跟埃利奥特很接近。埃利奥特那时对他已经另眼相待了。”不仅如此，基辛格居然还同时赢得了埃利奥特的著名死对头卡尔·弗里德里克教授的青睐。据这位同学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你要么是埃利奥特中意的人，要么是弗里德里克中意的人。而基辛格却能左右逢源，同双方都混得挺好。”

基辛格的勤奋也是令人钦佩的。有时他坐在椅子上从早到晚地看书，一

边咬自己的指甲，直到咬出血为止。他在生活上毫不讲究，长年累月地穿着同一套衣服，像个老式古板的条顿人教授一样。看不出他对姑娘们有什么兴趣，甚至谈话中也很少提到女人的事。正是在大学里几年清教徒般的生活，为他打下了一生大有用处的基础。

当时，在那个雍容如也的学术天地之外，却另有一个世界在急剧动荡。国内，恐吓在压倒勇敢，麦卡锡主义统治了美国；国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整个西欧为此惶惶不可终日，那位为领导盟军打败纳粹出过力、后来出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此时也跑到哈佛的校园里，发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计划，以加强美国的大西洋盟国。胡志明正在越南开始进行一场抗法战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他提供了打败法国人的力量。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在亚洲的东方。哪怕随便扫一眼，也会发现世界正在经历着变动，经历着革命。

在哈佛的许多学生看来，这些似乎都是远方的事，然而在基辛格眼中，每一次大变动，不管发生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都是对他个人的一种威胁，因之感到忧虑，产生怀疑。他不大相信单凭善良本身的力量就能够获胜。当时国际会议上唱出的诸如“人类大家庭”、“和平不可分割”等等高调，并不能为他带来任何安全感。根据他的经验，靠一连串口号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是毫无根据的。这样做，危险太大而希望绝小。他的经验不可避免在使他皈依于现实政治的战略，认为强权乃是历史的基本力量。单有和平的愿望，并不能带来和平。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纳粹当前，而欧洲像基辛格那样的人没有强权，因此数百万犹太人免不了丧生。类似的悲剧，还多得很。

可是他认为，如果把强权本身看成是有害的东西，那就是没有抓住这个老问题的要害。强权本身无所谓好坏，纵然历史上充满了用强权、肆虐行暴的例子，但强权毕竟也是可以用来防止灾难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强权。

这种思想贯穿在基辛格的学术著作中。他在1950年写的毕业论文，自谦地题为《历史的意义——读斯宾格勒、托因比和康德著作的心得》。这篇论文就是他的世界观的初步探讨。

论文的题目冗长，行文沉闷。一位同事评论说：“还带着不少翻译过来的德文气味。”不仅如此，基辛格的心得一写就是350多页——就是在埃利奥特的政治系里，这篇心得也未免显得太长了些。于是后来上面便订出一条规定，今后论文篇幅一律不得超过150页。不过，就基辛格的情况来说，即使早有这项规定，那也无所谓。据基辛格的一位哈佛同学回忆道：“埃利奥特只看了亨利那篇论文的前100页，就给他批了个最优。”

他的这篇毕业论文，对他那雄心更大的博士论文来说，只不过是一次试笔罢了。他本来打算就欧洲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期——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段“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写一个三部曲，对当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垮台作一番详尽的分析。可是后来，他只写了三部曲的第一部，即1812年至1822年那一段，题目是《重建的世界：卡瑟尔累·梅特涅与和平恢复时期（1812—1822年）》。

基辛格说：“在1814年和1815年，这些人对自己所干的事是胸有成竹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他们胡乱搞出来的。所以我便进行了一些分析，看看解决办法是如何产生的。”

他通过分析得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形成了基辛格外交的独

特标志。他认为保守势力同革命势力之间是会经常发生冲突的，并且很有可能导致暴力行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应该建立一种和平结构；其战略是巧妙地利用相互争斗的势力之间的均势，其手段是把秘密谈判同必要时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二者结合起来。

1952年，当基辛格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埃利奥特举荐他的这位大弟子去负责一项新的研究活动，这使基辛格同世界各国首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网。这项活动的名称是哈佛国际讲习班。这个讲习班邀请了国外大约35位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到查尔斯河畔来度暑假，纵论政治、哲学和历史。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兴趣的事情。经过几个夏天，基辛格通过这项活动就结识了好几百位前程远大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而这些人每想到7—8月间在坎布里奇度过的悠游日月，也很感激基辛格。这些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德斯坦，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日本通产相中曾根康弘、以色列总理阿隆等著名政治家。

这个讲习班从一开始就是冷战的产物。它同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一样，也有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中央情报局为了掩人耳目，通过基金会的渠道提供资金。中央情报局历来就是这样利用一些学者和大学进行反共斗争的。

基辛格为这个讲习班进行的活动，只是他进入哈佛以外的权力、政治和外交界的一例而已。正是由于50年代初期基辛格就作为一个公认的强硬派出现，因此他很容易便被吸收到华盛顿的权力核心中去了。当基辛格还只是文学士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华盛顿陆军作战研究处的顾问。1951年，陆军曾派他到南朝鲜去考察军事占领对朝鲜人民的影响。基辛格后来回顾道：“我当时对朝鲜根本一窍不通。”他对许多世纪以来朝鲜同日本的敌对情绪也毫无所知，因为他竟专门路过日本请人给他写介绍信。因此到朝鲜的头两个星期，谁也不理他。等到1952年基辛格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已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心理战略小组的顾问出入于华盛顿了。就这样，他的才干和雄心把他送上了飞黄腾达的初步阶梯。

亨利·基辛格多样化的生涯，在本世纪中叶时是一帆风顺的，在学术界赏识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萨姆纳奖金。他作为哈佛国际讲习班的组织者，也博得不少美誉。他同华盛顿的关系，虽然刚刚开始，却已表现出前途无量。基辛格青云直上——直到1954年，才遭到第一次重大的挫折。

事情是哈佛不肯给他正式聘书，这使基辛格大失所望。他原来满心以为，一旦博士头衔到手，跻身于哈佛教席当然不在话下。至于他为什么遭到拒绝，那是一件永远无法揭开的学术界秘密。但当时了解他的一些同事猜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有人说他这个青年学者“很难相处”，神气十足，专门巴结名教授。第二，一些教授见他对哈佛校外事务兴趣很浓，认为此人热中做官胜过教书做学问。基辛格的一位哈佛同学补充说，不聘请他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而是怕他只想利用哈佛而不为哈佛服务”。

当时，哈佛拒聘这一手对他是莫大的打击。这个消息在学术界传开后，芝加哥大学当即表示愿意请基辛格去当教授，但他谢绝了。他的一些朋友鼓励他留在哈佛，接受一个临时教员的职位，指望总有一天会变成正式聘请的。他果然留了下来。“此人有一股韧性！”克雷默尔谈到基辛格时说，“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他有三头西西里骡子加起来的那股子蛮劲，人有了这种劲头，什么事干不成啊！”

这时，在纽约忽然有了一个严格说来不属于学术界的职位需要人。一个极有影响的非官方团体对外关系协会（它有时被人称为“真正的国务院”）出版的《外交》季刊需要一名编辑主任，由该杂志的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到哈佛去物色人选。基辛格的朋友们——包括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立即写信推荐他。结果基辛格并没有获得这个职位。原因是，写了几十年对外政策文章的阿姆斯特朗认为基辛格的文风太呆板。不过，基辛格在离开协会会所时，还是给那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姆斯特朗的同事、当时任协会理事的乔治·富兰克林回忆道：“亨利是个富有自信心的人，谁同他谈话也会受到感染而增加对他的信心。”阿姆斯特朗发现这个青年学者才气横溢，便请他考虑担任另一项工作。

当时对外关系协会搞了一个由 34 人组成的很有干劲的小组，专门研究在核时代除了全面战争以外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苏联挑战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报告人，即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负责人。基辛格在哈佛的恩师埃利奥特教授竭力劝他接受这个职务，为此给协会写去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此外还有几位有影响的人如施莱辛格和麦乔治·邦迪（当时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也赞助这件事。

1955 年 3 月 8 日，基辛格写信正式接受了这项工作，信中流露他惯有的自负口气。他向对外关系协会表示，他接受这项工作，“不仅是因为看起来这个工作大致符合我本人的想法，而且也因为我很喜欢协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亨利和他的妻子搬进了纽约的一座公寓里。基辛格便埋头于这项研究工作，这是他一生中另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第二章

志在白宫

对外关系协会的会所座落在纽约第 68 街和公园路口的一座古老的大厦里，这是基辛格进入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起点。在协会举行的世界事务讨论会上，在协会招待来访的总理和外长们的正式宴会上，他结识了不少具有广泛政务、外交、军事、实业和新闻工作经验的权势人物。这些人接受一种既定的观点，即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通过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领导的世界范围的反共联盟体系来遏制苏联。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抱有怀疑。他们觉得，一有侵略，不论在哪里发生，不论规模大小，就威胁要以全面核战争来加以反击，那是说不通的，对外关系协会鉴于这种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全面战争的战略所包含的危险，要求这个研究小组提出另外一些办法。小组的成员，全都是有关方面（从生产武器以至制订政策）的专家。

让基辛格担任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负责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小组研究的题目正符合他一些时期以来的想法。他并不是反对当时政府观点的唯一学者，但他是最早提出质疑、主张彻底改变战略的人之一，并且是在有影响的刊物《外交》季刊上这样做的。该刊 1955 年 4 月号上有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军事政策和“灰色”地区的防务》，这篇文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了有力的批驳。虽然他是协会的一个新手，名字后边只不过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无所顾忌地提出了他关于什么是保卫美国的最好战略的思想。

无论在协会工作时间还是下班以后，基辛格无时不在考虑，怎样在打核战争则造成浩劫、搞绥靖则心有未甘这两个前途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借以摆脱正像他后来所说的“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作一抉择的困境”。一句话，就是要设法学会如何在核弹时代生活和生存下去。基辛格以其特有的精力，全神贯注在这项为期一年半的工作之中，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的思路。

他这番努力的成果就是他那引起争论的研究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 1957 年在协会主持下出版的。这本书标志着关于核战略的大辩论的一个转折点。

这本行文时而流畅、时而晦涩的书，对世界的看法是暗淡的，把苏联描绘为力图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稳定的一个革命的、扩张主义的国家。这个观点反映了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的立论：保守和革命两种力量的斗争是永无止息的。

全书贯串着基辛格内在的浓厚悲观情绪，带有一种“充满忧郁的心情”，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基辛格论及 1914 年以前弥漫欧洲的幻想时写道：“太平日子过久了，悲惨是什么滋味已经不知道了。国家可以覆灭，乱子有时无法收拾，这一切都忘光了。”基辛格接着写道：“核时代的难处在于：现代武器可了不得，因此一提到打仗就引起反感。但是如果不冒打仗的风险，就等于奉送一张空白支票给苏联统治者。”

因此，美国在不准备打全面核战争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对付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压力呢？基辛格提出了一条出路：实行分级威慑的政策，设想到有限战争之始就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基辛格写道：“有限核战争是我们对

付核大国或一个能用人力来代替技术的大国的最有效战略。”

基辛格这个不落旧套的建议使整个华盛顿为之哗然。核战争可以是有限战争的提法，是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家们的基本假定不相容的，此辈认为只要一旦按了电钮，这场核战争就势必是全面的。美国的军事体制就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上面的。基辛格却独树一帜。他认为应该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概念，须知在新的世界形势下美苏两家的核弹势均力敌，因此，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只有打有限战争之一途。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有限战争“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于影响对方的意志而不在乎于粉碎对方；使对方看来接受我方条件比继续抵抗有利；要争取达到特定目标而不要追求彻底消灭敌人”。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连续 14 个星期列在畅销书名单上。它使基辛格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金和驻外记者协会的奖状。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外交记者查默斯·罗伯茨说：“这无疑是 1957 年、甚至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尼克松副总统曾为此专函向基辛格致贺。杜勒斯国务卿的“大规模报复”方针受到了这本书的质疑后，他接受了有可能打有限核战争的思想。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影响的参议员随身带着这本书。五角大楼也研究它，虽然位居要津的将军们强烈不同意基辛格关于把陆军和空军合并成一个军种的建议。

有不少教授同意基辛格的观点，认为应该有一种战略方针来把核力量变为政策。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他的结论感到震惊。他们说，基辛格关于美苏必须如何“合作”使战争保持有限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是不合逻辑到了极点。《纽约邮报》上出现过《“有限”战争是通向还是脱离无限战争之路？》这样一条标题。20 世纪基金会理事奥古斯特·赫克谢尔问道，一个民主国家明知自己还拥有巨大的战略核力量可供使用，能甘心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失败吗？乔治·凯南和迪安·艾奇逊怀疑苏联领导人能否合乎理性地处理核威胁，不管是有限战争的威胁还是全面战争的威胁。这两人问道，难道他们的想法同我们一样吗？怎么能假定不同对象对于同样的刺激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呢？

这本书的问世以及它所触发的论战，使基辛格一跃而居于专门研究核武器和国家战略问题的学术界、即专家学者治国论这个新学派的最前列。当基辛格在 1957 年夏天回到哈佛时，他不仅仅是一名有才华的博士，而且是一位国际闻名的国防战略家了。他离开哈佛的短时间却造就了赫赫的名声。哈佛校园外面的世界给了他哈佛过去拒绝给他的东西，即承认他对自己才能的估价。当时他是 34 岁。

很明显，哈佛对基辛格的归来是高兴的。他接到了聘书，被任为政治系讲师。1959 年提升为副教授，1962 年升任正教授。这时，他已经有一子一女，女儿叫伊丽莎白，儿子叫戴维。

基辛格虽然回到了哈佛，但还同外界保持着联系，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顾问。他是 50 年代初在弗吉尼亚州昆底科城的一次军事战略问题讨论会上结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基辛格度假时，在对外关系协会同洛克菲勒再次见了面。两人的强硬路线观点非常吻合。基辛格写完那本书以后，洛克菲勒便要他以部分时间担任专题研究工作负责人——这是由洛克菲勒出资的一项研究工作，为期一年半，任务是研究今后美国的国内外重大问题。

基辛格再次成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美国人的组织者。一位听过基辛格在

国家安全问题小组发言的人认为他“了不起，真棒”。

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写成的最后报告于1958年1月6日发表，成了报纸头版新闻。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安全的军事方面》——人们非正式地称之为“对苏联人造卫星的回答”。它反映了基辛格的观点，主张制定一项以战术核武器为中心的战略（这表示他那个引起争论的主张已逐渐得势）。报告说：“必要时不惜打核战争的决心乃是我们确保自由的部分代价。”与洛克菲勒的“家家户户搞防空洞”的口号相呼应，报告要求扩大全国民防系统，并大大增加国防开支——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每年递增30亿美元。

这个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的报告受到五角大楼的赞赏，因为在五角大楼眼中，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行动都包藏着苏联的极大祸心。国会山上反应热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坎农附和说：“防务方面无论用多少钱都不为过。”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说，洛克菲勒报告“完全戳穿了那些半吊子的对付苏联军事威胁的措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敦请洛克菲勒“尽快”到他所主持的那个参院战备小组委员会去作证。

事实表明，美国中间阶层也紧跟在国会之后，急于想多了解一些这个报告的内容。洛克菲勒在报告发表的当天就在电视节目《今日》中与节目主持人戴夫·加罗韦讨论了报告。洛克菲勒原想利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来发动他竞选纽约州长的政治运动的，但是在这次节目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报告本身。会见完了，加罗韦随便说了一句，谁对这个报告有兴趣，都可以向全国广播公司函索。当时他手下的一个编辑发表意见说：“你得每份附送一辆福特V—8型汽车才有人要。谁愿意写信要一本令人费脑子的书呀？”有1000封来信就算不了不起了，不可能再多了。但是第二天邮差竟送来4.5万封函索信件，第三天又送来了20万封信。来信渐渐堆积如山，数不胜数。这种现象要么说明那个报告写得出色，要么表示国民对于未来是否还有指望忧心忡忡。基辛格的名字在全国各地的邮箱里出现。

基辛格认为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很混乱，不断加以抨击。洛克菲勒报告问世两月后，基辛格在芝加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讲台上攻击了首都的政策制定人。他几年来对政府、科学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进行了观察，对于政策制定工作竟不掌握在专业人员手中而掌握在律师和企业家手中这一情况深感痛心。他说苏美谈判一般总是专业人员对付外行人。他得出结论说：“通常是专业人员得胜。”

他还不断抨击他认为过时的国防政策。1958年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他重申他的主要论点——在核时代，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政策必须抛弃。基辛格警告说：“这个政策大危险；同时，在我看来，也太花钱。”美国必须制定一项灵活反应政策，以适应当前的各种挑战。在泛泛谈论中东问题时，他说，不应该让美国总统在危机中面临是否要冒牺牲3000万美国人性命的危险来保卫贝鲁特这样的问题。（那年夏天，黎巴嫩危机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基辛格说：“事实上，恐怕美国总统只能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而这样就会鼓励苏联用逐步蚕食的侵略手法把整个世界夺过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苏联要统治世界是毫无问题的，而美国有责任来阻止它，应尽可能采取除全面核战争以外的办法。因此，他强调采取有限战争、甚至有限核战争的威慑战略。

那几年中，基辛格在哈佛的事业也有发展。由于他的同事麦乔治·邦迪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哈佛新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曾在国

务院里襄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罗伯特·鲍伊。他后来谈到基辛格的这项任命时总是说：“这是我一生的最大错误。”

鲍伊和基辛格的对立，是由于两人个性不合和政策不同造成的。鲍伊认为基辛格刚愎自用，太爱闹摩擦。按照鲍伊的设想，这个研究所应该专搞研究工作，而他的副所长却认为同时还应该搞教学。更重要的是，鲍伊的多边核力量方案受到了基辛格的轻视。这个方案建议由不同国籍人员混编一支由25艘水面舰只组成的北约组织多边海军力量，每艘携带8枚核弹头。基辛格认为这个方案在战略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触犯欧洲人的尊严。多边核力量后来成了肯尼迪总统的国策，但为约翰逊总统所抛弃。鲍伊和基辛格之间勉强的休战最后是在1960年以基辛格的辞职而结束的，那时基辛格已经独当一面，当上防务研究工作的负责人了。

基辛格这位教授，由于他介绍情况时能把复杂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深受爱挑剔的白宫记者团的赞扬。他在课堂上也表现了这种才能，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循循善诱的教员。基辛格讲授的“国际政治原理”是哈佛大学的重头课之一，他也能讲得符合要求。据哈佛大学的学生报《哈佛红报》报道，他的课“内容丰富，总能引人入胜，有时还妙趣横生”。

他享有这样的名声：一个知识界的要人，同外界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基辛格的一个哈佛同事说：“对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来说，在哈佛呆着是不过瘾的，在这里休想沾到权力的边。”

基辛格居然克服了地理限制，把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请到哈佛来。正如他过去主持国际讲习班时曾邀请一些前程远大的外国人在暑期来参加学术讨论那样，他现在当上了防务研究工作主持人的新职，又不断向华盛顿发出邀请。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部长、助理部长、帮办们常常出席他的防务政策讲习班。对他们来说，可以借着向国家下一代上层人物解答不带党派色彩的问题的机会，走出雾谷（指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办公室去透透空气，又何乐而不为？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让他的学生见见那些行使权力人物的机会。自然，他不是不知道，由他出面邀请这些著名人物，不用说也扩大了他自己同华盛顿权要的联系，基辛格这种邀请客人来讲课的做法，滋长了某些哈佛教授的疑心，觉得其实他不是自己教课，而是依靠外力。不过，要评判他的做法，最关键的还在于学生的态度，而学生们都喜欢这种做法。主持人也喜欢这种做法，他一个劲儿亲自扮演唱反调的角色，同他的客人们论战，有时讲得得意忘形，越出了教授的本分。

基辛格在整个50年代后期都专心研究核战略问题，当时哈佛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举办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当代问题讲习班，基辛格参加了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讲习班。

基辛格的战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认为在措词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依靠核武器来解决核武器所引起的难题。可能由于这种种批评，他后来对自己的战略思想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放弃了把有限核战争作为“我们最有效的战略”。这个改变反映在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选择的必要：美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之中。这本书在1961年1月出版，恰好是肯尼迪就任总统之时，当时肯尼迪宣称要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为了保卫自由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西方抗击共产主义传播的能力，基辛格和过去一样感到担忧。他谈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时，仍然把中苏联在一起，尽管其他的政策分析家已开始觉察到中苏之间的分歧。他发出警告说：“我们在进行全面战争的力量

对比上逐渐落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有限战争。我们的常规力量不断在萎缩。”

基辛格不相信同苏联搞缓和的想法——这一想法自 1959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同赫鲁晓夫总理举行“戴维营精神”会晤以来已获得广泛的支持。他觉得两种不同的社会对谈判抱着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条约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有法律义务；不但有实际效力，而且有道义约束。而在苏联，让步只不过是持续斗争中的一个片段。”

哈佛毕业生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把“新边疆”政策带到了华盛顿。新总统还从自己母校招来了一大批秀才——其中有：麦乔治·邦迪，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任总统特别助理；以及亨利·基辛格，不过，这时基辛格还只是往他想挤进去的那扇门里伸进了一只脚。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位 8 年，不过是从原地不动变到维持现状，一无足观。肯尼迪时代的开始可是知识界的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定下了调子，新政府至少口头上开始表现出想竭力干一番事业的样子。

基辛格在这个新华盛顿的生涯，开始时是大有前途的。一个例子是，肯尼迪总统深受基辛格、加文将军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人的著作的影响，放弃了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方针，改而采取对苏联的挑战作出分级军事反应的政策。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他的老朋友施莱辛格向新总统推荐，基辛格被任命为三个有威望的机构的政府顾问。这三个机构是：麦乔治·邦迪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和兰德公司。

本来这时对美国和对基辛格个人都似乎是一个大好机会，但是结果却使基辛格很扫兴。他出的对外政策点子没有人听，他的作风和肯尼迪班子的作风格格不入，因而他从哈佛出来担任正式的（虽然是兼职）政府顾问为时很短。

基辛格对“新边疆”和新总统感到失望。基辛格回忆说，肯尼迪“很有意思”。但是基辛格对总统为人是否有意思并无多大兴趣。他喜欢的是遇事决断，态度认真，目的明确，而他在肯尼迪身上却找不到这些素质。他又看不惯肯尼迪这帮人的“纨绔”作风——什么游艇啦，滑雪啦，在游泳池里胡闹和乔治敦玩的那一套。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正经的人”是不应该那样的。

但也并不仅是作风问题。基辛格虽然欣赏总统的才华，但对肯尼迪外交上的大政方针却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位总统完全不懂得力量的限度，随随便便就答应援助别国，妄自以美国是无所不能的。在基辛格看来，这些都是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凌驾分析的恶劣作风。

在敏感的柏林问题上就存在意见分歧。1961 年 8 月，苏联突然在德国前首都中间筑起了一道墙，基辛格感到很震动。他曾一再警告，西方不应作出使“柏林地位恶化”的“让步”。他认为筑墙是一个侵略行为，如果不加制止，可能升级到一场世界大战。肯尼迪的看法不同，他曾私下对左右的人说，这道墙实际上起到了稳定东欧局势的作用。表面上，美国也发出过一个正式的抗议，并且调兵遣将想吓唬苏联人，可是那道墙并没有垮下来。总之，西方在柏林问题是输了一着，而基辛格认为柏林正是盟国的欧洲政策的试金石。

基辛格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不同意肯尼迪的政策。肯尼迪采纳了鲍伊提出的北约组织多边核力量方案，而基辛格则仍然强烈反对该方案。肯尼迪推

行他的“宏图大略”——敦促英国加入萌芽中的欧洲联邦。基辛格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理由至少有两点：它同戴高乐的维护法国利益的政策相冲突，它无视整个欧洲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

基辛格信奉面对面的交换意见，他借施莱辛格之助，几次想绕过邦迪，跑到总统那里面陈意见，但总是未能达到目的。邦迪紧紧把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是给基辛格吃闭门羹。肯尼迪左右的一些人后来说，基辛格在内部唱反调闹得太过分了。有一回，肯尼迪向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议论基辛格的作风说：“有点令人讨厌。”

基辛格曾给肯尼迪政府惹过一连串外交上的小纰漏。1962年1月，基辛格根据一项文化交流计划在印度访问时，有人问他巴基斯坦会不会同中国结盟。基辛格回答道：“不会。巴基斯坦绝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这句话使巴基斯坦舆论大哗，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还提出了外交抗议，对基辛格的“失言”表示不满。邦迪给基辛格去了一封电报说：“请你免开尊口，否则我将下令把你召回。”

过了一个月，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道扬镳了。这位顾问被劝辞了职。有个同事后来回忆说：“他是大发脾气走的。”不过，他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及兰德公司的两个顾问职务还保留着，这两个机构都不需要天天同白宫联系。他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里一直呆到1967年，在兰德公司还多呆了一年。

若干年后，基辛格向朋友们承认，他“悔不该莽撞行事，错过好机会”。他回顾那段时期，不胜感慨地说：“60年代初，我第一次从上层看到了政府——现在的人往往指责我那个时期过于卤莽，过于乐观，甚至有点妄自尊大。有些批评倒很中肯。然而，那时的风气还是符合地地道道的美国精神的：有问题，只能上，不能躲；衡量一个人不但看他的成败，也看他的努力程度；宁愿好大喜功，不甘庸闲遣日。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反对派都认为大家是在为一个共同事业奋斗，而不是争吵不休，势不两立。”

从1962年到1965年，基辛格全部时间都在哈佛，除了1964年曾有一段时间出去帮助洛克菲勒争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外，一直在研究复杂的大西洋安全问题。他把他的见解写成了十多篇文章登在多种报刊上，如《外交》季刊、《记者》杂志、《哈泼斯》月刊、西德《世界报》、法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以及《公共事务》杂志等。除了这些文章，他还写了一本《麻烦的伙伴关系：重新估计大西洋联盟》的书，1965年4月出版。真是个多产作家！他的文字讲究匀称，别具一格，但有些读者觉得气势有余而优美不足。一个老朋友说：“他这个人文章写不好却偏要写，由于下了苦功，居然也勉强通顺，这完全得力于他超人的毅力。”这时，基辛格已不必为家务分心，因为他和安妮终于在1964年离婚了。他们结婚15年，关系一直不睦。安妮后来回忆说：“那是没有乐趣的婚姻生活。”

基辛格在文章和书集中抨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西欧的政策。基辛格指责说，在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极少进行认真的商讨（后来他当权时，人家也拿这条回敬他）。另外，他觉得美国官方对欧洲人、特别是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态度太傲慢了。华盛顿不了解欧洲人从马歇尔计划时代以来已经成长起来，不再喜欢美国那种家长作风了。他写道，美国在欧洲问题上不应强加于人。他说：“如果我们硬要在一切地方、包括欧洲继续包揽一切政策，我们的资源将不堪负担。总有一天，我们会认为欧洲有点自主性不但不是坏

事，反而是好事。”

基辛格也许因为是欧洲出身的，也许因为是研究世界史的，他从来不大赞成只有美国才能决定世界道义和政治命运的论调，也不大相信美国初创时代先辈所传下来的所谓美国力量无所不能的想法。例如，他根本不能同意迪安·腊斯克那个美国万能的信念。1962年2月，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曾有一次在同记者们就越南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把食指按在咖啡桌上说：“只要美国在哪里加一点压力，哪里就得屈服。”

基辛格颇以这种美国佬的自我陶醉为虑。1966年6月，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他对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说，美国越来越厉害的“包打天下”的倾向，使他很担心，“我们的精神力量哪里吃得消啊！”加在美国领导身上的负担可真太大了。基辛格发表这些见解时，美国正深陷在越南战争之中，但是他没有公开抨击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他已经从自己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公开发表批评言论所得的教训中学乖了。但是他影射越南问题是明显的。

越南战争成了亨利·基辛格进入约翰逊政府的敲门砖。他担任政府的对外政策顾问。这是第三次了。这一回，他有效劳的机会，是得力于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援引。洛奇是尼克松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搭档，后来当了肯尼迪的驻南越大使。1965年7月，约翰逊总统委派洛奇再度出使西贡，人们认为这项人事安排显然带有政治色彩，目的是表示两党一致支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投入更大力量，因为那时是每送一批士兵去越南，围绕这场战争的争论就激化一层。洛奇要求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他当大使期间委任基辛格和洛奇的儿子（也在哈佛教书，名叫乔治·洛奇）当国务院顾问。这个要求是由约翰逊的一项建议引起的。洛奇后来回忆道：“约翰逊建议我从外面找一些人出出主意，提一些新点子，因为他感到他那班常年顾问提上来的都是老一套，而他需要的是一些新鲜思想，因此我想了一想，便请了基辛格。我当年在哈佛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同他很熟，对他的才干很钦佩。”基辛格的任命不到一个月就批准了。巴不得回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基辛格，从此便跳进那波涛汹涌的越南问题决策工作中去了。

越南问题不是基辛格的专长。他的兴趣一向集中在核战略、欧洲、大西洋联盟等问题上。他游历过的世界是西方，不是东方。他对欧洲如数家珍，却从未涉足东南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对他也不能说是完全陌生的。哈佛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舆论的温床。基辛格对官方人士的思想是熟悉的，这些人老是说，看到“隧道将尽，光明在望”。他阅读来自西贡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经常同约翰逊白宫的乐观言论唱反调。他十分了解法国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场肮脏战争。

基辛格曾访问西贡多次，第一次是1965年10月，同行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克利福德是华盛顿有势力的律师，担任过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民主党总统的顾问，后来在1968年初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的任务是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作出估计。

当然，基辛格同明显的掌权人物进行了商谈——美国方面，找了大使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西贡方面，找了阮高其将军、阮文绍将军和其他高级将领。但他也知道官方讲的那一套总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他便跳出了“要人”的圈子，开始向不当权的人们征求意见。他同佛教领袖、当地的知识分子、村长、记者们谈话。他认识到，西贡和偏僻的村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

越南，因此也下乡走走，询问一些有关越南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情况。越南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有什么民族传统？他们有政治基础吗？他们能应付战争吗？南越的军队情况怎样？能改进吗？怎么改进？要多久？最重要的是，除了源源不断运进美国军队和战争物资以外，美国还能用什么更切实的方法来帮助西贡政权？

他在这次走马看花式的访问中竭力收集资料以后，仍然按照他的老习惯，不向别人只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一次是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这个亨利向那个亨利说了些什么，是保密的。但是过了几天，基辛格和克利福德刚离开西贡，老资格的《洛杉矶时报》远东记者杰克·福伊西便发出了一条关于这次访问的消息，登在该报头版。报道说，他们“回国时深感震惊”的是，虽然大量投入了美国兵和美元，“他们发现在越南政府（指西贡政权）当前和未来的领导人中，几乎完全缺乏政治上的成熟性和无私的政治动机”。

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思想库”作了短暂停留，报告他南越之行的调查结果。那里的专家不是认识基辛格本人便是熟悉他的著作的，因此来听的人十分踊跃。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后来回忆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对这场战争最精辟的分析。他了解军事形势，政治形势，对于交谈过的越南人，谁个的话值得听，谁个的话要打折扣，他都心中有数。据他估计，我们正在执行的军事战略非常错误，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叛乱战斗，而是在对非常规的敌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子钉死在西贡一小撮声名狼藉的政客和将军们的旗杆上了。”

基辛格一回到首都，立即向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汇报。他按照标准的基辛格方式办事——进行个别的私下会谈。他分别同邦迪的特别助理乔纳森·穆尔、邦迪、麦克纳马拉、乔治·鲍尔等人谈了他在越南考察的结论。穆尔后来回忆说：“天晓得他对别人讲了些什么！估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也许是一模一样的，但谁也不知道，根本无案可查。”基辛格喜欢搞私下谈话，当然不能说是由于他有怯场的毛病，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找人个别谈是为了在沟通思想方面收到最大的效果。

基辛格有他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他仍然把世界各部分看成是互相关连的，任何地方的平衡起了变化都将产生连锁反应。他这个观点1966年夏曾在《展望》杂志的特约专栏里发表过。文章劈头就说：“越南战争主要有两个问题：撤退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作了这样的开场白以后，他接着就阐述据他看来如果美国在人们可以称为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情况下撤出越南，世界各地将产生什么反应。

第一，“一个三等的共产党农民国家打败了美国”，将使“全世界共产党内部斗争中的最好战派系的地位得到加强”。第二，美国撤出将使美国的东南亚友邦，包括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灰心丧气”。第三，日本和印度见到美国无力“履行义务”，可能将其“长远倾向”从华盛顿移向北京或莫斯科。最后，他写道：“如果美国在亚洲表现如此无能，势必也会在其他地方降低对美国诺言的信任。”他的结论说：“我们在越南作战，已不仅仅是为越南人。我们也是在为我们自己，为国际秩序的稳定而战。”

在相当程度上，基辛格之反对美国撤出，是不加批判地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思想。当时迪安·腊斯克总认为中国硬是要至少控制亚洲。他一再警告北约组织说，要是美国很快撤出越南，就连冰岛和挪威那样“遥远的”国家也

会受到影响。但欧洲人不大理会这些警告。他们不相信，一俟最后一个美国大兵离开越南，苏联就会突然不顾一切进行扩张。

但是，基辛格同腊斯克一致的地方也只到此为止。他并不同意政府要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的内心欲望。他认为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无论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愿让北越这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吃败仗；第二，因为已经有“一个共产党‘影子政府’渗透到了南越生活的各方面。”他写道：“越南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和心理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基辛格认为，美国要建立和扩大包括“人口越多越好”的“安全区”才是上策，这样可以“使我们在会议桌上有可靠的谈判筹码”。

几个月后，1966年10月，基辛格重访南越——这一次是同丹尼尔·戴维森一起去的。戴维森是协助威廉·邦迪工作的一位年轻律师。与1965年那次调查旅行不同的是，基辛格这次负有一个具体任务：协助拟定（如果可能的话）一项经过改进的“招抚”计划，目的是向共产党方面高级人员搞策反。事毕，将在约翰逊总统本月底去马尼拉同美国的亚洲各盟国举行首脑会谈的途中，由他向总统汇报调查结果。这次南越之行又使他十分失望。基辛格对一个村庄的访问就说明了这一点。据后来透露，当地的美国顾问向基辛格保证说，这个村子已经“85%平定了”。几小时以后，他从越南人那里了解到，事实上这个村子每5个人中就有4个向越共纳税。基辛格于是又找那个顾问个别查问这种向敌人纳税的情况，怎么能说这个村子85%已经平定了呢？顾问说：“是这样的，越共不敢进村来，村里的人是用邮寄方式向他们交税的。”这个典型完全暴露了美国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更加深了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怀疑。

基辛格从西贡飞到马尼拉向邦迪和洛奇作了汇报。此行本身倒没有什么重要，不料却埋下了几年后哈佛大学反战学潮中的一个小小风波的根子。由于基辛格要到菲律宾，使他不能主持一个讲习班，他便嘱咐戴维森转请当时任总统顾问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打电报给哈佛的富兰克林·福特院长解释一下。哈里曼觉得这件事由政府出面未免小题大做，但他还是指示他的一个助手罗伯特·米勒照办了。电报说：“美国政府以哈佛大学慨允借调基辛格教授赴南越成功卓著地执行一项任务，深表感谢。此项任务极为重要，唯有基辛格足以胜任，且必须在马尼拉会议之前完成。”这个电报当时归档了事，但后来却被哈佛的一群反战学生袭击在校长办公室、抄查校长档案柜时翻了出来。这份电报就被用来说明基辛格和“约翰逊的战争”有最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不过是一般家长为孩子缺课给老师的一纸“假条”，只是写成公文格式而已。

基辛格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秘密谈判家的，但是他早在约翰逊政府时代就开始见习秘密外交来了。他成了一个代号叫做“宾夕法尼亚行动”的关键人物。这个行动就是由华盛顿通过基辛格所熟识的一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同河内极秘密地进行通信。那个法国微生物学家认识另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认识胡志明。基辛格和这两个法国人都不是精通外交谈判艺术的老手，只是抱着寻求结束战争的动机。他们的目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要以美国停止轰炸换取河内同意“迅速”进入“建设性”的谈判。这场戏是在1967年6月到10月期间演出的，虽然没有能使双方开始谈判，却是次年把交战双方一起弄到巴黎的那个秘密外交活动的先声。

故事是从喝开胃酒闲谈开始的。当时任国务院顾问的基辛格、微生物学

家埃尔贝·马科维奇和一小群学者在巴黎聚会讨论一系列国际问题。他们两人历年都参加这类聚会。上一次是 1966 年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海滨休养地索波特举行的。两人讨论越南问题时，马科维奇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雷蒙·奥布拉克 21 年前认识胡志明。奥布拉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后来在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留学，现在是工程师和行政官员，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胡志明曾在 1946 年率领越盟代表团来到巴黎郊区枫丹白露，同法国谈判越南独立问题，但未获成功。他在附近的奥布拉克的别墅里住过一些时候，后来这位河内来客当了主人的一个孩子的教父。能不能利用奥布拉克这个渠道进行和谈呢？基辛格相信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私下请示邦迪，邦迪请示了腊斯克，腊斯克请示了总统。过了几星期，从华盛顿发来了同意进行的信号，但规定基辛格不得用美国政府官员的名义，只可用有关人士的身份。这是事先布置好的一旦“宾夕法尼亚行动”出了问题时的遁词。

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征得戴高乐总统的同意，在 1967 年 7 月 21 日飞往河内，三天后，见到了范文同总理。他们为了说明此行并不单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便把他们同华盛顿的半官方联络员基辛格的关系告诉了越南政府总理。接着，马科维奇“作为个人意见”扼要叙述了一项两点建议：美国停止轰炸，越南限制运往南方的战争补给。

范文同回答道：“我们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如果这一点实现了，谈判就没有多大障碍了。”

他接着说：“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美国有很大的力量，美国政府想要打赢这场战争。约翰逊总统正受到病痛的折磨，这个病痛就叫做越南南方。我们也认为战场上的形势是决定一切的，这场比赛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有些人希望把战争限制在南方。但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决心要继续对北方进行战争。因此，我们认为对北方的空袭可能增加。

“我们准备他们轰炸我们的堤坝；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领土上迎战。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们的军事潜力不断增长……我们为独立而战已经 4000 年了。我们三次打败过蒙古人。美国军队纵然强大，恐怕也未必有成吉思汗那样可怕吧。”

越南总理坚持美国军队必须撤出越南。但是他说，在时间表上他可以通融，他了解有一部分美军可能要留在南方直到达成政治解决为止。他还说：“我们并不想使美国屈辱。”北越无意把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强加于南方，也不强求立即统一全国。

那天早些时候，总理陪同奥布拉克会见了胡志明。会见后，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使用预先约定的密码，给基辛格发了电报。两人从河内回到巴黎后几小时，基辛格就会见了他们。基辛格向国内发出了下列报告：

奥布拉克说，见到胡志明时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胡志明老得多了。他穿着一件中国式长袍，走路拄着手杖。但是他的智力不减当年，眼神里仍然闪烁着往日的光彩。他似乎乐于担当老祖父的角色，而不过问细微末节的问题。

奥布拉克带来了一样礼物，一小块彩色室石。胡志明回赠了三件礼物：一段绸子给奥布拉克的女儿，几本书，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是取自据说在越南上空击落的第 2000 架美国飞机残骸的金属做的。他还记得奥布拉克所有三个孩子的名字。

在谈了奥布拉克一家情况大约 15 分钟之后，奥布拉克问道：“主席先生，

您知道我的来意吗？”

胡志明回答说：“知道。”

奥布拉克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胡志明回答道，他不喜欢“在越南的和平”这个提法，因为这给人印象好像美国和越南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其实，美国是侵略者，必须受到谴责……

胡志明说，关于谈判的问题具体由范文同掌握。然后他又说：“记住，很多人想骗我。都没有骗成。我知道你不想骗我。”

然后他又拉起家常来了。他听说奥布拉克卖掉了他 21 年前住过的那所房子，表示很遗憾。

“下次去巴黎时叫我住哪儿呢？”他接着问，他要是去巴黎会不会受欢迎，但回避了他是否愿意得到邀请的问题。

50 分钟后他结束了谈话，由人护送出了房间。范文同送奥布拉克到汽车前。他说：“我们尽可能不让胡主席在具体事情上操心。”

他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希望他能活到亲眼看见祖国统一。”

8 月 3 日，一小批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碰头，研究基辛格的报告。就在那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向南越增兵，使美军总数达到 52.5 万人。五天以前，他还曾命令对 16 个新的重要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有几个很靠近河内市中心。这些官员们花了 8 天功夫拟出了美国的答复。他们叫基辛格通过马科维奇—奥布拉克渠道将以下信件带给范文同：“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轰击，如果这样做能迅速导致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以求双方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我们的假定是，当谈判不论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不利用停止或限制轰炸的机会。如果它利用这个机会，显然是与谈判所要达到的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间朝向解决问题的方针背道而驰的。”美国的这个立场，与一个月后约翰逊提出的“圣安东尼奥和平方案”很相近。

8 月 17 日，基辛格在巴黎再次会见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送交了上述信件，并根据指示告诉他们说，美国准备进行谈判，公开的或秘密的都可以；并说，部分减少轰炸要比完全停止好，以免使谈判受到突出注意。三个人商量的 5 小时。基辛格对两点说得很明确：“建设性的讨论”一语，是指美国政府强烈希望避免一打打一面进行旷日持久的朝鲜式谈判。“利用”一语，是指“增加向南方运送人员和补给”。马科维奇向基辛格说，他对美国的猛烈轰炸感到不安。基辛格说，在没有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情况下，暴力的强度可能还要继续上升。他催促两人赶快成行，把信件递交给北越人。

这两个法国中间人次日就去办签证，但没有弄到。在这之后的两天里，他们在塞纳河岸的一个旅馆里同基辛格碰头，而不在马科维奇家里，以免被人发觉。这时，三重唱发展成为四重唱了，哈里曼的助手切斯特·库珀陪同基辛格一起出场，以表示美国是严肃认真的。基辛格告诉他的联系人说：“从 8 月 24 日起，对河内附近的轰炸方式将会有明显的改变，目的在于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作为我们善意的一种表示。”这话是直接来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里来的，这项限制的有效期是“10 天”。

8 月 21 日和 22 日，美国军用飞机对河内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造成了“大批生命”的损失。

8 月 25 日，这两个法国人与北越驻巴黎代表梅文蒲见面，再次要求签证。梅文蒲回答说，在轰炸中访问河内太危险。两个法国人回答道，他们已经得

到在河内地区的安全保证，一直到9月4日为止。他们把美国信件的文本交给梅文蒲，请他转达河内。他们讲了同基辛格接触的情况，转达了基辛格说的其他几点：美国希望这些交往保守秘密；对北越堤坝的轰炸是偶然事件；美国准备派代表同北越委派的官员在万象、巴黎、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会晤。

8月31日，梅文蒲在提到8月21日轰炸的同时，又一次拒发签证。但是在9月2日，他请他们到他的办事处来，颇为神秘地建议他们搞清楚，“在今后几天中”不会对河内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同基辛格进行了联系。基辛格同邦迪进行了联系。对河内附近的轰炸限制延长了3天，直到9月7日。但两人仍然得不到签证。

9月10日下午6时，马科维奇实验室的电话铃响了。梅文蒲接到了河内的信件，是对基辛格的答复。结果很令人失望。

“美国建议的实质是附有条件的停止轰炸。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非法的。美国应停止轰炸而无权提出条件。”

“美国的信件是在对河内的轰炸升级后并威胁要继续轰炸河内的情况下送来的。这显然是对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地拒绝美国的建议……”

9月13日，基辛格重返巴黎，同马科维奇共进早餐。

他带来一个密封的信件，是华盛顿对河内的拒绝的答复。约翰逊总统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我们曾建议河内的代表同基辛格直接会晤。”基辛格希望亲自把信件交给梅文蒲，但梅文蒲告诉法国联系人说，由于美国继续威胁要对河内轰炸，直接会晤是不可能的。第二天，马科维奇送去了基辛格的另一封密封信件，表示对河内态度困惑不解。基辛格写道：“我们轰炸河内附近，就被指责为施加压力。我们在没有得到河内任何表示的情况下自动地限制我们的行动，并且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却又被指责是下最后通牒。实际上，美国的建议，既不含有威胁，也不附带条件，不应以这些理由加以拒绝”。这两封信都是经过华盛顿批准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又送去了几封密封的信件，进行过几次接触，但梅文蒲坚决拒绝接待基辛格，也不给法国人签证。他说：“美国人正在玩弄两面手法。他们一面提出和平，一面加强轰炸。”最后，9月24日，梅文蒲召见马科维奇，向他宣读了河内发来的一封电报。梅文蒲拒绝了“圣安东尼奥方案”，不过他对法国中间人说：“我接受你们表示的对基辛格的信任，但是当美国正在搞战争升级的时候，我不可能见他……我们对美国的政策不抱幻想。”

基辛格的答复是在第二天早晨8点半送交梅文蒲的。这位美国使者的信开头说，不要对“过去的事”进行互相指责了；接着说：很明显，华盛顿和河内互相了解对方的思想方法有很大困难，所以直接接触是十分必要的。他写道：“通过中间人，不管如何可靠，总不是令人满意的代替办法。”基辛格强调，华盛顿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得到保证，停止轰炸将“迅速”导致“建设性”的谈判。但是在北越外交官看来，“迅速”和“建设性”这两个词就是变相的条件。

于是基辛格又回到了坎布里奇。

10月10日，马科维奇打了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长途电话给基辛格，要他赶回巴黎。基辛格不愿去，并说，美国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应该由河

内来回答了。马科维奇不嫌麻烦，在周末又到梅文蒲的办事处，央求这位北越外交官使渠道保持畅通。梅文蒲给了一个书面答复，宣称：“在美国推行战争升级政策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待基辛格……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后，才能举行讨论。”

白宫的反应是把僵局归咎于河内，但同时也不放弃努力。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里写道：“看了这个声明，我再一次相信，河内没有兴趣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除非按照它一贯坚持的强硬条件。但是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10月18日我在内阁会议室和腊斯克国务卿、麦克纳马拉部长、沃尔特·罗斯托以及基辛格博士开会研究了巴黎接触的全部记录，在我的顾问们的强烈建议下，我同意派基辛格去法国再作一次努力，争取进入认真的讨论。”

基辛格又匆匆横渡大西洋了。他接到的最新指示是：“你的目标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指出：你在华盛顿的朋友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他们觉得河内一直不愿在任何重要问题上作出反应。”到了巴黎，他的法国联系人对他说，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设法直接见到梅文蒲。奥布拉克为了表示他个人的急切心情，说为了和平，他愿意凭他同胡志明21年的老交情，亲自去澄清情况。只要北越人了解，美国的立场依然不变，基辛格不反对这样做。

奥布拉克打电话给北越办事处，梅文蒲接了电话。马科维奇在一个分机里听着。奥布拉克说：“我们有急事要见你。”

梅文蒲：“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情况越来越恶化。没有再谈的必要了。”

奥布拉克：“我们有些新的、非常重要的事。”

梅文蒲：“什么重要事情？”

奥布拉克说，这事关系到梅文蒲上次的信件和为达到停止轰炸而采取的步骤的顺序。

梅文蒲：“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然后他重复了刚才的话：北越方面没什么新的要说的，没有会见的必要。

奥布拉克挂了电话，深感失望，苦恼。他打电话告诉基辛格，梅文蒲拒绝见他们。基辛格也同样感到失望，回坎布里奇去了。“宾夕法尼亚行动”至此寿终正寝。

据华盛顿主管“宾夕法尼亚行动”的一些人认为，基辛格是此道的新手，却于得出奇地在行。约翰逊委托他进行一项绝密的谈判，尽管总统明知他同洛克菲勒关系密切，因此有可能向共和党人泄露。但实际上，他是谨慎到了家的。他准确表达了美国的立场，他严格按照指示办事，他如实汇报谈话内容。他一贯正直坦率——对内对外无不如此。当然，他并不决定政策，也不指挥谈判，他只是中间人之间的中间人。然而，这次同北越人的秘密接触，尽管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还是使他对同“对方”打交道之难这一点获得了初步经验，并使他对河内与华盛顿互不信任的程度有了深刻的体会。这番经历对他日后担任尼克松同北越谈判的使者，是非常宝贵的。

双方的目标既然完全对立，因此战争就继续打下去了。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苦恼心情，终于使一个以“结束战争赢得和平”的保证来竞选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能够以微弱多数而当选总统。

当新政府进入白宫时，基辛格在尼克松身旁。在就职典礼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这位新任命的总统顾问已经在为尼克松总统出谋划策了。但基辛格没有想到，尼克松会给他提供充分展示他外交才能的世界政治大舞台，使他

成为美国总统的最佳搭档。

第三章

最佳搭档

在尼克松当上总统和基辛格成为杰出的外交家之后多年，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卢斯还常常津津乐道当初的情景说：“这可是我的主意啊，那时我一心想把亨利介绍给尼克松，后来总算搞成了，我明知亨利不是尼克松派，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尼克松，他是十足的洛克菲勒的人，但我还是相信他们会搞在一起的。我对尼克松说，我想你会赏识亨利的。我认为只要亨利同尼克松谈上一小时，两人就会非常投机的。”

这一次有点掷骰子味道的撮合，是卢斯夫人的杰作。这位当过剧作家、驻意大利大使、代表康涅狄格州的女议员卢斯夫人，从来认为美国只有在共和党手里才保险。这一幕的场景是纽约五马路 993 号她的雅致时公寓，时间是 1967 年 12 月 10 日，一次圣诞节前的酒会上，基辛格是最早到会的客人之一，他这种守时的习惯，在进入白宫、权势熏人之后就逐渐失掉了。却说这天晚上，他认识的客人不多，也没有几个认识他，加之他又不善于寒暄应酬，这些“客观情况”，用他爱用的字眼来说，表明了他会赶快“脱身”的。

他正待要走时，尼克松来了。卢斯夫人立即把两人领出拥挤的客厅，带到僻静的书房，这就是她亲手试办的牵线工作。尼克松和基辛格交谈了不到 5 分钟。这次谈话是在他们功名事业的重大时刻进行的：尼克松在 1960 年大选中败于约翰·肯尼迪，1964 年又眼巴巴看着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现在正力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一心想在明年夏天击败各派对手，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基辛格呢，这位鼎鼎大名、才华出众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着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而洛克菲勒正是尼克松所有对手中最厉害、最顽强的一个。

但是两人没有涉及竞选总统这个敏感问题，倒是谈到了基辛格的著作。这位前副总统谈到了他对基辛格第一本主要著作、1957 年的畅销书《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钦佩之意。基辛格也提起尼克松曾就该书给他去过一封贺信，使他十分感激。

他们第一次见面只做到彬彬有礼的程度，如此而已。多年后基辛格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两人都不甚擅长于酒会上的谈话。”他说，尼克松当时有点生硬，他自己则有点矜持。莫非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个第三者洛克菲勒游荡其间？或者只是因为基辛格虽然与尼克松素未谋面，但却对他抱有一般“书生偏见”之故？但在这次简短的交往中，尼克松的言谈证明那些偏见并无根据，倒是基辛格不得不修改自己心目中对尼克松的漫画形象。他颇为惊奇地发现，尼克松“谈吐之文雅，议论之精辟”，均非始料所及。

至于尼克松，他给卢斯夫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对同基辛格进行的第一次个人接触是满意的。他很赏识这位同共和党素有联系的哈佛学者，此人与居心叵测的东部权势集团中的邦迪、施莱辛格之流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之后，直到 1968 年 11 月 25 日，基辛格和尼克松才再次相会。这是在尼克松以微弱多数险胜休伯特·汉弗莱当选为总统后不过几个星期的事，距尼克松在共和党迈阿密全国代表大会上大败洛克菲勒、一次投票即获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也只有三个多月。如果说这是尼克松踌躇满志之日，却是基辛格伤心失意之时。

尽管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初次会见挺愉快，但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想到尼克松要当总统，就感到不是滋味。在他们眼中，尼克松其人见识浅陋，权迷心窍，不择手段，其一味反共的程度，准会把美国弄到同苏联、中国进行核对抗的地步。基辛格常对他的反尼克松派的朋友们说：“尼克松这人哪里配当总统！”在196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有人曾引用过基辛格的一句话：“在所有竞选人当中，理查德·尼克松当总统最危险。”

基辛格当时认为，1968年的美国需要一个能够团结全国、懂得国内问题的轻重缓急、善于区别对待国际挑战的领袖。他期望洛克菲勒出来担任这个角色。在1968年初，能取得基辛格同样信任的政治家只有罗伯特·肯尼迪一人。基辛格说过：“博比（肯尼迪的昵称）有干劲，有魄力。他来领导，行！”

基辛格在洛克菲勒手下已经干了十多年，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办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研究工作的主持人。但是基辛格的工作绝不仅限于关门搞学术研究，他还参与了洛克菲勒的政治活动。他作为共和党竞选纲领委员会的对外政策顾问，目睹了196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耳闻了右派如何欢呼巴里·戈德华特的胜利和如何嘲笑那位纽约州州长的失败。

过了四年，连约翰逊总统也因越南战争而遭了殃，这时洛克菲勒便再次出来竞选总统。5月，他宣布同名列前茅的尼克松竞争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基辛格使出肉体与心灵的浑身解数投入了洛克菲勒的这场竞选运动，他整天奔走操劳，上午同洛克菲勒研讨对外政策，下午赶到哈佛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同样的题目，然后搭乘末班飞机从波士顿飞回纽约。

基辛格扮演的是一种独特的角色。往往当记者们就越南问题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或战略武器问题采访洛克菲勒州长，并听了这位竞选人的高见之后仍然感到不得要顿时，他们就被带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去。“找亨利吧”，洛克菲勒手下的人总是这样说，“我们这里只有他有办法把我们的立场讲得头头是道。”

人们之所以被指点去找基辛格，既是由于他的学识，同时也由于他的作风。他从大处着眼掌握政策的功夫，是与他共事的人无不承认的，尽管有时不免有点不服气。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深谙官场的诀窍。假如他有什么政策主张可供洛克菲勒采用，他必然亲自进言，决不假手他人。可见基辛格对于官场中顾问和东家之间要建立亲密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早已心领神会了。

洛克菲勒的一些其他顾问反对基辛格的这种包办作风。其中有当年文森豪威尔的演说撰稿人、专栏作家、洛克菲勒的心腹顾问和发言人埃米特·约翰·休斯。“亨利替州长掌管对外政策问题，按说应该是我的下属嘛”，休斯后来这样说，“但是，我想让洛克菲勒就越南问题发表一个声明，不通过基辛格就不行。后来我们终于搞出了一篇政策声明，但我感到调子不够强硬。基辛格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叫人相信他是一贯反对战争的……”

就因为休斯与基辛格之间不断明争暗斗，于是“同亨利共事”是如何如何“困难”的话便传开了。但就算所传属实，那也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洛克菲勒同基辛格共事却从不感到困难。基辛格对州长真可谓鞠躬尽瘁了。他这份对上司的忠心劲几，也正是他日后的上司所最需要的。

8月，基辛格随洛克菲勒前往迈阿密参加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当时尼克松的呼声最高，但是州长手下的人员仍然希望他们的老板时来运转，还能赢得提名。基辛格在美洲饭店14层楼上占用了一个大套间，与洛克

菲勒的房间只有一厅之隔。那饭店走廊里，那大庭之中，那密室深处，那全国电视上，所进行的一幕幕政治活剧真把他看入迷了：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操纵、发布和透露新闻，候选人和政客之间、政客和幕僚之间、幕僚和财东之间、财东和记者之间、记者和公众之间所进行的说不尽的公开的、秘密的谈话。凡此种种，对于这位度暑假的教授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上了一堂哈佛大学永远学不到的政治学课程。

对基辛格来说，重要的是使洛克菲勒获胜，或者最低限度要使洛克菲勒在越南问题上的观点获得胜利。几星期以前，州长在《纽约时报》上以一整版广告的方式发表了一项从越南撤军的具体方案，人们认为挺新鲜，尤其是由一个共和党人提出来的。这基本上是基辛格的思想。这项方案规定了撤军分四步走：先从单方面撤出 7.5 万名美军开始，随后建立一支国际维护和平部队，最后交战双方达成政治和解。

对此，尼克松在战略上保持沉默。他不理会洛克菲勒的具体建议，暗示他另有高招，只是暂时不端出来。这时，尼克松一心要为自己树立一个谨慎通达、深知党和国家最高利益何在的保守派形象，用以影射洛克菲勒大事宣扬他的越南方案的做法对州长本人招揽选票可能很有利，但对国家争取和平的目的却不见得有好处。

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散发了一份半正式的对越南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纲草案，其中反映的是尼克松一派的观点，而不是洛克菲勒的观点，于是两个候选人之间的冲突就更尖锐了。为了这个有分歧的问题，基辛格在洛克菲勒的同意下，悄悄地同敌对营垒尼克松总部进行了接触。

基辛格以讨论政策而不讨论政治为幌子来进行试探，他并没有改换门庭的意思。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甚至在此以前，就有几个尼克松的干将想拉他脱离洛克菲勒，并且居然用金钱为诱饵。这些人，基辛格后来说，都不是“正经”人。根据一个说法，那些人为了收买基辛格，曾把出价翻了两番，但是他“一想到居然有人以为用钱可以收买他，就愤慨万分，感到莫大侮辱”。

基辛格的来意无非是争取尼克松那一派支持一项在越南问题上比较接近洛克菲勒思想的政纲。开始时，事情很难办。对方看来对越南问题的复杂性不怎么了解。这班人大部分来自加利福尼亚南部，是搞宣传的人，他们把这个问题纯粹看作是一个政争问题。不过最后还是搞出了一个政纲，把共和党的政策重点放在谈判，而不是放在炸弹上。

但是，代表大会现场的政治算术很快就使竞选纲领委员会内部妥协的意义大为逊色。尼克松的机器势不可当，一次表决就使洛克菲勒以 277 票对 692 票败下阵来。一时全国的电视屏上便只见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

基辛格为洛克菲勒的失败伤心地哭了。他回到自己在曼哈顿东 55 街 400 号的单间公寓房里，一觉睡到次日日上三竿。一位打电话把他吵醒了的朋友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讲话的声调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那样颤抖，那样灰心，那样丧气”。他口口声声轻蔑地骂“尼克松这家伙”，说“这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

但是，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对基辛格。迈阿密全国代表大会收场那天下午，基辛格的电话铃又响了，是尼克松的一个助手打来的，他打听基辛格博士有没有可能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事。

基辛格的回答是有条件的。他说，他“以专家的身份”，随时准备回答有关对外政策的实际问题。但是他不想出席正式的会议，不起草阐明立场的

文件。换句话说，他不准备参加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但是，如果他们想经常找他，他是愿意提供他的专业知识的。

整个8月和9月，厄克松营垒里不断地有人来找他，以此表示那位胜利者对这位仍然矢志效忠于失败者的教授兴趣之大。

民主党方面，休伯特·汉弗莱手下的人偶尔也就某一方面的外交政策问题来请教基辛格，但是民主党方面的这些试探总是浅尝辄止。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基辛格看成是共和党人，尽管他一直自认为是“无党派人士”。

当时任尼克松竞选总管的约翰·米切尔，有一次就巴黎的越南问题谈判征询过基辛格的意见。尼克松手下的其他人，也曾为欧洲、北约组织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来求教。基辛格总是有求必应，毫无派性。

又有一次，尼克松的助手打电话问基辛格对改组国务院有何意见。在正常情况下，他对这个问题是不会不谈的。他对国务院机构的臃肿有不少意见。那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讲习班上发表的论文里就说：“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把基层外交人员裁减一半，我们的情况可能要好些。”但是这次基辛格却表现了不寻常的自我克制，推说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在电话上说不清，况且这对竞选运动或国家的对外政策说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在竞选期间，只有一次，提出了一个看来超出单纯征询专业知识范围的问题，尼克松手下的人问基辛格博士是否愿意同共和党候选人见见面？见面的事并未实现。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就是没有进行过接触。”但是，尼克松这边频频送去的秋波显然打动了他。就在代表大会以后几星期，基辛格同他的老朋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议论政局时（索南费尔特也是年轻时从德国来到美国的难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基辛格相识），就向这位在国务院里专门搞政策分析工作的索南费尔特谈到了尼克松圈子里发出来的试探。两人琢磨了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里供职的可能性，逐一研究了各种官职，如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助理国防部长，以至于出任大使等等。索南费尔特竭力主张基辛格争取“罗斯托的那个职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当时在约翰逊政府里，这项职务是由另一位教授沃尔特·罗斯托担任的。索南费尔特劝他说：“共和党里我知道只有你一人具有干这一行必备的学识条件。”基辛格免不了谦虚一番，说恐怕不大可能给他这样的职位吧。不过，既然都只是瞎猜，基辛格也就表示，如果他真的担任这个职务，他要请索南费尔特参加他的白宫班子。

基辛格尽管有这类盘算，但在代表大会到总统选举这段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往返于两个具有鲜明的反尼克松色彩的天地之间——一个是洛克菲勒的政界，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学界。他继续同洛克菲勒保持亲密的关系，按时飞到纽约去同这位州长共进午餐。洛克菲勒对尼克松的怨气，虽然为了全党团结这一暂时利益而有所收敛，但仍然很强烈。他的另一天地，哈佛大学的学界，反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的情绪就更强烈了。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们不同意所谓“新的尼克松”的说法，他们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历史上以前受玷污的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卷土重来。最严重的是，他们把尼克松看作是造成美国分裂的越南问题上的一名鹰派。

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他的同事们是尽人皆知的。这些同事当中，有些人已在打算，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大选中，一旦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如何到

汉弗莱政府里谋求一官半职。10月，离大选只有几个星期了，基辛格在罗得岛新港的海军军事学院作报告进午餐的时候，大家议论起大选来。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这位作客的教授对尼克松的诊断是“偏执狂”，并对他能否挑得起白宫重担表示怀疑。

甚至尼克松11月的大捷，也止不住基辛格对这位当选总统评头论足。当月，他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时发表的一些坦率的评论，曾使不少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其中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后来回忆说，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品评真是“极尽挑剔之能事”。埃尔斯伯格说：“一个同这些政界人物有来往的人，对刚当选的总统竟敢如此直言不讳，实在令人惊讶。根子在于他同洛克菲勒的关系。”

后来，在基辛格参加了尼克松政府之后，他惟说想不起讲过那些刻薄话了，但说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基辛格对这段往事另有一套说法。他说：“对总统的看法，回忆起来，主要不是我认为他不合适，而是他使我感到不安；对他的优点我当时毫无所知，对于缺点却又信以为真。其实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见解，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嘛。”

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飞到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他们谈到了外面盛传州长将被邀出任尼克松内阁的国防部长，并且还讨论了应不应该接受的问题。基辛格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让我担任什么职务，否则我们也会加以讨论的。”谈话中间，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对方的声音和名字都是陌生的，是尼克松的一名年轻助手，名叫德怀特·查平。他说：“可否请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来皮埃尔饭店与当选总统一晤？上午10点，行吗？”

星期一上午，基辛格被领进了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39层楼的套间。不待介绍，基辛格早已赫赫有名了：5本著作，几十篇文章，外交问题学有专长，熟识许多外国领导人。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讨论了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对外政策。这种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摸底。这对基辛格来说，是一次奇特的经历。相互打量的后面隐伏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尼克松要不要给他一个差事干？

尼克松进行了一般性的试探，看基辛格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尼克松采取这种缓进的做法，足以反映他的持重态度，这也可能是他照顾到基辛格公开的反尼情绪，也可能是他体谅基辛格同洛克菲勒的特殊关系。基辛格对这种欲语还休的做法也不置可否。在他看来，还得看工作的性质和州长的进退；假如洛克菲勒参加政府，那么他必然要先来请基辛格为他工作的。基辛格暂时只答应尼克松这个具体要求：帮他找一些专家来填补外事部门的重要职位。

在讨论过程中，尼克松把霍尔德曼叫了进来。这是基辛格第一次见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在加利福尼亚搞宣传的人。此人后来成了总统的心腹，直到1973年4月30日因水门事件而垮台为止。当选总统指示他，为了联系方便，搞一条直通哈佛大学基辛格那里的电话专线。但是基辛格感到自己还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安电话专线不免过份张扬，便说，找他不难，通过哈佛大学的总机就行了。

基辛格匆匆离开皮埃尔饭店直奔机场，飞往哈佛大学去赶他下午4点钟的那堂课。

第二天，他把他同当选总统3小时会晤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洛克菲勒。

州长说，他刚接到尼克松的通知说，决定不邀请他本人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了。据洛克菲勒记忆所及，尼克松没有对他提及可能聘用基辛格的事。

却说基辛格刚在哀叹洛克菲勒被排斥在内阁之外，这里电话铃又响了，还是查平，从纽约用普通电话线打到坎布里奇来的：基辛格博士星期三是否有空再来皮埃尔饭店见见约翰·米切尔？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一听就有数，也许他们现在要谈我的事情了。”他赶忙同他的哈佛老朋友麦乔治·邦迪联系。邦迪当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是福特基金会主席。“可能他们要我担任一个什么职务”，基辛格悄悄地对他说，“你看我干哪个工作好呢？”邦迪替他出主意，争取当政策计划室主任。

11月27日，星期三，基辛格怀着鸿鹄将至的心情，坐飞机离开哈佛，到了皮埃尔饭店。

正式邀请是在当选总统的套间里提出的。尼克松聘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会，解释说，他感到非常荣幸，但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

“好”，当选总统说，“一个星期吧。”

这事谈完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接着便就新总统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正午到了，又谈到午后。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这回两人却都不曾想到这顿饭，接连谈了差不多4个钟头。他们谈到了越南问题。当选总统想要把苏联拉进来共同解决这场战争。基辛格对这场战争引起的国内不团结表示忧虑。他们还谈到中国、三角外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核均势等问题。基辛格认为，主要由于华盛顿忙于印度支那问题，忽略西欧的时间太长了。尼克松分析了苏联在中东的意图，并说，他打算派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到那里去了解情况。基辛格认为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重点都应该重新安排。两人都觉得谈得很合辙儿，十分满意。

这以后，基辛格便成为皮埃尔饭店的一位常客了，尽管尼克松的助手们对他还莫测高深。他的著作也未必是他们床头的读物。“不过如此而已。”总统的忠实发言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搞宣传出身的罗纳德·齐格勒日后这样描述基辛格给他的最初印象。约翰·埃利希曼也有同感，此人从前在西雅图市一个区里当律师，后来成了白宫内圈的一个关键人物，也在1973年4月30日因水门事件而栽了跟斗。他承认说：“我本来以为此公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亨利写的东西，因此我不很了解他有多大本事。我听说他很有才华，大概很爱发脾气，很难与人共事，我们同他在一起可能会闹别扭。”

此后的一两天内，基辛格忙于打定主意接受尼克松明确请他担任的那个称心的职务。这时候，他一下子就把以前对尼克松的许多书生偏见都抛在一边了，从他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尼克松有某种坏名声。我需要使我相信，这个坏名声是不该有的。”

基辛格很相信自己对尼克松的印象，这是很符合基辛格这个人的特点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他有根深刻的印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他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除了巴里·戈德华特，他都见过）都好。他并不稳讳他对这些候选人的评价：就连那些他称为非常有才华的候选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给他的观感也是十分无知的。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但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

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尤其是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对于肯尼迪，基辛格感到有点难下断语。肯尼迪很吸引人，可是同样优柔寡断。在肯尼迪遇刺身死前那段时间里，基辛格认为，如果肯尼迪再任一届总统的话，大概不是创出丰功伟绩，就是闯一场大祸。至于戈德华特，从远处看去，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观点。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自不待言。汉弗莱（他在几年后透露说，他本也想提名基辛格为他的对外政策顾问）要不是因为同约翰逊的关系玷污了自己的形象，破坏了自己当领导的资格，本来是很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的。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了解却是头等的”。然而，他虽能鼓舞他周围的人，却无法赢得竞选总统的胜利。

这才使基辛格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尼克松，这位 1969 年 1 月 20 日就要走马上任的大总统。

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很痛快，很干脆，力促基辛格接受邀请。州长说：“我生来凭直觉办事，我觉得这样做对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洛克菲勒并未因为自己败在尼克松手下而影响他对基辛格的推荐。他说：“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位当总统的人效劳，尽力协助总统。他为肯尼迪做过事，为约翰逊也做过事，我常常鼓励他，要求他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给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做出贡献。”

下一步，基辛格向他的哈佛同事麦乔治·邦迪、阿瑟·施莱辛格以及其它朋友们一一征求了意见。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劝他接受那个职务。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在尼克松朝廷里的人，是他们进入共和党政权新世界的开路先锋。

基辛格的老友弗里茨·克雷默尔却拿不定主意。他对基辛格说：“作为你的朋友，我只能说这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右派’将骂你是丢掉东南亚的那个犹太人；‘左派’将骂你是叛徒。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当然你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因为再没有比你更合格的人了，至于你个人的幸福，那是无关紧要的。”

11 月 29 日，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办公室，要求约见当选总统。他从尼克松那里出来，再到尼克松那里去，前后相隔不到 48 小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咱们就一言为定吧。”这是基辛格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和转折点。事实证明，他与尼克松是一对最佳搭档。

聘用基辛格这件事，预定在 12 月 2 日正式发表，但是，要是尼克松以为他将宣布一件出人意外的新闻而洋洋得意的话，那么他是会失望的。皮埃尔饭店 39 层楼证明是保密不严的。11 月 30 日的《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罗伯特·森普尔写的一条新闻，标题是《尼克松内定基辛格为对外政策顾问》。新闻写得很谨慎，它说，虽然尼克松方面不肯证实此事，但是当选总统正在谋求洛克菲勒州长的这位外交事务顾问担任“专职工作”。森普尔写道：“无法找到基辛格先生发表评论。”早在此时，基辛格已在表演他的遁身术的绝技了。

12 月 2 日，当选总统终于在皮埃尔饭店举行的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大家介绍了他这位新顾问，但这不能算尼克松透露了什么新东西，而

只是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满面春风。当选总统明确表示，给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绝那种危机外交的做法，“不要尽是等到出了事情才去应付”。

基辛格显出颇为自信的样子，宣称他打算经常请一些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外国专家来白宫商讨问题，又说他“同全世界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广泛的交游”。

尼克松也说：“我这个人喜欢让各种观点都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基辛格博士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我认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程序，努力使美国总统不要只听到中听的话。而这种投总统所好的做法向来是白宫工作人员爱犯的毛病。”

在任命国务卿以前先任命基辛格，可能会使新闻界和其他方面人士感到奇怪。对此，尼克松解释说：“基辛格博士深刻地认识到，他不应该成为总统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一堵墙。我打算任命一位非常强的国务卿。”

在国内政界是一片赞扬声。在西欧，基辛格有许多官居要津的朋友，他们的反应是如释重负。东欧则是倒抽了一口冷气。波兰《华沙生活报》称基辛格为“冷战哲学”的一个主要鼓吹者。

美国知识界的反应总的说来是热烈的。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很反感，觉得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竟去投靠一个他们认为是老奸巨滑的政客？较普遍的看法是，新总统选中基辛格，这证明他出手练达，给新总统的记分本上添了一分。过去民主党走遍各大院校搜罗人才，从来也不成为大新闻，可是这个尼克松是共和党，居然也有这种见识！学界有一部分人当初听到在野多年的理查德·尼克松竟即将入主白宫，不焚大为震惊，现在看到他聘用了博学多才的基辛格，才略为安下心来。

基辛格马上担负起特使的任务，去向抱怀疑态度的知识界做工作。几天之后，12月6日，他乘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国际文化自由协会的晚宴。记者被轰出去以后，基辛格向在座的作家和知识界人士保证，今后白宫的大门将随时对他们开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这些人日后由于政府其他部门门禁森严，竟会不断抓住他这个人情，失是谴责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后来，水门事件发生后，又提出了关于政府是否讲道德这个最深刻的问题。这些人还对他大将其军，问他：为什么不先国家后总统，急流勇退？

在水门事件之前日子比较顺利、尼克松的声望还很高的时候，基辛格经常拿自己当初对当选总统的礼聘疑虑重重作为笑料来谈。他说：“我这个人当时实在不识抬举，当选总统给我这个差事，他担的风险不知比我要大多少。他既然有勇气委我以重任，我总不能说，‘我需要一星期的时间来考察，看看我的朋友们是否认为在你手下工作是不道德的。’他真是在冒险啊？”

当选总统的确对基辛格并不十分了解。基辛格的著作他读过几本，但不是全部。通过别人了解他吧，基辛格自己说：“我的朋友，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民主党自由派。这样，他能真正向谁了解情况呢？假如我向他提出10个愿意保荐我的人。其中就会有8个他信不过的。我会提到麦乔治·邦迪、阿瑟·施莱辛格、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许还有杰罗姆·威斯纳。如果我不忠诚或者不称职，就会影响他当总统的威信，而他对我实在啥也不了解啊。”

正是由于基辛格同这些“自由派”关系密切，才使得那些死心塌地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此辈无非是政治打手，唯一的指导原则就是夺

取胜利；他们同尼克松是患难之交，经历过残酷的厮杀，忍受过 1960 年竞选总统和 1962 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绩，苦熬过一事无成的 60 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 1968 年，他们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可是突然在他们中间冒出了这位后来居上、外国血统、异国口音、哈佛出身的亨利，他只是在胜利之后才来投奔尼克松的。基辛格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尼氏白宫的形象。他们不信任他，讨厌他。他们对约翰逊政府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不放心，而这些人正是基辛格现在想拉进他的班子的。

他们对基辛格的怀疑，尼克松是知道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当选总统对自己能把这应教授从哈佛挖出来而感到的得意。对尼克松来说，和基辛格搭上关系可是大有好处。他能出奇制胜，突然任命一个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的人出任重要顾问，这一招是政治分析家所意料不到的。他能把一个颇负盛名的知识分子罗致到自己手下，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遭。当时为总统起草演说稿的威廉·萨菲尔指出：“要知道，尼克松不总是受知识分子拥护的，这还是说得客气一些呢。他久仰基辛格的大名，那是洛克菲勒王冠上的一块大宝石呀。尼克松懂得，他的政府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在里边。他有的是权势，借用‘教父’的用语来说，他能向基辛格提供基辛格所无法拒绝的东西，现在他能满足基辛格对行动、权势、核心地位的欲望。而在这之前，他可拿不出什么东西能把基辛格这样的人从洛克菲勒那样的人那里拉过来。这是他颇为得意之笔。”

对基辛格来说，应尼克松之聘倒不冒什么了不起的风险。他说：“我大不了落得个罗斯托那样的下场罢了。”罗斯托是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被认为是越南战争升级的祸首，他下台后在得克萨斯大学任教，因为他原来执教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不欢迎他回去了。后来，每当基辛格由于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而受到猛烈抨击时，他总爱说句俏皮话来解嘲。他会笑嘻嘻地说：“不知道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书的滋味如何。”

基辛格之所以接受在白宫工作，是由于他醉心于大权在握，而把对尼克松的嫌鄙克服过来了。多年来，基辛格关心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是美国在创造一个免于核灾难的世界的工作方面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尽管他悉心研究了这些问题，但他的主张还没有受过考验。哈佛大学，不管它自视如何高明，终究还是个学府之地，在那里就是把问题看错了，无非丢脸而已，总不至于完蛋。坎布里奇和最高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乃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基辛格甚至在他保持哈佛教席的同时，就曾先后为三届总统出谋划策。如今他竟有如此难得的机会，可以专心为一位在对世界许多基本看法上出乎意料地和他一致的总统效劳。试问，有哪个哈佛大学教授，肯放过这个在历史关键时刻出来帮助制订美国对外政策的大好机会呢？

基辛格抓住了这个机会，终于成为一个驰名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第四章

直上青云

从前，美国并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同历史悠久的机构相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是个小娃娃，到尼克松政府时，成立了还不到30年，只经历过5届总统。可是，由于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那种决策风格，在他整个第一届任期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当他还在皮埃尔饭店忙于筹备走马上任的时候，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开始形成了。基辛格受命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职以后，尼克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从前任总统手里接过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个松松垮垮的摊子改造成一种权力集中、统筹决策的机构。

最初那种类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创立的，其职责是“统筹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三军和政府各部、署（局）能在有关国家安全问题上进行较有效的合作”。它的法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紧急战备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列席会议。根据讨论问题的性质，也不时邀请其他一些人参加会议。有关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立法措词讲得很含糊，所以历届总统曾对它加以不同的运用。什么样的情况，取决于什么人当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工作作风引起的问题而创建的。原来，当时罗斯福个人独揽外交政策大权，有时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某些部门竟毫无所知。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后，便让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设计一种体制，保证使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意见都能得到考虑。结果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刚成立的时候，是以“福雷斯特尔的报复”而闻名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草创时期，当时美国在对付和遏制战后苏联力量的发展中正在迅速扩大自己的作用，杜鲁门就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作为统筹美国在这方面的活动的工具。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杜鲁门主要还是依靠马歇尔以及后来的迪安·艾奇逊这两个强有力的国务卿出谋划策。

杜鲁门以后的几任总统都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搞成反映他们自己那一套工作作风的机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加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做法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于白宫，使白宫成为一个像军事司令部那样的机构来指导国家政策。但是他的将军习气难改，总是要求事事意见一致，这样就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了一个议论不休的场所，其结果，照迪安·艾奇逊的说法，便是“精疲力竭而后一致了事”。到头来，艾森豪威尔是在军事上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其他事务则交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处理。

肯尼迪总统对国际事务特感兴趣，他把艾森豪威尔的那套文牍机构砍掉不少，亲自抓外交政策；迪安·腊斯克担任挂名的国务卿，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班人马则交给麦乔治·邦迪去管。在出现重大危机时，特别任务小组通常就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白宫）开会。雾谷不再是决策的中心了。

在约翰逊总统时期，越南问题弄得他坐立不安，整个白宫笼罩着危机的

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是行政大楼举行的星期二午餐碰头会上临时讨论某些专题时的陪衬而已。

尼克松反对专题讨论，又反对强求一致，有时甚至还反对午餐。他要的是一个短小精悍、不会泄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约翰逊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点是，对政治问题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那时高级顾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打交道的方式到白宫去跟总统“一起探讨”问题的。这种情形到尼克松时代完全消失了。尼克松要进行全面控制，完全丢开过去民主党的那一套。

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回忆说：“尼克松决定把会议精简到最低限度。”黑格过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当过基辛格的副手，1972年末升任陆军副参谋长，1973年中由于水门丑闻而接替霍尔德曼当上了白宫办公厅主任，据他说，“尼克松希望避免他所谓的‘空话连篇的解决办法’”，即官僚机构中为了尽量少得罪人而炮制出来的那种做法。尼克松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方案供总统选择”。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都要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经过审慎考虑、具有独立见解的意见，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针。

尼克松发现基辛格是自己的忠实信徒，同他一样主张由强有力的少数人统治，一样不信任官僚机构。说实在的，基辛格甚至在去皮埃尔饭店应聘以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决策机构急待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考虑了很多。在基辛格看来，约翰逊的做法的特点是使“研究人员的技术能力同处境困难的政治领导人的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基辛格主张用一种防患于未然并预谋对策的办法来代替“危机外交”。他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是最终处理送呈总统的所谓“选择方案”的机构。

基辛格和尼克松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不谋而合。当选总统很快就同意了他这位顾问想使这个机构发挥最大效能的计划。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想法：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在最高一级审核和决定政策的唯一机构，它使政策的执行差不多完全集中控制在白宫手里。更重要的是，要一改那种这边应付一下危机、那边搪塞一下问题的条件反射般的做法，而代之以更有思想的做法，把美国的应变对策和主动措施结合而为长远的全球战略。按照当时所设想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任务，基辛格将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运转文件的枢纽，把各种选择方案送呈椭圆形办公室或退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再加审议；二是当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备总统随时咨询。

基辛格组织了一个精明强悍的外交政策专家班子来协助自己执行这双重任务。这个班子并非整个从坎布里奇搬来，尽管基辛格同坎布里奇那所有大批可以聘用的教授的大学渊源最深，这个班子是由各行各业出身的人们组成的杂拌儿。他罗致了一批未任过公职的年轻学者，但主要还是从政府机构内部挑选的。从政府内部挑选的人，都是历届政府的留用人员，包括五角大楼里有政治头脑的官员，国务院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还有理论工作者和技术人员。

基辛格任用这些人，只看他们的才能大小，不管他们的政见如何。霍尔德曼对这种情况很恼火，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总是感到不舒服，而且怀疑这些人中间有人并不完全忠于尼克松。

在最初几个月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批人对于有机会彻底审查美国外交政策都颇为兴奋，他们的知识分子朝气使政府里那班8点来、4点半走的

循吏为之侧目。上司和下属之间有一种创造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解释说：“当时的想法是，要使他们感到他们正做着无比重要的工作，要培养一种修道士式的献身精神，说句公道话，我认为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初创阶段过后，基辛格把他所搜罗到的专家组成了一个他所谓“非常严密、非常忠诚的组织”。

基辛格招聘来的一些人，免不了也还敬他一番恭维话。温斯顿·洛德说过：“为亨利干的事，你原来就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得了。亨利总是一丝不苟。”洛德是一位笔头飞快、博学多才的年轻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是从国防部过来的，后来曾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莫斯科。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确是人才荟萃之所。且看：

“我是第一个从国务院调来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后来这样回忆说。还有不少早期调来的人后来都争着以此自夸。索南费尔特当国务院东欧情报和研究处处长时，有一次在西点军校参加会议，他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看到他的朋友基辛格被任命的消息。他打了个电话表示祝贺，并约定当天在纽约见面。索南费尔特急忙请基辛格放心，说明他认为他们几个月前的那次谈话没有任何约束力（当时他们猜测可能会派基辛格去干“罗斯托的那个职务”），基辛格现在并没有义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基辛格明确表示，过去他想让索南费尔特搞欧洲的理论问题，现在想让他搞欧洲的实际问题。他们讨论了把欧洲分成东欧和西欧两部分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还是要使欧洲保持为一个整体。接着，索南费尔特就到安提瓜去度寒假了。他回来后，对他的好友亨利说：“行！”

亚历山大·黑格上校是从西点军校截回来的。他是西点1947届毕业生，这年12月初正好回到母校，忽然接到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打来的电话。古德帕斯特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当正副总统时，就是尼克松的老相识，这时正在帮助起草一项使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的方案。他请黑格到皮埃尔饭店来。

原来有两个朋友推荐了他黑格。一个是林登·约翰逊的亲信约瑟夫·卡利法诺，此人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主持国防部时曾是黑格的老上司。另一个是克雷默尔博士，他曾在60年代初期同黑格在国防部共事，当时黑格在陆军部负责柏林问题和北约组织方面的工作。黑格在朝鲜和越南都打过仗，是乔治敦大学的国际问题硕士。黑格在谈到他和基辛格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时说，“基辛格当时正在物色一位军人，这个人不能是典型的军界知识分子，但必须首先是一个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并且要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资历。”黑格恰恰符合基辛格的要求。黑格原以为他一定会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顾问，可是事实上他最初担负的任务却主要是负责编纂呈送总统参考的“午前情况报告”——这种报告约有20页，内容是一夜来全世界政治和军事事态发展的最新情报。由于这位上校严守纪律，工作勤奋，经验丰富，于是让他管的事日渐多起来了，至于他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终了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时，肩上已有4颗将星，就不用提了。黑格很快就被人称为“基辛格的基辛格”。

罗杰·莫里斯是一位年轻的哈佛大学博士，原来在罗斯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他是基辛格从行政大楼到五角大楼途中，在汽车里聘用的。他们原约好在那天早上谈话，可是基辛格迟迟抽不出时间（这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只好请莫里斯登上汽车，以便在基辛格按约去见一批将军时的路上交

谈。这个对尼克松印象很不好的莫里斯记得，当时基辛格是这样说的：“喂，我希望我周围能有几把好手。我认为你不是在为总统个人工作。你知道，我是支持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我到这里来是为美国总统工作，并不是为理查德·尼克松个人。不管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要求你暂时把那些看法丢在一边。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嘛。”基辛格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严肃的不抱政治成见的风度”。在车子开到五角大楼停下来之前，莫里斯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于是，他就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班子直接转到另一个班子，同时也暂时克制了自己的反尼克松情绪——至少在1970年春天发生柬埔寨事件以前他是这样做的。

至于莫顿·哈尔佩林，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主持最后一次讲习班时曾特邀他在会上发言。会后，基辛格立即聘请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一个官职。那天是12月16日，基辛格去主持防务问题讲习班时迟到了20分钟。他向大家介绍了哈尔佩林。那时哈尔佩林是一个30岁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他到华盛顿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之前，经常在讲习班上讲课。哈尔佩林尽管反对尼克松，也反对越南战争，但还是同意了。这样，他就从五角大楼转到皮埃尔饭店，在那里开始搞越南问题和战略部队问题的工作了。

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恰好当选总统办公室已经要求国务院派一位职业外交官来皮埃尔饭店处理外交文电，于是伊格尔伯格就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并经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同意。基辛格认可了这项任命，并且马上就请他到职。12月中，伊格尔伯格开始工作，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问题到外国要人求见当选总统，事事都归他经办。

劳伦斯·林恩，30岁刚出头，是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原是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基辛格请他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基辛格表示，新的一届政府想对军事——战略——防务政策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林恩愿意来主持这个研究工作吗？基辛格还想让林恩主管一项“国别研究”工作，详细审核美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林恩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一个星期吧”。基辛格学着尼克松几星期前对他自己说的话回答他。于是到12月底，林恩便加入到行政大楼那个不断膨胀的班子里来了。

丹尼尔·戴维森是1966年认识基辛格的。他受聘时卧病在床，发着华氏103度的高烧。他是哈里曼大使巴黎和谈班子中的成员，这时刚从巴黎回到纽约，想找个新工作。他给基辛格打了电话。那天是11月29日，星期五，一个吉利的日子：基辛格向戴维森透露，他马上就要通知当选总统，说他决定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了。第二天，《纽约时报》透露了这一消息。基辛格给戴维森回了个电话，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又安插了一个人，戴维森流感好了以后，就在行政大楼里得到了一个职位。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若干机构：“前台办公室”，约有六七十个亲信；一个处理危机组；一个计划组；一个研究组；一个分析组；此外，还有负责拉美、欧洲、东亚、近东和南亚、非洲和联合国以及国际经济和科学等方面的专家们。

这个班子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指导广泛的政策问题研究工作。一项研究工作通常从一个部际小组开始，这个小组由主管有关地区（如欧洲、非洲、拉美）的助理国务卿担任组长，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助理部长或其帮办，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一名成

员。此人负责保证所有的选择方案都经过审核，然后把最后成品即调研报告送交基辛格。部际小组照例不提任何肯定建议，它的职能只在于提出各种“地区性”选择方案，供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

这些选择方案在送交高级审查小组之前，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加以提炼、加工。高级审查小组由基辛格主持，成员有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视情况由他们的副手出席。这个小组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现实的选择方案”都能上达总统。然而，除非基辛格认为某个选择方案是现实的——这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然它就休想跨过总统的门槛。

这时，这些“选择方案”才正式提交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法定成员，并由基辛格提出选择意见。基辛格解释说：“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进行讨论，人人都有机会提出意见，但仍然要由总统本人作出决定。总统喜欢下面把这些选择方案写成书面东西再交给他，然后由他自己斟酌决定。”

总统一旦作出某项决定后，就送回给基辛格，然后再由基辛格转到副部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副国务卿主持，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基辛格）。委员会的任务是贯彻总统的决定，不过有时候说时容易做时难。基辛格有一次解释道：“局外人一定以为总统下令，下边当然照办不误。其实不然。我还得花很多时间才能使它得以按照总统的意图来贯彻。”

基辛格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比邦迪、罗斯托都大得多。尼克松发布的关于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号行政命令，就把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的一切行政大权都集中于基辛格之手。这项命令剥夺了国务院和国务卿在以前历届政府里享有的特权。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最初并不介意；等到介意时，已经来不及了。基辛格除了掌握把选择方案送呈总统的工作外，还负责一系列署（局）际委员会；一旦出现危机，还建立一些新的强有力的委员会，也由他负责。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正像他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既是行政长官，又是无情判官。”

国防计划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设法使每年的国防预算同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协调起来。国防预算之巨大——1974 财政年度为 850 亿美元——正好说明这个委员会之重要。它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情报委员会为整个情报系统规定总的政策。它也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四十号委员会”（根据总统关于成立该机构的指示而定名）是专门处理美国秘密情报活动的机构。它也是由基辛格主持的。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处理危机的高级机构。它是在北朝鲜击落了美国间谍飞机从而造成一次重大危机之后，在 1969 年 4 月成立的。这个小组还是由基辛格主持。

1969 年 7 月成立的核查小组，是白宫“在限制和控核武器方面同苏联进行缜密谈判”的“行动中心”。这个小组又是由基辛格主持。

其实，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往往都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由于处理的问题不同才安上不同的名称。但是，很少有哪项外交政策不是通过这个精心设计的体制而后决定下来的。结果，由于基辛格控制了 this 体制，他也就控制了决策的全过程。“人人向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一人向总统负责”，这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历来工作方法的一针见血的概括。

这种由总统设计、通过基辛格贯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做法，深深闯入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这两个一向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的腹地，弄得怨声载道。

亨利·基辛格 1969 年 1 月 20 日来到他设在白宫底层的办公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那个正在努力从约翰逊政府转变到尼克松政府的行政机构提出了 50 个问题。有许多问题在规定的回答期限内是无法作答的。基辛格要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商务部和财政部以及预算局在一个月或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一些问题提出详尽的答案，如：美中关系的现状如何？美苏关系的现状如何？美国与印度、南北越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现状如何？苏联和中国是不是在走向战争？问题问个没完。“他妈的，他究竟认为自己算老几啊？”政府机关的走廊里，嘟嘟囔囔，一片抱怨。

基辛格承认，这一长串问题可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他在 2 月 6 日对一批白宫记者说：“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后几个月作决定时会大有好处。”他还说，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主意，而是总统的主意。尼克松决定“要像他向国会提出的年度经济情况报告一样，也提出一份年度国际形势报告”，也就是要对“美国的现状和趋向”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尼克松原来计划要到 1970 年初才把这部分内容作为年终总结发表，可是后来又觉得，说明一下“我们在 1969 年 1 月 20 日开始接管时……国际形势怎样”，未始不是个好主意。

基辛格把总统的主意作为一项命令来执行。他解释说，他不要政府办事人员提出政策建议，他要的是原始资料，“用来检验我们各项建议的……标准”。

国务院非常生气，勉强挑起了这个担子。那里的官员们抱怨说，基辛格只不过是在给他们“找点事干干”罢了。不久，当他们发觉一个小小的、高度集中的白宫核心班子正在把他们排挤出决策圈子，这时，原先的一些怨言很快就汇成一股怨气了。他们决定进行反击。

雾谷对基辛格体制的挑战，是由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外交政策专家乔纳森·穆尔带头的。理查森曾任马萨诸塞州的司法部长。穆尔则担任过理查森的副手，也是基辛格的老朋友。穆尔提醒基辛格，才不过几个月以前，穆尔在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时，基辛格曾表示颇有同感。这项研究认为，国务院应该是统筹对外政策的唯一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应该是一个公开论坛，各种各样参与政策制定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那里发表意见，来影响总统的最后决定。在穆尔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却在唱独脚戏。

理查森强烈支持穆尔提出的看法，至多略加变动，但他失败了。后来，理查森试图修改基辛格的体制以加强国务院的作用，建议由他来负责高级审查小组。这一着又输了。他后来计算了一下，他失败的次数两倍于得胜的次数，而所得的胜利又都是微不足道的。理查森后来不得不向基辛格屈服。

在穆尔的协助下，理查森安排了每周同基辛格举行一次午餐碰头会，这种午餐会不久竟成了当时国务院和白宫之间唯一有意义的联系。理查森和基辛格在对嚼沙拉之余，办了不少事，并且建立了一种私人间和工作上的密切关系，这使国务卿罗杰斯大为不快，1970 年 6 月理查森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后，罗杰斯故意迟迟不找人填补他的空缺。数月过去了。当时人们认为，罗杰斯是要做给基辛格看，理查森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事情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国务院倒了霉；罗杰斯和基辛格的关系每况愈下。两人几乎连话

也不说。基辛格背地里讥笑罗杰斯，但只是在最心腹的助手面前才这样做；罗杰斯贬低基辛格的成就，但也只是在最心腹的助手面前才这样做。

罗杰斯满以为靠他同尼克松的老朋友关系，总能保住他本人以及国务院的威信，并使有些官员想削弱他在政府中的权力的阴谋不能得逞。但他从根本上把形势估计错了。尼克松显然不是这样想的。只是在这场争斗的高潮过去以后，理查森和穆尔回过头来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基辛格并非自作主张要造成一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是在执行总统的指示。穆尔解释说：“总统一任命亨利和罗杰斯，人们就发现亨利感到干起事来有点勉为其难。总统是想由他自己办国务卿的事，因此他任命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物在前台掌管国务院——一个老朋友，为人可靠，又是外行。他然后再任命一个全国找不出第二个的外交上最能干的人来死心塌地为他服务。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理查森大体上具有同感。他说：“我越是观察总统和基辛格处理对外政策问题的做法，就越是相信目前这种安排几乎肯定是按总统的意旨下来的——不是因为亨利想要那么办，而是因为总统要那么办。”

基辛格同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关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尽管他们是尼克松政府里吵架最多的两个，但这两人互相尊重。当他们在196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初见面时，莱尔德掌管竞选政纲委员会，基辛格是委员会的一个外交政策顾问。莱尔德钦佩基辛格那种顽强的反共精神，基辛格钦佩莱尔德政治上的求实精神。莱尔德16年来一直是威斯康星州选出的众议员，在国会里是一位实力人物。他放弃了这个地位和有可能出任少数党领袖的机会，而接受了尼克松为他安排的五角大楼职务。莱尔德跟罗杰斯不同，罗杰斯是基辛格手下的败将，而莱尔德却同基辛格打了个平局。他们在越南问题上观点不同，他们在武器经费上意见不一，他们对1971年印巴战争的某些方面也各有各的看法。照五角大楼发言人丹尼尔·亨金的说法，他们斗得像“两只猛虎”，但谁也压不倒谁，总是在不伤尊严、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各自收兵。这位总统顾问每个月有一两次去五角大楼同莱尔德共进早餐。但他却不很愿意和罗杰斯同桌吃饭。

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最初也向国会里的朋友抱怨亨利控制所有的情报；但在尼克松政府执政后不久就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是总司令的意图，基辛格只不过是他的传令军士长而已。基辛格后来说，就“我同军方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比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更能接受他们所不喜欢的决定。”这里，他显然低估了五角大楼可以搞到白宫绝密情报的能力。1970年初，即尼克松和基辛格搞超级机密控制一年之后，据说五角大楼的头头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联络单位安插了一个海军文书士官，专门窃取那些处理越南、中国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敏感问题的“亲阅”绝密文件，送给五角大楼。这种秘密活动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

基辛格维护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解释说，总统“对组织工作有非常坚定的看法”。不想让副国务卿主持高级审查小组的是总统本人。把这项工作交给基辛格做，事情就简单了，免得有时要否决一些决定。总统希望权力掌握在直接由他领导的主管外交政策的人手里，就是说，他的顾问手里。明明讨了便宜的基辛格却又说：“我对组织机构没有什么定见，因为我认为总统怎么办都可以。”

基辛格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之余，偶尔也表扬一下某些出力的

部门作为点缀。实际上，他对整个官僚机构一直抱有一种近乎轻蔑的情绪。这种情绪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他在 1972 年说过：“国务院有 2 万人，国防部有 5 万人，他们都需要彼此同意才能采取行动……他们都想做我正在做的事。所以问题就成了：怎样才能使他们把文件运转起来，推动车轮前进，使工作得以完成？”

这种高傲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外交政策是众人的事，可不是少数高级专家的私产。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早在 1969 年就担心，国家安全委员会独揽大权的趋势将夺走“许多传统机构掌管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而这些机构大多数是对国会负责的”。富布赖特还对国会不能直接过问基辛格的工作感到不安。后来在 1970 年，基辛格每当国会要他去作证时总是推托说他有行政特权，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对此曾表示反对。赛明顿指责说，基辛格是没有国务卿名义的“地地道道的国务卿”，但却不受国会的追究。

基辛格想用贬低自己和自我解嘲的办法来缓和一下刚冒头的对他的批评意见。他跟一群记者说：“我不相信我有 7 个人就会把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接管过来。”

他在正经谈问题的时候总是表示，掌握决定权的是总统，而不是他。虽然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的主管人，把最后的选择方案上达总统，但他说，他从不凭自己的好恶来影响方案的上呈。他说：“在实质性问题，并没有什么‘基辛格政策’，我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一系列政策选择方案。假如真有什么‘基辛格政策’的话，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所建立的一整套新体制就会乱了套，更不用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了。”

基辛格一方面认为一个人未经总统要求而擅自主张推行自己的政策无异于“自杀”行为，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是跑腿的角色。他说：“总统在一天的工作完了，把双脚往桌上一翘，说‘好吧，亨利，你把所有的选择方案都送来了，那么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当然，我就对他提出我的看法。但是我并不想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他。再说，他从来也不会让人家把意见强加给他啊。”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强加给”尼克松。基辛格最初的印象是，他和总统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尼克松上台后他们开始一起工作的那种亲密而又正常的关系就证实了这一点，基辛格近乎本能地知道只有在他同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合为一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控制政府机构，从而帮助整顿美国外交。他对总统毕恭毕敬，因为几个月之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尼克松，现在他要消除这个痕迹。要让基辛格把自己那种人所共知的自我中心感屈从于尼克松的自我中心感，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使尽他赖以青云直上进入白宫的浑身解数——动脑筋，多联系，坚韧不拔，讲求实际。

天寒地冻的 1、2 月间，往往在下班时，白宫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收拾皮包回家了，基辛格却往椭圆形办公室走去，说他要跟总统交谈一下最新情况。交谈情况的时间往往不长，然后两人就谈一些别的事情，有时一谈几小时。基辛格后来说：“我毕竟是少数同他能谈得来而又是他认为同他知识相当的一个人。”

霍尔德曼和新上任的总统发言人罗纳德·齐格勒偶尔也信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听一会儿。总统和他的顾问在那里规划未来的美国外交方针时，往往交谈一些旅行中和政治经历中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一些世界人物的观感，谈

到赫鲁晓夫、厨房辩论、多边核力量、戴高乐、越南、北约组织、中国、东南亚条约组织、导弹差距、勃列日涅夫、古巴危机，等等。

对于世界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正在发生变化的作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看法非常相似。不过，基辛格总是偏重哲理，尼克松偏重政治。基辛格把他丰富的理论知识用来谈一个问题，而尼克松看问题的方法却是凭直觉——这是饱经政治风霜的顽强斗士所采取的态度。但是鉴于 60 年代发生的那些动乱事件，他们两人都确信，美国以全球为已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辛格曾对总统的一批朋友说过，1969 年进入白宫的，“不管是谁，都得重新估计一下我国政策的前提”。尼克松政府“接事之日，正是美国不得不对前一阶段的政策力矫积弊之时，刷新美国政策已属势在必行”。这当然是指的越南战争了。基辛格又说：“归根到底，我们之所以投入战争，部分原因……是这种理论，即不管哪里出现侵略，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

基辛格和尼克松一致认为，这种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不过，越南问题固然重要，却不是改变政策的唯一原因。西欧已经恢复了活力，这一点，在 8 年前基辛格就看到了，当时他曾提醒过肯尼迪。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家长式态度必须及时抛弃，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基础同它们打交道。共产主义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中国再也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两种威胁了。

然而，对基辛格这位核战略家说来，近几年最重大的变化还是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 1945 年到 60 年代初期挑起保卫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重担，是因为当时美国对苏联是居于压倒的战略优势。1962 年美国迫使赫鲁晓夫把导弹从古巴撤走，正是由于这种优势，而不是由于肯尼迪有什么魅力。这场导弹危机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推动了苏联开始执行一项在导弹和核武器生产上大规模赶超美国的计划。1969 年尼克松总统重新审查美国所承担的义务并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所面临的已是一种崭新的局势了。

这个复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建立不久，就受到了一次考验。

1969 年 4 月 15 日午夜刚过，五角大楼接到报告说，一架美国 EC—121 间谍飞机，载着 31 个人，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了，可能是北朝鲜人击落的。凌晨 1 点零 5 分，五角大楼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室。1 点零 7 分，值班官员在电话里把消息报告了黑格。4 分钟后，黑格跟基辛格通了电话。在约翰逊时期，罗斯托遇到这样的事，是会立即向总统汇报的。但在尼克松领导下，基辛格却要等到掌握了更详细的情况再说。凌晨 2 点 25 分，五角大楼来电话说，北朝鲜声称是它打下那架飞机的。基辛格仍然没有惊动总统。他要求了解有关营救和军事应急计划的情况。清晨 4 时，五角大楼证实了这架飞机确实是被北朝鲜人击落的。到这个时候，基辛格才打电话给总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现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总统问道。

基辛格说：“不需要，我们正在汇集各方面的情况。”

上午 7 点，基辛格又打电话给总统，准备 8 点整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基辛格带了地图及国务院、国防部提供的初步报告到会。总统说：“我只想知道这一点，这件事发生在领海 12 哩以内还是以外？”

“发生在离海岸大约 90 哩的海面上。”基辛格回答说。

总统问：“你有把握吗？”

基辛格答道，“有把握。”

尼克松然后跟基辛格说，他不想研究地图，但他想要一个关于可能采取什么军事和政治对策的全面报告。他还下令在他考虑对策期间停止类似的飞行。

任何熟悉尼克松过去一贯做法的人，准以为他会要求采取迅速的军事报复行动。一年多以前，1968年1月，电子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被捕获时，尼克松就曾抨击约翰逊对北朝鲜的攻击作出的反应太温和。当时尼克松指责道：“美国的尊严下降到太不成样子了，连北朝鲜这样一个四等军事国家居然敢在公海上劫持美国军舰！”但是尼克松当上总统以后，却改变了他看问题的角度。

从星期二下午6时到星期三凌晨3时，基辛格一直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小组的会，准备了一份关于各种对策的全面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总统那里，在星期三的两次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北朝鲜进行报复性轰炸。基辛格倾向于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总统看来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国务卿罗杰斯要求他进一步考虑：苏联、中国或者中苏两国会不会感到不得不起而捍卫北朝鲜。

星期四这一天，基辛格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另一个研究小组会议，准备了两份关于美国如果轰炸北朝鲜会发生什么情况和如果不轰炸又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非常详尽的报告。莱尔德国防部长建议，这种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三方代表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题研究小组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以便使应付危机工作方面能有些章法”。这就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起源。

总统又推敲了他的选择方案，但他依然不下令进行轰炸。可是，他决定在星期五中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经向北朝鲜提出抗议，EC—121飞机将恢复飞行——但是有军用机护航。他强调指出，他的决定仅仅是一项“初步决定”。

尼克松的声明立即被平壤电台斥责为“玩火行为”。北朝鲜人警告说：“我们绝不会置之不理。”

那天下午，总统和基辛格对这场危机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让基辛格征求一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的意见。一小时后，基辛格汇报说，这些政府高级官员大部分反对采取报复性轰炸行动。总统这时又问基辛格有什么意见。基辛格回答说：开仗容易脱身难。他对总统说，EC—121飞机危机是第一次，“不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危机，美国的反应该有条不紊，深思熟虑。这时基辛格感到，总统似乎倾向于反对主张对北朝鲜基地迅速进行报复性袭击的一切建议，因此他便很快改变了立场，基辛格开始捡起了罗杰斯所主张的对北朝鲜的挑衅需要克制的论点。他说，进行报复性袭击可能会影响更大的目标——重新调整同中国和俄国的关系。

当天晚上，总统决定搁置这件事情。基辛格感到满意的是，尼克松是在全面研究各种选择方案之后才作出决定的。

第一次危机过去，基辛格成了名人。他登时在新闻界产生了影响。基辛格在新政府任职还不到3星期，他的头像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对于这位只靠一个人支持的前哈佛大学教授来说，简直是平步登天。这家周刊在2月14日一期中，发表了一篇向基辛格大送秋波的专文，用5页篇幅介绍他从菲尔特镇到白宫的经历，文中还对梅特涅和洛克菲勒有所赞扬。在这

之前，基辛格曾指示他的部下，要同《时代》杂志的记者组充分合作。基辛格在新赢得的声誉中飘飘然了。一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回忆说：“基辛格非常想出风头。”他在尼克松政府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就连算命先生也难以料到他的前程会这样一鸣惊人和引起这么多的议论。基辛格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妈妈也许这样想过。我自己，可没有。”

基辛格喜欢看到他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但一想到他的部下有可能把政策机密泄露给报界，却也感到忐忑不安。有一件有名的内幕新闻是：一次基辛格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一些机密情报，第二天他就召开了工作人员会议，劈头便问：“在座哪位是代表《纽约时报》的？”他这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他内心的确对泄密感到一种深切而近乎神经质的不安心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他醉心于尖端外交，另一方面认为有必要让白宫的霍尔德曼之流相信他部下的忠诚。同时，基辛格深感连自己也有必要表白忠诚。在他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少有7个工作人员家里的电话被偷偷地安上了窃听器；这些人自己不知道，但基辛格是知道的，有一些忠于国家但不是忠于尼克松个人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个机关里的空气实在无法忍受，便一怒而去了。

基辛格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内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后，约翰·米切尔在1970年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满不在乎（至少在公开场合），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在哈佛大学，我花了10年功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个月。”

第五章

巧施连环套

“经过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第一次说出这样一句话仅仅几小时后，克里姆林宫就向白宫提出了挑战，要求白宫说话要算数。苏联外交部把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都找了来，举行了难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在那里听了苏联的两名高级发言人发布消息，而不像往常那样只是听宣传。

新闻司司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国际司司长基里尔·诺维科夫宣布，苏联已准备好就限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问题“开始认真交换意见”。诺维科夫说：“尼克松政府的代表什么时候愿意坐下来谈判都行，我们是准备好了的。”

华盛顿这个和解的调子和莫斯科那个和解的响应，使许多美国人满怀希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冷战政策和铁幕政策，对抗和冲突，花费了不知多少亿美元来发展核技术，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可怕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这一切，使这些美国人忧心忡忡。人们没有忘记，新总统本人就是最早的冷战武士之一，但是他现在讲话的调子似乎在变。还有什么比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好的办法来开创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呢？

一些有影响的参议员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这些议员竭力想摆脱为了制造层出不穷的先进武器而引起的那种耗费巨大的恶性循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同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一道，打破了党派界限，共同力促刚上任一天的总统接受苏联的建议。

大学里那些备受尊崇的研究防务问题的学者也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这些学者对研制分导多弹头这件事深为震惊。这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将使美国能从一枚导弹的弹头中发射出一串小弹头，加以制导，使之击中各个不同的目标。

主张搞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说客们对新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要它赶紧抓住苏联的这个倡议，实际上也就是把约翰逊政府未完成的事业接过来。

如果尼克松同意立即同苏联人谈判，他原可以轻易地取得通常反对他的人的支持。但是，这时无论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对于接过约翰逊政府那套未经考验的谈判方案就仓促去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都不感兴趣。不管有压力也好，没有压力也好，他们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先拖一拖再说。一些参议员、学者以及约翰逊手下的人把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但是，白宫这些新的战略家却不然，他们对这种会谈的看法截然不同。诚然，他们认为限制核武器至关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同苏联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的策略，是以他们称之为“连环套”的思想为基础的。

“连环套”这个思想，是基辛格均势理论的最新运用。他自195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过。他在博士论文中以拐弯抹角的笔调写道：“如果一个大国能得到它所想要的一切，那么它就会力求取得绝对安全，即建立一种感觉不到有外国威胁的、一切问题都能像国内问题那样容易得到解决的世界秩序。但是，鉴于一个国家的绝

对安全意味着所有其他各国的绝对不安全，因此，绝对安全决不可能通过‘合法’的解决办法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征服来实现。”在核时代，这种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征服是不可设想的，除非疯子才想这样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所能要求的唯一目标是“相对安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即“稳定秩序的基础是各国的相对安全，因而也就是相对不安全”。

显然，要实现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有赖于在敌对双方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把一方的要求强加于对方。在基辛格看来，苏联始终是这种平衡的潜在破坏者，就人口和核力量来说，苏联是唯一足以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而且在一个正在奋力建立秩序的世界上，苏联一直是动乱势力的祸首。现在应该教育苏联领导人，要他们掌握如何使他们本国的利益同其他各大国的利益保持平衡的手腕。因此，美苏问题同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问题取得进展，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

基辛格对“连环套”的看法是广义的，带有一些哲学色彩；而尼克松则着眼于实际，着眼于具体问题。尼克松就任之前已开始认为，要实现越南的和平和保持中东的安宁，关键都在于俄国人。他觉得克里姆林宫同那两个动乱地区是有着明显联系的。

因此，如果苏联领导人在他们停滞不前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想取得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同美国做生意，如果他们想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削减武器经费使之用于消费品生产，那么，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尼克松所考虑的是某种外交上的以物易物。必须使俄国人相信，遏制而不是扩大局部战争是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这样，苏美就有可能跨入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

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加上尼克松一心想拖住莫斯科来解决越南问题的念头，两者结合起来，便使“连环套”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月20日提出的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检验这项政策的第一个机会。

基辛格后来解释说：“我想在广阔的战线上采取行动。”他的目标是要达到“恰当的利益均衡”，以诱使莫斯科在解决一系列问题时采取合作态度。他说：“我不想玩弄气象学的把戏。”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十分讨厌所谓“友好气氛”之类的提法，这句话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基辛格希望同苏联人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具体的、切实的谈判”；而在他看来，每一项谈判都可以用来“防范”对方推翻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同时也可以“防范”突然来一场世界性危机而破坏实现和解的通盘计划。他强调指出：“我们之所以这么坚持‘连环套’，原因就在这里。”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教育国家安全委员会，使之领会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新精神。

在总统就职的次日，他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驻越美军副司令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紧急战备局局长乔治·林肯，当然，还有基辛格。议题是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会议的讨论情况是绝密的，没有宣布任何决定。当天下午，老资格的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对克里姆林宫这项紧急倡议作了唯一的官方反应，他对记者们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将得到新政府的优先考虑。他没有进一步

发挥。

两天后，白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的是同一批人，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自那以后又过了两天，召集了第三次会议。总统迅速作出了决定。

1月27日，尼克松利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来宣布他对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的决定。这次记者招待会在白宫东厅举行，通过电视播送实况。他始终没有用“连环套”这个词，但在他讲话中多处包含了这个意思。基辛格当时在场听着。这时，离白宫不远，在第16街和L街交叉口那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手下的人也都围坐在电视机旁，出神地听着尼克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涵义。

尼克松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先生们，女士们：这是我就职以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我设想大家会有一些问题要提，所以我不想说什么开场白，就直接回答你们的问题吧。”

到第五个问题，才提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个问题。前面的几个问题是：新总统的立法计划，实现越南和平的“打算”，他对改善同北京的关系的悲观看法，以及他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那第五个问题是这样提的：“总统先生，关于对外政策，特别是核武器政策，你能否对我们谈谈你……对同苏联举行导弹问题会谈采取什么态度？”

尼克松回答说：“我是赞成举行战略武器会谈的。这里，问题不仅在于会谈什么时候举行，而且在于会谈将在什么情况下举行。”

尼克松在解释这问题时，有一处明显地反映了基辛格的思想。总统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有两派：一派主张，不管“政治解决方面有无进展”，都要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另一派则反对“对我国的战略武器作任何削减”，除非先在“政治解决方面取得了进展”。

尼克松不参加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采取了中间立场。

他强调指出：“我打算采取的方针是，务必使举行战略武器会谈的方式和时机能够（如果能够的话）促使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例如中东问题，以及一些只要美苏合作便可造福和平的其他重大问题。”

“连环套”这个方针，这时才作为美国新的谈判策略基础而宣告出笼。总统一方面拒绝了苏联要求把限制战略武器作为孤立的问题来谈判的倡议，另一方面又在苏联人面前点出举行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同美国一道使“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他提出了中东问题，还暗示了越南问题。现在挑战书又扔回到克里姆林宫了。基辛格认为，能否实现缓和，只看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如何。

然而，美国的这一重要策略变化——“连环套”，并没有立刻被人们充分理解。眼前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统拒绝立即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点上。尼克松这一着使许多国会议员、学者和社论撰写人感到大失所望，使在华盛顿的多数外国（尤其是苏罗）外交官为之愕然。他们意识到美国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包括多勃雷宁在内）多大把握能看出，美国谈判策略的改变会对苏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多勃雷宁当晚发回莫斯科的电报想必曾使克里姆林宫的美国问题专家忙到深夜。

总统看样子是当场临时决定公开宣示“连环套”这个方针的，这使基辛格很不安。他认为，要使“连环套”起作用，就不应把它作为报纸头版新闻来向苏联人提出挑战。相反，他宁愿采取比较外交的做法，譬如同多勃雷宁

进行私下会晤，这样，他就可以详细说明“连环套”对双方有什么好处。据莱尔德说，基辛格认为，“在公开场合过多地谈论‘连环套’，就有把事情搞坏的危险”。

在以后的几周里，基辛格成了向抱怀疑态度的政府高级官员宣讲这一概念的唯一老师。这些官员一口咬定说，“连环套”会使大国陷于无穷的争论之中。他还同国会议员进行了座谈，因为他们也抱怀疑态度，认为“连环套”肯定要葬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途。此外，他还接见了一批又一批记者。1969年2月6日，他在同白宫记者团会见时说，“根本没有打算要挟”苏联人“在某一方面接受吃亏的解决办法，而在另一方面使它有所得益”。

基辛格的矢口否认并没有能使苏联人满意。一国搞“连环套”就是对他国的讹诈。在新政府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进行了一连串争论激烈的私下会晤。基辛格在见面时总是想开导这位苏联外交官，使他了解“连环套”的好处。但是多勃雷宁，这位从1962年就在华盛顿当大使、对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有素的人，却是敬谢不敏。在他看来，“连环套”就是高压手段，就是强加于人，就是敲诈勒索。但是白宫寸步不让，坚持要搞“连环套”达半年多之久。苏联人认为这简直是不切实际的顽固，他们既怒不可遏，又莫名其妙。

为了坚持“连环套”，基辛格不得不顶住来自他自己部下的种种批评、压力。他的一个助手说：“那一阵子亨利可没有少挨骂。国务院想向苏联人提供信贷，签订航空协定。负责军备控制的人要求他同意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的欧洲盟国要亨利接受苏联提出的召开欧安会的倡议。甚至共和党人也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同俄国人早日举行最高级会谈。连肯尼迪也曾经搞过一次呢。”

但是，基辛格在确信已经在缓和的土壤中妥善播下种子之前，对于推动东西方和解的努力，却“存心加以拖延”。重新安排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而需要周密的准备。

根据基辛格的想法，拖延还有另外一条理由：对于那样复杂的谈判，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没有弄清底细之前，我们不想就这样重大的问题进行谈判。”

基辛格曾经说过：“我们从约翰逊政府那里接收过来的有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全部研究材料就这么一点儿。”他边说边合拢两掌，几乎碰到一起。甚至在尼克松班子开进华盛顿之前的1968年12月28日，当选总统其时还在比斯坎岛上闲度周末，就指令基辛格着手准备一系列的调研项目。其中有两个属于战略武器这个总题目的专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战略力量布局”，一个是关于“禁止核扩散条约的后果”。

基辛格把研究“战略力量布局”的任务交给了由哈尔佩林和林恩领导的一个精干的班子。他们编制出了一张两个超级大国战略力量的对照表：双方各拥有的各种类型的导弹有多少；飞机、坦克、潜艇和部队有多少；在各个特定期间双方能动员的兵力有多大；可以侦察到的对方武器生产方式有什么变化；正在重点生产哪些武器，哪些武器是次要的，等等。研究的项目并不限于技术问题。还对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虽然分析得并不十分细致，却深刻到足以判断出两个超级大国能否持久地大量生产武器。

这份调研报告在1月下旬写了出来，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专家们只进行了泛泛的审阅，但基辛格看得却很仔细。他正在为尼克松在竞选高潮期间再三

提出的一个问题寻求答案。尼克松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强调，美国必须对苏联“在军事上保持明显的优势”。他强烈指责民主党人主张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同苏联达成协议。这份报告所附的各种表格，果然证实了基辛格原来的直觉：这种“优势”在 70 年代是办不到的。由于苏联人正在建造的类似“北极星”型的潜艇和比美国武库中的任何一种类型都要大的洲际导弹，总统根本无法在 70 年代实现美国以往曾对苏联保持过的 5 对 1 或 6 对 1 的那种优势。哈尔佩林写道：“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美国设想出什么样的战略武器计划，都不可能取得 50 年代时的那种优势了。”

的确，只要把两国的 1969 年 1 月时的战略力量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苏联人在赶超美国方面已经取得了何等的进展。对照表指出：美国拥有 1054 枚洲际导弹，656 枚潜艇导弹，540 架远程轰炸机；苏联拥有 1200 枚洲际导弹，200 枚潜艇导弹，大约 200 架大型轰炸机。

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这份调研报告，基辛格向总统提出了如下建议：“充足”应取代“优势”作为美国军事政策的目标。尼克松接受了这个意见，不过他想掩饰自己的战略退却，说什么在语义上兜圈子是错误的。他在 1969 年 1 月 29 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美国拥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以维护我国的利益和保持本政府确信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义务。我认为，‘充足’这个字眼实际上比‘优势’或‘均等’都更合适。”

基辛格搞的另一个“战略”调研报告，完全赞成约翰逊政府谈判成的那个禁止核扩散条约。报告认为，这项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是不利于美国的。基辛格劝总统批准这个条约。2 月 5 日，尼克松将条约文本送交国会，要求参议院立即采取行动。

参议院经过 4 天的辩论，以 83 票对 15 票批准了这个条约，不过在此以前，它指责政府拖延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连富布赖特参议员也不能完全领会基辛格所说的“连环套”的种种好处。

华盛顿到处是一派疑虑气氛，由疑虑演变而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担心，“连环套”只不过是幌子，是一个搞新武器计划的学术遁词而已。基辛格奋力反驳了对政府意图持如此恶意的看法，但是谁也不买他的帐，尤其是因为参议院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后才一天，总统就宣布美国将搞新的所谓反导弹导弹计划。尼克松把这种导弹取名为“卫兵”系统。在尼克松看来，反导弹导弹可以使美国今后同苏联人进行任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易时得到一些谈判本钱。

三军参谋长建议，美国应该恢复造洲际导弹（已有好几年停留在 1054 枚这个水平），并加紧生产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基辛格明知苏联的战略武器与日俱增，但是在 3 月 5 日的一次专门研究反导弹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却极力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理由是：那样做会加剧军备竞赛，因而从长远来看，可能危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途，不必要地刺激俄国人。

虽然国会对政府建议搞有限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方案的利弊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悄悄得到总统批准由它们加紧研制分导多弹头。分导多弹头搞成后，将使武库骤然扩大。麦克纳马拉曾把这种从单弹头导弹发展为多弹头导弹，比作从常规战发展到核战的变化。为了争取人们的支持，使增加拨款理由更足，莱尔德恢复了五角大楼一年一度关于“赤祸”威胁的宣传，透露了关于苏联新式进攻性导弹 SS—9 的令人震惊的情报。有一次他

在国会里说：“苏联人正在搞第一次打击能力。”第一次打击，是美国核战略概念，即在发生危机时先动手把对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全部或大部摧毁，亦叫解除武装的第一次打击。

要断定基辛格对分导多弹头的确切态度，是不容易的。他表示，一旦总统拿定了主意，他就支持。然而，这件事却反映了基辛格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哪怕是他最亲信的顾问（在走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同他朝夕相处的人）也不了解他内心深处对分导多弹头的想法。一个顾问说：“亨利肯定是赞成搞分导多弹头的。就我所知，在武器问题上，他从来是标新立异的。但是要是你问我‘你知道亨利赞成搞分导多弹头吗’？我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

基辛格认识到，分导多弹头会成为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一个复杂因素，因为要检查出在这种洲际导弹的母弹头里边究竟塞进了多少小弹头，除了就地视察之外别无他法，而莫斯科却是一贯反对就地视察的。此外，基辛格还认识到，一旦俄国人看到美国在分导多弹头的武器竞赛中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要他们放弃研制自己的分导多弹头，是不现实的。从个人因素来看，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许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同这种可怕的新武器关系太密切，就可能损害自己同哈佛大学同事们的关系。此辈中有不少指责搞分导多弹头的决定是向新一轮军备竞赛迈出很大的一步。

不过，还是有理由揣测，对于尼克松批准搞分导多弹头，基辛格并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他最后是赞成的。一个原因是，他从来不相信单是武器这个因素就会引起战争，战争要归咎于人、政治和外交，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基辛格对苏联人的疑虑是众所周知的。苏联一面呼吁举行新的武器谈判，一面继续扩充其 SS—9 导弹，这一点可能促使了基辛格支持搞分导多弹头的决定。不管怎样，总统既已批准分导多弹头上马，再来谈这个问题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于是基辛格马上转而为之辩护。他经常提醒记者们，早在麦克纳马拉时期，就已经开始研制分导多弹头了。

根据总统对反导弹导弹和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考虑和决定这一背景情况，基辛格费了大劲（往往还吃力不讨好）拟定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的立场。在尼克松就任总统的头一年，除越南问题外，没有哪个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耗费基辛格的精力的。

1969 年 10 月 20 日，总统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秘密会晤。他们说，美国终于准备好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了，问苏联准备好了没有。多勃雷宁回答说，苏联也已准备好了。显然，由于就在那一天苏联与中国在北京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苏联东翼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苏联人也想回敬一个他们自己小小的“连环套”：他们也许认为，莫斯科同华盛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人产生一种压一压的作用。5 天后，美苏两国同时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 11 月 7 日在赫尔辛基开始。

在白宫发布这个公告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杰斯显然企图再次破坏基辛格的“连环套”方针。他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完全没有附带条件，我们并没有为这个谈判提出任何条件”。基辛格听到罗杰斯的这句话后，简直气昏了。目睹者事后谈起这件事犹有余悸。罗杰斯的话是传给苏联人的错误信号。基辛格建议，立即重提“连环套”。总统是“连环套”的合伙炮制者，他第二天便指示他的发言人齐格勒去做这件事。齐格勒对记者说：“这

个谈判是不能在真空中举行的。总统的看法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些记者觉得，注意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争斗是他们工作中颇有趣味的一件事。

要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公告发表后，马上引起了国会要求尼克松建议两国停止多弹头导弹试验的强大压力。许多参议员希望，把分导多弹头导弹这个妖怪赶回瓶子里去，为时还不晚。但是基辛格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根据他对会谈的计划，提出这种建议的时机还早——只有在实际谈判中对俄国人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摸底后才能提出来。总统顶住要求停止发展分导多弹头的压力，则另有一条理由。他要在美国搞成了这项技术并使之完善之后，才愿意冻结。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基辛格在举行首轮会谈的前夕悄悄告诉多勃雷宁大使说，美国在分导多弹头方面和任何其他方面都不打算提出具体建议，希望俄国也不要提出什么具体建议。

11月17日，会谈在香槟酒杯丁当作响声中揭幕了。美国代表团团长是杰勒德·史密斯。他是个华盛顿富翁，是尼克松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曾担任杜勒斯的核武器问题专家。苏联代表团由费拉吉米尔·谢苗诺夫率领，他是个德国问题权威，1955年以来任副外长。史密斯收到了一份总统发来的由基辛格起草的电报，突出地强调“连环套”的重要性。电报说：“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危机，不是简单地因为有武器，而是因为双方的利害冲突，或是因为一方野心勃勃追求单方面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在解决当代危险的政治问题方面求得进展。”

换句话说，美国将采取审慎的方针。美国并不准备急急忙忙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虽然这样的协议也许是值得欢迎的。美国打算等一等，先作些试探，看看在政治问题上有无同时出现进展的迹象。通过会谈可以全面考验一下苏联的意图。

最足以说明美国的方针和风格的，是代表团带到赫尔辛基去的谈判文件，原来那里边竟没有一个具体方案。不过，却有4个说明性的方案，全都是用作谈判依据的。这4个方案内容广泛，从冻结进攻性武器到实际削减这种武器的储存都包括在内。基辛格给苏联人提供了选择余地，可以从中任意挑一个。实际上他等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个方案你们最感兴趣？说得更具体些，这4个方案中哪些部分你们最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捏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其依据是基辛格所谓的“积木组合”。

这种新奇的作法，消除了造成大量时间浪费的那种老一套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按照那种作风办事，第一，必须事先对某项具体方案取得一致意见（即美国政府各部门都能接受）；然后，如果苏联人拒绝了，整个过程又得在另一个具体方案上重演一遍。每一次必须使政府机关各部门全都满意。而现在按照新办法，只需重新搭配一下“积木”，一套新的谈判方案就出来了。

基辛格认为，他的“积木组合”节省了宝贵的时间。美国政府花了5年时间煞费苦心才谈成了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核扩散条约也经过4年多才谈成——而且那项条约，用基辛格爱用的话来说，“甚至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后来人们就这样称呼）从1969年11月17日起，只用了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对基辛格来说，这就清楚地证明了他对军备控制谈判采取“积木组合”办法的好处。

新办法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能够测出苏联对会谈的态度是否认真。没有

一个人真正知道，苏联谈判代表是否打算以传统的冷战方式行事，他们是否会抛出一个冗长的、捉弄人的方案，宣布这个方案是会谈的唯一基础，没有莫斯科点头，他们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更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毕竟是一项极其错综复杂的工作，过去从未就这个问题详细地交换过意见。1967 和 1968 年时，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曾同苏联人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套总的政治原则，但是双方都还没有遇到过像导弹经不起打击的程度或以新式潜艇导弹替代老式 SS — 13 导弹这样一些棘手的问题。

使基辛格感到相当满意的是，苏联人很快就对限制战略武器的各种技术问题同美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969 年 12 月 22 日，两国谈判代表休会度圣诞节，双方同意于 1970 年 4 月 16 日在维也纳复会，从而确立了轮流在芬兰和奥地利进行谈判的格局。他们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表示：“对于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双方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观点。”这一提法并非通常那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外交辞令，而是表明朝着对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取得相互理解迈出了真正的一步。然而，正如基辛格经常指出的那样，相互理解并不总能保证达成协议；有时，相互理解只不过说明存在着分歧而已。

1969 年 12 月 30 日，基辛格交给核查小组一份秘密指示，这个指示后来成了美国在 1970 年拿出来的谈判方案的基础。史密斯和谢苗诺夫在 4 月复会时，美国方面首次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方案，但是苏联人不接受——至少在当时没有接受。美国不能肯定，苏联人是否会接受禁止分导多弹头并进行就地视察的方案。不管是对就地视察，还是对不让他们有机会在分导多弹头技术方面赶上美国，苏联人都不感兴趣。美国不能肯定，苏联方面是否会接受“不搞反导弹导弹”的方案——要求两国都不设反导弹导弹发射架，实际上也就是不搞反导弹导弹。对此苏联人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周围设立了自己的“橡皮套鞋”反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也不能肯定，苏联方面是否会接受冻结进攻性导弹。对此，苏联人又是个不感兴趣。他们一直竭力要求订立一个局部协议——仅限于冻结防御性的反导弹导弹，他们说，只是在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之后，他们才准备讨论冻结某些进攻性武器系统的问题。罗杰斯和史密斯对这个主张是感兴趣的，但总统和基辛格却不以为然。基辛格坚持认为，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两方面必须联系起来，只谈一方不谈另一方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到 1970 年 7 月下旬，基辛格的意见占了上风。基辛格所制订的计划既包括防御性导弹，也包括进攻性导弹。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人士把这个计划称为“计划戊”，后来白宫人士还把它叫做“斯威”(SWA, 即 StopWhereWeAre)，意思是“到此为止”。这个方案于 8 月 4 日向苏联人提出，它规定：在进攻性武器方面，允许配置的洲际导弹（包括 SS — 9 导弹在内）的限额每方为 1900 枚，并完全禁止陆上机动洲际导弹。该方案不包括分导多弹头导弹（基辛格估计，苏联人是不会同意禁止分导多弹头导弹的），也没有提及前沿导弹系统，即部署在中欧的中程导弹。在防御性武器方面，方案建议，用来保卫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反导弹导弹的限额应为 100 枚，要不就干脆不搞什么反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苏联人不接受“到此为止”方案。基辛格的一个助手后来说：“凡是涉及到 SS — 9 导弹的，不管是‘到此为止’方案，还是任何其它方案，他们连听都不要听。由于苏方坚持只谈反导弹导弹问题，我们完全停顿了下

来。”这种局面实在令人沮丧。

在那年夏天的那个难解难分的时期中，苏联人只有一次离开过他们“只谈反导弹导弹”的既定方针；他们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建议，当即遭到美国拒绝。事情是这样的：7月10日，苏联人一反常态，不再重弹他们“不”的者调，而提议建立华盛顿—莫斯科联盟来对付“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苏联人的建议无疑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拒绝了这种建议。基辛格后来解释说：“假如苏联方面是认真打算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向我提出这个建议，而不是向史密斯提出。”

临近夏末时，基辛格知道总统很想同苏联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地点最好在莫斯科，时间最好在1972年大选前政治上某一有利时刻。但是，在能想出一套办法足以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僵局之前，或者说，在苏联人表现出有点愿意帮助总统“体面地”撤出越南之前，基辛格知道举行最高级会谈只是空想。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越南问题之间的连环关系，乃是尼克松政府的策略核心。虽然基辛格花了很大的力气，然而这两个问题却久久没有得到解决。有时，当基辛格提到“越南”这个词儿时，他坐在安乐椅上，缩成了一团。

看上去简直只有他原来的一半大小，一边咬着指甲，一边喃喃自语，嗓子低得几乎都听不见了：“真要命啊！”

第六章

巴黎秘谈

基辛格成为总统的高级助理之后，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结束不得人心的侵越战争。

在 1969 年的头 6 个月里，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对于通过谈判迅速达成越南停战，相当乐观。他们的时间表是以月计而不是以年计的。他们真地相信，只要公式用得对头，武力和外交结合得好，就可以产生约翰逊多年来未能到手的那种奇迹。

在 1969 年 1 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基辛格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越南谈判》的文章，为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依据，因而也就成了以后 4 年白宫所提出的一切方案的起点。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哪个国家的首都也没有引起像巴黎那样的兴奋。在巴黎，美国和北越刚刚由它们各自的盟友——边是南越，一边是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来进行一种四方的新努力，以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一开始就看得出，四方谈判丝毫不比自从 1968 年 5 月开始的华盛顿和河内的双边谈判更有成功的希望。甚至在谈判正式开始以前，双方关于谈判桌的形状问题——这是四方之间政治关系的象征——就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了。

谈判桌应该是方的，圆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菱形的，还是某种尚待发明的新形状，这个问题是由南越人提出的，目的显然是要在当选总统尼克松就职之前拖延谈判。他们一心希望新的尼克松会像旧的尼克松一样强硬反共。正当他们为了谈判桌问题吵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基辛格文章发表了，引起人们纷纷猜测，认为即将出现突破。消息传来之际，由直言无忌的副总统阮高其率领的南越人正在位于圣奥诺雷近郊大道的华丽的布里斯托尔饭店举行酒会，一时许多谈判人员，其中有美国人也有南越人，纷纷拦住新闻记者向他们要基辛格的文章看。

对于在巴黎的谈判人员来说，基辛格文章的关键在于为陷入僵局的会谈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基辛格指出：“有关各方都知道，……谈判方式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基辛格警告说，要美国同北越谈判关于南越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那是发疯——可是基辛格就任后不到一年，连他自己也逐渐把这个警告置诸脑后了。然后，等到两条轨道都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

基辛格原以为北越领导人会欢迎这个新鲜办法的；他当时认为，他们所要的无非是美军全部撤出南越。只是到了 1971 年，当他最初那个乐观情绪开始消失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他们是下定决心非要美国把“全部权力”交给他们不可。

要是河内不理睬他这一套，基辛格另有二线办法。他在文章里写道：“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

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跟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总要到来的政治较量。”换句话说，他建议的是一种类似詹姆斯·加文将军的“圈地战略”的方针——这样可以使美国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华盛顿的“体面地脱身”的战争政策，而不致产生漫漫长夜何时尽的情绪。

虽然基辛格认为 60 年代中期美国的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他反对一切主张美国承认错误一走了事的意见。他认为大国的行动切忌轻率，即使犯了错误也要信守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既然美国在这项义务中投入了 50 万大军，这就解决了关于越南是否重要的争论。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信义和美国的“荣誉”都押在越南的丛林里，美国的盟友和敌人都在急切地注视着，世界命运在 M-16 式步枪的枪口上动荡不定。他的灵活政策中包括一个决不让步的要点：他写道：“美国不能接受军事失败，也不能接受由外部军事压力造成的南越政治结构的改变。”

后来，反对他的政策的人抨击这一点，认为是一个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方案，可是在 1968 年 12 月之际，基辛格的主张看来颇有前途。他关于结束战争的明确计划同五角大楼一味追求军事胜利的幻想形成的对照如此鲜明，以致这一计划竟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誉。

在 1968 年那个竞选年中，尼克松也曾设想如何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基辛格是教授探讨问题，尼克松却是从政客竞选总统出发。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

尼克松与基辛格不同的是，他关于结束战争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虽然在竞选期间，他曾让关于他有这样一个计划的种种暗示广为流传。实际上，尼克松确有一篇越南问题的演说，安排好在 3 月 31 日晚上广播，可是在那个时间之前，约翰逊总统抢先宣布了对北越部分停炸，并且宣布了他彻底放弃竞选连任总统的打算。约翰逊发表了这个出人意料的宣告之后，尼克松决定不发表他的演说了。那篇讲稿后来收入当时担任尼克松的演说起草人理查德·惠伦的内幕著作《别让旗子倒下》一书，从中可以看出尼克松的越南战略的一些梗概。

尼克松在惠伦起草这篇讲稿时对他说道：“我得出了结论，没法打赢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不能那样说。实际上，看来我们只好说些相反的话，这完全是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的本钱。”既然是“没法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从他 1966 年立场的一个大转弯，因为 1966 年他曾以鹰派面目出来帮助共和党人竞选国会议席——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想出某种办法来争取和平，最低限度也要结束这场已经成为民族悲剧和政治包袱的战争。

在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几个星期，基辛格与尼克松就已开始为越南问题进行工作了。1968 年 12 月中旬，基辛格受聘后才几天，就拜访了他的老友亨利·罗恩。罗恩是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时任兰德公司总经理。基辛格问兰德公司能不能编写一份关于越南问题选择方案的机密的全面分析材料？罗恩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派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此人 60 年代曾在哈佛大学基辛格的防务政策讲习班上讲过课）主持。埃尔斯伯格编成了一份无所不包的各种选择方案清单——从全面战争一直到全面撤军。

1968 年圣诞节那天，罗恩和埃尔斯伯格两人带着全套选择方案飞到纽

约。基辛格在皮埃尔饭店的一个套间里把那些选择方案审阅了4天，然后他前往比斯坎岛（这是后来基辛格常去的几个休养胜地之一）与当选总统会合。埃尔斯伯格拟的选择方案中有一条是要美军从南越“立即全部撤出”。埃尔斯伯格那时并不主张这个方案（他那时倾向于在巴黎试试看，有没有可能通过谈判实现美国和北越双方一齐撤军），但是他还是把这个美国单方面撤军的方案也包括在他那套无所不包的方案汇编之内了。后来他声称，不知是基辛格还是尼克松的一名高级军事助手在那个选择方案上划了一条粗粗的黑线。基辛格说：“胡说八道！总统当时说：‘这个不考虑’，而在头一轮研究越南问题时的确也没有考虑过那一条。”

1月初，基辛格又找了埃尔斯伯格来纽约接受另一项任务，原来总统要求政府各部门对越南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次研究，基辛格请埃尔斯伯格帮助拟出一份调查表，准备发下去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独立意见。1月21日，总统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审核了这个调查表——表中共有28个问题，定名为《国安研1号备忘录》（第1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叫基辛格分发各有关部门。

可是，尼克松不等政府各部门提交答复，早就着手推行他自己的越南政策了。他第一步是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他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反战人士指责说，撤换代表使谈判失去了蓬勃开展的势头。但实际上，尼克松—基辛格这个二人新班子的行动是很迅速的。

将由洛奇向北越人提出的新方案，集中体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在越南问题上的思想，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把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部队“共同撤出”南越。

同美国过去立场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1966年10月时，约翰逊曾保证说，在北越军队撤出6个月之后，并在“暴力的规模”减退之后，美国才从南越撤军。

尼、基两人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从总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已经看得出来，他是在俄国人面前摇晃诱人的钓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贸易、缓和柏林周围的紧张局势、欧安会，吸引他们采取新的合作态度，使越南问题得到妥协的解决。在3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说：“大家知道，巴黎和谈能开得成，苏联是帮了忙的。我认为我还可以说，根据国务卿和我国苏联大使谈话的情况，我现在相信，苏联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也担心越南战争扩大化……他们认识到，如果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接着他就谈到了关键问题。他说：“我相信，苏联是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恰当地帮助结束战争的。至于它可以做些什么，那只有它自己才能回答，而且也许只能私下回答而不能公开回答。”

尼、基的第三步更为重要。正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尼克松已经决定了一个具有更深远影响的步骤。他甚至在就职以前，就已决定要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逐步撤出越南的计划。他只对基辛格一人讲过这个想法。

根据总统的指示，基辛格向总统的最高幕僚们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5种

方案。这些方案一部分是以埃尔斯伯格所拟的方案为基础的，从极端鹰派的立场到比较鸽派的立场都有。

基辛格逐一作了说明：第一，总统可以决定全力争取“军事胜利”。这意味着，依靠猛烈轰炸和封锁北越港口以摧毁北越，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发出不许干涉的强硬警告。

第二，他可以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限制在南越，集中力量击败那里的共产党的抵抗。这个方案仍然包括空袭从北越通过老挝进到南越的渗入路线。

第三，总统可以把美军逐步撤出南越，同时逐步加强西贡政权，让南越军队把局面顶下来。

第四，他可以加速撤退美军，大力依靠南越当局扩军，并迫使西贡朝着在巴黎取得政治妥协的方向前进。

第五，总统可以下令立即停止美军在越南的作战任务，并推动在巴黎迅速达成交易，那就等于向河内的基本要求投降。

不出尼、基两人所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大体一致。最后一个方案，即美国马上撤军，被当场否定了。第一个方案，即增加美国的卷入程度，也被否定了。总统的幕僚中没有一个要求军事上的胜利的，但也不要政治上的失败。第二个方案，即原封不动继续在南越陷下去，也放弃了。国防部长莱尔德加强了尼克松的这个信念：除非美国的伤亡人数和开支有显著的下降，否则就无法再要求美国人民支持这样一场不得人心又无法取胜的战争这就只剩下第三和第四方案了，而这两个方案的区别主要是程度上的。莱尔德主张美国较快撤军，同时大力装备和训练南越人自己去打仗，这个主意后来称为“越南化”。罗杰斯国务卿总的说来同意莱尔德的意见，但主张强调巴黎和谈；他觉得搞越南化太靠不住，又太费时间，谈判才是迅速摆脱绝境的一种更有利的办法。

基辛格大致上同罗杰斯意见相同。在他看来，外交途径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也赞成美国撤军，但由于他对西贡的军事能力没有什么信心，而且十分怀疑西贡政治上的稳定性，因此他认为越南化是不现实的。基辛格说：“我只把它看作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谈判的工具。我从来不认为它是行得通的。”

基辛格十分清楚：越南的形势糟透了，美国非找一条投降以外的出路不可。

在巴黎，在双方继续会谈的过程中，洛奇感到难以使基辛格的某些想法为北越人所理解。他说明了双轨方式的好处，对方却坚持要单轨谈判，认为一项解决办法的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是分不开的。他建议双方同时撤军，对方却坚持要美国撤军——而且他们甚至不屑讨论撤军问题，除非美国首先同意抛弃阮文绍政权并成立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联合政府。

在谈判时，美国政府开始了“菜单行动”——这是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10哩宽的狭长地带内的北越部队集结和出击基地。基辛格是极少数参与这项秘密的官员之一，他相信这个轰炸行动不仅将阻止5万北越军队进出柬埔寨边界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而且还将促使北越人在巴黎采取比较灵活的谈判方针。基辛格这个人从来是相信炸弹的说服力的。

“菜单行动”真是非同小可。从1969年3月18日开始，B-52轰炸机对边界沿线北越阵地出击共约3600架次，在柬埔寨领土上投下了十多万吨炸弹，而当时华盛顿还宣称它是尊重柬埔寨的中立的呢。在某些作战日，这种

空袭占了 B—52 轰炸机在东南亚全部作战行动的 60%。

官方直到 1970 年 5 月才承认有这种轰炸行动。在此以前，这种空袭是异乎寻常地保密的。就连基辛格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里的越南问题专家们都一无所知。国会的各有关委员会也是如此。为此而挖空心思地搞了“两本帐”的簿记制度，使五角大楼那些了解内情的人可以对投在柬埔寨的东西保持一份真实记录（那个记录是“绝密”的），同时他们向参院军事委员会提供一份假帐，只说他们报告中的所有炸弹都投在南越的目标上了。

基辛格不必费神为这个骗局进行辩解。他觉得，如果把美国在地理上扩大战争、把轰炸扩大到柬埔寨去这件事发表出来，那就会引起日益不满的国会以及全国反战舆论的谴责怒潮。如果全国闹起来，只会使政府争取越南和平的计划复杂化。加之，基辛格不想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难，当时西哈努克正在酝酿同美国恢复中断了差不多 4 年之久的外交关系。要是政府透露轰炸这回事，西哈努克就得表态。如果他谴责轰炸，美国也许就不得不停炸；如果他公开加以默许，他就会得罪河内。因此，这类轰炸一直是“秘密”的，尽管挨炸的北越人是知道的，宁愿装聋作哑的西哈努克是知道的，南越当局是知道的。只有美国人民蒙在鼓里。

关于秘密空袭柬埔寨一事，美国人民首先是从报纸上看到的。1969 年 5 月 9 日，当时的《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威廉·比彻报道说，B—52 轰炸机正在“对柬埔寨边境的北越庇护所进行秘密袭击”；又说，柬埔寨当局不但没有抗议，而且同美国和越南共和国军部队越来越“合作”，“常常供给他们关于越共和北越向南越调动的情报”。比彻接着说，轰炸的用意是“向河内发出信号：尼克松政府虽然在巴黎竭力争取和平，但也不惜冒一些上届政府所不敢冒的军事风险”。

奇怪的是，这篇报道并没有激起基辛格所担心的那种轩然大波。可是，白宫倒好像是挨了一枚炸弹似的。已经被早先几次泄密事件激怒了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这次泄密更是怒不可遏。这件事使他们显得像是一面高唱和平、一面扩大战争的伪君子。他们还十分担心，他们那些敏感的外交倡议也许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基辛格还有另外一层忧虑。尼克松的心腹正在怀疑秘密是从基辛格新搭起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人捅出去的，这使基辛格很被动。事实上，他对泄密也非常恼火。他为了表白忠诚，还亲自参加了对泄密人的追查。

到了 5 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总统定于 5 月中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到时他将初次公开阐明他和基辛格认为可以作为解决这场战争的谈判基础的那些原则。基辛格起草了演说的头几稿。

这篇演说定于 5 月 14 日晚上 10 时发表。在总统讲话之前 1 小时，基辛格把多勃雷宁请到白宫办公室来。他把演说的一份预发稿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强调指出它所包含的新的契机，然后提请他注意下面几句关键性的话：

“要是把态度灵活误以为是软弱无能，把通情达理看成是没有决心，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还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明白，要是这种无谓的痛苦继续下去，势将影响其他方面的决定。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基辛格把这几句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话：如果苏联人“不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美国就要“使战争升级”。多勃雷宁答应把基辛格的口信转达克里姆

林宫。

尼克松在演说中提出了八项建议：

一、所有非南越军队开始撤出。

二、上述军队须在 12 个月内大部撤出南越，剩下的也要撤离战斗，开往指定的驻地。

三、随着北越部队全部撤离，所有外国的非共产党部队也将撤出。

四、成立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监督机构，对撤军工作进行核查。

五、然后由监督机构帮助安排各地停火。

六、监督机构还将协助“根据协议的程序”举行“选举”。

七、安排早日释放全部战俘。

八、最后，协议各方同意遵守 1954 年和 1962 年的日内瓦协议。

基辛格并不指望总统的演说立即产生奇迹，但他很高兴美国终于清清楚楚地阐明了自己在越南的目标和期望。他希望河内也能以他草拟声明时那样的认真态度来考虑这个声明。

过了几个星期，美国又采取了第二个重大步骤。经过几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南越撤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决定，它将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但将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阮文绍总统的西贡政权的强烈反对。第一批撤出的人数将是不多的——到 8 月底撤出 2.5 万名战斗部队。但基辛格和总统相信，只要精心布署，第一批撤军的公告可以成为向河内发出的带决定的信号，表明华盛顿退出印度支那的决心。他们决定在 6 月 8 日，即总统 5 月 14 日演说后 3 星期多一点，发表这个公告。（基辛格认为，河内至少需要 3 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美国的任何重大声明。）

尼克松和基辛格固然急于要跟北越人打交道，却并没有忘记，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友是在南越。基辛格对盟友是很强调的，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背弃西贡政权。过去他常埋怨美国在越南有“以太上皇自居”的倾向，并且谴责 1963 年美国怂恿政变分子杀害吴庭艳总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错误。基辛格上任后不久曾对哈里曼吐露说，在他看来，约翰逊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听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在 1968 年 11 月初公开责备阮文绍不肯到巴黎去跟民族解放阵线举行谈判。基辛格对哈里曼说：“不应该那样对待一个盟友嘛。”尼克松之所以决定前往中途岛（位于华盛顿和西贡中途的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是信天翁游息之所，也是美国的一个海军补给站）与阮文绍会晤，以宣布第一批撤军，正是为了要表现双方的团结一致。此举不仅是要抬高阮文绍的威信，也是借他的出场来安定美国国会里保守派的心，说明南越是支持尼克松总统的。不消说，西贡的鹰派是不支持这个决定的；至于阮文绍的公开表示同意，那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总统、基辛格、罗杰斯以及白宫其他随行人员前往中途岛的路上在夏威夷停了一下，同美军司令部碰头——具体说，把撤军决定的规模通知了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文布拉姆斯将军。艾布拉姆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们都不赞成。这位将军不是傻瓜，他懂得，出于国内政局的需要，必须开始撤军。但他认为，撤出战斗部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要撤可以撤后勤部队，至少也可以两者结合，凑个数也行嘛。艾布拉姆斯的问题是，他只是一位将军，不是信号手。他不懂得基辛格向胡志明发出这个信号的奥妙何在。基辛格是想让那个病中的北越领导人领会到，总统是故意削减美国在印度支那的

作战机器的。要是只撤出后勤部队，河内就可能认为是个骗局。

基辛格相信，从 50 多万人的大军中撤出 2.5 万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实力并无影响，然而却可显示美国谋求解决的诚意。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总统只要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屡犯错误，这已不是头一次了。

中途岛公告发表后，基辛格越发觉得事情大有可为。他说：“我们现已到了应当开始认真谈判的阶段了。”这时再次从越南传来了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全国各战场都沉寂下来了。北越继先前在春天从南越撤出部队之后，又从南越陆续撤出了一些部队。在南方，共产党军队正在分散成游击队式的小分队。美军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基辛格又在捉摸：这莫非是对方回答的信号？他痴心地认为，也许北越人是在开始响应美国的撤军吧。他手下的人中很少有人同意这个看法。他们大多数觉得共产党人不过是在重新集结，准备下一次进攻罢了。但基辛格依然相信，北越部队的撤退决不是进攻的前奏，而是谈判的前奏。

基辛格和他的许多白宫同事们不一样，硬是对谈判抱着希望。由于他同学术界素有密切联系，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觉到当时横扫全国大学校园的汹涌澎湃的反战情绪。就在基辛格动身去中途岛之前，他就亲自尝到了这个运动势不可当的威力。一天，他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去接受名誉学位，结果，受到了一顿公开侮辱。全校 900 名应届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反对他。基辛格意识到，在这种学生眼里，他已不再是学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在进行一场“无理性”、“不道德”战争的政府的象征了。大学生对基辛格怀有敌意，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他接受名誉学位的最后一次。

那些布朗大学四年级学生对他的抵制，是对他发出的公开挑战。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就痛下决心要恢复政府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他相信，只有通过谈判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才能防止学生的反战思想有朝一日爆发成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或者发展成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大规模同社会对立的情绪。信任这个东西，在基辛格同学生对话的时候显然不存在了，在他同“对方”对话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他不知怎么的忽然感到，如果他能在美国和北越谈判代表之间建立起一种人与人的信任感，那么他就有办法打破巴黎会谈的僵局，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多少是为了要建立这种信任，基辛格建议采取一种不寻常的步骤。7 月中旬，尼克松出发进行一次环球旅行，行程包括去西贡同阮文绍再次会晤和对罗马尼亚进行一次开辟新天地的正式访问。动身前不久，基辛格说服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联系，向这位北越领导人发一封密信，建议举行认真的谈判——如有可能，由基辛格和北越人在巴黎开始秘密接触。

基辛格建议，这封信由一位相当不寻常的送信人来递交，此人叫让·圣特尼，是法国银行家，曾是法国驻河内总代表，自 1945 年以来同胡志明私人关系极好。圣特尼是一个热心而办事又极端审慎的人，那时恰巧在华盛顿看望朋友——其中包括基辛格。圣特尼的妻子克劳德曾经是 1953 年夏天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班上的学生，那个班是专为年轻有为的外国领袖人物开办的。她是一位作家兼历史学家，既聪明又漂亮。她和圣特尼结婚以后，基辛格常常到他们在里沃利路的俯瞰蒂勒里花园的寓所去看望他们。圣特尼 7 月 15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总统。由于谁也不知道他到了美国，只好由基辛格来充任译员。圣特尼表示，他愿意代表美国访问河内并带

一个信去。不然的话，他建议黎德寿同基辛格举行会谈，黎德寿是北越政治局的一个重要成员，不时前往巴黎参加同哈里曼的会谈。

尼、基选择了头一个办法。当下起草了尼克松给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尼、基要求圣特尼亲自交给河内。这封信强调说明美国致力于谋求和平的决心；表示愿意在讨论美国的计划的同时讨论河内的计划。

圣特尼把尼克松的信交给了北越参加巴黎和谈代表团团长春水。不到一星期，河内同意由春水和基辛格举行秘密会晤。圣特尼得到通知后转告了基辛格，那时基辛格正陪同总统作一次环球旅行。从“阿波罗 11 号”在大海中溅落的时候开始，尼、基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在总统飞机回国的时候，基辛格同总统一行分手，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基辛格的秘密会见预订于 8 月 4 日在圣特尼的寓所举行。黎德寿当时已经离开巴黎，同基辛格对话的人将是河内参加和谈的全体会议的的全权代表春水。向外界解释基辛格此行的目的是向法国和北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情况，实际上是掩盖他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晤。

新闻记者们紧紧追逐基辛格在巴黎的行踪。他们看见他在美国大使馆跟洛奇聊天。他们看见他去提翁大厦拜会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他们看见他在爱丽舍宫同蓬皮杜总统举行会谈。然而，任凭记者如何盯梢，基辛格还是甩掉了他们，去同春水会晤了。

这次秘密会晤是在圣特尼寓所里举行的。圣特尼只呆了一会儿，给双方作了介绍并向客人们指点饮料放在哪里，就走开了。春水和基辛格会谈了差不多 3 小时。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春水法语很流利，但他带着一名译员。基辛格呢，看法文材料还行，口语差一些，由当时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精通法语的弗农·沃尔特斯将军陪同。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两人只是各自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起点。

那天，基辛格这个外交界的“七”号新生涯尚未开始，就有几次险些暴露了。当时任《新闻日报》外交记者的玛里琳·伯杰在基辛格离开美国大使馆时拦住他问：“是去见圣特尼吗？”这位女记者觉察到基辛格和圣特尼是在越南问题上关系非同一般的老朋友。基辛格笑而不答。他坐上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轿车飞快开走了，没有人跟踪他。

那天下午，基辛格的心腹助手索南费尔特打电话请伯杰来喝酒，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开，但没有成功。伯杰老是问：“亨利是不是看圣特尼去了？”索南费尔特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那天晚上，伯杰又截住了基辛格，这次是在奥利机场，基辛格正要前往布鲁塞尔去向北约组织介绍总统出访的情况。她还是问这个问题：“你去看过圣特尼没有？”基辛格回答：“没有。”过了一会儿，当基辛格进入贵宾候机室去跟新闻界短暂会见时，他显然重新斟酌了答话。他正好又碰上了伯杰的眼光。他承认道：“不错，我见到了圣特尼，跟这位老朋友散步了 10 分钟”。如此而已。接着他央求她不要报道这件事。可是，一位法新社记者在旁偷听到了基辛格同伯杰的谈话，就说他要报道这条关于圣特尼的消息。伯杰由于职业上的关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也报道了。8 月 5 日的《新闻日报》用了“基辛格的外交散步”这一耐人寻味的标题，发表了她的巴黎电头的消息。

就在 8 月 5 日那天上午，伯杰接到美国驻北约组织大使罗伯特·埃尔斯沃思打来的电话。他恳求道：“别发表那件事吧！”她告诉他，来不及了，

登载这条消息的报纸已经到了报摊上了。她想不通对方为什么那么大惊小怪，但对方不肯说。过了几年，当基辛格的秘密活动成了杂志封面标题之后，她回想基辛格那次的古怪行径，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担心她顺着圣特尼那每条线索联系到春水，从而发现这两个敌手之间的第一次秘密谈判。

在春水——基辛格会晤后大约 3 星期，白宫得悉越南的传奇般的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已经逝世。大家都说不准他的去世对于河内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胡志明同美国的最后一次联系，即他给尼克松的复信，是在他去世前不几天到达华盛顿的。虽然一些受过专门训练解释共产党用语的美国官员在胡志明的复信中找到了一些松动的口气，但总统却一点也觉察不出来。尼克松后来说：“它不过是重申了北越在巴黎会谈中采取的公开立场，断然拒绝了我的倡议罢了。”

基辛格大失所望。他的朋友们发现他突然对于“体面地”结束战争的前景悲观起来了。他一度确实相信，美国开始从南越撤军，将失去同河内进行认真谈判的筹码。他想，胡志明的继承人一定会理解尼克松希望“体面地”撤出的意愿。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他们踌躇不前，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西贡政权势将在他们面前坐大。基辛格把这个利害关系透露出去，想要影响河内的思想。

河内领导人对局势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美国撤军一开始，只会削弱、不会加强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他们还认为这就等于表明美国的颓势已成，无可挽回了。

双方都理解不了对方的立场，僵局加深了。

9 月中旬，巴黎的北越代表把尼克松总统宣布的第二批撤军——以后 3 个月里撤出 3.5 万人——斥为“装装样子的事”。军事上出现了新的情况——不是在战况继续沉寂的南越，而是在邻国柬埔寨。共产党方面把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通过胡志明小道渗透进来，大部分是运到柬埔寨与南越边境日益扩大的庇护所去的。北越部队最大的集结点在西贡以西只有 50 哩。基辛格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认为，这表明可能在 1970 年初对南越首都来一个“真正的歼灭性打击”。

10 月 15 日美国反战团体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反战抗议示威活动，这是反对美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不得人心的战争的一幅戏剧性的写照，大学校长、宗教界领袖和一大批民主党参议员——甚至一些过去并不积极参加反战运动的人们都支持这次示威。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了沉默的守夜、祈祷以及和平的抗议游行。华盛顿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包括学生、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许多人臂缠黑纱——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听反战演说，然后平静地向白宫进军。许多城市降了半旗。数以百计的高等院校停了课。

三天后，基辛格去了一趟哈佛大学。他早在 50 年代就认识到，“考验一个政策，要看它能否获得国内的支持”。他想征求一下某些老同事的意见。也许同样重要的是，他要向他们示意，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白宫的重视。但此行对基辛格却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那些教授朋友们已经给了政府“6 个月”以上的时间（这是基辛格曾要求的时间）来结束战争，可是杀人的事仍在继续，看不到尽头。他们对基辛格大失所望，那是毫无疑义的。有几位教授说，他们看不出基辛格的政策同罗斯托的有什么区别——这是对他的一种有切肤之痛的批评。有一家请基辛格吃饭，女主人就戴着蓝白相间的反战徽章。一位从前的同事谴责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基辛格听了十分窝火，便劝这

些朋友“不要站在道学派的立场来反对当权派”。朋友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强烈要求基辛格说服总统提出一个具体的争取和平的新方案，最低限度也应该把美军全部撤出越南的时间表公诸于世。

基辛格一回到白宫，就把哈佛大学的意见向总统汇报，这是不消说得的。总统一概置之不理，这也是不消说得的。尼克松认为，哈佛大学属于敌对营垒，基辛格去那里无非是搜集情报，进行侦察而已，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战斗的序幕。

1969年秋天，正当人们对越南问题议论纷坛的时候，基辛格的名字从报纸的要闻版跳到社交新闻版去了。一天晚上，他出席乔治敦交际花巴巴拉·霍沃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格洛里亚·斯坦宁举行的很阔气的酒会。40多岁、体态稍胖、但鬓脚刮得干干净净的基辛格，正在同客人聊天，有一个年轻妇女请他过去同斯坦宁女士以及乔治·麦戈文参议员一起照相。这两个人，究竟谁的名气大些——是那位参议员呢，还是这位总统助理，很难说。

这位年轻妇女是萨利·奎因，《华盛顿邮报》的社交新闻记者。她问基辛格：“你骨子里是个风流人，是不是？”

“嗯。”基辛格不好意思地回答，同时向她提供了一个他那名噪一时的选择方案。“因为我干着这个工作，你不好叫我风流人，是吗？为什么不叫秘密的风流人呢！”

奎因把基辛格这些话登了出来，而那张相片经过一番剪修，却只见基辛格和斯坦宁女士成了一对儿，麦戈文的像被剪下扔进字纸篓里了。说也奇怪，这本来是开开玩笑的，后来竟闹得满城风雨。基辛格的韵事很快就使人对尼克松政府的观感都热闹了起来——说它同全国形形色色的美女都“挂了钩”。

不过，基辛格善于在报上出风头的本领可是引起了白宫上层同事的嫉恨。据一位深知基辛格一方和霍尔德曼、齐格勒、埃利希曼另一方明争暗斗情况的卸任官员说：“基辛格自我吹嘘的做法弄得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等人恼恨交加。”他们担心“亨利是在和尼克松抢出风头，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拆亨利的台，把他搞得心绪不宁，神经紧张，感到自己地位不稳。但谁也知道，基辛格又不是个傻瓜，岂不知自己有遭人暗算的危险？我相信在某些问题上他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仇者也许会骂亨利是伪君子，亲者却会说，‘他是个聪明人，懂得自存之道’。”

“一天，基辛格无意中同霍尔曼并排走路——两人都跟在总统后面，是参加了一场讲演会出来往白宫走。这时，尼克松忽然决定要到杰斐逊纪念馆那里转一下。这种事，作为部下理当奉陪，不在话下，但有人听见基辛格嘟囔说：“早知道你要去那里，我倒不如自己走向白宫，还能办点事呢。”这话在晚报上登了出来，霍尔德曼见了就打电话埋怨基辛格不该违反白宫内部“默然效忠”的规定。基辛格却处之泰然，对这位总统的化身说，发表出来的话不算什么，还有更不中听的话没有发表呢。霍尔德曼问道：“什么话？”“当总统的，我领教过了，全是一路货。”基辛格说完咯咯笑起来，可是对方却没有跟着笑。

虽说白宫内层人物对基辛格的狂态看不惯，不过他们也是此道的里手，深知他这一套在政治上还是有用处的。让基辛格在好莱坞交际场合露露面，也许有助于使尼克松政府的形象显得不那么僵硬，还可利用他的广阔交游来缓和一下外界对白宫的不满情绪。虽说他所属的政府对新闻界和反对党都不放心，但他却能同一些批评尼克松最厉害的人，甚至同日后列为“敌人”的

人常有来往。

总起来说，总统的宠臣们对于基辛格爱出风头这件事真是百般滋味，一方面不得不服他是个大有用处的人，另一方面又恨他老是跟总统抢新闻。彼得森曾这样说过：“亨利同白宫那帮人的关系就像凯撒同布鲁图的关系那样亲密。”基辛格在白宫里是个茕茕子立的人，但他却说：“我只买总统的账。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1969年12月初，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河内可能又有意思进行认真的对话了。过了一星期，美国实业家赛勒斯·伊顿在同包括黎德寿在内的河内高级领导人会晤后，得到了清晰的印象，看来北越政府在胡志明逝世以后已经回过气来，现在准备再来搞谈判了。

12月15日，基辛格向记者介绍总统第三次撤军公告（到1970年4月15日再撤5万美军）的情况时，又一次提到“有些迹象”，“有些故意放出来的空气”，说明河内大概在打出信号，表示又愿意谈判了。他说：“我认为，北越领导人今后能不能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来谈判，再过两个月左右就可以见分晓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迹象都是往好里去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北越部队源源而入，各条渗透路线上都空前拥挤——据基辛格说，其规模竟“五倍到十倍于几个月前”；同时，河内官方电台和报纸也在攻击总统的越南化计划是“为美国战争贩子的私利而延长战争、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政策”。

但是这些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谈判就此搞不成了。基辛格早已看清，河内的策略当中有一条：谈判之前，放手猛打。

“迹象”越来越多，基辛格也更加急于重开谈判。他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发出美国政府愿意和解的信号。美国飞机对共产党阵地出击的架次减少了20%，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基本上停止了美军的“搜索—消灭”行动，美军人数也不断减少，基辛格还悄悄地放出风声说，洛奇大使12月8日退休以后由不甚著名的职业外交官菲利普·哈比卜接任，这件事不表示美国对秘密会谈的兴趣有所减退。虽然这话不怎么令人信服，但是基辛格还是这样放风了。

到了1970年1月底，河内终于对这一连串的信号作出了答复。哈比卜了解到黎德寿又要到巴黎来了，名义上是出席法国共产党的一个会，实际是准备进行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1月31日，北越这位白发如银的革命家兼党务工作者兼外交家的黎德寿，乘坐苏联客机到达巴黎布尔歇机场，一下飞机就宣布他准备进行“认真谈判”，同时指责美国总统耍两面派：“他一面侈谈和平，一面又推行所谓越南化计划，想延长战争。”

基辛格认为这番谴责无非是为了“拉开架势”，尼克松也同意这个看法，于是很快就批准基辛格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谈。几星期后，基辛格就前往巴黎去同河内这位高级官员举行第一次会晤从1970年2月底至4月初，基辛格先后四次去巴黎同黎德寿在首都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会晤。这类会晤有时长达8个小时，但基辛格每次在华盛顿不露面的时间却从不超过40小时。

他运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使人觉察不到他离开了华盛顿：临去秘密会晤之前，他总是故意到处露面，格外活跃。但见他：出席有许多记者在场的酒会；在有名的法国餐馆里同有名的专栏作家吃饭；带着漂亮的女朋友出席阔绰的宴会；在外交活动中让新闻记者、政府人员和外交官团团围住。

有时，为了偷天换日，尼克松以总统之尊也参加串演。总统同基辛格一起离开白宫前往戴维营了——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齐格勒照

例宣布他们的旅行计划，但有一点他却秘而不宣：基辛格在得到总统的最后指示后，将从戴维营坐直升飞机到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转乘喷气机，飞到西德或法国一个偏僻的军事基地，转往巴黎。

给基辛格当翻译的是沃尔特斯将军。

沃尔特斯给谁担任翻译就喜欢模仿谁。如果说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他得意的话，那就是安排秘密会晤。为了进行得更秘密一些，基辛格一般是在周末或假日由一名秘书和两三名工作人员陪同，乘一架波音 707 总统专用飞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程。飞机航行证件上说，这是为检查总统旅行航线而进行的一次定期训练飞行。它将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一个法国空军基地阿沃机场着陆。法国人在这个基地驻扎着海市蜃楼式战斗机和 KC-135 加油飞机，外形同总统波音机差不多。基辛格坐的飞机降落后只停很短的时间，让基辛格在那里走下飞机；它从雷达追踪电波中消失的时间不会超过 25 分钟；然后它就载着基辛格的秘书飞往法兰克福的莱茵-美茵机场。这时基辛格的助手和基辛格已转乘蓬皮杜总统专用的神秘-20 式喷气机飞向巴黎附近供私人飞机使用的库布莱镇机场。

在库布莱镇机场上，沃尔特斯将军会登上飞机迎接基辛格，理所当然为他的安排感到洋洋得意。他把基辛格和基辛格的同事领到一辆没有标志的租来的雪铁龙小轿车去——这对沃尔特斯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他是正式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而这次旅行不能告诉使馆，开始的时候又没有官方拨款可以偿还他支付的费用。他开车把基辛格送往巴黎纳伊区他居住的那幢公寓楼去，途中通常都要提醒基辛格这件事。到达后，他就偷偷用电梯把他们从地下车库送往他住的一套房间。他的管家只知道基辛格是前来访问的一位美国将军，名叫哈罗德·A·基尔希曼。第二天沃尔特斯开车把基辛格他们送往巴黎郊外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 11 号。这里距离基辛格住处有 30 分钟路程，是一个中下阶层居住区。有一年半时间，秘密会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三次旅行中，两次都是按这种程序顺利进行的。但是 3 月 16 日的旅行由于飞机飞往巴黎时发生技术故障险些流产。驾驶员突然发现起落架液压控制系统失灵，必须用手操作才能使它降下。然而降下后如果不补充制动液就无法使起落架重新升起。在阿沃机场着陆是不可能了，因为驾驶员不了解法国军事基地是否有设置进行这种虽然次要但却必需的修理；即使有这种设备，也会由于一架进行训练飞行的总统专机从一切追踪雷达上消失过久而引起疑问。

飞机必须飞往德国的莱茵-美茵机场，而那儿谁也不知道基辛格马上就要到达，更不知道他们的使命和困境。基辛格的旅行并没有通知国务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无法告诉德国当局有一架法国飞机要来接基辛格。

幸好总统专机都拥有优越的通讯设备。基辛格当时的特别助理托尼·莱克通过华盛顿线路中转，从飞机上同巴黎的沃尔特斯将军取得了联系。沃尔特斯去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交涉，由当时担任法国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的米歇尔·若贝尔和蓬皮杜总统亲自授权派法国总统专机去接基辛格——这次是在法兰克福。

基辛格在莱茵-美茵机场一个黑暗的角落着陆，蓬皮杜专用的喷气机已在那里等候。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和基辛格迅速换了飞机，着陆不到 10 分钟就又起飞了。沃尔特斯自称，西德人之所以迅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他的糊弄下相信飞机上的乘客是蓬皮杜的秘密的女朋友。沃尔特斯戏剧化的禀赋曾经办

成许多非同寻常的事，这一点，令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常常纳闷。

不管怎样，沃尔特斯以他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使基辛格和他的助手 3 月 16 日的旅行化险为夷。他一切出色的成就都具有这种特征。

基辛格在舒瓦齐勒罗瓦同北越人租用的那幢房屋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个领班。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通向花园。起居室内部对面摆着两排绷着厚实的红套垫的安乐椅。美国谈判小组——基辛格、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瑟尔、托尼·莱克以及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那面墙就座，北越代表团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是无限的。

到 4 月初，基辛格认为再继续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总统同意这个看法。

基辛格在谈判上确实是认真作了尝试。而华盛顿方面某些官员看到北越陈兵柬埔寨境内，却觉得基辛格前一阶段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当时负责越南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认为，北越人已经决定“管它什么谈判，先打个痛快再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当然也是这个看法。基辛格回头想想，觉得情形也正是这样。

事实上，在 1970 年 4 月，实现政治解决的形势还没有成熟。这时，柬埔寨发生了亲美政变，这就又增加一个冲突的来源，使僵局更复杂了。柬埔寨事件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发生了深刻影响，并使基辛格和黎德寿的谈判中断了一年多之久才告恢复。

第七章

鱼钩计划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副样子，所以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驻金边的一位外交官事后追忆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1月7日那个不祥的早晨的举止时这样说。“他那天动身去欧洲。请注意，这是他每年一次的‘出国就医’。这时他已经走进了飞往巴黎的一架民航喷气机里了，柬埔寨人还在高声欢送。这种场面我们经历过不下几十次。但是，他突然又走出来，站在机舱门口，好像是作最后一瞥似的。”

人们后来分析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被黜事件时，还记起一些其他小插曲。一位西方大使回忆他曾听到西哈努克当时自言自语道：“我累了，我累了！”另一位外交官说：“来给他送行的要人，柬埔寨官员和外交使节，排成一行，他在这些人面前走过，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这时他忽然走到一个柬埔寨人跟前，高声说，‘喏，这位是不愿意我回来的。’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一时引起了哄然大笑。不过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

当然，笑得最后的并不是亲王。

不到两个月，这位被农民群众奉若神明、被上层人物视为狂人的亲王被推翻了，他的王国终于陷入了他曾力求避免的战祸之中。战事首先由南越伪军同南越解放军和北越军之间沿柬埔寨边境打响，接着柬埔寨军同从边境庇护所向西出南的越共和北越军干了起来，美国便乘机入侵柬埔寨。这次入侵后来被尼克松说成是一次“出击”。柬埔寨之役使那早已怒气冲天、四分五裂的美国更加混乱了，国会山上吵成一团，州立肯特大学打死了人，反战大示威的声音坐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都能听见。

但是这些都是后话。却说1970年3月乱子初起的时候，一批有组织的柬埔寨人由几队穿便衣的宪兵带领，突然在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常驻金边代表处和北越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要求它们把军队撤出柬埔寨。当时西哈努克亲王在巴黎，他谴责了这次示威事件。他在法国电视上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柬埔寨右派勾结，说右派“希望我们加入美国阵营”。但由于他一向以善耍政治手腕著称，所以当时人们还怀疑这次示威是他自己授意搞的，为了想用这种戏剧性的办法促使莫斯科和北京去促使河内“尊重”柬埔寨的中立。总之，他并没有急着赶回国内，而是飞到了苏联首都，他这么一绕，坏了大事。就连他那出名的魅力这时也无济于事了。

3月18日，西哈努克，这位自五0年代中期从法国取得独立以来一直统治着柬埔寨的人，被他的老部下朗诺元帅出卖了。朗诺此人多病而迷信，平日倒是对亲王唯命是从的。西哈努克是在莫斯科听到这个凶讯的，随后他飞到了北京，在那里指责中央情报局推翻他。朗诺在少数贵族、军官和企业家的支持下，执掌了金边政权。一位记者报道说：“这是一次上层阶级的政变，不是革命。”这次政变一下子结束了西哈努克灵活的中立政策。

过去西哈努克在两个强大的对手之间搞平衡，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他明知自己那3万名装备很差的军队绝不是北越和越共在柬埔寨边境的4万到6万武器精良的军队的对手，所以他“装聋作哑”，听凭他们使用柬埔寨边境上的一块狭长地带，随心所欲地向毗邻的南越出击。他也默许美国B—52飞机不事声张地对这个边境地区轰炸了足足一年之久。他就是这样在共产主

义和西方之间走钢丝，防止了越南战火蔓延到柬埔寨。

如今西哈努克给赶了出来，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朗诺上台了，但是一上台便立即陷入困境。朗诺为了维持场面，抛却了中立立场而采取反共立场，这正是西哈努克过去常说的军人掌权后必然走的道路。结果是可怕的：柬埔寨顿时陷入了燎原的战火之中，既要打内战，又要同外国人打。那班招募来的吊儿郎当的柬埔寨兵乘着征用来的“百事可乐”送货卡车去替朗诺打仗，但他们哪里打得过受到越共和北越军支持的对手（柬埔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游击队组成的混合体）。于是，朗诺向美国求救，这正是当他一发动政变，人人都料定他会这样做的：他要求美国至少给他 5 亿美元的武器、飞机和其他援助。

美国军方对柬埔寨这场剧变是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万一共产党在全国得势，柬埔寨边境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从而危及把战争交给南越军负责的那个越南化战略。喜的是，终于可以实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朝思暮想的“穷追”计划，“扫除”经过 B-52 飞机一年多来秘密轰炸也没有摧毁的那些共军隐蔽所。约翰逊任内对军方多所掣肘；现在是尼克松当政，大概会批准他们大打出手了吧。国务院人员主张谨慎一些。白宫方面，基辛格的班子也在着手研究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

4 月 1 日，白宫对外装出一副关心又不惊慌的样子，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辛布拉姆将军则向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处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危机的三种方案：第一，让南越军越界加紧袭击敌军庇护所；第二，由美国提供炮火和空中支援，鼓励南越人采取更大规模和更有力的军事行动；第三，帮助南越人全力进攻敌军庇护所中的根据地和补给基地，并派美国陆军顾问随行。

基辛格把这些方案转呈了总统，尼克松迟迟未作决定。过了几天，总统带着全家看电影《巴顿将军》。片子描写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人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勇猛也是下场最可悲的一员大将。巴顿最大的功绩在于历尽千难万险，把阿登战役中陷入重围的一支美国部队救了出来。尼克松深为《巴顿将军》所激动，罗杰斯国务卿后来对 20 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达里尔·扎纳克说，总统是那部影片的义务宣传员，“他逢人便谈这部片子”。尼克松觉得，他也像巴顿一样，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却不知如何应付是好。从基辛格同黎德寿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内对谈判不感兴趣，至少对美国所提的条件不感兴趣。

到 4 月中旬，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濒于绝望。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军活跃在乡间，切断公路，对金边进行包围。共产党军无论在指挥上和武器上都远胜朗诺的军队，后者迅速发现自己的热情和护身符都对付不了对方的斗志和伏击。在西贡的美国官员本来已经够焦急的，这时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

总统的心情同他们一样，他不仅担心柬埔寨的局势，而且担心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信誉发生问题。他迄今表现相对的克制，乃是为了一项远大的战略，但他担心对方可能产生错觉。当共产党方面在他就职后不久就炮轰西贡，从而违反他们同约翰逊总统之间的“谅解”时，尼克松没有采取行动。当北朝鲜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时，尼克松也没有采取行动。他此刻觉得窝囊得很，生怕共产党会把他看成软弱的鸽派，不管共产党在哪里活动他都不敢反击。他虽然不想在东南亚承担任何新的军事义务，但他显然倾向于采取强硬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在哪里？什么时机？

1970年4月20日，星期一，这是事件发生之前最后10天中的头一天，不过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点，甚至连总统本人也是如此。这天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第四批撤军，1971年5月1日以前从越南将再撤出15万美军。现在国内要求结束卷入越南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为了对付这个，所以这次增加了撤军的数目；同时为了减轻西贡美军当局对加速撤军的种种顾虑，所以把撤军的期限放长了。尼克松一边这样宣布，一边又明确警告河内说：“如果敌人今后加强行动，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留下的军队，我将毫不犹豫大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那种局势。”当天他就飞回华盛顿了。

4月2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同基辛格一道去总统那里出席每天上午的例会。尼克松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共产党军队在柬埔寨活动的情况。赫尔姆斯说，北越军正在包围金边。基辛格觉得他的汇报给朗诺向美国告急求援“增添了一分紧急感”。尼克松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明天开会。下午，基辛格和莱尔德同总统碰头。三人讨论了河内“新的气焰”，他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这种情况对越南化计划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请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司司长雷·克莱因到他的白宫办公室来，问他有什么新情况、新见解。克莱因说，没有。基辛格和赫尔姆斯又同总统谈了一下。上午10点，基辛格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参谋部三部（作战）部长约翰·沃格特中将会面。基辛格想知道五角大楼莱尔德部长下属负责人的看法。沃格特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来，完全是与莱尔德、赫尔姆斯、克莱因一色的观点。

下午两点半，尼克松在内阁会议室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副总统出席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紧急战略局局长乔治·林肯准将也出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赫尔姆斯也在座。基辛格作了一个关于柬埔寨的军事形势和政局的详细报告，中心内容是：朗诺政府的处境极为困难；还不清楚的是，共产党究竟是想占领柬埔寨全境呢，还是仅仅想取得有利地位以求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基辛格认为，不论哪种情况，北越军的庇护所越扩大，它就越有可能使在南越的美军遭到更大的伤亡，结果几乎肯定会妨碍越南化计划，从而有使美军撤退放慢下来的危险。

基辛格的报告非常详尽，在座的人对报告的内容和设想都没有提出质疑。看来已经逐渐形成一致意见：为了保护在南越美国人的生命，美国应该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来阻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得胜利。有些人倾向于在柬埔寨使用美国军队。但是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让南越军队负责地面作战，美国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

那天晚上，尼克松吩咐基辛格负责拟订一个由南越军攻打鹦鹞嘴共产党军庇护所的计划，鹦鹞嘴是柬埔寨领土的突出部，东距西贡只有35哩。其时尚未下令采取行动，但基辛格已经摸着了总统的思想脉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

4月23日，星期四，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这个小组是一年前处理因北朝鲜击落美国EC—121飞机所出现的危机而成立的。基辛格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穆勒海军上将、赫尔姆斯和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他们讨论了在柬埔寨进行一次由美国支持的袭击在军事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问题，并具体讨论了由谁去做哪些事、和谁一同做、何时做，等等。会后，基

辛格又分别同格林、帕卡德和穆勒谈了一下，然后向总统汇报。

傍晚，基辛格去参议员富布赖特家，向他和其他 7 位参议员简要地介绍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局势。他从下午 5 点半一直呆到 7 点。其间总统给他打了四五次电话。基辛格一直没有透露总统心里在盘算着的事：向柬埔寨境内发动一次地面袭击。

当晚，基辛格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其他成员再次碰头，大家都穿着礼服，准备出席台湾国民党大使馆为来访的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举行的正式宴会。他们讨论了进攻鹦鹉嘴的计划。

会后，总统回林肯厅，基辛格回到白宫西翼自己的办公室。两人通了几次电话。尼克松提出了几个问题：既然可以进攻鹦鹉嘴，那为什么不进攻所有的庇护所呢？当时美国驻金边使馆人员很少，他们能挑得起协调大规模进攻的额外担子吗？基辛格从这些问题中意识到，总统正在考虑使用美国军队对柬埔寨进行更大范围的进攻。

尼克松深更半夜又给基辛格打了最后一次电话，说他想搞一份进攻柬埔寨境内所有共产党军庇护所的计划，还说在早上 7 点 1 刻，他要见基辛格、穆勒、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库欣中将。

这五个人按约定时间在星期五清早会面。他们研究了派遣美军进入柬埔寨领土上另一个突出部鹦鹉嘴以北的鱼钩地区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接着，基辛格又同他们分别谈了谈，然后去见总统。尼克松让基辛格打电话告诉莱尔德，可能要动用美军进攻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军庇护所。尼克松知道莱尔德对这一行动很不同意，罗杰斯也是这样。这两位部长都怕美国进攻柬埔寨会进一步煽动各大院校和国会山上的反战运动。两人都主张限制美军所起的作用。

基辛格对南越军从来就没有多大信心，所以他同意总统的意见。既然必须制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胜，以便美国得以安全地从南越撤军，同时向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莫斯科和北京）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那么也就必须保证把这一仗打赢才行。基辛格设想了一个突然大举攻入柬埔寨的方案，攻入的时间不长，主要目的只是在于使柬埔寨在美国从南越撤军之际，不要落入共产党手里。

莱尔德建议基辛格摸一下国会山的底。尼克松提出去找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坦尼斯看看。斯坦尼斯是一年前就知道 B—52 飞机轰炸柬埔寨这件事的少数人之一。基辛格同斯坦尼斯谈了一小时，斯坦尼斯勉强同意使用美军进攻鹦鹉嘴和鱼钩地区的计划，那天下午，基辛格又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了一次会，但他始终没有透露总统打算在柬埔寨使用美军的意图。会议主要讨论了以南越军为主力的鹦鹉嘴作战计划。

傍晚，基辛格邀请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五名成员到他办公室里，对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各种方案尽量提出反面问题，加以讨论。这五个人是：安东尼·莱克、温斯顿·洛德、劳伦斯·林恩、罗杰·莫里斯和威廉·瓦茨。

讨论集中在美国可以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柬埔寨国内的共产党威胁。莱克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工作上关系最密切。他反对入侵，说：“那等于扩大战争，不管怎么说，总统只要卷了进去，就别想摆脱出来。”何况这样一来，柬埔寨内部将来还要出大问题。我们在国内外都会受到反对，代价太大，不值得那样干。”

莫里斯也附和这种论调。认为这又是一次不智之举，徒然造成伤亡，造成破坏，而捞不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瓦茨提出了最强烈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如果今年进攻柬埔寨，明年就会进攻老挝，后年就要轰炸海防了。

林恩表示担心。

洛德没有透露他的想法。

会议开了一小时左右。五个人走出门时，莱克已经决定，他再不能跟着这次战争升级下去了；莫里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瓦茨回家时情绪沮丧，茫然若失，打算辞职。

基辛格呢，他 4 月 25 日星期六一早就同埃利希曼会面，向这位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详细地介绍了柬埔寨行动计划。埃利希曼“登时”就理解总统是决定要“打进去”了，鸚鵡嘴和鱼钩这两个地方都要打进去。

接着基辛格找林恩私下谈了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林恩是反对的，但并不是感情用事，他能说出一番道理来。”

基辛格和林恩谈话时，从戴维营来了电话。总统要看莱尔德的鱼钩行动计划。基辛格拿到后立即乘直升飞机去戴维营，正赶上同总统和总统的朋友贝贝·雷博佐一起吃了面包夹牛肉。过后，尼、基两人对有关美军从地面攻入柬埔寨的地图、图表和计划整整研究了两个小时。他们议了一下莫斯科和北京可能作出的反应。两人都觉得反应一定会很强烈，但局面还控制得住。

那天傍晚，尼克松、基辛格和雷博佐乘直升飞机飞往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在那里同米切尔会合，一起登上总统的游艇“水杉”号，在波托马克河上邀游了四个小时，在船上他们又看了一遍《巴顿将军》这部影片。好久以后，基辛格曾对一位朋友说：“那部片子如果再叫我看一遍，我非开枪自杀不可。”

4 月 26 日，星期日，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阿格纽和林肯这次都未被邀请。会议由基辛格主持，讨论赞成和反对美军攻入柬埔寨的各种意见。如果军事进攻成功了，所得的东西抵偿得了由于丧失国内支持而遭到的损失吗？如果柬埔寨赤化了，隔邻的西贡能存在下去吗？会上，总统没有宣布决走。会后，他要基辛格同他一起到他在白宫里的住所。他们又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

4 月 27 日早晨，内圈人物再次开会。会上气氛显得格外紧张了。一位顾问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国内事务我不在行，不过如果你这样干的话，依我看，大学里会闹翻天的。”尼克松听了一会，然后说：“有意见现在说吧，等我决定要干，我就不希望再听到这种意见了。如果我决定这么干，那就说明，我已经下决心付出必要的代价了。”莱尔德是个披着鹰派羽毛的鸽派，他很勉强地同意了艾布拉姆斯关于必须使用美军的建议，因为这位将军说，否则他就不能保证成功了，罗杰斯这时自言自语说，莫非艾布拉姆斯和其他军事将领只是讲一些他们认为是总统爱听的话？这种想法触动了尼克松。他坐下来，马上拟了一封“直发”艾布拉姆斯的电报，责成他“据实报告情况”。

散会后，尼克松要基辛格让五角大楼为美国和南越军进攻鸚鵡嘴和鱼钩提出最后计划以及“任何其他建议”，当晚必须交卷。

他还要基辛格去同另一位参议员，参院外委会保守派共和党人、特拉华州的约翰·威廉斯商量。威廉斯不像斯坦尼斯，他反对攻入柬埔寨。他是作出最后决定前受到谘询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国会议员。

那天晚上，基辛格到布鲁金斯研究所参加宴会，会上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向他提出了柬埔寨问题。他们问道，听说美国正在考虑对金边给予大规模援助，不知是否属实。基辛格没有透露，美国正在考虑的却是派美军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

那天晚上，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膝上放着一本黄纸本。据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文尔索普细腻的描述，总统信笔列了一张利弊对照表。他显然已经决定要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了。“时间越来越紧”，他写下了这几个字。他希望避免“出现一种我们不动，对方也不动的暧昧状态”。他认识到，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可能使国内“严重分裂的局面”变得更加深刻。

夜里，尼克松接到文市拉姆斯的回电说，“据实报告”，他认为需要出动美军。

4月28日，星期二，一大早，尼克松把基辛格叫来，说要使用美军进攻鱼钩地区。基辛格立即拿出他自己的黄纸本，上面也列了一张利弊对照表。尼克松看了看基辛格的表，基辛格也看了看尼克松的表，两张表上的内容几乎一样。基辛格对总统说，他有责任提请他注意柬埔寨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危险。尼克松答称，他决心已下，要在柬埔寨使用美军。他知道有危险，但现在不愿回头，即使将来事情失败，他也不愿听人埋怨。

总统当即把决定通知霍尔德曼和米切尔，随后又通知了莱尔德和罗杰斯。

按计划，南越军将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夜间开始进攻鹦鹉嘴；美军将在华盛顿时间星期四夜间开始进攻鱼钩；总统将在星期四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演说。

4月29日，星期三，基辛格同托马斯·杜威共进午餐。杜威是共和党元老，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有时也找他商量的。杜威赞成这个进攻计划。吃着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参议院里共和党的督导、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打来的。格里芬说，据报道，南越军进攻了柬埔寨的鹦鹉嘴，是真的吗？基辛格回答说，是真的，他还强调了美国只是有限卷入了这场进攻。但他对美国军队计划进攻鱼钩的事却一字不提。格里芬说，关于南越进攻的消息，参院共和党领导人不是从白宫那里得到通报，而是看到记者的报道才知道的，这种情况，实在使人震惊。

傍晚，基辛格和霍尔德曼向白宫高级工作人员传达了鹦鹉嘴作战计划，但没有透露鱼钩作战计划。

星期三晚上，尼、基两人在电话里交谈了好几次。两人都紧张地等待着星期四。

星期四刚过午，总统就请基辛格和霍尔德曼到他紧挨着椭圆形大办公室的那个私人小办公室去。尼克松把演说稿念给他们听。据说，他们“只提了一些细小的意见”。

下午3点50分，基辛格主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主要是检查有什么漏洞。会后，他向另一个越南战争问题上的鹰派、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介绍了情况，米尼赞成这次进攻。

总统发表演说前几小时，基辛格在行政大楼召集他的工作班子开了一个非常会议，有一个参加者后来回忆说：“会议是在古老的印第安条约室举行的。我觉得此中有某种讽刺意味，因为大多数的印第安条件后来都被撕毁了。”基辛格告诉他们，总统已经决定派遣美军进入柬埔寨，嘱咐大家要保

密，据另一人回忆，基辛格这样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大家必须支持总统。我们已经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我们经过最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真伤脑筋啊！谁都有一肚子意见。我可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在这里谈的关系到总统威信的问题，而不只是关系到某一个人。诸位当中如果有人认为他不能支持总统，切切注意在这个当口儿，无论如何不要到外面乱嚷嚷。如果有谁硬要这样干，那就请他辞职。”

基辛格回到白宫办公室时，莱尔德来了电话。这位国防部长对总统演说稿中的几个措词表示惊讶，特别是其中提到河内领导下在南越指挥作战的那个“中央南方局”。尼克松似乎是说，“指挥共产党军在南越全部军事行动的总部”即将处于美国的直接攻击之下，这样就会给人以完全不准确的印象。莱尔德知道，基辛格知道，许多记者也知道，这个“中央南方局”不是丛林中的五角大楼，不是筑有坚固工事的指挥中心，而是不断变换地点的流动总部。莱尔德和基辛格曾力劝总统删去演说稿里提到“中央南方局”的地方。他们甚至还劝他不如让艾布拉姆斯将军去宣布这次进攻的事情。可是尼克松说什么都不听。他仿佛听到了从远方传来的号角声，仿佛看到了自己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表“流血、流汗、流泪”演说的邱吉尔，或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并肩地走在历史的大道上，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离总统发表演说不到一个钟头了，基辛格在向一群广播和电视记者介绍情况。记者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的都是涉及当前的危机，而没有联系到历史远景。倒是基辛格主动告诫记者，别指望会攻占这个中央南方局。他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实际的目标：“我们并不指望能真正俘获这个总部的人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正好在哪个地区。很可能是当我们打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但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通讯设施，尤其重要的是破坏他们的补给站。”

4月30日晚上9时，总统终于出现在电视摄影机前，全国千百万人都在等候他发表演说。他句句话都表现战斗气概，通篇用语杀气腾腾，向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出挑战。他说：“事到紧急关头，如果世界上头号强大的国家……表现却像一个无可奈何的可怜巨人，那么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如果我们不敢挺身而出，那就等于让世界看到：尽管美国强大无比，但是真到大难临头，它却表现软弱无能。”

只是在美军已经开进柬埔寨后，朗诺才从美国驻金边代办劳埃德·里夫斯那里正式得到“出击”的通知。美方把“耽误”的原因归诿于通讯失灵。

入侵柬埔寨的消息一宣布，全国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似的，几十个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游行，并计划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示威。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弹劾尼克松，尼克松则反唇相讥，大骂学生是“二流子”，“只知捣毁校园”。他的话引起了更多的示威游行。

整个周末，基辛格忙于收阅来自柬埔寨的报告。他深入研究、反复核实每一份报告，他同总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还回答记者提问，有选择地会见一些国会议员，约定时间接见前来抗议扩大战争的老同事，并且接了几十个认为“亨利准是发疯了”的反战人士打来的电话。

到5月4日，星期一，几百所大学都在闹事，情况触目惊心。在根本说不上是激进分子会聚之所的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国民警卫队为了把扔石头

的学生驱出一个地方而开了枪，打死了4名学生，打伤了11名。

州立肯特大学惨案使基辛格十分痛心，倒不是因为死了人和导致了暴力蔓延，而是因为这次流血事件说明全国由于这场谁也没能真正理解的战争而陷于分裂了。那天晚上，他对一个朋友悲愤地说：“我完蛋了。每一次战争都有人牺牲，我就是这次战争的牺牲品。”他这种忏悔毫不表示他认为总统的行动不智。如果他当初不赞成尼克松的政策，他大可劝阻进攻柬埔寨行动，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运用他的巨大影响去劝告总统悬崖勒马，或者他曾经考虑辞职以示抗议。恰恰相反，他是支持这项政策的。

基辛格在坎布里奇的一位老同事汤姆·莱勒发来一份慷慨激昂的电报，代表了知识界普遍的情绪。这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统计数学教授的电报说：“如你果真对总统具有传说那样的巨大影响，那么你应该立即提出辞呈，附上一篇你同印度支那政策决裂的声明，这样也许还可能扭转历史的进程。要是你赞成那项政策，那么你就一辈子洗刷不掉这个坏名声了。”

基辛格曾向一些哈佛老同事解释，那些要他辞职的人虽然抱着好意，但是目光未免短浅。他们记得他这样说：“如果我跑去对总统说我要辞职，他就有可能心脏病发作，那时斯皮罗·阿格纽就会当总统。你们愿意吗？不吧？那就别老劝我辞职了。”

基辛格当时还存有幻想，以为自己在旧日的同事当中威望还很高，这些人的盛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要他们了解总统作出决定的原因以及他基辛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就会息怒的。可是，5月8日发生的事使他的全部幻想彻底破灭了。那天，13位同他有多年深交的哈佛教授冲进了他在白宫底层的办公室，谴责柬埔寨行动，要求他拿出良心来，“去制止那个疯子”。

当然，基辛格完全可以让他们吃闭门羹，他只要唤来特工人员，就可以把这些人挡在白宫外面。但是基辛格是想按他在1968年12月4日接受总统邀他任职后不久对他的知识界同事所作的保证，尽量同他们保持联系。他当初曾许愿说：“我办公地方的大门是永远对你们的意见开放的……请常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如果往后几年我同诸位朋友保持对话，那我就是失职。”

13位教授强烈的反战情绪令基辛格吃惊。与此同时，反对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的抗议浪潮继续高涨。在基辛格看来，好像政府的一切都受到了围攻。议员们在国会提出要求美军撤出柬埔寨和限制总统作战权力的法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5月9日，7.5万多名示威群众（多数是大学生）在华盛顿集会抗议入侵柬埔寨，示威游行是和平的，但人们的忿怒情绪超过了去年秋天。黎明前，总统乘车到林肯纪念馆，走进示威群众中间，想把他们的敌对情绪转变为支持，弄得保卫他的特工人员十分紧张。他先是谈打橄榄球的事，然后说到战争。但双方各不相让。

甚至尼克松自己营垒中间也出现了怀疑和马后炮的议论，这正是尼克松对基辛格说过他所不能容忍的“埋怨”。黑格日后说：“他明知官场的阻力一定很大。尽管有许多社会人士提出了抗议，甚至他自己的内阁也提出了抗议，但他确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时挺身而出号召大家坚信这项政策，要拥护总统领导的，不是霍尔德里曼，不是埃利希曼，也不是尼克松本人，而是基辛格。在这段士气低落的日子，基辛格经常在白宫高级工作人员的上午碰头会上，站出来讲些给大家打气的老套话。什么要深信不疑啦，要支持总统啦，对这项政策要继续保持信心啦，要坚决顶住啦，等等。埃利希曼后来回忆说，亨利“那时是个斗士，又是一个真正能鼓舞人

心的领导人”。

正由于基辛格在旁人动摇不走的时候对总统表现了忠心耿耿，所以他同椭圆形办公室主人的关系终于巩固下来了。自从总统就职以来，基辛格就一直向这个方向下功夫，然而只是当尼克松在柬埔寨危机中被说成是丧尽良知而基辛格还是不遗余力地为总统保驾时，这才真正奠定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可是，基辛格仍然无法说服莱克、莫里斯和瓦茨收回辞呈，而且林恩紧接着也辞职不干了。5月末的一个星期六早上，莱克同他这位上司谈论他辞职的事。莱克回忆说，基辛格看来“内心很感失望”，简直就像是“我退出了他的讲习班，不听他的一切教诲似的。他知道我了解这点，但是我认为他是着眼于社会的稳定来看问题的，他认为莫里斯和我两人的态度说明，我们这些人不是在尽力维持社会团结，而是跟着那些瓦解社会的激烈分子跑了。他强烈地感到，我们不是在患难之中背弃尼克松总统个人……而是背弃国家元首。”

每当发生危机、每当社会面临挑战时，基辛格内在的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美国走上魏玛共和国的道路，在挫折失望中转向极端，转向一种现代的法西斯主义。他常讥讽挖苦莱克等人是“悲天悯人”，说他们讨好左派，反尼克松的老成见大发作，放弃了责任。他常大声说：“我们是总统的人，就得像个总统的人的样子！”他认为他的哈佛同事只因一味在柬埔寨问题上痛心疾首，因此看不清大局。基辛格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在于它恪守义务，在于它守信、慷慨，在于它两党一致忠于国际秩序，在于它反对暴政、侵略。在基辛格心目中，主张维持现存秩序的势力和主张革命的势力之间，是有区别的。越南问题也许是一场悲剧，美国本来是根本不应该闯进去的，但是既然闯了进去，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狼狈不堪地逃脱出来，而是应该走得光彩体面。现在是，总统处于四面楚歌，想做他应该做的事，但是整个权势集团却在背弃他，就像当年德国的权势集团曾经背弃民主政治一样。教授、作家、知识分子统统都跟着青年上街了，他们不顾他们的客观性了；尤其严重的是，他们丧失了他们的勇气。在新的和解时期到来之前，必须保住这个社会。美国总会恢复它本来的精神面貌的。但是在这之前，妈的，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

几个月后，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向一群编辑介绍情况。他是这样分析他所谓的关键问题的，他说：“我们向来以为，如果政治决定要在街头上作出的话，那么胜利者不会是中产阶级上层的青年大学生，而是一些真正的凶顽之徒……一个社会要是采取这种方式决定方针政策，那么它迟早要走上某种形式的专制独裁道路，社会上最残暴的势力就要掌握政权。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真正处于危险中的不是这位总统，而是整个社会的权威问题。大家看看最近几任总统的历史吧：一个惨遭暗杀，一个威信扫地。我们国家经不起再这样搞垮一位总统了，不论他的政治信念怎样。”

基辛格在硬着头皮干下去。他会见一个接一个的学生和教师代表团，总是表现出态度可亲的教授风度，随时准备应战，不畏孤立，以全部身心为国家的团结而奋斗。从4月30日美国地面部队奉命开入柬埔寨起，到6月30日撤出来，这一期间，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以外，还至少七次接见了大批记者，不断阐释政策、对付敌意批评，当然还要解释总统的立场，如说“总统的意思是……”或“我对总统讲话的理解是……”等等。

在紧张对垒的情况下，基辛格的幽默语言帮了他很大的忙。他能以此来博取听众的好感，岔开人家的攻击，有时还可以使批评降温，他5月9日向报界作“背景情况介绍”时，一上来就说：“我刚才还在情况室里策划战争呢”，于是引起一阵大笑。基辛格马上加了一句：“齐格勒先生说，‘那句话不得发表’。（稍停片刻）用德语来讲更好听一些。”这逗得大家又乐了。5月16日，基辛格在比斯坎岛接见记者，他的开场白是：“谁有什么问题要我回答吗？”第一个提问题的人指出，官方关于柬埔寨之役的解释显然前后矛盾。此人最后质问道：“我要问你，是谁在对我们撒谎，再通过我们对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只停了一秒钟便答道：“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在历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基辛格一般都是分四个方面来谈问题。

第一，他竭力批驳这样的揣测，说美国将在柬埔寨承担一项新义务，就像在南越那样。他向大家保证，美国军队将在6月底以前撤出柬埔寨。

第二，他指出，柬埔寨之役为有序地从印度支那撤出美军，也为增强南越部队，赢得了至少六个月的时间。

第三，他表示理解全国各地学生的不满情绪。他说：“这里有我的学生，我教过他们课，这里有我的同事……这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我们了解抗议的人们的烦恼、焦虑，我们希望他们终于会懂得，我们国家没有哪一部分人，包括处在负责岗位的人在内，能够说，只有他们才对这次冲突感到苦恼……我们并不希望发生对抗。在对抗中不会有什么胜利者，只有牺牲者。”

第四，基辛格认为，美军在柬埔寨的地面行动一旦结束，就会产生新的谈判机会来寻求体面解决越南战争的办法。他提到北越已经将“他们的几位大使”召回国，北越国会已经召开，他估计河内正经历“一个深刻的重新考虑问题的时期”，过后，政治局可能作出要进行“认真谈判”的决定。

总统对柬埔寨之役的估计更为乐观。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他保证，这次进军打乱了敌人在南越的部署，共产党在富饶的三角洲和西贡周围地区的军事活动已经显著减少。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大肆宣扬南越军在柬埔寨之役里的表现，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他们宣称南越军已取得空前的作战经验，从而产生一种荣誉感和团结精神。

事实上，美国的空中支援对南越军的作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南越军之所以有这点新的积极性，还有一层与军事无关的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原来这是南越军第一次在国境之外作战，同装备很差的柬埔寨军队（他们刚刚当兵，其实是穿着军装的老百姓）相比，南越军可以说是老虎。他们第一次找到了蔑视的对象，就像在南越的美军蔑视南越军那样。南越兵摆出了一副在本国作战时很少看到的威武气概。他们带着自命为柬埔寨救世主的情绪，加上他们对柬埔寨人的仇视，于是关于他们掠夺、奸淫和屠杀柬埔寨平民的消息就层出不穷了。柬埔寨人方面也开始迫害世代居住在柬埔寨的无依无靠的越南平民，借口是说这些越南侨民窝藏越共和北越军。于是，许多无辜的越南人遭到屠杀，肿胀的尸体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

这次入侵给柬埔寨带来了长期的灾难，这是人所不齿的嘲弄一个弱小无助国家主权的战略。它没有缩小战争而是扩大了战争。白宫宣传说，这不过是一场60天的地面行动，如此而已；美军行动只限在边界内21哩的地区内，如此而已。但是等到入侵柬埔寨的3.2万名美军撤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

半壁江山已经落在“对方”的手里了；而三年以后，B—52 飞机仍然在轰炸以前那些庇护所。美国在柬埔寨投掷了 50 万吨炸弹（比整个尼克松当政期间投掷在北越的多一倍以上）之后，1973 年 8 月中旬，国会迫使总统停上了轰炸。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丝毫廉耻的话，那就是华盛顿绝少有人再侈谈这一切残杀和轰炸都是为了造福于柬埔寨人民了。柬埔寨完全成了强加于它的一场战争的战场。

对基辛格来说，在柬埔寨使用美国的军力不是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他下述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引伸，即有时为了推进外交事业（目前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谈判使美国从印度支那体面地撤军），实行武力政策是必要的，而且还要迅雷不及掩耳地实行这种政策

第八章

谈判背后

1970年7月1日，最后一个美国兵撤离柬埔寨的第二天，尼克松总统任命美国最受尊敬、最有经验的一位外交家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以此向河内公开表示他准备重开谈判。布鲁斯曾历任美国驻西德、法国、英国大使。他于8月初到了法国首都。

当布鲁斯在听取有关单轨和双轨两种谈判方式的主要不同点的介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秘密拟订一个打破僵局的新方案。基辛格主持的一个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已经对这个方案最关键的停火问题研究了好几个月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代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专家，在它的督导下，就像早期研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时那样，深入研究了在整个南越44省中的20个省里实行的三种停火方案。

第一种停火方案要求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是美国谋求多年而没有达到的目的。第二种停火方案承认无法把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对河内的一大让步。这个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让北越军队在南越某些指定地区重新集结。第三种方案超过让步，成了投降，实际上是不顾西贡的反对，接受了河内关于北越军队可以在南越全境行动的要求。这就是所谓“就地停火”方案，它只要求北越人停止战斗，而容许他们继续在政治上控制当时处于其军事控制下的所有地区。

基辛格劝总统试一试第三方案——搞就地停火。他认为这是三个方案中最切实可行的，有希望可以争取河内同意，最后达成协议。国务院里两个重要人物沙利文和哈比卜支持基辛格，也认为停战谈判必须反映战场的现实才能成功。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阮文绍总统坚决反对就地停火的主意。他们得到邦克大使的支持。这些人从西贡的立场看问题，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在军事上是无法接受的”。

在美国入侵柬埔寨以前，尼克松同艾布拉姆斯、邦克等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就地停火对阮文绍威胁太大。但经过那60天激战以后，他觉得越南共和国军的战斗力还相当不错，因而改变了主意，到了仲夏，基辛格的就地停火方案占据了尼克松计划的中心位置。

基辛格争取到总统同意那个方案之后，便筹划同河内进行新的接触。他让布鲁斯为他安排同北越方面进行另一轮秘密会谈。河内让离开巴黎已好几个月的春水重返巴黎，从而表示准备会谈。1970年9月，基辛格两度飞越大西洋同北越谈判代表秘密会晤。他对春水说，美国无意使北越“受屈辱”，无意霸占它的任何领土，也无意剥夺它连续打了25年仗所获得的政治果实，甚至无意在南越保留美军基地。他解释说，事实上美国愿意给越共一个“合理的机会”，通过非暴力手段取得南越的政权。虽然美国就地停火的新建议到了10月才公诸于世，但是很可能基辛格早已把美国政策上的这个转变告诉了春水。

但这位河内代表看来毫不为这番好话所动。不久就看得出来，春水没有被授权谈判任何新的倡议，他所能做的只是重述人所共知的河内立场。9月份谈了两次以后，基辛格决定“决不再”同春水单独会谈了。基辛格说：“简

直是浪费我的时间，他除了传递信息没有别的权力。我倒有点喜欢春水这个人，我同他个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不是说他是强硬派，不过他缺乏灵活性，他所能做的只是宣读发言稿。黎德寿有权可以进行谈判，春水没有这个权力。”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布鲁斯大使 10 月 8 日在巴黎谈判桌上正式提出美国上述新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除了第一次建议就地停火外，还包括四点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答应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其他三点提出了美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

基辛格自己包揽了解释这个新方案的工作，不放心别人插手。他在一系列给新闻记者介绍情况的会上强调说，这是美国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全面方案，说这个方案远远超过了 1969 年 5 月总统演说中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他闭口不谈美国政策中的那个关键性的转变，即从先前的“共同撤军”方案退到“就地停火”方案，实际上，当记者纷纷向他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时，他有意避而不答。

一个记者单刀直入问道：“难道我们放弃了先前的‘共同撤军’的主张了？”基辛格回答：“没有。”他接着说：“当然罗，那主要看你怎样给‘共同’这个词下定义了。不过我们并不是放弃这个总原则。”

另一个记者想逼基辛格说得更明确一些。他问道：“换句话，你是说，与我们撤军的同时，北越方面也必须按我们一向坚持的那样，撤出他们的部队，对吗？”基辛格回答说：“不错，基本上是这样，那是谈判内容之一。”

总统的这位顾问通常叫嚷要极力保持他对新闻界说实话的信誉，但是这一回出于政策的需要，显然认为没有必要说真话了。

基辛格一边煞费苦心对美国人民隐瞒着美国这项重大让步，一边却想方设法使北越了解到这个转变的全部涵义，他不但让布鲁斯在巴黎直接对北越人讲，还间接地让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和波兰大使那日·米哈沃夫斯基传递消息。这两个共产党外交官都意识到这个转变的重要性，他们找国务院和白宫的重要官员核实后，立即将他们发现的情况电告河内。

但北越人不为所动。他们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容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美国这项大让步对他们说来还不够。他们仍然坚持，美国必须先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许美国人“体面地”撤出。虽然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呕心沥血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并没有完全领会到河内政策的核心所在。

到 1970 年年底，形势比一年前更暗淡了，基辛格在圣诞节前夕向记者回顾一年来的对外政策时承认：“谈判进展不够快，这使我们很失望，我们对 10 月间那项和平倡议曾抱较高的希望，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能实现。”外交战线既然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僵局，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又一回合的军事较量。

老挝（在这块印度支那东南部的狭长地带里，胡志明小道在密林中蜿蜒数百哩）是军方喜欢称为“有油水”的打击目标。多年来美国派飞机轰炸这些小道，却从来没有采取过要在地面上切断他们的行动。虽然军方多少年来一直要求出动地面大部队去切断北越军队这条重要补给路线，但历届总统都不批准。从 1970 年夏天以来，尼克松不断收到高度赞扬南越军斗志昂扬、面目一新的报告。艾布拉姆斯老是说，南越军已经在柬埔寨受到考验，“杀出去了”。到了 1971 年初，尼克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让南越军打进老挝去。

基辛格起先对于在老挝作战并不积极，但也没有加以阻挠。1月中旬，总统批准了进攻老挝的战略。南越人称之为“兰山 619”的这个战役，要达到几个目的：切断胡志明小道，破坏北越军队的储藏所，阻止北越军队插入南越北部的几个省，以及为实施越南化争取更多时间。让北越人在老挝境内的小道上流血，就可以减少越南军和美国在南越流血。尼克松懂得，他不能再像柬埔寨之役那样派美军越过边境同南越军并肩作战了。库珀一丘奇修正案禁止任何这样的军事卷入。但该修正案并不妨碍美国在 2 万南越军于 2 月 8 日开进老挝时提供大规模的空中支援。如同柬埔寨之役一样，这种空中支援又一次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支援，如果没有美国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输送南越军和运去大炮、补给品和粮食的话，南越军休想越过边界一步。

老挝之役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南越军偶尔也打得不错，但许多部队被优势的共军炮火所消灭。数以千计的南越军官兵仓惶逃窜。一个幸存的军士阮文认为，北越军队的骁勇善战并不完全由于他们的斗志。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敌军是吃了麻醉药的，我听说他们吃了一种‘无畏’药，这种药使他们不惧炮火，视死如归。他们前仆后继打冲锋，踏着战友的尸体向我们猛扑过来。”

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观看这次战役的片断报道时感到大为吃惊的是，见到南越军的士兵抱住美国直升飞机的着陆橇从战场逃回南越的情景。有些命运不济的士兵，在直升飞机着陆以前就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些人不等直升飞机起飞就被推了下来。一个美国驾驶员说：“我们也得考虑自己的性命嘛。15 个家伙挂在下边，叫人怎么把直升飞机开上天啊？”

“兰山 619”战役在发动后 44 天就提前结束了。南越军匆忙撤退，美国记者把它描写成为溃败。阮文绍愤怒地反驳说，那不是溃败，而是高明的战略。他硬说：“我们的目的是乘敌不备，然后撤退。”他吹嘘这次战役是南越军的空前大捷，而南越军官上报的关于击毙多少敌人占领多少储藏所和切断多少小道的统计数字，是根本违反普通算术规则的。他们的报告使人联想到威廉·卡利中尉在美莱惨案审判时的供词：“向国内人民报告我们打死敌人的数字比他们打死我们的人数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是随意凭空作尸体统计的。任何东西的尸体都算：越共、水牛、猪、母牛。只要是死的，都统计在内。”

五角大楼支持阮文绍的说法，不在话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不顾河内在“兰山 619”战役中获得了心理上的胜利这一事实，仍然一味欢呼，说这次战役是南越军的又一次胜利。基辛格先前还信不过南越军，现在也开始接受五角大楼的估价了。他在给总统的一份秘密报告里再度发出乐观论调。他在老挝战役结束后不久写道，“我们估计，印度支那半岛的力量对比已经转变为对南越人有利了。”

三年前，南越军是在南越境内人口稠密地区及其附近同敌人交战。现在，他们已显示出，他们能够在没有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或顾问帮助的情况下，在敌人庇护所地区对敌作战，同时还能使他们自己境内保持平定。

他们已显示出有能力在困难、陌生的地形和不利的氣候条件下，同具有充分准备的敌人进行复杂的大部队作战。并且，这是在美国军队自 1969 年以来已减少约 26 万人的情况下进行的。

基辛格看来甚至有点想入非非：有朝一日让“善战的越南共和国军”去

进攻北越。就在老挝战役期间，基辛格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午新闻”节目上，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实况电视采访。他非常机警地拒绝批驳一项盛传南越军不久将大举进攻 17 度线以北的传说。基辛格至多只肯说：“在目前，这种可能性还不十分大。”事实上，南越军根本无此计划，基辛格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乐得搞心理战，叫河内紧张一下也好。

3 月初，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的话来说，基辛格自己发动了一次“小小的春季攻势”。一个星期六下午，清闲无事，他把三个和平战士请到白宫的情况室来。这三个人刚被司法部指控为贝里根兄弟阴谋绑架基辛格案件的共谋犯。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这三个人是汤姆·戴维森（25 岁，其父是圣公会牧师）、威廉·戴维登（44 岁，公谊会教友，哈佛理学院物理学教授）和贝弗利·贝尔修女（44 岁，那慕尔圣母院的修女）。基辛格首先为他曾经说过所谓“修女思凡”的失言表示道歉，然后解释说，他早想找他们来谈谈贝里根案件的某些问题。

事后，戴维森对麦格罗里说：“怪就怪在这个人倒还不错。他弄得我们这些道学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代表了政府的良心。当然罗，我们对良心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戴维登也说这次会见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我们这些人被控图谋扔炸弹。可是他呢，他搞的那个轰炸就在我们谈话时还在进行着。他认为在某种情况下，进行大屠杀是可以的。我对他说，我认为进行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在随后的一周，基辛格邀请参议员麦戈文共进早餐。麦戈文当时已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麦戈文对基辛格说，越南战争“可说自始至终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基辛格并不否认，美国当初干涉越南是个错误，不过他指出，总统是受到选民、整个世界形势和其他“外界”因素限制的。麦戈文过后对记者们说，他感到很惊讶，基辛格十分关心公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如何，而毫不关心越南战争牺牲了多少亚洲人。

过了几天，基辛格邀请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到白宫共进午餐。麦卡锡 1968 年曾以和平为号召参加总统竞选。几星期前，麦卡锡曾在哈佛大学一次反战宣讲会上说：“中世纪时处死或流放那些出坏主意的谋士的做法，是有其道理的。虽然我不主张这样做，但是我对某些出过坏主意的人还能恬然回到学界来，是有保留的。”基辛格向来非常忌讳人家这种物议，但是他在这次午餐会晤时没有提起这件事，尽是引经据典讲些不着边际的话。

3 月 25 日，基辛格邀请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多年来反对越南战争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白宫共进早餐。他们也谈得很广泛，其中包括越南问题。

基辛格希望，通过这种交谈，一定会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的谅解，争取到更多时间使美国逐步从印度支那脱身。他向来反对一切两断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认为，激战之后必有和谈。在入侵柬埔寨后，他曾经搞了一次外交，如今老挝战役已经结束，他又准备一试身手了。1971 年春，他鼓动总统再制订一个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把 1970 年 10 月 8 日布鲁斯所提出的那个方案加以扩充而成的，但是包括两点重要的新让步。基辛格觉得，这可能终将弥合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分歧。

第一点让步是，美国保证在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全部撤出南越。这

是满足河内关于美军应限期撤完这个要求的重大步骤。第二点让步是，美国答应要阮文绍总统在南越举行全国大选前一个月辞职。这是接受河内关于阮文绍必须下台的要求。此外，这个方案仍包括原有的全印度支那就地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对停火和选举实行国际监督、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新协议的实施等各点。

这个方案直到 1972 年 1 月才公布，它不仅导致美国同北越人进行新一轮秘密谈判，而且证明了基辛格不愧为掌握秘密外交艺术的能手。1969 年 8 月，他曾秘密会见春水。1970 年初了曾四次秘密去巴黎同黎德寿会谈。1970 年 9 月，他又两次会见春水。现在，1971 年，他将第六次飞渡大西洋同北越最高谈判代表举行会谈。除 1969 年那回第一次秘密会谈险些拆穿外，多少盯梢的记者部从未能抓住他使他吐露秘密。

1971 年春季和夏季，先后举行了六次秘密会谈，一次比一次有进展，直到后来基辛格可以说“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1971 年的首次巴黎秘密会谈是在 5 月 31 日，即过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漫长周末后的星期一举行的。总统先期乘直升飞机前往戴维营，以转移白宫记者团的注意，基辛格也耍了一些花招：他在一次招待会上露露面，随便说了几句新编造的俏皮话。乘着客人还在哄堂大笑的时候，他已经溜出来，在星期日晚上动身去巴黎了。

基辛格带着一种发起人的自豪感向黎德寿提出了美国的新建议。为了造成一种坦率气氛，他解释说，美国政府懂得（“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等南越的战争结束，签订和约后，将来美国人远在万里之外，而北越人则相距只有 300 哩。因此，使解决方案不但对华盛顿而且对河内都公平合理，才符合美国利益。他强调说，美国所要的是北越“愿意遵守”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特别强调就地停火，他解释说，根据这一条，北越部队无需撤出越南。基辛格这番说明并不比布鲁斯 1970 年 10 月间所讲的更有说服力，黎德寿拒绝了这个方案。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北越人坚持，任何不包括政治解决的方案根本不能谈。”美国一走了事不行，还必须在走以前作出北越人可以接受的政治安排。

尼克松的这位游说顾问第二次飞去同北越人秘密会晤时，居然还利用伦敦来掩人耳目。他于 6 月 24 日星期四抵达英国首都。星期五，他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共进午餐，然后同有“英国的基辛格”之称的伯克·特伦德爵士（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举行一连串的晤谈，交换两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经验。星期六一早，基辛格飞往巴黎同北越人举行了会谈，傍晚时回到伦敦。少数英国官员知道他去过了巴黎，但到底干了些什么，那就不一定知道了。他在伦敦故意抛头露面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星期一上午他又回到白宫办公了。

就在 1971 年第二次秘密会谈中，黎德寿提出了九点和平方案。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了有达成妥协可能的轮廓。每一点都是含含糊糊地包括双方的观点，而没有一点具体到足以冒犯美国人。基辛格出乎北越谈判代表的意外，迅速把河内的方案接过来，作为谈判解决越南战争的“基础”。基辛格后来解释道：“从那以后，美国的各次方案都模仿那九点的顺序和内容。”

但是道路仍然是崎岖不平的。过了四天，当基辛格已经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北越人在巴黎公开提出一项完全不同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老调重弹，口气强硬，坚决要求阮文绍立即下台和规定美国全部撤出的日期。基辛格当即给巴黎打电报，质问黎德寿是否推翻了他 6 月 26 日提出的那个秘密方案？

这位北越代表向他保证说，没有，他那个方案仍然算数。这一下，基辛格才领悟了北越战略的真意：他们仍然愿意在私下进行认真谈判，但同时他们还是要进行公开的宣传，显然是为了煽起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7月间，基辛格双管齐下。他同北越人会晤两次，第一次在12日，第二次在26日。7月12日他在巴黎，这倒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大使馆曾宣布他到巴黎同布鲁斯大使会商。新闻界被蒙在鼓里的是，基辛格刚从北京作了开路先锋的访问回来。他大摇大摆地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一路上访问了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中间极端秘密地去北京走了一趟，从卡拉奇传出谣言说，他可能在巴黎同北越一个高级官员会晤。因此，一大群新闻记者跑到法国首都等着他。基辛格居然叫他们都上了当。后来他谈起这件事说，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一趟北京，比进入什瓦齐勒罗瓦（巴黎工人住宅区，美越秘密会谈在此举行）郊区还容易。

7月12日晚上，基辛格故意让人家看见他同正在巴黎休假的电视节目负责人玛格丽特·奥斯默在有名的加兰餐厅吃饭。第二天早上，全世界的报纸都登出了他们两人在一起的照片，《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主任梅尔·埃尔芬叹道：“亨利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用私生活来掩护本职活动的人。”

7月12日下午，基辛格逐点研究了河内的九点建议，花了四小时之久。时间不够，没有谈完，双方商定两星期以后继续谈。7月26日，当“阿波罗”宇宙飞行员出发登月的时候，基辛格正准备同北越人会晤。肯尼迪角这次盛况空前的发射，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到7月26日傍晚，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达到了可以具体地衡量进展的地步了，这在他们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双方的分歧已经缩小到只剩下河内九点中的两点了。基辛格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情绪。他开始看得见“一桩交易的轮廓”了。他相信他已经走到了实现突破的门坎上，而现在离1972年大选年还有一大段时间，因此，谁也不能指责是在让外交服从国内政治的需要。

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基辛格和总统致力于修改美国的和平方案，希望能解决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在剩下两点（美军撤出的条件和南越的政治前途）上的分歧。8月15日，他们的方案搞好了。基辛格趁着总统宣布货币和贸易政策上的一项激烈改变时，悄悄收拾行装，准备第五次前往巴黎。第二天，基辛格会见黎德寿，提出了一个八点方案。在基辛格看来，这个八点不仅非常近似河内的九点，而且还设法解决那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针对北越第一点反对意见，美国提出，美军全部撤出的具体日期为1972年8月1日，条件是必须在1971年11月1日前达成全部一揽子原则协议。关于河内的第二点反对意见，美国首先保证在即将于10月3日举行的南越总统选举中保持中立。其次，美国宣布，如果苏联和中国也限制对北越的援助，美国愿意限制对南越的援助。最后，美国将发表一项声明，尊重所有印度支那国家采取不结盟的方针。基辛格觉得，他对河内的两点反对意见真是做到最大的让步了。所以他非常乐观。

北越人花了三个星期来考虑这个八点方案。在这段关键时间，他们看到阮高其和杨文明退出总统竞选，让阮文绍处于自己同自己竞选的可笑地位。又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基辛格同黎德寿两人这一系列秘密会谈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于9月13日在巴黎近郊工人住宅区什瓦齐勒罗瓦举行。

北越人一上来就给基辛格当头一棒，拒绝美国的最新方案。他们声称这

个方案根本没有解决那两个他们有反对意见的关键问题。他们抱怨美国所提的撤军日期太遥远了。另外，既然阮文绍现在搞独脚戏选举，美国所谓在 10 月 3 日大选中保持中立的保证是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这才明白，他先前的乐观完全落了空。要在 1972 年以前获得他那个和平解决，显然是没有希望了。

基辛格现在才充分意识到，黎德寿一再坚持美国必须先把南越交给共产党，共产党方面才允许美国从南越脱身，原来这话是算数的，基辛格同北越人正式谈判一直到了第三年，才最后抛弃幻想，弄清了河内的中心思想。原来北越方面一心要美国同他们一道把阮文绍赶下台。

显然，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基辛格本来以为河内会欣赏他的主张的合理性和他的方案的灵活性，而北越方面则以为基辛格会同意他们对阮文绍那场独脚戏的选举的鄙视态度。北越人看到美国方面从原先的谈判立场步步后退，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有意在南越选举中抛弃阮文绍——有一次基辛格苦笑着说：“请高抬贵手，让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其实，基辛格从未打算同黎德寿一起把阮文绍政权搞掉。他一贯主张打开某种不“硬性规定其发展方向”的“政治进程”。然而北越方面也是直到 9 月 13 日那次会上才终于懂得，基辛格也是说话算数的，他不是寻求某种东西来掩盖彻底投降，而是在寻求真正的妥协解决。当北越人弄清美国的真正立场后，他们就中断了谈判。他们不愿意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试试看能否掌权的机会而接受和平解决，他们要的是肯定能掌握政权，万无一失。

在阮文绍重新当选的尴尬事件过后八天，即 10 月 11 日，美国又秘密送了一份略加修改的和平方案给河内，并建议基辛格和黎德寿在 11 月 1 日会晤。同时还附去一封信，指出这是“在 1971 年年终以前寻求谈出一个公正解决办法的最后一次努力”。

两星期后，河内答复说，黎德寿不能在 11 月 1 日会见基辛格，而另提 11 月 20 日，美国接受了这个日期，但是到了 11 月 17 日，河内又通知基辛格，黎德寿“病了”，提议基辛格同春水谈。基辛格不干。他答复说，同春水一个人谈“不解决问题”，他只准备同黎德寿谈，否则拉倒。河内不作答复。结果是，又一次陷于僵局。

1971 年圣诞节时，基辛格对越南局势又感到很泄气了，驻西贡的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的记录表明，自总统就职以来，在尼、基同黎德寿和春水双方执行谈谈打打政策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有 1.4 万多名美国士兵丧生，10 万多名受伤。越南双方的伤亡还要高得多。反战势力越来越强烈要求政府规定美国撤军日期，并谈出一个解决战争的妥协办法来。基辛格想做到这两点，但他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失败了。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沉浮了三年之久——今天升到乐观的顶峰，明天又掉入失望的深渊——现在，感到达成交易依然遥遥无期，一如当初。

基辛格在越南问题陷入挫折和迷雾之际，一个工程计划时时闪过心头。他常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们能在湄公河口筑一个大坝，把整个越南淹没在至少 12 尺深的水里，那时也许……

1972 年 3 月 31 日，越南的天主教徒正忙于做耶稣受难日祈祷，北越人民军四个整师，在大批苏联坦克和远程大炮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这次进攻的时机和规模，都使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为之震惊。基辛格原以为北越会在 1 月底或 2 月初——在总统去北京之前或访问期间——

一发动一次攻势，规模也没想到这样大。但是直到3月中旬，还不见动静，基辛格料想北越人也许是改变了主意。他想，可能由于北京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因而逼得河内重新考虑它的战略了。也可能是由于美国飞机频繁袭击北越据点，使北越的攻势发动不起来了。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最后竟认为北越根本不会发动什么攻势了

几个月来，北越人一面准备发动一次突然进攻，一面作出有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姿态来吊基辛格的胃口。1月26日，也就是尼克松戏剧性地透露基辛格同黎德寿的秘密会晤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会谈已陷于僵局后的第二天，尼克松给河内送去一个密讯，提议重开秘密谈判。几星期后，北越接受了总统的建议，表示3月15日以后哪一天都可以。基辛格马上提议3月20日，河内同意但是，到3月6日，北越就开始拖延了，建议会晤推迟到4月15日。基辛格答称那天他正在日本，4月24日怎么样？十天过去了，河内没有答复。美国为了表示等得不耐烦，便让威廉·波特大使（他在巴黎接替了布鲁斯）中断了例行的半公开会谈。

3月31日，基辛格终于收到了河内的回信，同意4月24日会晤，条件是例行的巴黎会谈必须同时恢复。他立即起草回信，确定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晤，4月13日恢复半公开会谈。但是他的信还没来得及译成密码电报拍发出去，河内的攻势就打响了。基辛格后来才知道，早在1971年10月黎德寿得了外交“病”时，河内就已“决定诉诸武力”。从那以后，“他们一直设法使谈判配合”他们的军事目的。他们每次拖延谈判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真是厉害，真是不好对付！”

到了4月1日，北越的攻势扩大了，这时基辛格也急了。尽管美国在1970年对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进行过“出击”和连续轰炸，但那些庇护所依然存在，威胁性反倒比以往更大了。几千名北越军从那里杀过边界，向南直插安禄市；另一支几千名北越军从南面的庇护区柴桢挥戈东进。60哩外就是西贡，那里已经告警，但还没有陷入惊慌。基辛格同总统、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商量了好几次，但在军事上没有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到4月2日，北越军长驱南下，进入广治省，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第三师，挡不住这股压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说，美国正面临南越遭到大举入侵的局势。他又一次对敌人的意图估计错了。自1968年初的春节攻势以来，北越方面对南越的进攻还没有达到过这样广泛、这样猛烈的程度。这一次北越军几乎出动了全部兵力，把13个地面战斗师中的12个投入了这一仗。河内国防部长武元甲的座右铭原来一向是“只打有把握的仗”。但这次他却是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这次攻势显然是他的一出压台戏，想在军事上来一个辉煌胜利，迫使美国在外交上屈服。阮文绍不久就称这次攻势力“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武元甲的战略是：夺取一个省城，宣布为临时革向政府的临时首都，争取外交支持，然后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取阮文绍而代之。

基辛格4月2日给北越人拍的电报说：“美国方面一直表现极其克制，为的是尽可能使谈判取得成功。”实际上，美国政府被北越这次进攻打得目瞪口呆，已经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4月3日，星期一，基辛格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1969年春以来他处理危机的机构）开会。接连六个星期，这个小组几乎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把各方面的原始材料集中起来，供基辛格出主意和尼克松下决心，然

后再把决心落实为行动。

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是不作记录的。自从上次杰克·安德森搞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关于印巴战争的秘密会议记录以后，基辛格就进行整顿，只让少数官员参与会议，加强了保密，严格了纪律，以减少泄密的可能。

同先前几次危机一样，这次基辛格还是起着重要的抓总作用。他通常在上午8点到达白宫办公室，一边吃早餐，一边阅读由黑格或他的班子里其他成员整理出来的夜里收到的驻外使馆来电和军事情报等待阅文件。8点30分，基辛格出席白宫官员的例会。9点整，他去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汇报工作，协助总统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其间，总统常常给罗杰斯。莱尔德·穆勒挂电话，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问基辛格的想法。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可以这样议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了正午（这是华盛顿时间，在西贡已是午夜了），基辛格就发出总统对此后24小时印度支那战争或巴黎外交谈判的最新指示。

然后，这种秘密决策的过程，便经过一番手脚编成各种新闻，通过少数新闻官员公诸于众。这些新闻官员：白宫的齐格勒，此人开头对外交政策一无所知，但是进白宫后学到了不少；五角大楼的丹尼尔·亨金，此人情况极熟，但口风甚紧，重要的情况只肯点点滴滴透露给记者；国务院的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此人善于引导记者体会政策的细微差异，因此颇得好评。这三个人从尼克松、基辛格、黑格或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那时接受指示，然后发布新闻。只有他们三人可以向新闻界发言。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里大多数别的官员是连记者打来的电话也不接的。

这门工作办得利落，管得严密，一般人所知道的只能是白宫想告诉他们的情况。除了正式发布的零星新闻外，白宫有时还故意透露出一些情况，目的是要拔高总统的形象，或是达到某种政策目的。试举一例：某次白宫透露，有个助手根据竞选的考虑对总统的某项决定提出了质疑，据说尼克松厉声喝道：“管他妈的什么竞选不竞选，现在最要紧的是能把我们的对外政策搞下去！”还曾经故意透露美国飞机和舰只调动的情况，引人注目，以制造尼克松决心击退北越入侵的印象。

4月4日这天，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项是政治的，一项是军事的。第一项决定涉及苏联。这次攻势一开始，基辛格就清楚地知道，北越人要是没有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远程大炮，根本不可能进攻南越。基辛格认为，苏联人是在支持一场轻率的军事冒险，这是四个月来的第二次了：上一次是印度，这次是越南，这些苏联人什么时候才会汲取教训呢？尼克松和基辛格断定，现在只有冒点政治风险，拆穿苏联人同进攻有关，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为了不妨害预定在5月22日开始的最高级会谈，他们决定第一次指责不由基辛格在白宫提出，而由麦克洛斯基在国务院提出。

4月4日，星期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上午例会后，黑格向麦克洛斯基发出了确切指示，让这位国务院发言人一点一点苏联以武器支持北越人进攻南越这一事实，但是不要多加发挥。参加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威廉·沙利文回来在午间向罗杰斯汇报（麦克洛斯基也在场），详述了黑格的指示。他们指出，黑格的命令来自基辛格。之后，麦克洛斯基就来到新闻发布室，这里早已挤满了等着发消息的记者。他的任务果然完成得很出色，齐格勒来了电话表示嘉奖，说：“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基辛格以为，对苏联参与进攻这件事，适当点一点，由国务院发表一次

措词谨慎的评论，登几条消息，就够了。但是他想错了，笨拙的官僚机构打乱了他的计划。官方一次评论引起了各种纷纷评论。国务院发表评论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也出来帮腔。报上出现头一批消息后，便促使新闻界进一步寻根究底。于是乎，什么苏美关系陷入危机啦，最高级会谈恐怕开不成啦，这类报道一时甚嚣尘上。

基辛格担心苏联人得到了错误的信号，于是他命令政府发言人降低指责苏联的调门。过后，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他个人是反对公开指责苏联人的，国务院搞得过分了。基辛格这些话不久就在赖斯顿的专栏里捅了出去，那些了解真相的政府官员深为惊讶。当有人在白宫提出这个问题时，基辛格表白自己说，他不晓得那个“苏格兰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印象的；还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有见到赖斯顿了。

国务院马上按基辛格的指示办事，罗杰斯国务卿甚至矢口否认，说政府从来无意“公开指责”苏联人。但五角大楼却仍然忠于基辛格原来的命令。4月6日，穆勒海军上将在海外作家午餐会上指责苏联说，越南战争有了“新因素”，这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大炮出现在南越。4月7日，莱尔德国防部长又加了码，他说，河内的先进武器有80%来自苏联，因此，莫斯科在帮助河内达到其战争目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基辛格这时正在同华盛顿某专栏作家共进午餐，一听到莱尔德那番话，不禁勃然大怒：“他妈的，我对他说过不要讲，他还讲！”基辛格解释说，本来布置只由麦克洛斯基指责苏联人一次，公开批评就到此为止。他嘟哝着说：“莱尔德忘了他已经不是国会议员可是，三天以后，部署又变了。这一次，是尼克松亲自出马指责苏联人了。4月10日，总统在国务院为签署一项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举行的仪式上讲了话，他的讲稿是基辛格起草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站在签字桌后边听着，表情索然。尼克松首先赞扬了苏联人在军备控制协议方面给予的合作，然后间接地批评他们鼓励北越的进攻。他强调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决不直接或间接鼓励别国对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事毕，多勃雷宁急忙穿过外交接待室，坐上他的卡迪拉克牌汽车就走，对记者一言不发。

4月4日的第二项重大决定，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军事上对北越进攻所作的反应。那天上午，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还留在南越的美军”。随后非正式告知记者，有一二十架B—52战略轰炸机刚离开北卡罗来纳空军基地，不远万里飞往泰国。

于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海空军力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加强。在北越攻势开始后的一个月內，东京湾內就集中了6艘美国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关岛的B—52机群增加到了近100架。泰国的乌塔保驻有53架B—52轰炸机和224架战斗轰炸机，岷港驻有113架战斗轰炸机。到4月底，共有1000多架美国军用飞机用于袭击印度支那各地的北越军据点。

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一听说白宫打算加紧使用B—52轰炸机，就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战略轰炸机太昂贵了，叫它不分昼夜连续执行战术任务可受不了。何况飞行员奇缺，而现有的飞行员（有的是第二次、第三次在越南服役）也都很疲劳，根本无法有效地执行任务。基辛格不耐烦地把他们这些担心统统撇在一边。他要用B—52轰炸同时给河内、北京，尤其是莫斯科发信号。此时此刻，他根本不愿意从五角大楼听到什么飞行员疲劳啦，飞机昂贵啦，这类唠叨话。他在忙于指挥一场战争呢。只见他俯身研究战区的大

幅地图，把舰队从太平洋的一端调到另一端，大声向将军们下达命令。在此期间几乎每天都同基辛格打交道的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亨利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信号的人。问题就在于，他一个劲儿向共产党方面发信号，却从来不理睬我们向他发出的任何信号。”

从4月6日开始，美国不顾1968年的约束，出动了战斗轰炸机袭击非军事区以北60哩的地方，对于这种“保护性反应”，美国没有作什么表白，也不强辩。穆勒海军上将当天尖锐地警告河内说，除非共产党方面停止攻势，否则美国的攻击将“逐步向北推进”。这个警告毫无效果。4月7日，西贡西北的禄宁为挺进的北越军所占领，安禄和广治郊区发生了激战。

4月8日，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发电向基辛格告急，说共产党方面显然是想全力搞垮阮文绍政权，这次攻势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美国海空军必须大举出击，才能挡住北越军。基辛格把这个坏消息报告了尼克松，尼克松当即下令出动B—52飞机轰炸北越。用这种巨型轰炸机深入北越后方袭击军事目标，1967年11月以来还是头一次。4月10日，它们轰炸了非军事区以北145哩的港口荣市。这还仅仅是开始。

在此后三天里，总统的高级顾问就B—52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紧急辩论。赫尔姆斯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提供了最新情报。莱尔德对轰炸不大积极，他担心国会里闹起来可能影响军费拨款。罗杰斯也不大积极，他担心战争迅速升级可能影响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穆勒和基辛格两人则大力主张用B—52飞机轰炸北越的首都和主要港口。穆勒的理由是，这样的轰炸很快就会使共产党无力继续在南越进攻。基辛格也认为可以使共产党受到重创，但更重要的是他急于要借此向莫斯科“发信号”，表示美国决心打掉北越的攻势，即使最高级会谈因此垮台也在所不惜。

尼克松听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要经历一番重大决策之前“独处苦思”的过程了。基辛格预感到总统将开放绿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老头子准保已经下定决心，不受人家摆布了。”

到4月15日尼克松决心已下。他批准了出动B—52飞机在周末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计划，计划的代号是“自由门廊”；他要基辛格立即把这项计划落实，目的是要摧毁北越的一部分油库，迫使河内把攻势停下来。基辛格的一位助手解释说：“我们认为这是一项策略决定……既有政治作用也有军事作用，我们要逼得北越人迅速决定，继续这次攻势是否值得，他们是否有使攻势继续下去的手段。”

在轰炸海防港时，有四艘苏联商船被炸伤。莫斯科提出抗议，说这是“侵略行动”，但是抗议中并没有包含明确的警告。中国也提出了抗议。美国发言人尖锐地反驳了这些抗议，指出，只要停止在南越的攻势，轰炸也就会停止。如果攻势继续下去，那么，用一位发言人的话来说，美国“准备轰炸北越的任何地方”。

新的轰炸行动引起了国会和舆论的责难，这是意料中的事。4月17日，《华盛顿邮报》指责说：“约翰逊以及前几任总统在过去一二十年内坚决不干的事，尼克松总统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干出来了。他派美国飞机轰炸河内郊区和海防港，并在北越近海集结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他这个决定把印度支那战争推到了同苏联直接对抗的边缘。”参院外委会的成员在4月17日和18日听取罗杰斯和莱尔德的证词时谴责了这次轰炸。这两位部长没有暴露自

己内心的怀疑，而是娓娓动听地赞同这次轰炸。罗杰斯除表示美国不会重新派去地面部队和不会使用核武器外，不肯排除采取其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不打算宣布哪些事情我们不准备做。”莱尔德则更进了一步警告说，美国可能在北越港口布雷。

基辛格不很在乎报刊上和参议院里提出的批评。他不相信这次轰炸就构成了一种挑衅，足以触发同苏联人的一场重大对抗。他胸有成竹而批评者却一无所知的是：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了。

虽然政府官员直接间接地批评了苏联人在这次进攻中的作用，而且美国人也已对莫斯科的盟国北越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4月间，苏美仍然进行了几桩重要的双边交易。多勃雷宁和基辛格再次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进行了高度机密的交换意见。大约在预定的最高级会谈之前六个星期，基辛格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一份精心考虑过的、旨在促进达成协议的妥协方案。这项方案的核心是，如果苏联人同意在最后的一揽子协议里把潜艇导弹包括进去，那么他答应，美国方面将允许苏联在这类进攻性武器的数量方面保持优势，条件是苏方必须淘汰其基本上已陈旧的SS—7和SS—8陆上远程导弹和一定数目的H级潜艇。

这项妥协方案打动了多勃雷宁。由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可能有助于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也可能缓和由于越南问题而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局势。更何况，基辛格既然能秘密飞往北京为总统访问作安排，有什么理由不能飞达莫斯科作同样的安排呢。

这位苏联大使进行了安排，让勃列日涅夫发出了邀请。基辛格接受了这项邀请，他主要考虑的是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安排最高级会谈。他希望能使勃列日涅夫明白，苏联如果把自己的政策押在共产党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上，那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甘心受一个小国凌辱的；所以，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纠缠下去，就有发生重大对抗的危险，可是双方在那里争夺的东西，同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总统能不顾北越的进攻，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出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那么，也许勃列日涅夫能就越南问题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基辛格还是没有放弃希望，认为他能说服勃列日涅夫限制苏联对北越提供武器。

4月19日，星期三，下午五六点钟，基辛格离开白宫，参加了乔治敦名流的一个酒会。他再次表演了“基辛格还在城里”的拿手好戏，按他每次秘密出访之前，照例总要出头露面一番的。他从酒会出来，就坐上白宫轿车，在夜色中飞速开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一架大型的总统座机。早已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位官员守候在机上了。他们是：他的欧洲问题助理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越南问题专家约翰·内格罗蓬特，两名私人助理彼得·罗德曼和温斯顿·洛德。一位很不寻常的乘客多勃雷宁也在机上。这位苏联大使是去参加基辛格—勃列日涅夫会谈的，他要偷偷离开华盛顿而不被人发现，舍此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在飞行途中没有谈什么。基辛格睡大觉，多勃雷宁看书报。

10小时以后，已是莫斯科的早晨，专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通常为国内航线专用的要人停机坪着陆。外匀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在场迎接基辛格。两人钻进黑色轿车，20分钟之后，开到了列宁山上的一所豪华别墅。这所别墅是莫斯科郊区五六处政府官员的住宅之一，那里住着克里姆林宫的几个首

脑人物。

基辛格在列宁山上的别墅里住了四天，对他来说，那是相当长的了。他这次出使莫斯科不像中国之行，没有什么足以激动人心的，不过是一次事务性的访问而已。这样说，既不是因为他曾在苏联呆过很长时间，也不是说他很了解这个国家。基辛格自己认为，对于苏联，需要了解的他都了解到了。这个已经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坚持极权控制制度的官僚政权，毕竟没有什么新鲜奇特之处。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不同，已经不是革命家了。他们已经没有理想，而成了庸庸碌碌的官僚。他们不过仗着大权在握，才成为重要人物。

第一天晚上，葛罗米柯外长来到基辛格住的别墅，就预定在第二天上午10时开始的与勃列日涅夫会晤的问题交谈了两个小时。接连三天，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在附近的一所专供秘密会谈用的政府别墅里每天至少要举行五小时的会谈。后来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其人“立场具体，目标具体”，“重实干不重哲理”，“办事干脆”，“精力充沛”，要求明确，也懂得如何使之实现。基辛格回忆说，勃列日涅夫粗俗，强横，直性子，但同时也谦和，有礼，甚至热情。

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的会晤说的是为总统访问莫斯科作准备，可是至少有一半时间花在越南问题上。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但就是没法找到打开和平之门的钥匙。勃列日涅夫暗示他对北越人发动进攻的时间感到不快，但是他强调指出，苏联并不能控制河内的行动。

基辛格要求苏联人减少对北越的武器供应，但无结果。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虽然他可能认为北越人的做法愚蠢，鲁莽，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支持他们，因为河内是个“兄弟盟邦”，何况一旁还有个中国呢。

基辛格还提出大国有责任不去鼓励别国对邻国使用武力，但对方仍然置若罔闻。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将继续支援“进步人类”反对“反动势力”。

最后，基辛格说明，总统强烈希望能根据使全体南越人有可能表示政见和选择政权的任何合理建议进行谈判，以便公平而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他甚至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出示了总统的最新停火建议，这项建议还没有向北越人正式提出。勃列日涅夫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可以有所松动。他暗示，北越人在同华盛顿和西贡谈判中态度过于顽固、僵硬。他似乎是在说，他曾建议他们灵活一些。他告诉基辛格，黎德寿很快就要回到巴黎，也很想同基辛格再次秘密会晤。勃列日涅夫不敢担保会打开僵局，但他力促基辛格恢复秘密会谈。

在讨论越南问题的过程中，双方都没有叫嚷，没有恫吓。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谈出什么名堂。基辛格反复强调一个严峻的信息，说美国决不甘心在南越遭到军事失败，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阻止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两人都明白，如果美国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势将造成苏美对抗，危及最高级会谈。

虽然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却比较有收获。基辛格解释了他早先在华盛顿交给多勃雷宁的总统的妥协方案。他感到高兴的是，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就接受了这个方案。从此以后，任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揽子方案都包括潜艇导弹了。这是朝着达成协议迈进了一大步。还有五六个问题悬着，但也顿时觉得不难解决了。基辛格可以看到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清晰轮廓了，其中

既包括进攻性武器，也包括防御性武器。

除了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之外，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还广泛地讨论了从柏林到贸易等其他问题。他们都决心要为最高级会谈的成功奠定基础，以便在最高级会谈中能签署几个具体协定。

每次正式会谈后，基辛格和他的班子总要给白宫编写报告，通过停在伏努科沃机场的那架警卫森严的飞机，用无线电拍发回去。有一天，基辛格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出了毛病，手下的人问是否可借用总统的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飞机上的设备，这位将军当时正在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作技术准备。基辛格说，不行，不能让斯考克罗夫特知道他在莫斯科。又问，那么使用大使馆的通讯设备行不行呢？基辛格还是说，不行，对雅各布·比姆大使也要保密。最后，经过基辛格专机上人员折腾了一天，总算把机器修好，同白宫恢复了通讯联系。

这次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了家。除少数苏联官员和基辛格自己手下的人以外，莫斯科谁也不知道基辛格到了苏联首都。一直到基辛格要离开的那天才告诉了比姆。这期间没有宴会，没有泄漏新闻，晚上也不去大剧院看演出，倒是找来几部大剧院的纪录片放给基辛格看，可是片子冗长沉闷得要死。基辛格一行在迎宾馆得到了几小时的娱乐休息。这座迎宾馆在列宁山上，专供政治局委员及他们的妻子、朋友享用，有宴会厅和体育馆。内格罗蓬特在一个奥林匹克标准大小的游泳池里游了几圈。索南费尔特和洛德同一个俄国职业球员打网球，他们老是嫌球拍的质量不好。基辛格呢，这位发信号的老手决定同莫斯科的特工头子打乒乓球，俄国人对乒乓外交是深有体会的。

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天，基辛格同葛罗米柯专为准备最高级会谈一起工作了六个小时。关于卫生研究、环境问题、空间合作以及“海上事故”等协议的最后细节问题都得解决。还要安排记者采访、官员居住的旅游房间，以及为尼克松夫人安排周到的参观日程，等等。基辛格返国之前，葛罗米柯陪同他巡视了一下总统和随行人员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下榻处，基辛格认为布置得十分考究。

4月24日，星期一，中午过后，基辛格离开莫斯科。第二天白宫宣布他去过苏联首都四天。记者们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保密。齐格勒答称：“我们目前正处于国际关系中非常微妙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在有机会探讨彼此的看法以前，应当尽可能避免外界事前进行猜测和议论。”他提醒记者，1971年初以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一直在交换意见。“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双方觉得更直接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基辛格再次表演遁身术的消息，赢得了新闻界又一次喝采叫好。赖斯顿写道：“他扮演这样一个微妙而惊险的角色的技巧，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奇迹。”基辛格却显得若无其事地说：“只要有鱼子酱，叫我干什么都行。”

基辛格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开始帮助尼克松润色他行将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稿。4月26日，总统一上来就宣布，7月1日以前将再从南越撤出2万美军，留下的只有4.9万人了。其次，他宣布，3月23日以来一直中断的巴黎例行和谈将于次日上午恢复，并称：“我们坚决希望，和谈恢复之后，将通过一切可供利用的渠道进行有成果的会谈，并取得迅速进展。”最后，他宣布，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将继续袭击北越，直到北越停止进攻。

在总统发表讲话之前，基辛格向新闻记者作过两次情况介绍。同尼克松

一样，他看来异常悲观。他承认，昆嵩，甚至波来古，都可能失陷。他说，“我们并未同意限制”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我们坚持要恢复 1968 年的谅解”；“越过非军事区的共产党军队必须撤回”。但是，基辛格的本事就在于他对记者谈话时，既能忠实反映总统的情绪，又能唱出不同的调子。那天晚上，他的主题是“谈判”，而不是总统口声声讲的“入侵”，基辛格称这次进攻为“六星期的抽风”。在基辛格看来，这阵“抽风”关系到“战争的结局”。他强调指出，战争正处于“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关头”。他发现河内的行动有一种谈谈打打的规律，并指出，黎德寿正在回到巴黎。基辛格告诫大家说：“这并不等于说他是带着可以接受的方案来的”；但这的确说明，这次攻势“既是一个军事行动，也是一个政治行动”。基辛格期待着在巴黎马上开始新一轮秘密会谈。他解释说：“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他们是同意那个把越南政府（西贡）看作是合法的政治结构的解决方案呢，还是执意要摧毁它而另建一个共产党政府？”

此后的一星期，南越来的消息继续使人感到不安。基辛格每天上午同总统碰头，研究关于北越不断进攻的报告，有些进攻大有把南越分割为两半之势。南越军有些部队打得不错，但是也有些部队伤亡惨重。基辛格埋怨莱尔德对越南化计划“吹得过头了”。艾布拉姆斯不断给白宫来电，说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支援是“必不可少的”，暗示如果没有这些支援，南越部队就要溃不成军，阮文绍就要完蛋。新闻报道强烈地表明，白宫又一次对河内打持久战的能力作了极端错误的判断。北越并非如基辛格所设想的那样“已成强弩之末”，它新近配备的装甲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过来，攻占小城，威胁大城市。南越军队开小差人数剧增，西贡在加紧镇压。一种大势不好的预感开始渗入美国的政府机构。即使是很少人知道的关于基辛格已经安排的 5 月 2 日与黎德寿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也不能驱散笼罩着白宫的阴沉气氛。

5 月 1 日，在尼克松露骨地威胁要轰炸北越堤坝的消息轰动世界的同时，当红军的坦克在传统的五一节阅兵中隆隆开过莫斯科红场之日，也正是另一些苏联坦克攻入南越最北那个省的省会广治市之时。南越军在北越猛烈炮火轰击下溃散了，沿一号公路向南逃往相距只有 24 哩的顺化。对西贡来说，真是兵败如山倒，狼狈不堪。南越士兵只顾四散逃命，丢下坦克、枪枝、装甲车和大炮，让北越军捞了一大笔外快。河内军队开入广治时，最后一批美国顾问正在乘直升飞机撤离这座弃守的城市。河内军队在城堡上升起一杆红旗，宣告大捷。广治的失陷，对西贡来说，对美国政府越南化计划的信心来说，都是当头一棒。驻华盛顿的一些东欧外交官担心，总统可能会觉得，越南把他害得太苦了，西贡太不中用，使他太丢脸了，因而可能下令采取诸如轰炸堤坝之类的剧烈行动来出气，并借此恫吓河内、莫斯科考虑改弦易辙。

从广治传来的消息，给基辛格 5 月 2 日与黎德寿的秘密会晤（同往常一样在巴黎郊区举行）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基辛格带着尼克松的新建议来到巴黎，他认为这项建议可以作为迅速解决战争的基础。如果北越人同意停火和遣返美国战俘，只要满足这两项，美国就同意在四个月内撤离印度支那。

基辛格认为，这项建议是如此简单明了，黎德寿准会接受的，只要他理解到那基辛格只能暗示不便言传的意思：北越的攻势已迫使尼克松把他的条件削减到最低限度，现在只剩下归还战俘和给一段体面的期间来撤军这两条了。这无异于表示，尼克松如此急于要从越南脱身，他对河内的全部要求，就是给他发一张离境证。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还得要来一番大叫大嚷、狂

轰滥炸，但这无非是为了掩护撤退而已。尼克松希望撤退，如果可能的话，在大选到来之前就撤。基辛格觉得，从北越立场来看，这项建议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何况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早就向他保证过，河内是会灵活行事的。

然而，基辛格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黎德寿轻蔑地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基辛格追忆那次三小时会议，说那是他同北越人进行长期谈判中最糟的一次，黎德寿一味地“强硬”，“粗暴”，“寸步不让”。

这次会晤是一大失败。基辛格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华盛顿。他十分担心，他谈判失败的消息加上西贡在战场上的失利，将会迫使总统采取突然行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可能因此告吹。

基辛格的担心是相当有根据的。当他5月2日晚回到白宫的时候，总统捎信邀他同游波托马克河。难道又要看一遍《巴顿将军》那部片子吗？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讨论了白天同黎德寿的倒霉会谈、来自南越的令人丧气的报告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前景，足足讨论了三个小时。尼克松看来对苏联人特别恼火。勃列日涅夫曾使他相信基辛格—黎德寿会晤会有成果，但结果却弄得一塌糊涂。难道是勃列日涅夫有意拿他开心？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了什么？基辛格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尼克松这时就提出有必要采取激烈行动，以迫使苏联人为他们继续支持战争付出高昂的代价。

两人研究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军事行动。轰炸堤坝如何？这倒是最新的一招，但尼克松不同意。派南越海军陆战队在北越登陆，行吗？这是切断共产党通向南方供应线的仁川式的登陆，尼克松也不赞成。他对南越的军事能力没有信心，而且他担心这很容易使中国产生误解，以为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有了根本改变。重新开进美国的地面部队呢？不行。使用核武器？也不行。总统的选择缩小到两条：一是撒开手来轰炸；二是破题儿第一遭，在北越港口布雷。布雷就等于公开干预进出海防港的国际航运，这是对苏联的正面挑战。

那天晚上总统没有决定，但是基辛格已经看出总统的意向了。他不禁对此大感不安。

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基辛格不断同尼克松讨论布雷问题。当年约翰逊没有同意布雷；1970年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这个主张时，尼克松也曾反对过。而今，总统的态度改变了，他觉得，布雷这一招的军事意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北越人每天需要赶运汽油去南方战场供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之用，这在越南战争中还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切断或减少从港口附近的油库向外运送汽油，可以严重挫伤他们的攻势，即使不是马上，也会很快造成这种结果。同时，布雷这主意政治上现在可行行了，这在这场战争中也是第一次。尼克松认为，他可以对北越采取这种剧烈行动，而不致引起苏联和中国的强烈反击。随着这两大共产党盟国逐步同美国改善关系，河内正日益同他们疏远。尼克松认为下赌注的机会到了，美国现在大可以封锁北越的港口而不致破坏自己同中、苏两国的关系。

至于基辛格，他对布雷本身没有什么疑虑，倒是担心布雷可能对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个最高级会谈对他的大国全球均势构想是最重要不过的。一天上午，基辛格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暗示说，他反对布雷，而且准备告诉尼克松，布雷可能危及最高级会谈，这使他的同事们吃了一惊。他是否真的把他的顾虑告诉了总统，谁也不知道。在华盛顿，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一项政策，对同事说说是一码事，向总统进言又是另一码

事，完全不一样。那星期，在另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基辛格重复了他的看法说，对北越港口布雷极有可能会造成最高级会谈延期。他对一个老朋友说，他担心越南问题仍然有可能打乱美国在外交上重要问题的缓急次序。

当然，正如基辛格的一位亲信所说的那样，基辛格也可能“是担心自由派对他印象不佳，担心人家把他同强硬路线连在一起，把他叫做尼克松政府的沃尔特·罗斯托”。正因为如此，他才故意散布说他对布雷有“无穷的疑虑”。一遇危机，基辛格总是向熟识的专栏作家暗示，他其实是反对总统某些强硬决策的，他之所以经过极其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仍然留在白宫，完全是为了抵销戈德华特保守派的影响云云。

他仍然是白宫同自由派和知识界进行联系的使节。他乐此不疲，胜任，愉快。在美国逐渐从印度支那撤退的时刻，基辛格认为当务之急就在于撮合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右两翼重新言归于好。他经常把自己看作是这两个互不来往的对立营垒之间的桥梁，往往是唯一的桥梁。

虽然尼克松在作出布雷决定之前那几天非常倚重基辛格的意见，但看来他仍然感到万分孤寂。他需要另一种支持者，能够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同情他的支持者。1972年5月间的基辛格不能满足他这个需要，但是基辛格的一位最不喜欢的同事却能够。原来那素来在国际金融界横冲直撞惯了的约翰·康纳利，竟突然被尼克松聘为心腹顾问，尽管在基辛格眼中，康纳利的国际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基辛格认为康纳利的政客手腕值得佩服，但绝非政治家。试想总统在作出关键性的决策时竟然倚重此公的意见，未免荒唐。当传说康纳利可能替代罗杰斯国务卿时，基辛格大为震惊。他对一些朋友表示，如果康纳利当了国务卿，他就走。几个月之后，他否认康纳利同他本人的关系有过什么“紧张”，但没有人认真看待他这番否认。

5月5日，星期五，尼克松同基辛格、罗杰斯、莱尔德、穆勒、赫尔姆斯和康纳利等全体主要顾问在一起开会，强烈倾向下令在北越港口布雷，但是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他征求到会的人的意见。大家一致支持搞封锁，虽然表现的热情程度各异。大部分人同意总统的说法，认为是苏联帮助北越策划了这次攻势来出总统的丑，使他在高级会谈时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点上基辛格却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固然苏联供应了这次攻势所用的武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鼓励这次攻势，也不同意发动攻的时机。大家虽然对布雷的热情不高，却也想不出什么既可打痛河内又能帮助西贡的高见。基辛格主张不如用B—52飞机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尼克松同意加强轰炸，但不是代替布雷，而是补布雷之不足。在另一个问题上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认为总统去莫斯科进行最高级会谈恐怕非延期不可了。有几个人（不包括基辛格）主张总统不如主动宣布推迟此行算了，理由是，当南越盟国的军事地位日趋瓦解之际，总统到莫斯科去是不明智的。于是吩咐一位演说撰稿人按这个意思起草一份讲话稿。讲话稿写出来了，但没有用。尼克松决定要看一看苏联人怎么办。

星期五傍晚，总统带着几本黄纸本前往戴维营，整个周末他都在那里起草他的讲话稿，这篇讲话后来成了他那年进行的一场最大的赌博。他决定在北越所有的港口布雷。他将对所有船只发出警告，但并不制止它们行动。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总下令海军勒令一切开往古巴的形迹可疑的苏联船只停航并登船检查。尼克松想避免同苏联演成超级大国对

抗，但是他决心要叫苏联为其继续支持这场战争的做法付出代价。他划清了两种做法的界限：一种是封锁北越，这就非造成对抗不可；一种是仅仅在北越港口布雷，好处是让苏联人自己考虑要不要对抗。他知道，不论采取哪种做法，都是对莫斯科的挑战，这在国际外交斗争中都是高度冒险之举。

星期日傍晚，尼克松回到白宫，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基辛格，要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行动起来。穆勒告诉基辛格，一切就绪。当天晚上，总统要基辛格提供南越战场的最新情报。基辛格汇报，北越军已完成部署，准备从三条战线出击：北面的顺化、中部高原的昆嵩和通向西贡的安禄。他还说，北越军进入阵地已两天多了，但是还没有出击。事实上，顺化以西和以北的几支北越部队甚至还后撤了几哩。两人最后认为，北越军是在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攻击。尼克松指示基辛格，5月8日星期一上午9点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了三小时的会。尼克松决定在北越所有港口布雷和轰炸连接中国的铁路线，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可说没有进行什么争论。据齐格勒说，尼克松表现出一副“横了心”，“干到底”的神气。他不要大家提意见或另出主张。基辛格尽管先前有保留意见，这时也不再说什么了。

基辛格后来对我们承认：“如果早先有人预言，到了5月8日我们就得这样做，我是不会相信的。”布雷乃是“最最不得已的一手”。

会后，基辛格和康纳利回到各自的办公室，这时尼克松又要他们两个马上去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就那项决策同这两位顾问又商量的10分钟，看来需要人家最后给他打打气。基辛格和康纳利都给他打了气，但康纳利的劲头比基辛格更足一些。

下午两点，尼克松打电话叫基辛格下达“行动命令”。他说，叫参谋长联席会议动手吧。

夜幕初降时，尼克松把他那个17分钟的讲话稿完成后，召集内阁开了一次短会。大家鼓掌欢迎他到会。他概括地谈了一谈形势和他的决定。大家在他走时又鼓了掌。会上没有人提出任何意见，好像这个内阁是一帮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人，只求得邀宠信，对于领导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听命不误。

晚上8点，尼克松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他一上来就说：“让我开门见山，把我不得已作出的决定告诉你们。”于是他把讲话稿的内容概括地谈了谈，列举了他不同意采取的几种行动，并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有必要在北越港口布雷。他要求他们给他支持。结果没有反应，正面的反面的都没有。

在尼克松同国会领袖们会面的同时，基辛格正在办公室里会晤多勃雷宁。他给这位苏联大使一份总统讲话稿，并强调指出，美国不想同苏联对抗，总统仍然希望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没有按惯例在总统发表讲话前召集记者介绍情况。

总统在晚上9点发表讲话。他指责北越入侵南越。他说，北越“之所以有可能”发动这次入侵，“是由于苏联向河内提供了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先进的进攻性武器”；这次入侵“增加了”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的“危险”，同时使仍在南越的“6万美军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他虽然声称南越人一直在“英勇作战，以击退这次野蛮的进攻”，但他这次明显地避而不谈对南越军、对越南化或对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判断的信心，这同仅仅12天前大不一样。

尼克松列举了三种对策。一是立即撤出全部美军，可是他说这会危害全世界的和平。他反对这一条。二是继续设法谈判出一种体面的妥协。他同意这样做，但有一个条件。他说：“要制止这种屠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使北越那班国际歹徒得不到战争武器。”尼克松于是就提出了第三种方针，这是他感到不得不采取的方针：美国对北越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他列举出他已下令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进入北越各港口的所有航道都将布雷，以阻止船只开进这些港口，并防止北越海军从这些港口进行军事活动。”

二、“美军已奉命在北越内河和它所宣布的领海水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制止运送补给品。”

三、“将最大限度地切断北越铁路和其他一切交通线。”

四、“继续对北越军事目标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

尼克松接着公开了他最新的和平方案，也就是黎德寿5月2日拒绝了的那个方案。由于尼克松所宣布的军事行动非常耸人听闻，因而大多数观察家反而忽视了他这次大大降低了在越南的政治要求的意义。

尼克松在讲话的结尾专门对苏联说了一段话。他说：“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只帮助自己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入邻国。否则，和平事业——我们双方在这一事业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将受到严重危害。”

“我们两国在近几个月的双边谈判中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在限制核武器和贸易等许多问题上已接近达成重要协议。让我们不要走回头路而滑到前一个时代的阴影里去吧……我们正处于一种新关系的开端……我们准备继续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一点，那么责任在于你们方面。”

白宫的电话总机顿时忙起来了，据齐格勒次日早上说，“达到了我从未见过的程度”。白宫源源不断地收到了至少2.2万封电报，支持尼克松决定的同反对的相比是五或六对一。当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电报有许多是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发来的。

显然，尼克松为了赢得从越南的“体面”撤退是准备不惜牺牲他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几个月后，他还津津乐道他5月8日那个决定的重大历史意义。他对一批战俘的家属说，那是“我出任美国总统以来最难下决心的一项决定”。他解释说，美国当时“面临失败，我必须选择，要么承认失败而乞怜于莫斯科，要么采取行动而力求化险为夷。我采取了行动”。

5月9日，星期二，是令人忐忑不安的一天。在华盛顿，谁也不知道共产党对尼克松的决定会作出什么反应。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以乌克兰党魁、粗暴的彼奥特·谢列斯特为首的强硬派力主苏联政府取消最高级会谈并反击美国的封锁。勃列日涅夫反对摊牌。可是苏联官方对布雷一事没有公开发表评论。那天晚上，塔斯社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说，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已离开莫斯科前往大马士革进行预定的访问。华盛顿的专家们认为，如果格列奇科估计将要发生一场重大的军事危机，是不会出访的。

中国的高级领导也进行了讨论，后来官方发表了一个抗议。中国政府表示说：“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在河内，随着全国和港口被美国布设了高效能的水雷，发出了一阵愤怒的抗议，同时准备对付扩大轰炸。

西贡是一片欢腾。

华盛顿则各种反应都有。鸽派，特别是乔治·麦戈文参议员，谴责总统这个决定；就是鹰派也并不全都赞成。国会走廊里吵吵嚷嚷，纷纷议论起总统的政治前途。

国务院里一批苏联问题专家聚在一起研究克里姆林宫可能作出的反应。他们的结论是，苏联人不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从来不把国务院放在眼里，所以对这条意见也就不加理睬。

在白宫，基辛格的几名亲信放下了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准备材料的工作。他们估计没有继续作这种准备的必要了。

上午 11 点 20 分，基辛格勉强装着笑容，出现在东厅的小讲台后面，向记者解释总统的决定。尽管有些记者认为“亨利言不由衷”，可是他还是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

基辛格在开场白里说，他“用不着强调，这是一项非常沉痛、十分为难的决定”；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只是因为我们认为舍此别无其他体面的办法”。他接着回顾了谈判陷入僵局的过程，从总统 1972 年 1 月 26 日透露的基辛格 1971 年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谈讲起，最后讲到这个判断：尽管勃列日涅夫 4 月里曾私下保证北越准备“认真交换意见”，但他同黎德寿 5 月 2 日的会晤仍然毫无结果，而陷于全面的僵局。他说，北越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决心要把他们的统治强加给南越，并强迫美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基辛格解释说，这种全面僵局就是总统决定在北越港口布雷和轰炸连接中国的铁路枢纽的一个原因。至于那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由于北越的进攻打乱了政府的越南化战略，必须予以反击——他却一笔带过，没有多谈。这当中他公开承认美国关于入侵的情报有错误。他说：“也许我们……低估了从外边（尤其苏联）大量运进进攻性武器这个情况……这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北越。”但是基辛格为总统的决定作这番表白的主要意图，是想尽可能保住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使用的巧妙手法是，极力渲染苏美合作的好处，使苏联人能撂下越南，放眼看看大好的新时代的前景。他说，大国应该能够“为国际行为制定出些准则”，使它们得以妥善处理在出事的非主要地区出现的对抗。他根据总统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指出，美苏两国正处于一种“新关系”的开端，必须打破谈完一项再谈一项的常规，尽可能让两国越来越多的官员同心协力，对一个和平的世界共同承担义务。这样，一旦发生危机，基辛格希望“因为有许多的人致力于各项建设性的工作，就可以施加影响，约束事态发展”。

虽然基辛格希望目前已达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否已经达到，他可不敢肯定。他在对记者谈话时，不肯作任何预言，而是谨慎地说：“我当然没法预言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那天傍晚，他对一位专栏作家说：“你知道，我在苏联问题上的功夫比在中国问题上多 50 倍。我不希望最高级会谈流产。”

5 月 10 日，星期三，基辛格为苏联人指出了一条出路，最高级会谈的前景这才开始有所好转。他打电话给多勃雷宁，邀请帕托利切夫第二天到白宫来与总统一叙。他说，莫里斯·斯坦斯作为商务部长去莫斯科的时候，不是受到过柯西金的接见吗？最近勃列日涅夫还接见了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嘛。基辛格解释说，总统觉得同苏联外贸部长来一次“礼节性会见”挺合适。多勃雷宁认为这意见好，但他先不讲定，说要问问帕托利切夫再给回话。

星期三一整天，帕托利切夫和卡萨托诺夫继续进行他们的谈判，好像根

本没有发生危机似的。傍晚，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落实了帕托利切夫同总统见面的事。多勃雷宁问：“是明天上午9点吗？”基辛格说：“9点。”压力顿时为之一松。基辛格告诉尼克松，他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赌博，“看来要赢了”。

5月11日，星期四，帕托利切夫和多勃雷宁比约定时间略早来到白宫。基辛格、彼得森和总统国际贸易问题顾问彼得·弗拉尼根迎接了苏联客人，随即一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见总统。基辛格问多勃雷宁可不可以“公开宣传”这次会见。多勃雷宁说他不反对，于是把驻白宫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请了进来，会见的气氛同平常一样亲切。尼克松同帕托利切夫闲扯了一阵语言问题。总统是只会讲英语的，他说他觉得俄语比波兰语容易，并且当场表演，用苏联说了一声“德罗日巴（“友谊”）；而当他试用波兰语来说时，就说不好了。过了几分钟，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被请出了椭圆形办公室，这时众位外交家就对促进苏美贸易的前景问题讨论了大约一个小时，其间谁也不提海防，谁也不提最高级会谈。

帕托利切夫回到苏联大使馆，就有一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社的电视记者问他，总统预定的莫斯科之行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通过译员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难道你怀疑吗？”

帕托利切夫这句话成了一条重要的新闻快报，正巧这时也收到了莫斯科对总统讲话的官方反应。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中，指责尼克松决定在北越港口布雷一事是对苏联船只航行的“不能容许”的威胁，“粗暴地违反了公认的航行自由原则”。苏联人“要求”“立即”解除“封锁”；但是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也没有取消最高级会谈。看来，他们是在回避总统的挑战。一个苏联官员解释说：“尼克松在玩扑克赌博，我们无意奉陪。”事实上，在塔斯社发布这项声明的同时，莫斯科的外交部官员正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会晤，继续为最高级会谈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

基辛格知道总统的赌博得手了。勃列日涅夫设法压住了他那边的鹰派，决定继续同美国搞缓和。他需要在他那多事的东欧后院保持安定；他需要获得西方技术来改造苏联落后的经济，使之现代化；他需要同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来抵消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的影响。总之，他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因此对布雷一事只好忍气吞声，且为欢迎尼克松作准备。

基辛格一看莫斯科的反应已经明朗化，总统的布雷和会谈二者可以兼得了，于他的调子马上就起变化。他又开口闭口“我们”如何如何了。他的乐观主义和自信心恢复了。最高级会谈一旦保住，基辛格的注意力便转到布雷和轰炸对河内可能产生的影响上面。他开始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美国军事行动对打击河内继续作战能力的乐观估计。穆勒曾告诉基辛格，布雷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使河内无法在南方继续进行大规模战争。莱尔德对基辛格竟然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颇感愕然。他听到基辛格把布雷说成是“我们置敌人于死地的一击”，并宣称在7月1日以前北越就会遭到严重挫败时，便怒气冲冲质问基辛格：“妈的，你干吗那样拚命吹嘘布雷？7月1号又有什么大不了？到时候仗还是要打下去的。布雷的效果，要有，也得等到秋后啰。”基辛格对莱尔德的劝诫置之不理，却只爱听穆勒的乐观估计。莱尔德后来解释说：“亨利总是欣赏军方的汇报，往往相信那一套，如果说的投合他的战略，那就更甭提了。”

基辛格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也是听信穆勒的，而穆勒这次却好歹说中了。原来在宣布布雷之前，北越的军队和坦克已经摆开阵势即将大举进攻顺化。但是后来他们没有动手。现在，最高级会谈的事情已不再令人担惊受怕，基辛格也就同意了穆勒关于北越方面为何不动手的解释。穆勒说，北越人是被迫放弃原定攻打顺化的计划的，原因是美国的轰炸和布雷把他们整苦了，他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

河内攻势的中断可是至关重要的事。这一来，西贡赢得了时间整编残部，华盛顿赢得了时间调整同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步调，而北越人则从此没有能重振他们的凌厉攻势。几个月后，北越领导人在苏联再次施加压力要他们同美国人妥协的情况下又召集了紧急会议。河内险些破坏了总统的三角战略，但它在大可坚持下去的时刻却停了下来，于是失去了这不可再得的机会。

基辛格经历了5月8日这场危机，不禁对尼克松搞卡脖子外交的本领加深了敬佩之意。

第九章

和平之路

6月15日，波德戈尔内主席飞到河内。北越人尽管因苏联热情接待了尼克松而颇有被出卖之感，但是由于它的军火主要还得依靠莫斯科，因此还是耐心听取了波德戈尔内带来的意见。波德戈尔内说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提出，现在是改变策略同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了。他认为，这样做不会有多大风险。因为尼克松在撤军问题上看来毕竟是认真的，况且，美国采取了新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军队撤出南方了。他大概还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说共产党迟早将在南方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波德戈尔内让河内的政治局考虑他的忠告，自己飞回莫斯科了。他回到莫斯科时表示，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使越南战争降级”，并说巴黎会谈即将恢复，苏联将促其成功。此话出自苏联人之口，倒是新鲜事，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公开拿自己的威望来担保重开谈判。由此足见苏联已经断定，同华盛顿在贸易、贷款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方面打交道的好处很大，有必要在解决越南战争上帮尼克松一把。

就在波德戈尔内对河内进行游说的同一天，基辛格也正在白宫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国会领导人，争取他们支持同苏联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甚至在总统还没有从莫斯科回国之前，就有人埋怨开了，说协议有漏洞，让苏联占了重要的战略优势。基辛格和总统花了整整三个小时讲述就控制核武器而达成的这些协议。基辛格讲得尤其令人信服。甚至连当时意见最大的富布赖特参议员也说，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让全国都有机会听听基辛格的阐述。一时间，欢呼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推行的缓和及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政策和声浪，压倒了国会内对其越南政策的批评。尼、基两人都希望，由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缘故，全国是会支持政府所采取的按照它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的倡议的。

几天之后，基辛格突然又在6月19日在北京出现（这是他不到一年中的第四次访问），大力推行美国的三角外交。他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接待，访问了五天。

由于基辛格外交上一环扣一环的部署，再加上美国施加了军事压力，导致河内在6月底召集了一次研究战略的特别会议。所有北越的高级外交官，包括春水在内，都应召回国了。基辛格估计，在河内重新估量了形势之后，黎德寿很快就会带着新的指示回巴黎来进行谈判。他希望河内的立场会有重大变化，从而打破僵局，谈判成功，结束战争。

“亨利上哪儿去了？”

7月18日（星期二）那天，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总统在圣克利门蒂的一班人马，在加利福尼亚的艳阳天气中消磨了18天之后，刚刚结束休假。他们集合在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机场，准备乘坐“76年精神号”飞回华盛顿。在这批通常陪同尼克松的人员中，却不见基辛格。隔着飞机跑道，记者可以看到有总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科尔森和齐格勒，唯独缺了基辛格。在从西到东4小时又40分钟横越全国的飞行途中，记者团纷纷就基辛格最新的这次遁身进行揣测。最后都认为他准是又溜到巴黎去同黎德寿进行秘密会晤了。

记者一再就此提问，齐格勒回答说：“我只能告诉诸位，他星期一就带着孩子飞回华盛顿了。至于亨利·基辛格现在在哪里，本人无可奉告。完了。”基辛格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戴维，曾跟父亲一起在圣克利门蒂呆了一会，这是事实。但那是星期一。星期二呢？

第二天早上，各家报纸也都纷纷推测基辛格去巴黎了。随着战争又由春而夏，萧条的股票市场一直在窥探谈判有无进展的迹象，这回开始回升了。分析家们很快就称之为“基辛格股市”。

有位记者一回到华盛顿，就打电话到基辛格的办公室查问。

“他在吗？”这位记者投石问路。

“不在”，基辛格的一位训练有素的秘书回答，“不过，等基辛格博士一到，我就告诉他你来过电话了。”

记者又探问道：“今天晚上会来吗？”

“也许。”

然而，基辛格没有来。那天晚上他飞往巴黎了。

第二天上午10点，白宫和河内外交部同时宣布，基辛格和黎德寿正在法国首都附近进行会晤。这两个对手第一次去掉了笼罩着这种会晤的秘密气氛。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会心地微笑，其实他们啥也不知道。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三小时内上涨了18点，成交额很大。这天下午，白宫还发布消息说，基辛格—黎德寿会谈持续了六个半小时。晚上的电视新闻中又作了详细报道。这一来，渴望结束这场战争的全国脉搏跳动得更快了。

基辛格当夜赶回华盛顿。这一次事先宣布了他到达的时间，因此一大群记者早已在场迎候。但是他只向记者们挥了挥手，一言不发，径直前往白宫去了。他对总统说，虽然看不出河内立场有任何具体变化，但从对方谈话的调子已经可以感到有所松动，同5月2日在海防港布雷和总统莫斯科之行前夕举行的那次会谈的敌对态度相比，那种气氛肯定是没有了。基辛格认为，北越人的立场可能很快会有重大变化。

基辛格和黎德寿在8月1日、14日又进行了两次会晤——不到一个月，双方三次会晤。接触之频繁，异乎寻常。基辛格觉得河内态度有新变化的印象，在8月的两次会晤中得到了证实。看来河内战略会议之后，北越人对阮文绍政权的态度缓和了。他们早先一直坚持阮文绍必须下台，才能考虑停火的问题。现在他们突然讲起南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和“三种政治力量”的“现实”来了。

这几句话可是非同小可。承认在南方存在不止一个政治组织（即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点；似乎就是默认西贡政权可以同临时革命政府并存。而“三种政治力量”的提法，指的是有可能成立一个由临时革命政府、阮文绍政权和尚待明确的“中间”力量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河内现在表现了一定的让步姿态。但是，基辛格一时还猜不透这种变化的力量。黎德寿仍然把大部分时间（据基辛格后来说是“发言的80%的时间”）用来谴责“阮文绍及其一伙”。

这时，河内指控美国轰炸了北越极易受到破坏的堤坝系统，造成人口稠密的红河三角洲泛滥成灾。美国一再否认堤坝是它有意选择的轰炸目标，尽管政府发言人承认，在轰炸堤坝附近的军事目标时，“无意之中”可能造成了一些破坏。这场争论使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有一次尼克松气势汹汹地说，那些批评战争的人是被北越的宣传“欺骗了”。他在一次临时举行的记者招

待会上说：“如果轰炸堤坝是美国的政策，那么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把它全部或大部摧毁。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干……因为我们是要尽量避免而不是造成平民的伤亡。”看来，他决心不让这些对美国轰炸堤坝的指责愈演愈烈，以致在未来政局敏感的几个月里形成严重问题。

在总统竞选进入紧张阶段之际，基辛格的去去来来，使人越发对越南问题的解决产生希望。齐格勒的谈话又故意让人觉得突破在即，至少使人觉得这种努力事关重大，每一个美国选民理应予以支持。齐格勒不时透露一点基辛格的行踪，好像基辛格每次出行都会把世界朝总统的“一代人的和平”的目标推进一步似的。齐格勒在白宫向记者发表谈话时，一再使用“敏感”、“微妙”、“谨慎”之类的字眼，而且在结束的时候，又总是用这样或那样不同的说法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不希望大家瞎猜。”但结果，不用说总是引起相反的效果。

人们越是渴望和平，就越是需要基辛格，大家到处围着他转。他在8月14日在巴黎同黎德寿会谈之后，第二天飞往瑞士的休养小镇拉克斯—菲尔莫斯，同家人一起欢庆他父母结婚50周年。几十个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跟在他屁股后面。他们纠缠着他打听消息，但他守口如瓶，这就更加使人觉得其中大有文章。他回答说：“真的不行，会谈情况实在一点也讲不得。”

“那么，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会谈有没有进展？”

他微笑着说：“真的不行，我不能讲。”停了一会儿，他好像对他们吐露真情似地添了一句：“这你们都明白的嘛！”摄影机把这种情景一一摄入了镜头。

家庭聚会之后，他登上瑞士政府的一架直升飞机，从拉克斯—菲尔莫斯飞往苏黎世。在那里，他向记者们挥了挥手，就换乘总统的喷气座机前往西贡了。白宫宣布说：“总统请亨利·基辛格前往南越，就越南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全面会商，包括巴黎会谈在内。”

从苏黎世前往西贡的长途飞行中，只见基辛格埋头看一本书，这可不是什么有关谈判的大部头参考材料，而是一本新写的梅特涅传。《华盛顿邮报》写道：“现代的梅特涅，不读这本书又读什么呢？”

8月16日，即基辛格到达西贡的当天，黎德寿也突然离开巴黎回河内，途中在莫斯科和北京作了停留。

西贡的阮文绍总统对他的强大盟邦美国是有疑虑的。当基辛格抵达南越首都时，沿自由路（法国统治时期的卡蒂纳大街）两旁的咖啡馆里议论纷纷，说是美国和北越已经达成妥协，将迫使南越的反共头目同共产党搞联合。

次日上午，基辛格到独立宫会见了阮文绍。阮文绍是西贡政坛一怪，当地的人说他能同时朝着四个方向走路。陪同基辛格的有他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邦克大使在南越已五年多了，由于他在外交上态度冷漠，当地人给他取了个“冰箱先生”的绰号。陪同阮文绍的是两位心腹顾问阮富德和黄德雅。原先只安排举行一次会谈，后来双方同意第二天再谈一次，以便进一步详细探讨几天前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讨论过的“两个政府、两支军队”的概念。基辛格对尾随着他从独立宫出来沿林荫大道一直到美国大使馆的记者们说：“我实在不能讲什么。你们干吗老是问个不休呢？”记者还是一个劲儿提问，基辛格还是笑而不答。

8月18日的第二次会晤持续了四个小时，仍然不见透露具体内容。西贡的权势集团越发不安起来了。一位南越参议员得出结论认为：“基辛格到这

里来，一定是心里有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包括搞掉阮文绍。”驻越美军司令部里也啧有烦言。独立宫里则充满被人出卖的恐惧。对于那些同阮文绍共命运的南越人来说，基辛格象征着出卖。虽然阮文绍信不过基辛格，基辛格对阮文绍也不完全放心，可是据基辛格的一位部下说，基辛格对这位南越领导人倒是有好评的，说他“能够在盟邦立场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力保本国利益”。在会谈中，基辛格竭力向阮文绍解释美国外交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受到的压力，同时也再次向他保证，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是不坚定不移的。

当晚，基辛格离开西贡前往戴维营。他在东京作了停留，同日本新首相田中角荣商讨了他即将访美的事。这时离共和党在迈阿密海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已没有多少时间了，尼克松希望清理一下外交问题，以便专心致力于总统竞选活动。基辛格一回来，便立即向总统汇报了他同黎德寿和阮文绍分别会谈的情况，并表示大选前极有可能出现突破。

基辛格回国后第二天，罗杰斯国务卿同他的总统一起共进晚餐。第三天，《迈阿密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采访罗杰斯的报道，说罗杰斯表示“相信”，越南停战“要么在大选前就可谈成，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要么在尼克松总统连任不久以后实现”。

基辛格可气坏了。他对一个记者说，国务卿这样预言不仅可能是错误的，而且他的那番话还有可能造成不利于谈判的影响。其实，罗杰斯不过是重复了基辛格私下所作的判断，而这也是尼克松的看法。可是，基辛格担心的是，北越人可能会利用美国这种在大选前急于求成的心情，压美国作出更多的让步，或者，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们就干脆拖到大选以后再说。基辛格气呼呼地说：“今后不许再发表那样的谈话了。”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8月21日开幕，由于缺乏刺激，还特意做了一些热闹文章。尼克松当然是“意中人”。他在北京和莫斯科取得的成功赢得了欢呼，被说成是走向“一代人的和平”重大步骤。还宣传说，他即将实现越南问题的解决。塑造这个形象，基辛格最为卖力。这位哈佛教授既是办外交的人才，又是搞竞选的能手啊。

8月22日，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放映了一部共和党摄制的为总统歌功颂德的影片，基辛格在片中成了主角。当大厅里灯光逐渐暗下去的时候，基辛格在宽银幕上出现了。他向选举人讲述了他对尼克松看法的转变过程。只见他像在兜售商品似地说开了：“我跟大多数同事一样，过去也是一贯反对他的，还对他很有成见。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完全不是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原来他为人明辨是非，风度文雅。自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的这番话通过电视传给了全国的观众。“他办事具有相当的，呃，用我一个大字眼，他具有相当的英雄气概……我相信，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形成了一道大分水岭。”这位总统顾问接着说，尼克松“想要做的，也就是他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即把我们的联盟搞得更有生气，与苏联结成新的关系，逐步探索同中国人打交道的途径，以及结束越南战争”。总之，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共和党的与会代表连声叫好。

基辛格这出戏的脚本，无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替他写。那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表露。在他看来，使尼克松获胜是当务之急，麦戈文如果当选，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认为，麦戈文获胜，将会使北越人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事后说：“要是麦戈文在11月赢了，那么，我们已经做的和打算

要做的一切。就都成了纸上谈兵了。”

代表大会上放映的这部影片，并不是基辛格在竞选活动中的第一次露面。他已经多次出现在有共和党和民主党捐款人参加的午餐会和晚餐会上。这些捐款人中有许多是犹太籍的头面人物，麦戈文对以色列政策的摇摆不定使他们惊惶不安。7月初，尼克松的一位主要筹款人塔夫脱·施赖伯邀请基辛格到贝弗利山参加过一次这类的午餐会。而在同月下旬，华尔街的金融家古斯塔夫·利维和已退休的底特律实业家马克斯·费希尔（二人都是共和党人，都曾不只一次地为共和党竞选活动协助筹款），也曾邀请基辛格到纽约参加过类似的聚会。不过，基辛格并没有参与筹款活动，他总是在人们谈起金钱的事情之前就走开了，表示他发表的见解是“没有党派色彩的”。但是，他的调子显然倾向于尼克松，也显然倾向于以色列，人家一听就有数。当有人就基辛格的这些活动向齐格勒提问时，齐格勒否认基辛格是在“为筹款而四出奔走”。齐格勒解释道：“他忙得很，管筹款的事有的是人，他在外交方面干着大事业嘛。”

基辛格不仅作为外交能手，而且作为某种名流在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出风头。他受到五名特工人员的悉心保护，屁股后总是跟着一群仰慕者。但还是有几个妇女设法钻进了警卫圈，亲一亲这位妙语横生的基辛格的脸颊。

一天晚上，《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女记者贝蒂·比尔发现，在会议大厅基辛格的包厢里，女演员露塔·李正坐在基辛格的身旁。李小姐不等发问就主动评论说，基辛格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比尔小姐问，是谁安排她坐在基辛格身旁的？李小姐用手指了指上面答道：“上帝”。

《华盛顿邮报》女记者多萝西·麦卡德尔报道过一则基辛格的轶事。有一次，罗纳德·里根夫妇在佩利坎湾租用一条150尺长的“佛罗里达”号游艇举行招待会，基辛格出席了。麦卡德尔报道说：“同往常一样，妇女们一见到基辛格就上前去亲他，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题。有个妇女对他说，她肯定认为他离开西贡后将跟另一些美国人那样，前往河内。平常对答如流的基辛格不觉一愣，他打量一下这位女士，然后正正经经地说：‘噢，我留着以后才去呢。’另一位女士问：‘他真的要去的河内吗？’基辛格还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人问他有无意思参加竞选，于是他便转而答复这个问题：‘我不打算竞选公职。’”

此时此刻基辛格好不得意啊。就连玛丽·麦格罗里这类对他没有好感的人也不得不对他“搞大国外交方面的惊人成熟”赞赏几句。采访白宫消息最能干的记者之一彼得·利萨戈写道：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不止是个能人，简直是个奇人，这可不是随便瞎说的。没有哪位部长助理能像他那样同时身兼数职，而且那么胜任愉快，那么沉着机智。”利萨戈接着写道：“他是一个地道的世界性人物，练达而不浮俗，自尊而不倨傲。他素以善讨妇女欢心闻名，这无疑使我国所有那些身材矮胖、长着猫头鹰眼睛、体态臃肿的中年单身汉颇受鼓舞安慰。”

代表大会结束后几个星期，基辛格又行动起来了——先飞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这是作了公开报道的；接着又飞到巴黎去同黎德寿举行会谈，这是秘密的。9月11日，基辛格到达苏联首都。同一天，北越谈判代表到达法国首都，准备就临时革命政府刚刚发表的一项新的和平方案进行讨论。尽管国务院官员马上把这个方案斥之为“新瓶装旧酒”，可是基辛格

却认为其中包含着“对方”让步的重要迹象。这个方案把黎德寿在7、8月间同基辛格会谈中所暗示的东西写成了文字：“越南南方内部问题的解决，必须从越南南方存在着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和三种政治力量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实现民族和睦……越南南方各方必须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排斥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把共产党政权或美伪政权强加于越南南方。”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阮文绍政权的存在，尽管他们使用了难听的字眼。他们没有再要求以阮文绍下台作为实现停火的先决条件，而且暗示保证实行一种政治进程，即任何一方都不应企图去“消灭”对方，或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对方。

基辛格在莫斯科呆了四天时间，探讨如何把苏联需要粮食和贷款与美国希望结束越南战争这二者之间联系起来。他到莫斯科时，显得兴致特别好。他同库兹涅佐夫副外长谈笑之间提到了不久前在慕尼黑开幕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苏联战胜美国的那场有争论的篮球赛。他还谈了自己在慕尼黑时发生的一次惊险事故，逗得多勃雷宁大使哈哈大笑。他说：“德国人把我乘的电梯掉到楼底下去了。”事情的经过是：基辛格和西德反对党领袖赖纳·巴泽尔在慕尼黑一家旅馆里乘电梯，这架电梯本来只能载四个人，而六名过于积极的保卫人员也挤了进去，于是电梯便从一楼掉到地下室去了。人没有伤着，可是八个人却在闷罐似的电梯里困了半个钟头。苏联人很乐意听这个故事。

基辛格到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遭到两次沉重打击之后，正力图缓过气来。一个打击是由于农业歉收造成严重缺粮，另一个打击是苏联军事顾问被赶出埃及，大为丢脸。虽说其中哪一个都不致于破坏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但两个加在一块却把他整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好在尼克松并没有乘机向他进逼。美国总统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是感激的，他认为河内谈判姿态的变化，部分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基辛格同意这种看法，他倾向于把河内看作是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顽强表现独立的盟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基辛格自己班子内部有了不同看法。比如，黑格和内格罗蓬特就认为，北越人之所以改变政策作出让步，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是美国不断布雷和轰炸的结果。

基辛格比较相信自己对“大国”作用的分析，他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北越在今后几周内会变得更灵活一些的保证表示欢迎。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估计，是根据他新近同黎德寿的谈话作出的。黎德寿在飞往巴黎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下。基辛格总爱把自己看成是个不讲情面的强硬谈判家，然而，他这次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所谈成的交易中，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品格。一当这位苏联领袖答应解决租借法案债务问题（这笔债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欠下的，过去一直是两国贸易谈判中的一个主要绊脚石），基辛格马上就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于是几天之内，美苏之间便就一项不寻常的贸易协定达成了协议。

因为取得了苏美关系这一“重大进展”而喜气洋洋的基辛格，离开莫斯科，取道伦敦，前往巴黎。他走这条线是为了尽可能保守他同黎德寿会晤的秘密。9月15日上午，他故意让人看到他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举行会谈，然后悄悄离开了伦敦。他在行前，指示住在克拉里奇饭店的助手们在门上挂了“请勿打搅”的牌子，然后溜走，别付房钱，随后由美国大使馆来付。基辛格这种酷爱秘密行动的癖好，开始使他的一些下属渐渐感到厌烦了。

基辛格一行乘一架老式的“康维尔”飞机在巴黎附近一个叫勒维西内的

秘密军事基地上降落，然后改乘汽车到吉夫絮伊维特。法国共产党在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别墅，艺术家费尔南·莱热当年曾在这里住过。室内挂有几幅 20 世纪最上乘的立体画派的作品，最近一轮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黎德寿阐明了河内对临时革命政府 9 月 11 日建议的立场。他强调指出，不能把任何政府“强加”给南越人民。基辛格说，尽管河内的立场有所变化，但新建议中仍然要求阮文绍下台，这是尼克松总统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还说，河内指望麦戈文当选，那是枉费心机；尼克松在目前大选之前的阶段里是最好讲条件的，大选过后，总统照例有一年的“蜜月”时期，行动可以不受什么约束。他最后解释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证明，尼克松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标，是会不顾一切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基辛格说，任何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目前不正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大好时机吗？

基辛格和黎德寿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协议。双方确定 9 月 26 日再次会晤，当天夜里，基辛格悄悄溜出吉夫絮伊维特回华盛顿，午夜过后到达，立即向总统汇报。第二天早上，他同罗杰斯共进早餐，然后在白宫那个向阳的南厅继续同尼克松磋商。中间有几分钟，允许摄影记者走近他们拍了几张照，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那天各报都充满了尼克松即将以压倒多数当选的消息。

近午时分，基辛格向白宫记者发表谈话。他大谈苏联之行，对越南问题则小心翼翼。他对河内政策新近的变化讳莫如深，只是说 9 月 11 日的方案“尚有不足之处”。

9 月 26 日，基辛格再次会晤黎德寿，这位北越谈判代表又搞了一个新东西。这次不是像 9 月 11 日方案所建议的那样，成立一个由“三种同等成分”组成的“临时政府”，而是建议成立一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仍由“三种同等成分”组成，但不具有政府职责，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行事。这个方案表明河内在政策上作了两项重大改变。第一，“委员会”显然不是联合政府；第二，“协商一致”看来保证了阮文绍对委员会磋商结果可拥有否决权。河内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方面阮文绍可以继续当政，同时也可以宣称搞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机构。这个方案虽不完全理想，但却为基辛格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他建议就此再谈一天。黎德寿同意。秘密谈判进行了近 38 个月，双方都还是第一次真正感到，现在接近终局的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和黎德寿详细讨论了河内的“委员会”方案。它怎样进行工作呢？怎样组成呢？阮文绍和共产党人这两方是清楚的，可是“第三方”是谁呢？由谁来决定呢？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原则上同意就地停火方式，但在停火的范围方面却没有取得一致。基辛格坚持停火应该包括整个印度支那，黎德寿坚持停火只限于南越。尽管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在 9 月底这个时候，基辛格又乐观起来了。事实上，由于他急切希望在大选前有可能突破，以至不怎么注意细节问题了，认为反正官员和专家们以后会去处理的。这时基辛格心中有一个庞大的计划：1 月下旬宣布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在 90 天之内实现停火，召开国际会议，最后开始一个包括南越各派力量在内的政治进程。

基辛格和黎德寿同意在 10 月 8 日再次会晤。他返回华盛顿时，总统正在加利福尼亚。第二天晚上，总统回到了首都，两人在总统游艇“水杉”号上

会面，黑格和霍尔德曼也在场。他们一边沿波托马克河游戈，一边讨论在大选前实现越南和平的政治影响如何。尼克松显然感到大选胜利在望了，所以吩咐他的助手们别管大选日期，只顾放手去争取最有利的和平解决便是。不过，这些人心中都很清楚，日期、谈判和总统连任这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10月5日，尼克松请了一些记者到椭圆形办公室来，通过发表谈话的形式，向河内的决策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尼克松说，虽然距离总统选举只有一个月了，但美国不打算因此就急急忙忙签订越南协定。他说：“如果条件合适，我们准备在大选前解决。如果条件不适合，我们就不准备在大选前解决。1968年正当事情有了眉目的时候，某些好心人铸成了大错，他们没有从对方得到适当的协议便贸然停止了轰炸……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谈判桌上的立场决不受大选的影响。”

基辛格知道，尽管尼克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说硬话，其实他还是乐意在11月7日大选日之前能达成一项过得去的协议的。1968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入竞选时，曾经许愿在四年之内实现和平。现在他只剩下四个星期的时间了。

此外，基辛格本人对于和平前景的估计是极为乐观的。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刚刚给他打来一份电报，答应要在下次会晤时作出“很大努力来结束战争”。据一个助手说，基辛格觉得“现在各种力量的布局再有利不过了”。这个助手引用基辛格的话说：“目前的形势是：苏联濒于饥荒；中国实在担心苏联可能在边境动手；保守派的美国总统对连任满怀信心，因而可容接受一项解决办法。这真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啊！”他又说：“亨利横下了心，要在大选前了结这件事。”

10月9日上午，基辛格来到吉夫絮伊维特的莱热别墅，黎德寿在门口迎接。这是基辛格为谋求达成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而作的第19次横渡大西洋之行。两人和往常一样略作寒暄之后，便走进餐厅继续进行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头几个小时内，双方只是重复了前几次会谈中老一套的话。黎德寿对阮文绍政权进行了抨击，重申民族解放阵线9月11日的建议，要求战争在军事解决之前必须先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美国是一贯拒绝这种主张的。看来，黎德寿是在试探虚实，基辛格则不为所动，于是出现了难堪的顶牛状态。黎德寿看来对下一步如何走有点犹豫，基辛格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最后，这位河内代表建议休会两小时。

基辛格趁此机会观赏了朗布依埃村附近的法国乡村景色，这个村因它那座14世纪古堡而闻名。基辛格一边在寻幽访古，一边在想黎德寿为何要求休会。

当基辛格回到吉夫絮伊维特时，这个谜就解开了。原来，黎德寿向基辛格提出一项“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九点建议之前，需要向河内最后请示一下。只要大致看一下这个建议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清楚看出，北越这个建议是个重大突破。河内破天荒第一遭表示了愿意把战争的军事方面同政治方面分开来谈，从而接受了基辛格的“双轨”办法，即军事方面的问题由美国和北越解决（通过妥协而不是征服），先宣布停火，接着撤退美军和归还美国战俘；随后，由南越的敌对各方设法达成政治和解。

黎德寿的建议是以协定草案的形式用英文写的，这一点恐怕也具有重要意义。显然，北越人这回是想要成交了。“聋子对话”的局面结束了。基辛

格把这个草案看了又看，反复看了三遍，生怕里头有鬼，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河内已明确放弃了要阮文绍下台而代之以一个联合政府的要求。

基辛格研究了草案后，毕竟也还是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停火只限于南越而不包括柬埔寨和老挝。第二，在立即成立一个“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停火的问题上，草案写得含糊不清；基辛格认为，必须成立一支人员足够的国际部队，以便在停火后立即用来防止双方在停战后的初期不稳定阶段大肆抢占地盘。第三，草案内辱骂西贡政权的语调，必然要激怒阮文绍总统，也许还会激怒尼克松总统。不过，基辛格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总的来说，河内已经作了重大让步，为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和归还美国战俘（也许在圣诞节前）打开了大门。这一来，大选前成交大有希望。基辛格当即建议第二天上午继续会谈。

“这下好了！我们搞成了！”基辛格跨进他的黑色轿车时高声地说。车行一小时返回巴黎的美国大使馆。他的高兴情绪感染了黑格、洛德、内格罗蓬特和罗德曼，大家都感到，越南和谈的僵局终于打破了。

基辛格回到大使馆马上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他已习惯于给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而不给总统本人打电话，以防外国情报窃听机构在涉及任何敏感的谈判时录下总统亲口讲的话。他说，河内新建议的提要马上用电报拍发华盛顿，请总统“紧急考虑”为是。基辛格还向总统请示几个问题，例如：“我们是现在就把协议搞出来呢，还是再等一等？谈判中我有多大的机变之权？”等等。

河内草案中提出的九点建议如下：

一、美国尊重 1954 年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当时，基辛格看来，在这一条上是没有争论的。

二、“协定签字后 24 小时内”在越南南方实行停火，美国“在 60 天之内”把全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走。没有争论。

三、“在撤走美国军队的同时”——也就是说在 60 天内——释放各方“被俘和被监禁的全部人员”。也没有分歧。

四、“成立一个包括三种同等成分的取名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政权机构，以便督促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履行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并组织普选。”这一条后来有过相当大的争论。

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的方法逐步实现”。没有争论。

六、“成立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基辛格想知道何时成立。“从签订这项协定时起的 30 天内召开一个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保证会议。”没有争论。这本来就是基辛格的主张。

七、各方保证“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方还保证“不使用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由于北越人认为越南南方是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不属于“其他国家”之列，所以这项保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此外，河内根本没有提出老挝和柬埔寨的停火问题。

八、美国“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印度支那”的“战后建设事业做出贡献”；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将“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关系”。后来就美国对北越提供多少援助（以及以什么条件提供）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九、“这项协定从签订时起生效。”这句话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可是后来对于由谁来签订这项协定，怎么签，何时签等等，都引起激烈争论。

虽然基辛格很想如约在第二天，即 10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同黎德寿会晤，但他不得不两次推迟。这是因为他在等待总统答复他的请示；另外，他还想知道尼克松是否同意黑格头天夜间草拟的、不包含什么实质性改动的美方对案。霍尔德曼终于打来紧急电话，说总统已经点头了。基辛格连忙带着手下人赶去吉夫絮伊维特。谈判进展很快。星期一谈了 16 个小时，星期二又谈了 16 个小时。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气氛中，分歧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和黎德寿实际已初步商妥了具体步骤的时间表：1972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布雷；10 月 19 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河内草签协定文本。在此之前，基辛格将去西贡争取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10 月 26 日，两国外交部长——罗杰斯代表美国，阮维桢代表北越——在巴黎正式签署协定；10 月 27 日，南越全境实行就地停火。

这时，谈判以及制定具体步骤的时间表，进展之快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基辛格从不否认，他那时急于想通过妥协使战争得到解决，但是他矢口否认他硬要在大选前达成协议。他一口咬定，是黎德寿急于在 10 月底前结束谈判——大概黎德寿认为，尼克松在当选连任之前对和平条件可能会圆通一些。

不管怎么样，眼看就要同北越达成协议了，基辛格显然有点得意忘形起来，他竟然对南越出席巴黎和谈的代表封锁起消息来了。他只向南越代表泛泛地介绍了谈判的进程，而有意隐瞒了双方已经交换协定草案并商定了具体步骤时间表这个关键性的情况。基辛格一心以为自己有能力对付西贡——堂堂大教授还对付不了一个调皮学生？基辛格对于两个越南都说不上有很深感情，不过他对河内似比对西贡尊重一些。

在最后定案时仓促万分，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推敲这九点建议和协定草案许多附件的文字。美国人很大意，没有看出草案里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要是同苏联人或中国人谈判，基辛格无疑会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但是，基辛格已经辛辛苦苦地同北越人谈了三年多了，眼看离总统选举只剩四周的时间，在美国人看来，这时的基辛格一心只盼拍板成交，那里还顾得上细微末节——这样正好上了黎德寿的圈套。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10 月 11 日，从上午 9 点半起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双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讨价还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核对文字，而就在这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法国外交代表机构被炸毁，法国大使皮埃尔·苏西尼负重伤致死。国际舆论哗然。法国提出了抗议；国内反战分子指责总统用炸弹进行谈判。人们担心，在吉夫絮伊维特进行的会谈也可能因这一炸而破裂。黎德寿私下对基辛格表示了不满；基辛格赶紧争取到了暂停对北越首都的轰炸。他们两人总算渡过了这一危险关头，仍按原定计划搞外交文件。双方都抱着希望，高潮即将到来，停火确实已经近在手边了。

黄昏时，黑格请基辛格要求暂缓几天，以防西贡方面不依。基辛格却不认为西贡会不依，因为现在这个方案毕竟使阮文绍得以继续当政嘛。不过，他还是向黎德寿建议把原定时间表推迟几天。停炸的日期由 10 月 18 日推迟到 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双方将在河内草签协定文本；10 月 30 日，在巴黎正式签订协定。这时，黎德寿起了疑心——两国之间本来就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但是，他同意了新的时间表，条件是：基辛格必须“保证”美国将遵守这个新时间表。基辛格要黎德寿放心，说虽然协定草案要拿去同西贡磋商一下，但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他晓得“还有不少未定因素”，但是他向黎德寿保证，只要双方都有诚意，美国将尽力遵守新时间表。事后他对

一个助手说：“这个宝是值得押一押的。”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基辛格同黎德寿趁着手下的人逐字逐句核定协定草案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哲理性的谈话，两人各根据自己的体验回顾了历史，谈到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基辛格对北越的英勇不屈精神称赞了一番，并保证美国将帮助河内医治战争创伤。他甚至还热情赞扬了黎德寿的坚韧性以及在同意双轨谈判方式时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态度。黎德寿看来真正感动了。据一位目击者说，黎德寿几乎掉下眼泪，以法国方式拥抱了基辛格。这两位外交家互相保证维护他们商定的各项原则，决不让任何“未定因素”阻碍实现停火，阻碍越南人民日后的和解及重建疮痍满目的家园。他们互相道别，用法语说了声“再见”，约定10月22日在河内会面。

经过连续四天的会谈（这是双方进行的几年谈判中前所未有的），基辛格于10月12日飞回华盛顿。下午5点52分，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他只对记者挥了一下手，就跨进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汽车，直奔白宫向总统汇报。“巴黎的姑娘怎么样？”总统问道。“时间不够啊！”基辛格回答说。两人用一小时研究了巴黎谈判的情况。第二天上午，黑格和罗杰斯也来了。并且让记者进来几分钟听听故意说给他们听的几句打趣话，并拍摄总统和僚属们在一起的镜头。记者向白宫发言人提了连珠炮似的问题。发言人没有透露什么事实，但也不去阻止记者们猜测已经实现了突破。

这边在白宫开碰头会，那边黎德寿也离开巴黎，取道莫斯科、北京回河内去了。这位北越谈判代表在奥利机场对记者说：“还有一些困难问题尚待解决。”他脸上堆满笑容，向人们频频招手致意。记者们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长年采访越南新闻的劳碌生涯大概快到尽头了。黎德寿说：“我还要再来巴黎，那是没有问题的。”

周末，基辛格订出了争取在大选前达成协议的下一步的日程安排。他定于10月10日（星期一）晚飞巴黎；10月17日找春水磋商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当晚去西贡；10月19、20日两天，说服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10月21日飞河内；10月22日，按照同黎德寿之约，草签协定。

基辛格这时真是得意非凡。虽然他自己一听到别人“泄密”就冒火，这回他却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便找来几个要好的专栏作家，透露了几点感想：他发现，北越人在最近一轮巴黎谈判中采取了新的姿态——严肃、认真、不带宣传成分；第二，黎德寿得出了结论（其间不无基辛格的一份力量），总统当选后在轰炸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第三，也许在11月7日之前就能签订一项临时和平协定；最后，已经对协定的具体安排进行了讨论。

基辛格带着这种心情在10月17日上午飞往巴黎，准备在什瓦齐勒罗瓦同春水会晤。基辛格随身带的文件中有一封两页长的总统亲笔信。信中说：“尽力实现体面的和平，不要管大选问题”；如能达成解决，“对大选固然有一点好处”，但“由于种种原因”，“那基本上是利弊参半的”。白宫故意透露了这封信的内容，借以表明总统在大选前的政治家风度。

基辛格一行中有两张新面孔：一是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他是国务院在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高级专家），另一是国务院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这是基辛格打破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圈子，第一次从政府机构里要帮手。鉴于他酷嗜保密的脾气，这种破格行动只能说明他确信现在已经进入谈判的扫尾了。

基辛格和春水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又整整用了12个小时来审

议协定草案。一星期之后，在巴黎的河内发言人阮成黎是这样形容这次秘密会晤的：“他们对双方的文本再一次逐章、逐条、逐句、逐字进行审议。”有几个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例如第七条和第八条。

第七条的内容中包括，定期充实自停火以后“毁坏、损坏、损耗或用尽”的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关于这方面的监督方式，春水主张尽可能松一些；基辛格则主张尽可能严一些。第八条是关于释放南方的政治犯问题的。西贡一度承认政治犯多达 8 万人，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一些。虽然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是越共的支持者，但是，大批释放这些政治犯就会壮大南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队伍。春水坚持要全部释放，但遭到基辛格的反对。

基辛格强调指出，必须取得阮文绍的同意，才能使谈判圆满结束，如果春水一定要得到最大好处，到头来只会遭到阮文绍最大限度的抵制，整个协定就会有落空的危险。然而，春水毫不让步，他一度甚至还提出更高的要价。他暗示释放南方的政治犯问题要同释放在河内的美国战俘问题一并解决。这一下基辛格火了。他警告说，释放美国战俘问题决不能同其他任何问题扯在一起，否则干脆甭搞协定了。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春水在两者联系问题上松了口，但是，他强调指出，河内极其重视迅速释放全部政治犯的问题，显然，这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一项主要要求。

这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是在一个时限下进行的。基辛格已告诉春水，他当晚要动身去西贡，希望在走之前解决剩下的那几个问题。那位北越外交家却一拖再拖，要么是因为他在谈判中没有相机行事的权力，要么他是以为拖延时间最后可以迫使基辛格让步。但基辛格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他要求迅速解决这两大问题，春水不为所动。这两个谈判对手都知道，基辛格按照自己的时刻表，必须在夜间 11 点之前起飞前往西贡，因为过时奥利机场就要关闭了。这就是说，他不能晚于 10 点离开什瓦齐勒罗瓦。据说，基辛格急得“几乎歇斯底里起来”。他怒气冲冲地从房间这头到那头来回走着，要求春水通情达理些。

将近 10 点时，基辛格突然声称：“我要走了。我得到西贡去了。”

“基辛格博士”，春水对他说，“如果你去西贡，那我们就无法解决了。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我们将用电报解决！”基辛格顶了回去，边说边收拾文件。

“为什么不能等我们到了河内再解决呢？”春水还是坚持。

这时，基辛格正在走出这座别墅。

基辛格于 10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抵达西贡的新山一机场。他打算在南越只呆两天。他自以为满有把握说服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基辛格为了向这位忧心忡忡的南越总统兜售自己的主张，纠集了一大批人来帮腔。这批人中有：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陆军参谋长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他曾任驻越美军司令，一向大力主张推行越南化计划），新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诺埃尔·盖洛海军上将（刚从夏威夷飞来），接受艾布拉姆斯在南越遗缺的弗雷德里克·韦安德将军，以及驻韩国大使菲利普·哈比卜（1965 年至 1967 年在西贡工作，后来担任出席巴黎和谈的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基辛格在冯克宽街 38 号邦克的官邸设立自己的指挥所。那是西贡的一条林荫道，然而到处是铁丝网、沙袋和美国宪兵。

这个高级美国代表团抵达西贡后，越发在当地的咖啡馆（如“海军上将”、“布罗达尔”、“阿特比”、“拉姆巧”、“吉弗拉尔”、“宝塔”，等等）

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越南的充满动乱的历史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啦。人们不禁想起越南的一种传统迷信说法，所谓“九字律”，据说凡是最后两位数字加在一起为九的年份，总是注定活该有事。日本占领是 1945 年结束的；抗法战争是 1954 年结束的；吴庭艳总统是 1963 年被推翻的；1972 年会发生什么事

却说西贡以北 700 多里的河内在 10 月 18 日这一天，出现一派节日气氛。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发现的。几天前到达河内的《新闻周刊》高级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看到成千上万的北越人列队游行经过公园，敲锣打鼓地祝贺打下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第四千架美国飞机”的高射炮手们。可是德博什格拉夫觉得，这似乎更像是力胜利游行进行预演。

上午 10 点，德博什格拉夫被带到总理府，同范文同总理进行了两小时的内容广泛的谈话。谈话是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总理穿着白衬衫和浅灰裤，同来访者客客气气地握手表示欢迎。总理和来访者用法语交谈。他们先回顾了德博什格拉夫 50 年代初对河内的几次访问。他们谈到法国人当时造谣，说胡志明因得肺结核而处于病危处态，大家为之大笑。不过他们很快就转到了战争如何结束这个紧迫问题。范文同对于黎德寿和基辛格在巴黎的谈判中尚属保密的全部细节当然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德博什格拉夫想探听点底细。

范文同说：“谈判现在处在极重要的阶段……我们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而不是为了达到暂时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允许也一定反对那样做。但是，我们决不会说不合时宜的话来损害在目前达成一种愉快的结局。”

这时，范文同显然是为了提高河内的谈判地位，撇开了黎德寿和基辛格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内容，说了一些后来严重妨碍基辛格在西贡施展手段的话。

德博什格拉夫问范文同，阮文绍是否可以“作为三方联合政府中的西贡政府一方的一员……？”范文同明知不会搞联合政府，阮文绍将继续当政，但是他回答说：“局势的发展已把阮文绍抛到后面去了，现在局势正在按照它自己的道路发展。”这句话暗示，那位南越总统连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都不配。

德博什格拉夫：“请问关于南方有两个政府的主张……如何？”

范文同：“你所有的问题都反映了目前局势的发展。必须承认目前存在两个政府，各管各的地区。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人人都必须尊重这种状况。”

德博什格拉夫，“是先停火而后美国撤军，再由临时革命政府同西贡政权直接谈判吗？”

范文同：“这就是当前的事态发展，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那时的局面将是在南方有两支军队和两个政府。在那种新局面下，它们必须为成立一个过渡性的三方联合政府作出自己的安排，并在美国撤军之后缓和局势……”

德博什格拉夫不知道河内已在 10 月 8 日的秘密会谈中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因此很自然地以为很快就能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其中关键是成立“联合政府”。第二天，当他再次去总理府，请范文同审查谈话记录稿时，范文同并没有更改“联合政府”的提法。德博什格拉夫急于要发电报道高级人士首次透露在巴黎出现了突破的消息。他打算乘坐下一趟班机（两星期往返一次）离开河内前往老挝的万象。

10月19日，星期四，上午出版的西贡《大民族报》刊登了基辛格的一幅不同寻常的照片——不是前一天晚上他抵达时的照片，而是转载《哈佛讽刺报》的一张双页照片。这是模仿《世界主义者》杂志的伯特·雷诺兹的手法剪辑成的，显示这位总统助理一丝不挂趴在地毯上微笑。说明词是，“基辛格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实际上，基辛格身上仍然有不少秘密，只是不愿意一下子全抖落出来罢了，否则就会影响他同阮文绍的面对面对谈判，尤其是影响他同黎德寿谈定的“和平”日程表。

同南越人的第一轮关键性的会谈是那天上午9点在独立宫开始的，双方人员坐满了阮文绍总统的“情况室”。南越方面出席的有：总统顾问黄德雅、外交部长陈文林、对外政策特别顾问阮富德以及南越驻美大使陈金凤。陪同基辛格的是：邦克·艾布拉姆斯、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名工作人员。会谈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气氛完全是有条不紊、心平气和的，基辛格的发言占了大部分时间。

基辛格把他同北越人谈妥的协定草案的一份英文本交给了阮文绍。他客观地介绍了协定的各项条款，着重强调他深信南越方面会认识到确实对他们有利的关键的几点：一、阮文绍不仅将继续当政，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他都有否决权。基辛格说，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照顾河内的面子，“并不是联合政府”。二、北越现已答应遵守“某种政治进程”，也就是说，他们已被迫在可预见的将来不采取军事征服手段。三、作为双重保险，美国将保持在泰国的空军基地，第七舰队将留在邻近海域，以防范共产党再次进犯。四、协定允许美国继续向阮文绍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将继续这样做。五、美国有相当大的把握能同苏联和中国取得“谅解”，使之限制对其盟国的武器供应。六、协定草案将允许美国体面地撤军，接回战俘，并支持其在西贡的朋友。

基辛格还向阮文绍反复说明：现在同北越人达成协议，时机最有利；如果现在签订这个协定草案，阮文绍就可以保留100万军队，并控制南越1900万人口中的85%左右。基辛格指出，即使协定使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分散的、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让临时革命政府在西贡派驻象征性的代表，阮文绍还是能在战后维持下去，甚至兴旺起来。

基辛格的结论是：“这个协定很好嘛，咱们两家总算没有白花力气。”不过他没有详谈协定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对阮文绍透露先在河内草签、后在巴黎正式签订协定的时间表。

阮文绍听后没有表态。他彬彬有礼地笑了笑，并答应基辛格，他将研究这个协定草案。双方约定当天傍晚再次会晤。

阮文绍的这种反应，使基辛格离开总统府时感到大有希望。殊不知，越南人同其他亚洲人一样，也是极力避免当面与人顶撞的。他们往往只是模棱两可地点点头，而不轻易说个“不”字。基辛格满心以为，阮文绍同他的顾问、国会的重要议员以及各军区司令磋商后，终将认识到签订协定的好处——基辛格希望，这一切在48小时之内能完成。基辛格对站在西贡的炎热太阳下的那群记者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便跨进等在外边的轿车，穿过几条街，回到美国大使馆。基辛格走进使馆走廊时，受到了许多外交官和办事人员的欢迎。有几个人鼓起了勇气拿出《大民族报》所刊登的他的照片，请他签名留念。基辛格欣然允诺。

这时，总统府里却是一片阴郁气氛。据阮文绍的一个亲信说，阮文绍在

“大发脾气”。阮文绍感到，基辛格对他不是相见以诚。不错，他已经通过他在巴黎的代表了解到，基辛格和黎德寿的会谈在 10 月 8 日已进入高潮阶段，谈判的“要点”已从巴黎电告了他。但是，直到当天上午的会晤结束之后，他才看到草案的真正文本，这使他很生气。他叫黄德雅先研究一下全文，在下午三四点钟召开一次西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

黄德雅是阮文绍手下最亲信的人物，是阮文绍的表亲和过继外甥，当时 31 岁。他是匹兹堡大学 1966 届毕业生。黄德雅同在南越的美国人员很少来往，同他们关系有时很紧张，以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官员私下骂他“那个坏小子”——“一个完全靠着同阮文绍的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的家伙”。尽管如此，他还是充当阮文绍的美国问题专家，是阮文绍手下的“基辛格”，他把握着关，不让发生任何可能危害本国的事情。他感到身膺重任，要在美国人被这场战争拖得精疲力尽、北越人乘势步步进逼的艰苦时刻，确保南越的生存。

阮文绍会见了一些国会议员，并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屈于压力而接受任何解决办法；与此同时，黄德雅着手将基辛格那天上午交给阮文绍的协定草案从头至尾研究了一番。

黄德雅把草案读了几遍后叫了起来：“我的天哪，这哪里是什么协定啊！”他觉得，有几条“很不完备”，“前后很不一致”，另外一些条文“简直糟透了”。他立即向阮文绍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了他的看法。其中特别有一点使他感到纳闷和不放心，“政权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文里，这个词听起来没有什么害处，但在越文中却可能带有危险的涵义。他说：“我估计，共产党方面一定会把这个解释为某种‘政府’机构。”由于总统府里开会的人都反对联合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政权”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政府”。阮文绍中断了这次会议，他说：“咱们问问基辛格博士。”

当晚 7 点，基辛格和邦克来到总统府。阮文绍要求得到一份协定草案的越南文文本。他说，发现了几个问题，不过也许完全是文字上的。基辛格表示了歉意，他答应总统，草案的越南文文本将在当夜晚些时间送到总统府。阮文绍问道，那么，这个“政府机构”是什么意思呢？基辛格回答说，没什么意思，它没有任何权力，此外，你有否决的实权。阮文绍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基辛格坐车返回邦克住所的途中，仍然相信到时候能够说服阮文绍，实现他对黎德寿所作的秘密保证。这时，他只剩下 24 小时了。

星期五上午双方的会谈照样以客气的握手问好开场。但是，头天晚上南越方面所积聚起来的猜疑和愤懑情绪很快就露出来了。“基辛格博士”，阮文绍先开了腔，“关于这个协定草案，为什么你们不预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呢？”基辛格回答的时候声音很低，他那低沉的嗓门使人几乎听不见。他解释说，他决定亲自面交，因为这个协定事关重大，有深远历史意义，因此不放心由一般的外交信使送来或经过通常外交渠道用电报发来。阮文绍的这番影射，指责美国 and 北越背着西贡进行谈判，使基辛格突然处于被动地位。

阮文绍步步进逼，不过他和基辛格都还谨守礼节。阮文绍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谈他看了协定草案的越南文文本后认为存在着的三大障碍。

首先，这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是行政机构，还是政权机构，还是联合政府？在英文中，“国家委员会”这个词确实不能解释为“联合政府”。但是在越南文中，意思就含混不清了。阮文绍、黄德雅等南越人认为，要么是黎德寿和基辛格两人串通起来欺骗西贡，要么是基

辛格自己上了黎德寿的当。阮文绍得出了结论：“就是这么一回事。”从他的观点看来，协定是要成立一个“政权机构”——也就是同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这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协定关于“三个越南国家”的提法：越南北方原封不动，越南南方则分成两部分：西贡和越共分别管辖各自控制的地区。阮文绍断然拒绝让出越南南方任何一部分的主权。他坚持认为，北越军队对南越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完全是凭武力抢占的。决不容许用合法的协定去批准侵略。基辛格怎么能够同意作这样的让步呢？

最后，阮文绍提出了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到北越军队撤出南越的问题。为什么不提？

基辛格对这些问题逐一作了解释。“联合政府”难办吗？他坚持说那是个“误会”，同黎德寿再谈一次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三个越南国家”呢？也是个“误会”，不过，这个提法难道有什么实际意义？阮文绍总统拥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靠山嘛。“北越军队应该撤走”吗？不错，这倒是个问题，可也不是什么新问题，自从1970年秋天以来，美国早已不坚持要北越军撤出。再说，由于协定禁止引进替补部队，已经在南方的那些部队将会逐渐消亡的。

南越人后来指责基辛格“在我们面前施放烟幕”。阮文绍讲话客气，但态度顽强。他要求得到彻底、圆满的回答。黄德雅说：“假如我们签订这项协定，就会显得我们荒唐可笑，就会显得我们是向共产党投降。”基辛格压住了自己的怒气，承认阮文绍提出的几个问题确是问题。他接受阮文绍的建议：由双方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小组由外交部长陈文林主持，第二天就碰头。

基辛格回到邦克的住所时既沮丧，又焦躁。不过他还是认为，阮文绍最终会回心转意的。基辛格对一个下属说：“也许他得再次同各军区司令商量一下。”

不管怎样，基辛格同黎德寿郑重谈妥的那个时间表显然又必须修改了。基辛格借用总统的名义向河内发了一份表示歉意的电报，建议再次推延时间表。他解释说，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解决若干问题。他说，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了第三张时间表：10月23日，美国停止轰炸和布雷；10月24日，在河内草签；10月31日，在巴黎正式签字。河内很快作出了同意的答复，这使基辛格大大松了一口气。北越方面接受了新的时间表，但是警告说：“美国方面不得提出任何借口再次改变时间表。”

那个星期五下午三四点钟，南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开会，对协定草案的越文本进行逐条分析。主要发言的是黄德雅，他对这个文件逐条分析了一遍。经过1小时45分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要求修改之处竟达26处之多。一个成员事后说：“那还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呐。”

10月21日，在越共和北越军队在南方全境发动了一连串进攻的形势下，美国 and 南越的高级谈判代表（阮文绍没有参加）在红十字街57号外交部长陈文林的住所会集。那是一条繁华的、戒备森严的大街，离总统府不远。

“基辛格博士”，外交部长先说，“我建议，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先作一个简短的祈祷。”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上帝啊”，外长用他那带法国口音的英语吟诵道，“为南越共和国代表和亨利·基辛格博士之间举行的这次会谈赐福吧！”基辛格的一个助手事后回忆说：“我一听就知

道大势不好了。”

黄德雅第一个讲话。他说：“基辛格博士，这是我们的清单。我们要求对协定草案作 26 处修改。”基辛格大吃一惊，不过他还是按捺住自己的脾气，说道：“请谈吧。”黄德雅逐一谈了分歧之点，有次要的，也有主要的。经基辛格作了番解释之后，解决了对方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还有六个问题他显然难以说服对方，即“政权机构”，“印度支那三国”，不提北越部队从南方撤出，自决权，利用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运送部队和物资，在两个越南之间重新建立一个稳固的非军事区等问题。

基辛格极力缩小这几个问题的份量。“关于机构的问题”，他似问似答地说，“请注意，你们是有否决权的嘛。”

“在南方的北越军队？这个，咱们要现实一点，人家本来就在那里嘛。”

“印度支那三国？那是打字打错了。”

“这简直是开玩笑”，黄德雅反驳说，“你们有专家，有翻译，可是你们在同一个文本上，同样的错误出现了两次。不，基辛格博士，这决不是什么打字的错误。”

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这场战争我们打了整整 15 年，难道就是为了接受这个玩意儿吗？”黄德雅越说越有气，“这等于向共产党投降。这个协定我们不能签。”

会开了三个小时，基辛格和黄德雅争执不下，这是明摆着的，于是就休会了。南越方面有一个人后来形容说，当时基辛格和黄德雅两人就像两个“比武的对手”。他说：“基辛格有脑筋，机灵极了，可就是不知是否有心肝。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一攻，他就暴跳如雷，这就暴露了此人的弱点，他很容易上共产党的当。”美方的一位谈判人员后来回顾那时的情况说：“那年 10 月，我们对南越人的种种做法大大得罪了他们。”

基辛格气急败坏地回到大使馆。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来回乱走，外衣也脱了，领带也歪了，一面命令手下人做这做那，一面往嘴里塞糖果。他自以为十分符合美国和南越利益的那个赶在大选前达成协议的宏伟计划，看来是实现不了了。过去，他好歹对阮文绍还怀有那么一点敬意，这一下也抛到九霄云了。“他妈的，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基辛格喊道。一个了解那次谈判情况的人说：“只要有人违抗亨利，基辛格，你就会看到他那个脾气有多大。”基辛格觉得，自己已经向黎德寿许下诺言，就必须兑现，决不容许阮文绍使他失信，有损他的雄图大略。

从河内到万象两周一次的班机正在发动，随时准备起飞。时间是正午，地点是嘉林国际机场。德博什格拉夫正在等候他的老朋友埃及代办穆罕默德·马赫卢夫来同他一起喝杯咖啡告别，在他的公文包里放着范文同总理同他谈话的记录。马赫卢夫在最后一刻闯进了候机室。他为自己来迟表示了道歉。他解释说，今晨 6 点半，他和在河内的其他各国外交官都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通知说，美国和北越之间行将签订停火协定，请他们建议各自的政府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压力，要他在 11 月 7 日大选前签署。北越人虽然同意了基辛格要求再次延期的建议，但是他们以为，美国是在拖延——把阮文绍抬出来作为借口，实际上尼克松自己不愿意在当选连任前达成协议。马赫卢夫告诉德博什格拉夫，他已用无线电话（由北京转）把这个消息和请求报告了萨达特总统。然后他咯咯地笑了笑说：“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北越人真是多么不了解情况呀。他们竟以为我们可以对华盛顿施加什么影响呢！”

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飞机从东北方向的河内飞行 300 里抵达偏僻的万象时，成了当地社会上一件大事。因为人们总希望有可能打听到一些从北越首都传来的小道消息，所以驻老挝的各国外交官经常去瓦望机场迎接那架四引擎的螺旋桨波音 707 飞机。这次美国驻这个“万象之国”的大使麦克默特里·戈德利也前来迎接德博什格拉夫。当两人钻进大使馆的汽车时，戈德利问道：“有什么情况？”德博什格拉夫答道：“有重要情况！范文同告诉我，他们不等美军全部撤完就会开始释放美国战俘，还说要成立一个三方联合政府，可能不包括阮文绍。”戈德利大吃一惊。“咱们打个电话告诉在西贡的威廉·沙利文吧。”边说边拿起汽车里的无线电话。几分钟后，通过大使馆专门线路接通了沙利文。这时，汽车正沿着湄公河北岸的公路急驶，戈德利在电话上迅速向他的国务院同事扼要地报告了德博什格拉夫带来的情况。“你看要不要叫他同亨利直接说话？”戈德利问道。“亨利就在我身边”，沙利文回答说。德博什格拉夫便接过话筒向基辛格详细汇报了他河内之行的情况：他如何获得总理接见；这位北越领导人又如何规定大约一半的谈话内容不得发表；他本人对这次谈话意义的看法，等等。基辛格要求把谈话全文的“原始记录”火速送一份到西贡的美国大使馆。

两小时之后，基辛格和沙利文就在研读谈话的全文——不供发表的部分和供发表的部分都在内。由于这是个急件，《新闻周刊》准备在 10 月 21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6 点以新闻稿的形式发布供发表的部分，赶在该杂志出版之前整整一天。基辛格看罢记录勃然大怒。范文同所讲的那个“过渡性的三方联合政府”以及“局势的发展已把阮文绍抛到后面去了”那句话，他同黎德寿在巴黎的谈判中根本没有这些。沙利文也愣了，他猜想要么北越人在“耍弄美国人”，要么存在着“真正的误会”。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基辛格顿时凉了半截，感到自己身受两方面的夹攻——一方是阮文绍抗拒协定，另一方面是范文同横生枝节。他痛感身陷重围，眼看自己的时间表吹了，那个宏伟计划也岌岌可危。但是，既然已朝达成协议的道路走了这么大一段，他总得另寻出路来摆脱困境才是。

他决定让阮文绍看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他要邦克打电话给黄德雅，约见阮文绍。“总统忙得很呢”，黄德雅回答说，“共军正在攻打西贡附近地区哪。”基辛格抢过话筒厉声说：“我一定要同阮文绍总统谈一谈。事情很重要。发生了一个新情况，我必须见他。”黄德雅不为所动，只是说除非基辛格能回答西贡提出的那些问题，否则没有必要来见总统。他问基辛格答得了吗？基辛格支吾其词。黄德雅便说，那就没有必要来见总统。基辛格急了，便提出第二天上午（星期日），只由基辛格、邦克、阮文绍和黄德雅这四个人在总统府会晤。事情绝对保密，时间是上午 8 点，行吗？黄德雅同意了。

基辛格在西贡的羁留引起人们揣测纷纷，认为会谈涉及了南越前途这一最敏感的问题。记者们围着美国大使馆团团转，但使馆人员也提供不出什么具体情况，反倒使新闻界更觉得这里大有文章。使馆的一个发言人说：“我只能告诉诸位，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20 年来最重要的外交谈判。”他还透露，沙利文悄悄去了万象、曼谷，这就暗示“和平”协定可能包括整个印度支那。

10 月 22 日清晨，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一个电话把黄德雅从睡梦中给惊醒了。他骂了一句：“他妈的，星期天一大早就把我吵醒了。”原来，范文同对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刚发表，这个官员想向阮文绍总统报告谈话内容，特别是范文同关于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将要成立“过渡性的三方

联合政府”等要点，黄德雅立即打电话告诉阮文绍。“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黄德雅气呼呼地说，“基辛格想要我们啊。”“可能”，阮文绍回答说，“也可能是他自己上当了。”

上午8点，基辛格和邦克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会上阮文绍先讲话，他说：“我们认为，这个协定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认为，协定照目前这样写法我们是不能签字的。”关于他的政府提出的26条反对意见，他说：“其中有些是次要的，但有几条是主要的。签字就等于向共产党投降，如何对得起成千上万美国和越南的阵亡将士？”

基辛格镇定地重复摆了摆论点说，阮文绍将拥有否决权，还掌握百万大军，美国将继续给予援助，等等。阮文绍同样镇定地把这些论点全部驳回。

这位南越领导人着重谈了三条主要反对意见：“第一，我们反对那个‘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很清楚，实际上这是搞‘联合联府’。第二，我们不能同意北越军队继续留驻在我们国内。第三，我们不能接受北越人可以任意通过非军事区。总之，这个协定我们不能签。”

基辛格很外交地批驳了阮文绍的论点，并且提出了几个旨在消除南越人反对意见的方案。他拿出范文同的谈话记录，指给阮文绍看北越总理所说的几句话：“我们已竭尽所能来争取圆满结束谈判……我们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阮文绍看了这几句话，但是他一下就看出了“联合政府”这个字眼和“局势的发展已把阮文绍抛到后面去了”这句话。这一来，阮文绍拒绝签订协定就更加振振有词了。

不过阮文绍也不愿显得过分别扭。他原则上同意就地停火的主张。确实，他说他愿意考虑各种“和平”方案，但他要根据“书面材料”加以研究。他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访问记。他尖锐地对基辛格说：“别对我们说你本事同黎德寿搞什么秘密谅解。我们不想同共产党搞什么秘密谅解。我们很了解北越共产党，他们无论签订什么东西，都不会遵守的。”

阮文绍最后向基辛格将了一军：你基辛格怎么会同意了这样一个草案？基辛格还是说：这个协定不错嘛。

这时快到上午10点了，按计划基辛格该动身去金边同正在苦战中的柬埔寨总统朗诺磋商。从西贡到金边坐飞机只需半个小时。阮文绍请基辛格下午5点前返回。基辛格同意了。他同阮文绍和黄德雅握了握手便前往机场。

基辛格在沙利文和内格罗蓬特的陪同下，乘空军的一架T-39双引擎轻型喷气机飞抵金边的波成东机场，然后换乘直升飞机直奔郎诺官邸。基辛格一连四小时谈了柬埔寨在当前谈判中的地位。这时柬埔寨局势险恶，全国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在“对方”手里，更不用说北越军队和越共沿南越边界地区还保持着庇护所——也就是1970年春美国军队一度开进去的那些庇护所。郎诺答应，一旦南越宣布停火，他也在本国宣布停火。基辛格则保证，美国将继续向朗诺政权提供军援和经援。基辛格知道，只有在毗邻的南越实现停火，柬埔寨的停火才有意义——然而南越停火却越来越渺茫了。

基辛格去金边后，阮文绍再次同军方和国会的主要头头进行商议，向他们保证，他决不接受基辛格带到西贡来的方案里的“三方联合”的政府。他用“预先炮制的一揽子方案”这个轻蔑提法称呼基辛格和黎德寿共同搞出来的那个草案。

5点钟时，四个关键人物——基辛格、邦克、阮文绍和黄德雅——齐聚总统办公室。阮文绍一上来就向基辛格明白表示，他不能签订这个“无法接

受的”协定。黄德雅插话说：“这不是我们故意拖延。”这是指美国人曾指责阮文绍 1968 年拒绝参加巴黎和谈的做法。黄德雅说：“我们是愿意同你们密切合作的，可是你们自己对这些问题提不出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接受呢？”阮文绍跟着说：“必要时我们将单独作战。”

据一个南越观察家说，基辛格都“气昏了”。据说基辛格讲了一句：“我在北京、莫斯科、巴黎都成功了，怎么好败在这里呢？”

阮文绍说：“基辛格博士，你不要那么性急，否则共产党会讹诈你的。这个协定不好，我要是签了，不到六个月越南又得大流血。”基辛格于是暗示，美国将断绝援助。阮文绍扭转身子看墙上的地图，让基辛格朝着他的后脑壳讲话，以示对其所讲的话的蔑视。阮文绍还是说：“我们反正不签这个协定。”接着，基辛格提出，美国可能单独同北越签订和平协定。阮文绍不为所动，宣称：“我们宁可用我们现存力量再打六个月死了，也决不能签这个协定而马上完蛋。”

据意大利记者奥利亚纳·法拉奇报道，阮文绍接着对基辛格说：“你们是个大户，你们对这个协定可以不斤斤计较，我就不能。一个不好的协定对你们说来无所谓。你们会在乎（留在南方的）那 30 万北越军队吗？你们是毫不在乎的。你们打开世界地图一看，南越不过是弹丸之地，丢了有什么了不起？南越丢了对你们可能还有好处嘛……可能对你们遏制中国、对你们的全球战略都有好处。可是……我这个小小的越南人对世界战略地图没有多大兴趣……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啊。”

基辛格怎么听得进阮文绍这番教训？他眼看僵局已成，毫无办法。据南越人后来回忆，基辛格说了一句：“我以后再也不到南越来了。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失败！”黄德雅扫了基辛格一眼，说：“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可是我们得保卫自己的国家啊。”

基辛格最后说：“我只好回华盛顿去要新指示。”

“回去后请将我们对那三条基本原则的看法转告尼克松总统”，阮文绍以强调的口吻最后又狠狠压了一下，“因为要是我们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就不接受也不签这个协定。”

会就开到这里。基辛格握了一下阮文绍的手，对黄德雅则理也不理，气呼呼地走了，邦克跟在后面。基辛格只获得阮文绍原则上同意就地停火，此外，一无所得。

基辛格回到邦克住所，立即向尼克松发了个特急电报，说明僵局的原委，并且当真建议，如果阮文绍继续拖延，就单独同河内媾和算了。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尼克松竟拒绝了这个建议，不同意单独媾和——至少眼前不行——反而指示基辛格要冷静些，不要同阮文绍闹僵了，要好生安抚阮文绍，重申美国 and 南越仍然是盟友，要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一来，基辛格不能便宜行事了，他这才体验到了通常那种外交家授权有限的苦楚。他问：可是我们怎么向河内交代呢？总统要他再给黎德寿去一个电报，不明言美国推翻了在 10 月 31 日前签订协定的诺言，而说遵守原定期限有困难。为了安抚一下黎德寿的不满情绪，电文可以强调美国决心迅速完成协定，同时让基辛格通知黎德寿，美国将从 10 月 25 日起在 20 度线以北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星期一上午 8 点，基辛格来到总统府向阮文绍辞行。他希望，事隔一夜，阮文绍可能回心转意了。两人谈了一下各自的立场，很明显，距离并没有缩

小。阮文绍交给基辛格一封给尼克松的信，信中阐明南越方面对协定草案的保留意见。阮文绍重申他愿意同北越达成妥协，但条件必须合适才行。基辛格则强调指出，美国仍然希望盟国和衷共济，在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基辛格出了总统府，急奔机场。记者和摄影记者们都被挡在离那架蓝白色喷气机约 50 码的地方。基辛格到达后，朝那些照相机方向看了一眼，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走到记者们跟前。根据他的外交经验，他知道，正当全世界在期待着搞成和平协定的时候，如果他哭丧着脸，就等于宣告大事不好。所以他强装笑脸，同一个头发留得又黑又长的年轻女记者拉拉手，说道，“我到这里是专门来看你的。”

“这次旅行顺利吗？”一个记者问道。

“顺利。”他回答。

“有成果吗？”

“有。只要我到这里，总是有成果的。”

“下次还来这里吗？”

基辛格没有回答，只是用外交方式笑了笑。

等到基辛格坐的飞机升到巡航高度、开始长途直飞华盛顿时，美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个有分寸的声明说：“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同越南政府的会谈将继续进行。在现在这个时候谈得更具体是不利于谈判的。”声明的每个字都是经过基辛格审定的。黄德雅办的西贡《最新消息报》倒比较宣言不讳。这家报纸的社论说：“观察家们总的印象是，由于越南方面毫不动摇地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越南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是在极其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阮文绍是利用自己的虚弱性作为对付基辛格的王牌的。他知道，美国人生怕对南越方面压得太狠太急，南越整个腐败的、没有斗志的军政机构可能一下子垮台，弄得美国欲撤不能。这样一来，尼克松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那信誓旦旦的“体面的和平”化为泡影。阮文绍之所以胆敢违抗基辛格结束战争的计划，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力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位南越总统想用这一手从美国那里弄到更多的武器、更多的援助和赢得更多的时间。他觉得，他有必要使本国人民对“和平”有个思想准备。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已经成为越南人生活的一部分了。他们打仗打了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但从来不是单独打，而总是站在“白人”一边打的，而他们感到这些白人总是看不起他们。阮文绍知道这次美国人确实是要走了，他希望拖住他们，越久越好，以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加强本国的政权，不仅为了对付将来临的政治斗争，而且对付他确信必将继续进行下去的军事斗争。

那个多事的星期一傍晚，基辛格在飞回华盛顿途中又给黎德寿去了一个电报。这次，他不论明里暗里根本没有提 10 月 31 日这个期限，而是强调必须在巴黎再举行一次谈判。池列举了三条理由：“在西贡遇到了困难”；范文同的谈话引起了“含糊不清的问题”；以及有“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在一俟宣布停火，立即出动抢占地盘。

基辛格当晚回到华盛顿时，提请总统注意，由于实施步骤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河内对协定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卦。不过他也指出，范文同和阮文绍两人都对协定提出了一些难题，必须加以澄清和解决，才谈得上签字。他从此得出结论：大选前是无法签订协定了。尼克松看来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民

意测验预示他将取得大胜。大多数美国人看到过去几周外交活动极其频繁，都以为越南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了。基辛格明白了，如果赶在大选前签订协定的代价是华盛顿与西贡公开破裂，并可能因此带来严重后果，那么总统是不干的。

10月21日，即基辛格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下午，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宣布：总统、基辛格和罗杰斯会晤了一个小时，研究了最近为实现谈判解决而在西贡和巴黎所作的努力。齐格勒说：“我们正在取得某些进展”，但是他劝大家不要“想入非非”。

人们很快就懂得为什么齐格勒说话那么拘谨了，因为阮文绍总统刚刚在西贡电视上对南越人民发表讲话，透露了他同基辛格格舌战的情况。在长达两小时的电视讲话中，阮文绍情绪激动，一会儿照念讲稿，一会儿信口而谈。他说，美国人和北越人在巴黎谈成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

他一方面承认，可能很快要在南越实行就地停火，同时他又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决不接受什么联合政府，也不同意让“30万”北越军队留在南方。他还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或签订任何协议……谁也不能代表我们行事，不能强迫我们服从他们的决定。”

在巴黎的北越发言人立即发表声明，痛斥阮文绍的讲话。该发言人指责阮文绍“顽固地反对和平和民族和睦”。不过他说阮文绍决非单干。他宣称：“美国政府无非是利用阮文绍那张嘴来推行其拖延战争和阻挠为迅速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而进行严肃谈判的政策。”基辛格意识到，河内也许在策划一项惊人行动，可是猜不透是什么性质的——是军事行动，还是外交行动。

自从基辛格回到华盛顿以后，华盛顿几乎所有的外交记者都想找他打听个究竟，其中有《纽约时报》当时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马克斯·弗兰克尔。星期二他没有得到机会。到了10月25日，星期三，上午九点钟，突然基辛格办公室给他去了电话。

这位总统顾问说：“我原来约定同人家吃午饭的，现在吹了，今天我请你吃午饭怎么样？”弗兰克尔马上答应了。基辛格约好12点半到离白宫一条街那家他经常光顾的莫愁餐厅。

基辛格一面吃饭，一面向弗兰克尔渲染自己如何马上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基辛格暗示，越南和平即将来临。这就是那些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件荒唐悲剧的《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等人多年来所鼓吹的目标——换句话说，这种和平能使鸽派和鹰派携起手来，从而使全国重臻团结。基辛格说，《纽约时报》应该夸奖总统，而不应该批评总统嘛。

弗兰克尔接着就探听具体细节，基辛格提纲挈领地概述了协定内容：停火在即，美军撤出，战俘回家；阮文绍控制大部分农村和全部人口集中点；共产党方面将保留一块块的孤立地区，称为越共控制区，由河内留在南方的北越军队驻地，美国估计这些部队的人数为14.5万人；成立各种联合政治委员会负责制定新宪法，组织新选举，等等。

弗兰克尔陪基辛格走回白宫，当天下午又打电话仔细核对了午餐时所谈的各点。在通常情况下基辛格总要叮嘱一句说，他所谈的“不供发表”或“仅供参考”。而这次他竟痛痛快快地核准了谈话内容。很快就排好了版，准备在《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出来。

10月26日，星期四，凌晨1点46分，外国电台收听处终于听到了河内发表的一项2500字的政府声明，公布了越南问题的九点协定以及秘密谈判的

细节。

北越这篇令人震动的广播一下子拉开了这场保密最彻底的谈判的帷幕。

凌晨两点，一阵电话铃声把基辛格从睡梦中惊醒。是黑格来电话报告刚从白宫的情况室了解到的河内电台广播。基辛格立刻给尼克松挂了电话，接着又给沙利文去了电话。

接着，基辛格、黑格和沙利文用电话同各方磋商了足足三个钟头，研究对河内的这个行动怎么办。这三个越南谈判老手开头以为河内想破坏谈判，但是很快就断定，河内无非是想压美国如期在 10 月 31 日签订协定。沙利文建议基辛格当天上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主要是让北越放心，哪怕还需要推迟一些时间，美国仍然是信守 10 月 8 日那个和平方案的。

上午 7 点半，尼克松和基辛格边进早餐边商讨对策。总统同意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向北越方面打招呼。私下联系固然可以满足外交上的需要，但不能适应总统选举前两个星期的宣传上的需要。基辛格知道，他在新闻界露面时，人家准会提出一些尴尬的政治问题来问他。例如，人家肯定会问他：为什么不在四年前达成同样的协定？他也知道，不管自己怎么解释，人家也未必相信。不过，他打算重申，美国要结束战争的决心与大选的日子无关。

基辛格最担心的是，河内领导人“可能认为我们对他们施展了一个大骗局——让他们在南方的部队暴露出来，以便人们加以消灭。”他觉得，美国“永远也别想得到这个协定，除非我们毫不动摇，并告诉西贡，事情就这样定了”。

基辛格本来想在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便看看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情况，但是总统决定在上午举行，越早越好。两人商定，基辛格应该强调一个主题，即美国对协定的基本内容将维持原议，但不愿被人硬逼着在 10 月 31 日之前签字。他要指出，还存在若干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可以在巴黎再举行一次谈判，有三四天大概就会得到解决。总统没有料到，基辛格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四个字，竟然使整个美国为之振奋，而且成了世界头条新闻。

从上午 8 点半到 10 点，基辛格、黑格和沙利文从各个角度——华盛顿的，西贡的，河内的——研究了形势。齐格勒急于知道基辛格准备何时开始举行记者招待会。各大广播和电视公司希望搞“实况”转播，基辛格把是否搞“实况”的问题推给齐格勒去决定，齐格勒又推给了霍尔德曼，霍尔德曼决定不搞。他暗示只有总统讲话才可搞“实况”，基辛格不宜用这个规格。至于“何时开始”，要由基辛格来决定。10 点刚过，基辛格便通知齐格勒，大约一小时之后就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

基辛格独自在办公室里，把想讲的要点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找出了几份文件，到 11 点 35 分，走进了白宫新闻发布室，齐格勒、沙利文和黑格跟在后面。

“女士们，先生们”，他说得慢条斯理，不时清清嗓子，“现在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两个越南的声音，很明显这场打了 10 年的战争快要结束了……”

“我们相信，和平在望了。我们相信，一项协定已经近在眼前。”

基辛格有时看一下那份提纲，但更多的时候是盯着拍摄他讲话情况以供事后播送的电视摄影机镜头。他详细地剖析了越南和谈的情况。他说，“河内电台正确他讲了”10 月 8 日建议的主要内容，即构成协定的那几点。他说：“我们对他们概述的情况没有意见。”但是基辛格谈到了“某些令人关注的

问题和某些含糊不清之处”，表示华盛顿和河内之间在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距离，即何时签订协定。河内定的期限是10月31日。基辛格着重指出，虽然10月31日一度曾是个实际可行的期限，但是美国现在需要推迟这个期限。

“留下的问题只需再同北越代表举行一次谈判就能解决，依我看来，顶多三四天就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拖很长的时间。”

“和平在几周或者更少一些时间里就能实现，这取决于这次会议什么时候举行。”

基辛格在结束讲话时强调了以下三个要点：“在得到合适的协定条款之前，我们决不能让人家逼着签署协定。”（这是说给河内听的）“当条款合适的时候，别人也休想阻拦我们签署这个协定。”（这是说给西贡听的）“本着这种态度，只要对方给予一定的合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很快给美国重新带来和平和团结。”（这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

记者招待会在中午12点35分结束了。几秒钟之后，“和平在望”这一重要新闻传遍了全世界。美国全国上下松了一口气，战俘和军人家属欢欣鼓舞，国会一片叫好声，股票市场价格猛涨。人们处在这猛然的欣喜情绪中，谁也不去注意基辛格所提到的那些“细微末节的差异”、“分歧”和“六七个具体问题”。这时人们玩味着和平似到未到的又惊又喜的感受，一时忘却了这场似停未停战争的各种数字：仅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军1.5万多人阵亡，11万多人负伤，美国共耗资500多亿美元，投下了360多万吨炸弹，南越老百姓死伤达60多万，南越军、北越军和越共的伤亡，那就更大了。

就是在这样得意洋洋的一天，基辛格也轻松不下来，从下午3点到4点，他向电视记者吹风，补充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话；4点到5点，他答复专栏作家们的电话，一方面接受他们的祝贺，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些情况；5点到6点，他同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谈话；6点以后，他继续回答记者们纷纷打来的电话，又补充提供了一些情况——大都在报上登出来了，说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或“政府人士”提供的。第二天基辛格接见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然后分别接见了《纽约时报》、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记者。第三天，他会见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和其他一些著名评论家。总而言之，他想通过这些活动让新闻界大力宣传“和平在望”这一观点，希望这样做有助于医治越南问题在美国造成的创伤，并使全国相信，战争又打了四年是不能责怪本届政府的。

其他任何官员，甚至那几个了解谈判内情的人，都被禁止对记者发表谈话。问到这些人，他们就说：“找亨利吧，他会告诉你的。”各家记者的报道，既无法从别处查证、核对，又都不点出消息来源。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外交、政治和宣传的做法，是由于消息非常闭塞，以及对一个官员的品格寄以无限信任。此人权力之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能把一件事情的全部新闻报道控制在手里。

第十章

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离开白宫新闻发布室后 6 小时，收到了河内发来的一份电报。黎德寿建议早日恢复巴黎谈判；不过，据基辛格说，黎德寿没有提出具体日期。基辛格刚刚公开应承要“再举行一次谈判”，这次谈判举行“三四天”，仍可在总统选举日之前搞成一个最后的和平协定，这是河内所希望的，基辛格也可以借此践约，并使事情按他的原计划进行。然而，尼克松却拒绝了黎德寿的建议。

基辛格在他那著名的“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后 6 天，11 月 1 日，来到了南越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他一出现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大厅里挤满外交官、将军、参议员、众议员、新闻记者。大家都问：什么时候实现和平？他打趣说：“记者们每隔 15 分钟就来电话量一量我的体温。你看他们全来了，团团围着我，好像我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似的。”人们不断拥上前来握他的手，高声向他道贺；摄影记者咋咋呼呼地照个不停。一个不知姓名的妇女挤到基辛格身边，低声说：“你是真正的亨利·基辛格吗？”这个真正的亨利·基辛格回答道：“人家是这么说的。”

基辛格往小菜桌走去，那里摆着各色美味食品，其中有虾饼蘸辣鱼露。他喃喃地说：“我喜欢吃越南菜。”但是人这样拥挤，他一直没能吃到那味菜。他到场了 25 分钟，尽到了礼节，就走了。

基辛格乘车沿着马萨诸塞街来到白宫。总统正在为预定在第二天晚上广播的一篇政治讲话稿作最后润色。就在上个星期，基辛格还说只要“再谈判一次”就可结束战争，从而在全国和全世界鼓起了一个乐观的高潮。总统 11 月 2 日的讲话似乎从这个大话后退了一些。

总统讲话的调子是谨慎的，与基辛格的有明显的不同。尼克松也讲取得“重大突破”，“很快”可以宣布“体面的和平”等等。但他所预计的时间显然大大超出基辛格所许下的“三四天”。他说：“协定谈合适了我们才签字，早一天也不干；协定一谈合适，我们就签，一天也不拖。”

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还有几点差别。总统说，他的目标是要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虽然他明明知道基辛格—黎德寿协定草案并未规定南越停火的同时在柬埔寨和老挝也要停火。此外，尼克松很强调那些“含糊之处”、“细节”和“中心点”等等，毫未表示这些可以很快解决。尼克松集中谈了还需要做的事情，基辛格则强调已经做到了的事情。

这不单纯是用词不同而已。虽说他们两人都力求结束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可是到 11 月初已越来越明显，总统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打算要的价格，比基辛格认为可能同北越谈妥的要高。阮文绍天天在那里骂协定草案是“出卖”，这似乎重又激发了总统冷战武士的本性，心想河内那么迫切要求签订协定，这里一定有鬼。

在尼克松的亲信当中，不乏基辛格的对头，这些人当然热衷于夸大协定的缺点。由于种种原因，基辛格实在树敌过多：这群官僚中间，有的嫉妒他的成就，有的不满他的飞扬跋扈，还有的干脆就瞧不起他。他们不惜毁掉他美国外交魔术师的声誉，损害他同总统的工作关系。

有一些接近莱尔德的五角大楼官员，给了总统一份据称是核实了的情

报，说北越计划在停火宣布后在南方发动一个大规模抢占地盘的行动。他们说，要挫败这一计划，必须有一支人员齐全的国际监察部队在停火时在场才行，然而协定没有规定这样一支部队。言外之意显然是怪基辛格欠考虑。罗杰斯提出了国务院的简要意见，认为谈判协定起草得太匆忙、太马虎了。就连黑格（他刚刚开辟了一条单独通向总统的渠道）也埋怨说，基辛格对黎德寿彬彬有礼，而对阮文绍却粗暴异常。但对基辛格批评得最厉害的还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据说，两人散布流言说，基辛格在谈判中越出了他的授权范围，可以说是背着总统私自同黎德寿作了一笔秘密交易。假如停火垮台，阮文绍遭殃的话，基辛格显然就要成为替罪羊的。

11月的第1周，尼克松与基辛格再次商讨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政策，并把有争议的问题分成主要与次要两类。基辛格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会有很大障碍。

基辛格把谈判项目的先后次序考虑好后，就与河内进行了一阵函电往返，结果在11月4日，即美国大选前三天，达成了秘密协议，决定在11月20日恢复巴黎谈判。基辛格对速决的可能性抱有希望，理由有二：第一，河内的口气像是想解决问题的样子。第二，基、黎两人又将进行一轮谈判。几星期以前，他们两人原已以为“和平”在望，但是后来这两个谈判者的信誉都受到了损害——基辛格是由于尼克松拒绝不顾西贡的反对而遵守10月31日的期限；黎德寿则由于无法向河内的政治局交代他认为已与美国谈妥的停火何以未能实现。现在，再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和平”还是有可能争取到手的。

11月7日大选结果，不出民意测验专家所料，尼克松大获全胜，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胜利。他赢得了49个州，60%以上的选票。比之四年前是大不相同了，那时他只凭千分之七的微弱多数而勉强入主白宫。

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和谈即将恢复的迹象。11月10日，春水对法新社记者说，黎德寿即将前来法国首都；他表示，如果美国不打算对九点协议草案作“根本的”修改，那么再同基辛格举行一次会谈是可以的。法新社从河内报道说，那里正在为释放美国战俘作准备。在马尼拉，美国正在调集一批扫雷舰艇，准备为北越港口扫雷。在万象，梭发那·富马首相会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总书记富米·冯维希，这是双方为解决老挝连绵战祸所作的首次重大努力。来自西贡的消息说，黑格将军带着尼克松的一封信陈述美国新谈判立场的信件到达西贡，此行结果如何对基辛格极关重要，将决定他同黎德寿谈判时有多大回旋余地。

黑格由邦克大使陪同，于11月10日（星期五）在总统府与阮文绍和黄德雅会谈了两个多小时。当天晚些时候，黑格又同黄德雅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足见讨论之急切。第二天，这四个主要人物又讨论了将近4个小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的意见，指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的空运即是尼克松对阮文绍友好的证明，也是他保证要获得体面解决的证明。阮文绍对运来物资表示感谢，并祝贺总统再次当选。然而不出所料，他拒绝就谈判立场作出妥协。他坚持北越军队必须从南方全部撤出而不是象征性撤出。他还反对任何想以秘密谅解代替书面保证的主张。关于要求河内承认非军事区为南北越之间明确的分界线这点，他也毫不让步，他还排除了西贡在南越任何部分放弃主权的可能性。总之，他是在美国看来急于交易时，力图加强他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

黑格再次强调，尼克松决心在对得起南越和美国双方所作的巨大牺牲的

情况下才接受那个协定；接着又婉言表示，假如同河内谈成了这样的协定，美国觉得自己就可以签字了，不管西贡同意不同意。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后来说道：“冰山正沿着自己的流向前进，在西贡不管怎么谈，都改变不了这一切。”这时，黑格已引起西贡当局极大反感，因此有些南越官员私下骂他“小暴君”了。

当这次重要谈判在西贡进行时，基辛格正在比斯坎岛度周末，总统也正在岛上他那面向海湾的别墅中休息。有一天，基辛格对《洛杉矶时报》记者罗伯特·托思说，他对阮文绍所提北越军应全部撤走的“最低要求”越来越感到不耐烦。阮文绍明知美国早在1979年10月已经放弃了这个立场。基辛格说，过去在美国巨大的空中和地面支持下，阮文绍都没有能把北越军队赶出南方，如今停火在即，他又如何能硬叫人家撤出呢？看来明显的是，基辛格想要在11月底以前，至迟12月初把协定搞下来。

黑格就在那个周末离开了西贡。随后，美国大使馆宣布，他同南越总统的会谈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言下之意是还存在着问题。南越外长陈文林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与西贡的立场已经“接近一些”——言下之意是双方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黑格在金边和汉城稍事停留后，下午5时左右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他走上喷气机的舷梯时，基辛格上前迎接。接着两人同乘等在那里的一架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尼克松在比斯坎岛休息了一阵后已经来到这个山顶休养地了。黑格主要汇报了阮文绍还是“不干”的情况。尼克松并不很惊讶。他重申应该把阮文绍的要求向黎德寿提出，但不要让这些要求阻碍达成协议。

11月14日，河内电台宣布，黎德寿已离开河内去巴黎。广播说：“最近，美国方面建议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举行另一次秘密会谈，以解决签订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再一次表示其诚意与认真态度，已同意美国方面的上述建议。越南人民要求美国政府认真地、真诚地、坦率地进行谈判，只有这样才能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基辛格把这则广播稿拿给一个记者看，一边说道：“告诉你的朋友麦戈文，我们就要签和平协议了，大概要不了几个星期。”基辛格的轻蔑之意溢于言表，他说：“麦戈文和阮文绍一搭一挡，同我们作对啊！”

黎德寿在11月17日抵达巴黎，路上照例在北京和莫斯科各停一天。

基辛格在11月19日（星期日）晚回到了巴黎，同黎德寿进行另一轮秘密会谈。

基辛格对聚集在奥利机场椭圆形贵宾休息室里的外交官和记者们说：“总统派我来进行谈判，他希望这是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谈判。给我的指示是本着和解、克制、善意的精神进行会谈，需要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

在大批警察护送下，基辛格驱车前往座落在圣奥诺雷近郊大道的美国大使的豪华住所。

有个记者问他：“明天上午的会谈在什么地方举行？”基辛格笑了笑说：“我已经作了布置，决不让人盯我的梢。我决不让闹得像演马戏似的。”

自从1968年5月以来一直采访和平谈判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社巴黎分社主任彼得·卡利谢尔出来应战。10月20日黎明，他派了两名摄影记者跟踪基辛格和黎德寿到他们的秘密会晤地点。一名摄影记者守在圣奥诺雷近

郊大道旁的一条小街的合适地点。当大使住所的绿色铁门一打开，法国警察就拦住街上车辆，让基辛格那辆由一名空军上校驾驶的白色轿车开入繁华的商业大街，驰往秘密会晤地点。其他官员的车子紧跟在后面。这位摄影记者紧跟着他那尊贵的对象——这一手在巴黎的车流中真不简单——一直跟到郊外。巴黎警察极力想把他甩掉，但在去吉夫絮伊维特的莱热别墅的45分钟疾驰中，他却一直紧跟在官方车队的后头。

与此同时，另一名摄影记者把他的摩托车埋伏在什瓦齐勒罗瓦的北越代表驻地附近。上午9点半，他看到一支黑色雪铁龙牌的车队开出来加入街上车流。警察也企图甩掉他，可是老甩不掉，就把他逼到路旁，威胁他说，要是他不放弃追踪，就当场毙了他。有一个警察真的掏出了左轮手枪。摄影记者解释说，他只不过是一个电视记者，并不是刺客。警察这边一走开，他那边又跟了上去，不过这次礼貌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等他赶到地方，他的那位同僚已先到了。于是，吉夫别墅的谜就这样揭开了。从此以后，这座郊外别墅里举行着谈判的整个期间，不管是下毛毛细雨还是瓢泼大雨，还是大雪纷飞，总有一小群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等候在这幢两层楼房外——有的还爬到树上，只要一看到基辛格，就挥手高喊：“哈罗，基基，哈罗，基基。”

第一次谈判于上午10点半开始。双方先说了一番客套话后，基辛格把阮文绍的最低要求摆到了桌面上，并且没有等黎德寿来得及加以拒绝就指出，这是阮文绍的要求。接着他又提出了尼克松的要求，指出这是总统的最低要求。基辛格肯定是想要让河内的代表看到，两者是不同的。

基辛格首先提出了“文字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黎德寿最初提出的草案用的是英文。双方都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最后互相都满意了。当时以为，英文草案的每一项改动都已由黎德寿的助手在措辞完全相同的越文本上照改了。但当基辛格的越南文专家戴维·恩格尔把越文草案拿来核对时，发现并没有完全照改，结果，两个草案有很大出入。当基辛格在西贡初次把越文草案拿给黄德雅看时，黄德雅一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基辛格特别留意要杜绝在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上产生任何模糊之处。基辛格提醒黎德寿说，双方曾一致同意，对于该委员会，恰当的越文提法应是“行政机构”，而不是“政权机构”。黎德寿说他记得这一点。他暗示，范文同在河内接见德博会格拉夫时，可能说得不够确切。这个委员会的确是一个“行政机构”，不应解释为是一个“联合政府”。

接着，基辛格提出了一件他当时认为“主要是技术性的事情”。他向黎德寿提出了一张各种各样“议定书”的长单子。在外交上，“议定书”是用来规定履行协定原则的方式的。例如，基本协定确立了“就地停火”的原则，但如何安排和保证这种停火，就只好由议定书来规定。换句话说，维持和平的军队要有多少？检查点要有多少？应该设在哪里？由谁指挥？有什么保护措施？由于预先得到警告说，北越可能在停火一生效就出动抢占地盘，因此基辛格要求建立一支“有足够力量的”国际监察部队，及时“开赴现场”以尽可能减少任何这种违反协定的行为。这是基辛格第一次向北越提出一张议定书清单。只要想一想仅在一个月前，他还准备在没有任何保证停火的实际手段的情况下就与北越签订协定，这件事就显得突出了。那时，他原以为沙利文、奥尔德里奇等“技术人员”会处理这些细节问题的。

黎德寿对基辛格所提的认定书清单未作具体回答。

据基辛格后来说，最后，“我们要求在协定中能提一下（不管怎样含糊，怎样隐晦，怎样间接），越南的两部分将和平相处，任何一方都不用武力把自己主张的解决办法强加于对方”。这是变相地要求承认 1954 年原来那个非军事区为南、北两方的分界线——这是阮文绍的一项要求，已为尼克松所接受，但基辛格显然认为并不十分重要，因此在 10 月谈判中并未提出来。这显然是要求在草案中增加一条新的内容。黎德寿对这个建议也未具体作答。

黎德寿在历时 6 小时的会谈快结束时说：“亲爱的亨利，当我们在谈判结束以后，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哈佛当一个讲马克思主义的特约教授？”这个问题——两位谈判代表之间随便讲的一句笑话——看来是一种和解的信号。

基辛格回答说：“欢迎嘛，不过，也得让我在河内教一门政治学啊！”

双方约定在 11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3 点再见面。吉夫别墅已不成其为“秘密”地点了。

基辛格回到巴黎美国大使住所后，立即发电报给尼克松，汇报当天的结果。他又打电话给霍尔德曼，谈了些非实质性的情况，如会谈的时间多长，气氛怎样等等。然后，为了再一次显示与一个焦急不安的盟友的团结（虽然它的意见并不决定谈判的结果），他对西贡大使范登林介绍了情况，特别强调黎德寿关于委员会不会变成联合政府的保证。此后他每次同黎德寿会谈之后，都要向范登林介绍情况，渐成定例。同样，黎德寿和春水对临时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阮氏萍也是这样。

星期二差不多整个上午，基辛格一直在大使住所里与助手们研究问题，给华盛顿打电话。午后不久，他才出来陪一位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到开在布瓦西·唐格莱街的路易斯大娘餐馆。这家餐馆在《米歇尔旅游指南》上并不出名，但那一天，由于基辛格选择在那里与旅居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的太太简·罗斯·库欣一同吃了一顿午餐而闻名全球。库欣太太婚前就跟基辛格认识。基辛格的赫赫盛名吸引了许多人到那条小街里来，结果不得不请来警察把摄影记者和看热闹的巴黎人从他们在吃着尼斯沙拉和炒牛肝的餐桌旁赶开。

基辛格吃这顿饭时叫人照相照个够。过后，他驱车前往吉夫别墅去继续谈判。事情似乎进展得挺顺利。下午 5 点 45 分，基辛格和黎德寿来到花园散步，透透空气，“哈罗，基基，哈罗，基基”，摄影记者们隔着马路从他们在树上搭的窝架上喊道。基辛格笑了。黎德寿戳着手指谈论着什么问题。基辛格打趣说：“别老对着我戳指头啊，人家以为你在训我呢。”黎德寿回答说：“我想笑的时候，总爱戳戳指头。”说完笑了，基辛格也笑了，摄影机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个镜头。

下午 7 点半，两位谈判代表走出来了。黎德寿送基辛格到汽车跟前。双方已经谈好星期三下午再碰头，两人热烈地握了握手，又站着让记者照了一会相。

当晚基辛格草拟了给总统的简报，跟霍尔德曼通了电话，又跟范登林简单联系了一下，然后飞往布鲁塞尔。他打算第二天上午同正在访问比利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商讨关于请印尼参加四国委员会在停火生效时帮助监督停火的事。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匈牙利和波兰一起——已在原则上同意参加这一部队，但河内反对印尼参加，理由是，它是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反共国家。基辛格相信河内的反对意见是可以克服的，他需要确知印尼是否仍愿作为这支部队的四个成员国之一。他在比利时首都举行的一次 75 分钟的

早餐会上，从苏哈托和他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得到了这个保证。

基辛格回到巴黎，径往吉夫别墅，黎德寿已在那里等着同他进行第三次会谈。下午，他们没有一起出来让人照相。会开了三个半小时，基辛格走时像通常一样向摄影记者们招招手，可是黎德寿出来时却面色阴沉，没有笑容，也不向人招手。

采访这次谈判的新闻记者当晚写稿时都伤脑筋。由于没有人向他们发布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一向主要是根据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每天的脸色变化来写报道的，忽然这天一个笑了，那个不笑，这个新闻导语，真没法写啊。

基辛格给尼克松发回的报告仍然基本上是乐观的，不过也有一些麻烦的迹象，基辛格觉得黎德寿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双方商定星期四感恩节上午10点再谈，也许到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这天，西贡也出现了一些麻烦的迹象。阮文绍的外交政策顾问阮宫德正在经巴黎赴华盛顿途中，目的是告诉美国，西贡对停火协定越来越不安了，逼美国对西贡的三点基本要求作出最后保证：不得搞联合政府；所有北越军队必须从南方撤走；明确规定非军事区为两个越南的边界。

使基辛格不安的是，西贡控制的报纸突然对他发动了攻击。西贡电台的一则评论骂基辛格“野心勃勃”，“太急躁”，“有错误”，“自高自大”。这篇评论明显地反映总统府的观点，还说：“真正的越南人实在难以相信，像基辛格先生那样一位备受一个强大国家总统信任的堂堂大学者，竟会上了共产党的当。”评论明显地想要挑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关系，继续写道：“这位总统助理可能是越权行事了……人们的印象是，基辛格先生已越出他的权力一两步，达到了侵夺他的上司总统权力的地步。人们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基辛格放聪明一点的时候，莫再那么野心毕露地为自己树碑立传了……南越人民希望这位美国博士衔顾问大人认识到，最好的教训莫过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要再对敌人抱幻想，他自己也懂得这个敌人从不让步，经常用背信弃义的卑鄙手段来骗取最大利益，南越人民坚决反对今后再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

基辛格听到西贡把他骂成是一个欺骗总统的、毫无原则的暴发户，心中大怒，西贡上层阔人深怕美国撤走，他们所办的报纸也纷纷谩骂基辛格。有些官员还直称基辛格为“那个犹太佬”。

西贡咖啡馆里的传闻甚至说，学着反犹腔调骂基辛格的人当中也有阮文绍。传说阮文绍曾说：“这个犹太教授跑到西贡来，一心只想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当这个小道消息搞得满城风雨时，有位记者说，他曾问过黄德雅，阮文绍确实讲过这话吗，黄德雅否认，同时开玩笑地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个记者的肋骨。

据南越人说，基辛格打了个电报给黄德雅，对这些攻击提出质问。黄德雅作为阮文绍最亲近的顾问，否认政府同这个突如其来的反基辛格浪潮有任何关系，宣称西贡的报纸、电台是不受政府新闻检查约束的。由于西贡政府对于离开官方路线的报纸经常不是勒令停刊就是查封的，所以这种辩解未免站不住脚。黄德雅后来把责任统统推到西贡报纸身上。他说：“我们政府里的人总要高明一些的，我们不会那样蠢的嘛。”

奇怪的是，西贡关于基辛格越权行事的说法，在华盛顿竟也有人遥相呼应。11月25日出版的保守派双周刊《世事札记》引述“政府最高机构”未透露身份的某一人士的话说：“总统对基辛格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因为他

同共产党订的协定（据反对他的一个观察家说），实际上是容许共产党‘可以开进来几千辆坦克’。”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刚一看到基辛格 11 月 4 日对奥利亚娜·法拉奇发表的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就发作起来。这篇谈话在意大利报上刊出后，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对法拉奇女士大谈他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事业成功的诀窍在于我是单独行动的。美国人就是喜欢这样子。他们就是喜欢那牛仔单人匹马率队前进的模样，就是喜欢他骑着马儿走南闯北，赤手空拳，也许连枪也不带一支，因为他从不打枪。他只消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略显身手就行了。总之，是西部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这种充满浪漫色彩、出奇制胜的角色很投合我的胃口，因为独来独往一向是我的一个作风，也可以说，是我的技巧。”

基辛格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单人匹马包打天下的好汉的这番话，使白宫牛棚里那些高级牛仔为之哗然。据一个助手说：“那天正是中午时分，在白宫西翼老楼里，至少有五六个白宫里的大人物在看到这篇报道时气得一跳三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狂妄的吹牛了。”另一个助手则说，有人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只是“一时失言——亨利无非是因为同一个漂亮女人说话，弄得不知所云罢了”。

后来基辛格回想那次谈话时，也叹息道：“我不至于说那样的话吧，不可能嘛。”

11 月 23 日这天，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感恩节，而对基辛格来说却成了吃闷日。他和黎德寿会谈了 6 个小时，好像河内有人忽然扳转道岔似的，对方谈判的语气和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三天来的“善意”，一变而为斤斤计较，咄咄逼人，炙炙肝火——按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说法，“这次谈得糟糕透了！”

黎德寿忽又提出他原已放弃的要求，定要阮文绍政权下台。基辛格大惊。黎德寿接着痛斥西贡的各项具体要求。他指责阮文绍坚持的南、北“两个越南”的主张，而提出搞“三个越南国家”——除北方外，把南方分为阮文绍控制区和共产党控制区两部分。同时，他强调“越南人民是一个整体”——这一声明排除了把非军事区作为边界的可能性，而使河内有自由通过的权利。最后，黎德寿收回了他早先作的一个让步；他说，象征性地撤出北越军队（原来是为促进达成协议的一个善意表示）现在“谈不上了”。

基辛格问黎德寿为什么改变立场，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一来，好像 10 月的突破是一场空了。基辛格于是警告黎德寿说，总统停止对北越 20 度线以北的轰炸，是希望谈判能“认真地”进行，言下之意是轰炸随时都可以恢复。黎德寿反驳说，北越方面是“认真”谈判的，是美国方面横生枝节，提出了一大套新要求。

黎德寿对基辛格拍着桌子厉声说话，这在谈判中还是第一次。他怒气冲冲地说：“10 月 31 日的期限过去了，你们的选举也举行了。依我们看，战争是可以继续打下去了。”基辛格不敢把黎德寿的反警告看作是空洞威胁而等闲视之。这种警告立即使人联想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景象：共军发动新攻势，美国恢复轰炸，西贡又要大闹一场，国会再次开动起来要求用立法手段制止战争，而不让基辛格继续争取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

谈判一时看来已经陷入绝境。基辛格原以为到周末，即一两天内，就可以把最后文件谈妥。现在看来，迅速达成协议是不行了。他生怕这一来人家会指责他 10 月 26 日那个“和平在望”的诺言完全是临近大选时搞的一个大

骗局。很明显，基辛格需要得到新的指示，黎德寿也需要向上请示。于是，这天两人唯一的一致意见就是，第二天再在吉夫别墅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已毫无意义，而举行一次正式的会见也许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基辛格那天晚上发给尼克松的电报，当然丝毫无助于增进总统在感恩节宴会上的胃口。

基辛格后来解释说：“我们不知道当时河内究竟作出了些什么决定，不过自那以后，谈判老是这个样子：解决办法好像已唾手可得，可是，当我们真要伸手去抓住它时，它又缩回去，让你抓不着。”

基辛格推想：可能是河内的十人政治局里有一两个人改变了立场。夏天决定进行这笔交易时，领导层并不是一致同意的。基辛格估计可能是在六对四、顶多是七对三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后来，河内政治局看到尼克松拒绝遵守 10 月 31 日的期限，表现出不再那么急于签订协定，而且在几个星期内就把南越一年所需要的军事物资赶运了去，还对阮文绍 10 月中旬推翻原定时间表的做法予以迁就，加以基辛格在上次会议上又忽然提出了阮文绍的最低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大概是疑心尼克松耍花招，企图麻痹北越军队，好让南越军队发动突然进攻，于是就缩回去了。基辛格估计，另有一种可能是，河内现在决定等一等，让美国国会投票，或者禁止轰炸，或者停止为阮文绍拨款，或者双管齐下，从而迫使美国退出战争。

北越官方对感恩节那天变化的解释比较简单。河内指责基辛格横生枝节提出新的复杂问题，从而改变了 10 月 8 日协议的基本性质。

11 月 24 日，由汤姆·芬顿领导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组又一次跟踪基辛格，来到他同黎德寿会谈的地点。这一次，是在黎德寿的住处会晤的，那是座落在什瓦齐勒罗瓦的达尔特街上的北越人的一所房子。基辛格本来是希望他和黎德寿非正式会谈这个秘密能够保住的。他身边只有黑格陪同，两人同黎德寿谈了两个小时。基辛格一出来，就直奔铁栅门，伸手拧门把。可是拧不动，推又推不开。他争叫起来：“我怎么出得去呢？”这话恰恰道出了他的真实困境。后来一个警卫打开了栅门。基辛格从芬顿身边走过，说了声“无可奉告”。

那天早晨，巴黎传闻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是南越方面散布的，北越方面也未加以否认。

当天下午，基辛格同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谈了 45 分钟，请他帮忙打消这些泄气的流言。傍晚时，法新社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关于越南问题的悲观传闻看来有点大大言过其实。”尽管基辛格一见到新闻记者就装笑脸，但流言照样到处传播。

11 月 25 日（星期六），基辛格又来到什瓦齐勒罗瓦，与黎德寿会谈了约两个小时。末了，基辛格建议休会到 12 月 4 日再谈。黎德寿同意，他说他将留在巴黎，等基辛格回来。基辛格离开北越人住处时，像通常那样露出笑脸。

几分钟后，黎德寿也离开了那里，脸部毫无表情。

基辛格直接飞往纽约，当晚 9 点 45 分到达肯尼迪国际机场，马上乘车前往曼哈顿闹市区的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总统的套间去同他商谈。摄影记者们获得了一个正式的“照相机”，进入客厅拍照。这时两人坐在沙发上，膝头放着活页笔记本和牛皮纸卷宗，低声谈话。基辛格忙提醒总统说，摄影记者们有可能听到国家机密。一位摄影记者当即请这位总统发言人放心，说

“没有听到多少”。尼克松把脸一沉，继续同基辛格低声谈话。齐格勒赶忙把摄影记者轰了出去。

总统和基辛格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一般情况下，过后是由基辛格交代齐格勒向新闻记者说些什么。这一回，是由尼克松亲自向齐格勒布置。于是这位发言人坚定地说：“尼克松总统相信我们一定能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我们正在争取这样做。尼克松总统认为，最重要的是搞一个能长期起作用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管长期，而不应是只管短期的。他准备付出必要的时间来争取那种能持久的解决办法。”

和平不复在望，时间表不算数了。

11月28日，阮富德抵达华盛顿。阮文绍原来是要他乘基辛格在巴黎忙于同黎德寿谈判的时候去华盛顿，争取同尼克松私下会晤一次。西贡仍然感到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是有分歧的，尼克松的谈判方针比较强硬。尼克松虽说在这个紧张时期对基辛格可能也有一些不放心，但是他不受阮文绍的挑拨，拒绝单独接见阮富德。只是在巴黎谈判休会、基辛格回到总统身边后，才通知阮富德，欢迎他到华盛顿来。

第二天，在尼克松按规矩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越南停火的赞同后不久，阮富德同总统、基辛格和黑格会谈了两个半小时。过了一天，总统再次同阮富德进行了磋商。据白宫发言人说，这几次会谈“极为详尽”，“极富于建设性”，“极为坦率”。明眼人一望而知这全是外交辞令。

在这一系列会晤期间，阮富德递交了阮文绍总统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求在签订任何停火协定前，举行一次紧急的最高级会谈，两位总统上次会晤是在1969年夏，离现在差不多有四年了。当时尼克松在一次环球旅行途中访问了西贡，签署协定前，尼克松不打算同阮文绍举行任何最高级会谈。

他郑重地向阮文绍的使者解释说，一旦他认为协定是“合适的”，美国就打算签字，“不管你们参加与否”。尼克松在阐述他的既定方针时，显然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即阮文绍的公开反对纯属虚张声势，撮终他还是要顺从美国的。尼克松警告阮富德说，如果阮文绍决定要单独打下去，他就要冒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或者是由于总统作出决定，或者是由于国会通过法案。尼克松说，美国的援助对南越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基辛格所说的，“你们如果不签字，就要自取灭亡”。尼克松重复了黑格曾对阮文绍提出的警告：只要基辛格能在12月15日前结束谈判，美国将签署协定。黎德寿已向基辛格保证，“第一批美国战俘”将在停火开始后的“十天内”获释，换句话说，即在圣诞节期间。对这些战俘（其中最早的是1964年在北越上空被打下来的飞行员）获释的憧憬，对总统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阮文绍接到阮富德的报告后，南越方面传出消息说，尼克松对南越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乖乖签字，否则没有好下场。显然，西贡以为，透露这个“最后通牒”的消息会激起美国右翼人士对白宫施加压力，反对抛弃一个在共产党威胁下处于困境的盟国。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讨没趣的错误估计。这个消息根本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受到了两面夹攻，左翼指责他“欺骗”，右翼攻击他“出卖”，这使基辛格突然感到筋疲力尽。正是这时，尼克松出来给了他以及时的支持。总统宣布，在他第二届任期内，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留任。尼克松希望，西贡能够充分看到他对基辛格公开表示的这种信任。关

于预定于 12 月 4 日恢复的巴黎谈判，尼克松通过齐格勒表示：“总统确信，基辛格博士将一如既往代表美国主持谈判，继续做出成绩。”有人问，基辛格的信誉会不会因为西贡对他不信任而有所毁损？齐格勒答道：“基辛格博士不仅全权代表总统，而且是按总统的指示行事的。”

12 月 3 日，基辛格正要动身飞往巴黎时，接到了一项令人不安的情报：河内正把小学生疏散出首都——显然是预防美国恢复轰炸。

12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10 点，基辛格和黑格乘车前往什瓦齐勒罗瓦黎德寿的住所，再作一次努力以求结束战争。在这幢有百叶窗的石砌两层楼房里，河内的代表一上来就重申他在上次会晤结束时所持的强硬立场。黎德寿简直能一口气背出他的各项要求：阮文绍必须下台，越南民族只有一个，河内没有义务撤出任何部队，更谈不上撤出所有的部队。黎德寿还强调必须立即释放南方的政治犯，否则将影响到整个协定。这是再次含蓄地威胁要扣住美国战俘不放。总之，双方顶了牛，弄得基辛格一筹莫展。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僵局之后，双方总算商定下午继续谈，完了次日再会晤。当基辛格离开别墅时，他发现有一只猫蹲在他的车顶上——一只白爪黑猫。这是凶兆呢，还是吉兆？基辛格问道：“哪位智者知道？”惹得大群电视摄影记者把这个场面拍入了镜头。

当天下午 3 点，双方在一个新地方继续交锋——这次是在离巴黎 19 哩的西郊圣日姆的一座豪华别墅。据基辛格说，黎德寿推翻了“两周前双方已协议的所有改动之处”。这是基辛格没有估计到的，他原先以为这一轮会谈可以“在两天内”结束。很明显，他必须得到总统对谈判的新指示，因为他授权有限。他建议取消星期二的会晤，改在 12 月 6 日星期三再谈。

星期三，基辛格和黎德寿来到塞纳河畔漂亮的纳伊郊区一个美国出生的珠宝商阿诺·克莱克的家里会晤，后面跟着一大群摄影记者，个个头戴防护帽，身穿鲜艳颜色的短外套。在院子里立即架起了巨大的天线装置，大概是用与几哩外协和广场的美国大使馆随时保持联络的。屋里挂满了弗莱明人的油画和壁毯。在这奢华的陈设中，基辛格与黎德寿开始逐步恢复到河内突然变卦前 11 月 22 日达成的协议。基辛格感到有希望，又打开了俏皮话匣子。他指着一盏吊灯说：“电灯泡一闪一闪时，就说明我们应该换换录音带了”。意思是不要老调重弹。

基辛格和黎德寿之间秘密地进行着重要谈判，这并没有使每星期四在美滇饭店举行的四方半公开和谈因而中断。美国、南越、北越和临时革命政府照旧进行四方谈判。在那周星期四会后，北越官员阮明伟指责美国“扬言要使战争升级”；他说，会谈“已陷于僵局”。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海沃德·艾沙姆的语气较为审慎。他说：“我们不应该让谈判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失望和挫折阻碍我们表现出我们争取和平的贯彻始终、不可动摇的愿望。”记者们认为，这种悲观论调也许反映了秘密会谈的实情。

那天下午，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吉夫别墅会谈了 4 小时。他们又略有进展。黎德寿放弃了他以前时而提出时而放下的要阮文绍下台的要求。关于全国委员会的“文字问题”也再次得到了澄清，排除了作联合政府解释的可能性。再次肯定了北越军队可能象征性地撤出。总之，这一切说明，在最后几次会谈中黎德寿的立场有了松动，在若干问题上恢复了他原先在 10 月 8 日协议中所作的保证。

当晚，基辛格打电报给尼克松说，星期六前也许能达成协议，如果要由

罗杰斯国务卿在最后文件上签字——罗杰斯当时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外长会议——就应该通知罗杰斯在星期五傍晚前赶到巴黎。

12月8日，星期五，基辛格和黎德寿的谈判地点改回到塞纳河畔的纳伊。又有了一些进展，但显然还不足以签订协定。基辛格再次看错了形势，他乐观有余而眼力不足。罗杰斯接到通知要他只管飞回国内，暂时搁下巴黎不管。

12月9日，星期六，这天巴黎的天气晴朗而有寒意。下午3点，基辛格乘车去吉夫别墅与黎德寿会谈了三个半小时。又有所进展。基辛格事后说：“我们认为我们已使分歧缩小到这样的地步，只要对方重新接受两星期前他们已经同意了的那一部分，协定本来是能够完成的。”“那一部分”是指非军事区的完整地位，意味着非军事区应是北越和南越间的边界线，不能渗透。

基辛格建议，双方主要负责人，即他和黎德寿，下星期一再碰头，但双方专家约定在星期日会晤，继续草拟执行协定的各项议定书：例如，绘制地图，标明南越的哪些地方属越共控制，哪些地方属西贡控制，哪些地方归属暂不确定。议定书同样涉及文字问题。基辛格后来透露说：“我们谈得差不多了，可以叫专家一起核对文本，以免再出现以前遇到过的文字困难，并确保英文文本上谈妥的各处改动，在越南文本上也相应改正。”

基辛格在离开吉夫别墅前，对黎德寿说，黑格将于当晚返回华盛顿，并准备去西贡坚决要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的定稿”。基辛格说，他希望黑格能在星期一或星期二抵达西贡，一两天后在巴黎草签最后协定。

双方专家——美国方面是沙利文，越南方面是副外长阮基石——于12月10日在塞纳河畔纳伊的克莱克家里会晤。不愉快的意外情况出现了。阮基石向沙利文提出了17处新的改动，他说是“文字上”的改动，但有几处显然过了线，属于实质性的改动。沙利文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过需要较多时间。他开始怀疑北越人可能在“玩把戏”。一个美国官员形容当时的谈判情况是“把战场上的消耗战搬到谈判桌上了，这确实是在考验谁的意志最坚毅啊”。

当晚，沙利文向基辛格作了汇报，基辛格转告了南越大使范登林。这个南越人求之不得，连忙放出了谈判再次陷于僵局的空。12月11日，星期一，开始极度紧张的一周。基辛格在塞纳河畔纳伊会晤黎德寿时，立刻提出了那17处新的“文字改动”的问题。黎德寿不答复，而是再次提出他喜欢提的那个问题：要求释放在南方的全部政治犯。他再次含蓄地威胁说，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与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可能要联系在一起。双方都认识到，这事关系重大，这样联系起来可能会葬送谈判。基辛格避开这一爆炸性问题，而端出了星期六仍未解决的非军事区问题。黎德寿根本就不愿谈非军事区问题。为了使谈判不致告吹，基辛格又使出了一招。他抛出了阮文绍最近提出的一个建议——交战四方，包括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全都在停火协定上签字。黎德寿愤怒地拒绝了这个主张，不承认这位总统有任何合法地位。河内以嘲笑的口吻把他斥之为美国的傀儡。这就使谈判又回到了这场战争的实质这一基本问题：争夺对南方的政治控制。

那天晚上，新闻记者们几乎没有看到双方有什么笑容。

星期二的会晤实质上是前一天僵局的重演。黎德寿拒不撤回自己的建议，即必须把阮文绍在南方监禁的政治犯同河内在北方扣押的美国战俘联系起来。他依然同过去一样，坚决反对明确规定非军事区为边界线。鉴于在重大问题上出现了障碍，基辛格建议讨论星期日阮基石向沙利文提出的文字问

题。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讨价还价后，双方总算把争执处从 17 处减少到了 2 处。双方还同意第二天上午再谈。

星期三清晨，基辛格接见了詹姆斯·赖斯顿。第二天上午刊出的赖斯顿的专栏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基辛格对他说，同黎德寿的会谈即将结束，但问题未了；至于阮文绍，此人简直是要人家给他的政权以人寿保险，基辛格认为这给问题的解决设置了最大的障碍。基辛格说，下一步怎么走是个重大问题，要由尼克松决定。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基辛格和黎德寿再次在塞纳河畔纳伊会晤。结果，又闹得不可开交。沙利文希望说定只剩下了 2 处“文字改动”，这时阮基石又向他提出了新的“文字改动”达 16 处之多，其中有 4 处肯定是“实质性”的。当基辛格设法集中讨论主要问题时，黎德寿还有令人更感意外的做法。他把河内草拟的执行停火的各项“议定书”交给基辛格。这位美国外交家满腹牢骚他说：“明明在 6 周前我们就阐明了我们的目标，5 周前本来是可以签署停火协定的。真想不到了今天还来这一手。”基辛格后来解释说，使事情越发不好办的是，黎德寿对“国际机构的看法”同他本人“截然不同”。北越人只想搞 250 人的象征性的国际部队，其后勤与通讯联络要么由越共提供，要么由西贡提供；换句话说，按所要调查的违反协定行为发生在何方的军政控制区而定。基辛格则要求建立一支约 5000 人的国际部队，这支部队可以随意到哪里去，并拥有自己的后勤基地，换句话说，不受越南敌对双方的控制。在基辛格看来，共产党采取这个立场无非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不是黎德寿企图诱使对方作出让步，就是河内打算在战场上争取一时的喘息，然后再在南方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不论出于哪个原因，基辛格认为这样顶牛下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他通知黎德寿，他回华盛顿去了，不过沙利文还留在巴黎，继续同北越人一起对“议定书”寻求某些共同点。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基辛格无法说服黎德寿接受固定的非军事区。他也无法劝阮文绍在主权问题上对临时革命政府作丝毫让步。他甚至在签字仪式问题上都无法说服越南敌对双方达成妥协。最后，他在“议定书”问题上陷入了“十足的僵局”。

北越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他们的发言人说，是美国人破坏了实现和平的机会；美国人在限期过后才回到巴黎，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他们说，只是在基辛格对 10 月间草拟的协定中某些有意写得含蓄一点的地方硬要使之具体化后，黎德寿才提出新的方案的。

在北越人看来，如果同意基辛格的要求承认非军事区为边界线，那就等于承认阮文绍政权，而这正是这场战争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如果接受基辛格的其他一些要求，也有碍于临时革命政府争取合法地位。

另一个因素是，北越人对以往 25 年的历史记忆犹新。他们认为，胡志明在 1946 年上了法国人的当未能取得胜利，1954 年签订日内瓦协议又受了骗，现在他们担心尼克松要玩弄最大的骗局：此人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假惺惺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在谈判桌上不能得手，就准备在当选连任后恢复轰炸，迫使对方就范。连一些美国官员后来也私下承认，河内这层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星期三晚上，基辛格在即将飞离奥利机场前宣布：“我要回华盛顿去了。至于有无必要再举行一次会晤，我将同黎德寿特别顾问另行商量。在这期间，沙利文大使和我手下的两个人留在这里，在波特大使的领导下同对方的专家

联系。”

他这番话煞费苦心地暗示，谈判仍在继续进行，而其实早已陷入僵局。但是他比谁都更清楚，他在一步步陷入一场暴风雨般的全国性争论之中。

这时，第一次有人对基辛格为人是否正直表示怀疑。基辛格坐的飞机刚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一个记者就问：“基辛格博士，你认为和平在望了吗？”基辛格淡淡一笑，回答说：“这话说得好哇，不知是谁说的？”

第二天，12月14日（星期四）上午，基辛格交给总统一份关于巴黎谈判的第一手报告。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们两人几乎商量的8个小时。为了“通过外交行动”结束战争，就像一条共和党竞选标语说的那样，基辛格“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得到总统的全力支持。基辛格不让霍尔德曼有任何可能去了解他和总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讨论了什么。

那天快到中午时，两人作出了第一项重大决定。尼克松向河内发了一个措词强硬的电报，警告说，72小时内必须恢复“认真的谈判”，否则就……尼克松在盛怒之下，随时准备恢复轰炸，基辛格也是如此。

在对河内进行威胁的同时，决定警告阮文绍，白宫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如他再反对，总统而不是国会就要断绝援助。基辛格同意这种做法。

第三项决定是派基辛格去向政府高级官员吹风。在48小时内，基辛格分别同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海军上将、副总统阿格纽以及白宫直接有关人员介绍了他对巴黎谈判的看法。

同穆勒谈时，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多少架可供使用的B—52轰炸机？穆勒不大舍得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派这种价值800万美元一架的巨型8引擎“同温层飞行堡垒”去北越上空，因为损失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三四。穆勒估计，总统大概准备使用B—52对北越进行新一轮轰炸。

星期五，总统决定应当向公众说明巴黎会谈出现波折的情况。问题是由谁向全国宣布这个消息。基辛格建议由总统来说明这件事；关于越南问题的重要事项，通常都是由尼克松自己宣布的。尼克松却说应由基辛格来执行这项任务，这得到了霍尔德曼的支持。既然基辛格在10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报了喜，捞了一把，现在这倒霉的事也该由他出面来干嘛。

12月16日（星期六）上午11点43分，基辛格走上白宫新闻发布室的讲台，解释为什么和平还是若明若暗。他提到总统不下14次（而10月26日那天只提了3次），暗示今后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尼克松。基辛格强调说：“我们没有能达成一项总统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协议。”他还说：“如果我们能达成一项总统认为是合理的协议，我们就努力去干。”既然他与黎德寿相约要保密，为什么又把谈判情况公开出来呢？对此他解释说：“总统决定，我们不能使美国人民蒙在鼓里。”他说，北越人一再“节外生枝”，同寻求和平背道而驰。基辛格宣称：“我们决不受讹诈而签订协定。我们决不仓促签订协定，而且，我可以说，我们也决不会听了人家的花言巧语就签协定，除非谈妥合适的条件。”

基辛格让河内放心，美国仍然希望按照10月8日协议的原则实现和平；不过他警告说，时间是越来越紧了。最后他讲了一句：“别人谁也不能否决我们的行动。”这是冲着西贡说的。

这次记者招待会完全只限于讲巴黎谈判，根本没有提恢复轰炸北越的可能性。关于这方面，基辛格什么也没有透露。

12月17日（星期日）下午三四点钟，这时总统限河内在72小时内开始“认真谈判”的最后时限已过。于是尼克松动用B—52，下令对北越恢复大规模密集轰炸，包括在河内和海防地区首次使用这种巨型轰炸机。第一轮轰炸于当天晚上（华盛顿时间）开始。

尼克松不仅想摧毁北越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而且想把他们炸回到谈判桌上来。按照尼克松的逻辑，他是以炸求和。正是按照这种逻辑，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就曾有过一个美国陆军军官望着被炸成一片瓦砾的南越城市板楸说：“因为我们要拯救它，所以不得不把它毁了。”

基辛格是支持尼克松的决定的。基辛格唯一的保留是，美国在动手轰炸以前，最好先通过莫斯科和北京对河内发出秘密警告。但他这些意见一经总统否定，他就二话不说地唯命是从了。

大规模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

1973年1月8日，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重新恢复了和谈。

经过两周激烈的讨价还价。基辛格与黎德寿于1月23日草签了越南停战协定。1月27日，国务卿罗杰斯代表美国与越南的外交部长在巴黎正式签署了越南和平协定。

罗杰斯在巴黎落笔签字的那一刻，正是巴黎时间上午11点，华盛顿时间清晨6点。采访白宫新闻多年的合众国际社女记者海伦想打听基辛格此刻在干什么。

基辛格通过新闻发布单位回答说：“是在搞爱情，不是搞战争。”

1973年10月16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获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得知这个消息时，大为激动。他说：“在我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哪一件事能比获得诺贝尔奖更让我激动的了。”

然而，黎德寿却拒绝领奖，他说：“南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和平奖。”

在舆论界，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受到了最猛烈的抨击。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60名师生于10月27日联名写信给挪威议会，指责他们选择了基辛格。

诺贝尔和平奖金委员会的2名委员对授奖提出了个人抗议并决定辞职，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分歧。

12月10日，授奖仪式在奥斯陆举行。基辛格当时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他指派美国驻挪威大使托马斯·伯恩作为他的代表，伯恩大使躲开了雪球的袭击和反美示威者，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奥斯陆大学的礼堂，去接受基辛格的奖金。基辛格把所得6万美元的奖金，留给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牺牲和失踪的美军的子女作为奖学金之用。

尽管有人抗议，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阿德塞·莱欧奈斯夫人还是维护了基辛格与黎德寿共同获奖。她说：“有关巴黎协定的消息使全世界出现了欢乐和希望的浪潮。”

第十一章

飞越喜马拉雅山

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令基辛格大出风头。然而，让基辛格扬名世界的谈判，却是他秘密的中国之行。但人们在事前绝没有想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会从小小的乒乓开始……

1971年春，有一天当人们一觉醒来时，从报纸上读到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解冻的大字标题。这一次，既不是成立了什么新政府，也不是哪一位外交家签订了什么重要条约，而是美国乒乓球队就要到中国去，进行一次没有美国政府参与的民间访问。乒乓球是风行全中国的运动项目，在最近一次世界锦标赛中，中国国家队在7个项目中夺得了4项冠军。美国队却名列第24。美国的体育爱好者们相信中国队秘书所讲的，邀请美国人来“是为了让我们能相互学习，提高我们的球艺”。

然而，那些并不关心球网、球和球拍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表面上不妨害任何人的邀请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的。事实上，这一决定是毛泽东3月间在他山中的别墅里作出的，因为，同美国总统会晤而奠定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与那些依赖美国的国家密切关系。另外，这一年将是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一年。联合国每年都要表决一次，每一次中国都更接近目标。在接纳中国的问题上，美国的盟国一个接一个地摆脱了美国的投票集团。只有少数国家继续坚持红色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不是他们应当与之打交道的政府的论点。现在，总统身边有了一位卓越的国际问题权威专家，总统是会考虑他的意见的。

美国乒乓球队15名队员和3名随行记者并不清楚他们的访问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曲。人们广泛评论说，他们是25年来第一个由美国公民组成的访华团体，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对周恩来的预言“我们揭开了中美人民之间关系新的一页”有所领会。

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立即作出了反应，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准许美国人按照同苏联在经济上交往的条件同中国进行交往。国务院明确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来访者，并且突然取消了美国企业家在同中国进行贸易交往中所应遵循的外汇限制。

乒乓球队到了中国，他们游览了一番，拍了一些照片，个个面带微笑，之后离开了中国。

1971年6月30日，尼克松总统在一次例行的公告中通报华盛顿官员，他的助手亨利·基辛格将在次日进行一次为期10天的了解情况的旅行。他将访问南越以及其他远东国家，同在那里的美国官员和外国代表会谈，交换有关战争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的看法。他将于7月12日回来，并直接就他在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所举行的会晤情况向总统报告。

一年半之前，尼克松就已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要制定一项同红色中国重新建立关系的计划。这次旅行就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

基辛格的头三天是在西贡度过的，他依照惯例又重述了一遍尼克松对这场战争的立场。

仅有一名记者看到了远东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的到达具有非同寻

常的意义。约翰·霍尔德里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有人对这位精明的美联社记者说，霍尔德里奇是来考察北越同红色中国之间的联系的背景材料的。

7月5日和6日，基辛格是在曼谷度过的，他同政府官员们一起照了像，并向他的外国朋友们保证越南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基辛格的下一站是新德里，那里还看不到即将爆发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的迹象。他出席了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并且对贫困地区进行了一番巡视；答应向尼克松总统报告需增加对饥饿的印度人的医药和粮食供应。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全然知道这其中的秘密。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到达西巴基斯坦离伊斯兰堡8公里的拉瓦尔品第。突然，他的日程安排有了变动。一位级别较低的随行官员谨慎地通知在伊斯兰堡等候的记者，说基辛格的胃有点不大舒服，要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处僻静的休养地休息几天。这个地方是省政府的夏季总部所在地，也是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和重要外宾常去的一个风景优美的避暑疗养胜地。

第二天清晨，在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最严密的安全措施的保护之下，一位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客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向北京飞去，随同前往的只有少数几位助手。这个人就是基辛格，陪同他一同前往的有约翰·霍尔德里奇，他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以及负责东南亚事务的职业外交官理查德·斯米瑟。基辛格的私人秘书黛安娜·马修斯则留在了巴基斯坦。

抵达北京机场时，这位总统密使受到了一位高级礼宾官员，一名译员以及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的迎接。去机场迎接的还有当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他是安排基辛格这次来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基辛格立即被安排与周恩来会晤，两个人谈了几乎8个小时。

中国在控制新闻报道方面是没有丝毫困难的，外国记者们也受到了一定范围的限制。所以，当基辛格一行人游览紫禁城时，就连精明的法新社记者也没能到场。之后，又进行了更多的会谈。7月11日，在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进行了最后一轮会谈之后，基辛格于下午1时起程返回巴基斯坦。他又从巴基斯坦飞往巴黎，去出席一次晚宴和参加另一次讨论结束越南战争问题的秘密会议。然后，他就回到了华盛顿。

许多政治专家都相信理查德·尼克松是在1971年7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获得了他重新当选的保证的。这座城市是《大家笑》节目中关于“中世纪美国”的俏皮话的嘲弄对象，是全国广播公司西海岸电视台所在地。

向报界发表的简短通告只是说，尼克松总统要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要讲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开始时，人们猜测巴黎会谈可能取得了某些进展，基辛格带回了不久前在巴黎会谈取得的好消息。随后，一种围绕着总统的谣言像旋风般地袭来，这就是某种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然而，就连那些到处追随总统，专门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总统开始广播之前10分钟，才由一名助理新闻秘书向记者们通报了情况。由于惊讶和时间紧迫，记者们已经来不及提前把这消息报道出去了。

总统开始向全国讲话，他首先提醒全国人民说，他正致力于谋求持久的和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稳定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尼克松平静地宣布说，他已经派基辛格去中

国与周恩来会谈，他就此即将发表的公告也将同时由中国政府首脑宣布。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一次可能意味着世界实力重要调整的访问。当这个消息广播出去之后，专家们分成几派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人可能会通过柏林作出反应，因为，每当美国采取一个外交行动时，苏联军队定会在东柏林搞一次演习。这是他们戏剧性地表演他们的力量和团结的最后一手。西德人和美国政府是不能小看他们这一手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尼克松的这一手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以便在下次大选中争得自由派的支持。然而，这两部分人似乎都同意，这将意味着牺牲 85 岁的国民党台湾领导人蒋介石以及他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尽管总统一再强调“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行动，并不是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再过几个月，尼克松就要进行他的和平之行了，这个世界将因看到战争威胁暂时不再存在而能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一个小时之后，尼克松、基辛格和几位助手在豪华的洛杉矶佩里诺饭店聚会庆贺。他们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等着早版《洛杉矶时报》的发行，以便看一看评论如何。

全世界立刻对尼克松总统的这份关于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本人访华奠定基础的公告作出了反应。南越傀儡政府急忙表示赞同，指出总统这样做是正确的，应该“使关系正常化，即使是同我们的敌人”。莫斯科没有发表什么评论。日本表示了赞同，然而企业巨头们却有些不安，他们担心在美国向亚洲投资中日本所占有的中介地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最具有戏剧性的反应来自于南朝鲜。南朝鲜政府表示了抗议并宣布把这一天定为台湾哀悼的日子。在台湾岛上，甚至连蒋介石的那些最乐观的同事们也都明白了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奋斗已经告终。如果美国与红色中国打起交道来，台湾是没有出路的。法国和意大利则兴高彩烈，就连美国国会中一向爱挑剔的民主党人也热情地肯定了这个公告。这可能是任何一位保守的总统为获得可使他再度当选的一大批中间自由派的支持所能迈出的最成功的一步了。

这一密谋是从 4 月份开始的。有一天，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举行一次只有男宾参加的晚宴，当一些人正在说着一些政治笑话，并祝贺总统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声望又有提高的时候，基辛格正在西侧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阅读一张用手写的字条，字条的内容涉及一件高度机密的事情。这是一位中立的，而且是友好的国家的外交官交给他的。这位朋友充当了白宫与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非正式的居间人。基辛格走进聚餐室并对尼克松的军事助理说：“不要让总统就寝。我要见他，我必须见他。”当客人们走了以后，总统吩咐叫亨利到林肯会议室去见他。

读过字条以后，尼克松对基辛格说：“他们希望进行一次非常高级的接触，也许甚至是最高级的会晤。”总统和博士几乎用了 4 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这份简短的信息，分析着每一个字，并开始考虑一份答复的草稿。他

们讨论该由谁去中国为这次访问作准备。国务卿罗杰斯不够热情，他的助手们又太没有经验。哪一位是既能干而又谨慎的呢？

48 小时之后，正当基辛格在白宫地下室他自己办公室的浴室里刮胡须的时候，总统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你将去中国。”这是尼克松对基辛格表示的最大信任。这位助手已深知他的上司考虑问题的思路，并且已证明了自己是这件 40 年来最微妙的外交使命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人选。

基辛格亲自拟定这次行动计划，包括秘密前往中国的巧妙安排以及如何对这次出国很快找到掩饰的托词。总统在忙于其它更重要的决策问题，他批准了基辛格及其小组提出的这项计划。需要召开很多的会议，以便使总统密使了解总统想要对周恩来以至对毛泽东本人所要转达的极其细微的想法和意向。

从收到那张潦草写出的便条并连夜在白宫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算起，90 天以后，基辛格已经到了北京。他宣读了那篇尼克松和他花了几乎 10 个小时写出的声明。这项声明是简短而明确的，它告诉周恩来美国总统希望恢复对话和恢复已经中断了 20 年的关系。最后，基辛格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家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像过去那么神秘了。”

对于与周恩来的谈话，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到。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在微妙的外交谈判场合，政治会议室里的时钟，就如同拉斯维加斯旅馆里的时钟一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赌场，一般认为只有输家才看钟点，然后决定自己最好去睡觉了。而在国家之间的谈判中，用提醒注意时间这样世俗的做法阻止会议继续进行，会被认为是失礼的。有一次，周恩来在译员和私人警卫的陪同下，突然在凌晨 4 时出现在基辛格下榻的旅馆的套间。

这是两个大国之间从未曾有过的一次比较坦诚的对话。这两位具有历史意识的发言人都能够回顾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并且能平静地倾听对方所谈的问题。会谈之所以进行得那样好，原因之一是周恩来的精明与气度——他避开了一个是政府首脑而另一个仅仅是政府首脑助理的这种身份上的不同。

幽默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在会谈一个阶段，周恩来一口气讲了几乎一个小时，然后为自己讲话时间过长而表示了歉意。这时，基辛格就邀请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演讲，并说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不停顿地讲上个把小时。

1971 年 10 月 16 日，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此次之行已经是公开的了。他是去安排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日程和后勤问题的。总统专机载着基辛格和他的 9 名助手，由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到美国最西部的州的避暑胜地——夏威夷的希洛。之后，他们要在关岛停留一夜，然后应直飞上海和北京。

为了这次旅行，总统把他个人的旅行工作人员班子让给基辛格博士使用。总统座机 707 型喷气机由总统的私人驾驶员拉尔夫·艾伯特齐上校驾驶。白宫的高级军事助理空军准将詹姆斯·德·休斯和尼克松助手德怀特·拉·蔡平将一同前往。复杂的通讯联络现由白宫通讯处主任艾伯特·雷德蒙准将负

责。向报界发布消息由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的蒂莫西·埃尔伯恩负责，安全工作由一名高级特工人员罗伯特·赫·泰勒负责。

同国务院的人相比，基辛格更信任他自己的伙伴。这次随行的唯一一位国务院人员是一个二流的中国大陆问题专家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他在级别上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赫·霍尔德里奇、温斯顿·洛德和乔纳森·豪海军中校。

在基辛格的两次访问之间，中国正发生着很大的混乱。当基辛格10月份到中国时，那时正进行内部斗争，还有关于谁将继承周恩来的种种猜测。中国总理一再强调内部纠纷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这句话是非常现实的，就如同说尼克松总统在选举年可以不理睬民意测验一样。

曾有人问过周恩来，中国是否愿意同苏联谈判。世界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即如果万一发生世界范围的冲突，中美关系的解冻将成为使俄中彻底决裂的沉重一击。周恩来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是凭借毛泽东的威望同总统会谈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政治家的人物，他已经上升到像一位盛誉哲学家。任何一位中国政治家若想对这位主席所赞成的事情提出怀疑，那是很难想象的。

尽管存在种种威胁，但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去破坏周与他的温和的对美政策。基辛格这次是为了最后敲定一些细节问题，他不认为总统即将到来的访问会遇到什么困难。

在美国总统出国访问前，有一个问题不曾张扬议论过，这就是安全问题。亨利·基辛格知道理查德·尼克松在拉美之行中曾被人吐过唾沫。如果要对这个人开一枪的话，也不比吐唾沫困难多少。按照传统的做法，安全问题应依靠东道国，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国家。东道国是应负责全面安全保卫工作的。然而尽管有这一传统，最后还是商定由美国自己负责对其元首的保护，其中包括特工人员和军事人员。至于理直气壮为此而动用的秘密警卫人员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要比总统起程的日期更为保密。在中国，总统有一次出席观看体育表演，据说那次派出的保安人员足足有1100百人，以防止有某一个狂热的年轻共产党人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来。

基辛格到达中国时，已经是相当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人物了。在中国报纸上暂时取消了对报道美国许多成就的新闻检查。中国报纸把基辛格描绘成一位英雄和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共产党国家，当报纸赞扬一位来访者时，就等于向公众表明他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人们会以热诚对待他。

1971年10月26日，为中国进入联合国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了。联合国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了台湾蒋介石的代表。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坚决主张两个中国代表团都应在这个国际机构中占有席位。但是，就连美国的盟国也认识到，美国的发言人只不过是敷衍搪塞一番罢了，驱逐台湾乃是红色中国和美国开始对话的自然结果。

美国曾经鼓吹过双重代表权。日本、菲律宾和其他一些美国与之建有防务同盟的亚洲国家也同意这样做。一些多年以来一直得到国民党台湾的技术援助的法语非洲国家也忠于这项建议。少数几个更加依附于美国的拉丁美洲国家也是这个集团的组成部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指出，全体中国人都应有权在联合国派出代表。他事前曾同亨利·基辛格和其他白宫助手们商量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话没有说服任何人。红色中国终于进入了联合国，国民党台湾被驱逐出去了。

11月30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白宫举行午夜会谈，并决定了对建议举行高级会谈的潦草便条作出反应的7个月之后，基辛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介绍了基辛格，并透露：“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博士当然将陪同总统一同出访。”

此时，在华盛顿市的另一端，参议员赛明顿和其他一些人一定正在看笑话。他们曾经警告美国人民，说基辛格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国务卿，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做事不需向任何人解释，而只对总统负责。基辛格向记者们宣布，毛主席将在北京接见总统，尼克松还将访问杭州和上海。尼克松夫人和一个人数量有限的高级助手班子将随同前往。

基辛格一再强调这是一次工作访问，将要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谈。这位总统助理回避了《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彼得·利萨戈提出的，是否这次会谈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越南冲突这一咄咄逼人的问题。

报界要求准许对这次访问进行广泛的报道。然而在起初，报道看来是有限的，但其结果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希望。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通过卫星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夫妇同中国领导人互相问候的场面。基辛格还告诉记者们说，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新闻界要报道一个美国总统来访这样的问题。

看着基辛格陷入一个圈套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有人问他共产党中国的权力的基础在哪里。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对他提出关于共产党政府的内部问题，基辛格巧妙地回答说，总统的这次访问并不容许美国人有权对那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进行猜测。后来，他总是会见那些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是“主要候选人”的人。然而糟糕的是，究竟谁是“主要候选人”而谁不是，要由那些掌权的人来决定。这就好比，假如毛泽东来到了美国，表示希望见到乔治·麦戈文、乔治·华莱士和特迪·肯尼迪，而没有把埃德·马斯基包括在内。这点遗漏就会使报纸和政界人士有了大作文章的材料。

这次访问将是一次工作访问，而不是一次官方的外交访问。基辛格提醒记者们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多次避开了记者们所设的圈套，显示出了他的才华，因而赢得了华盛顿记者们的尊敬。但有几次，在他力图摆脱圈套时也有过失言。他有时会对某个问题予以否定，然而却道出了比用肯定还要多的情况。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家纽约报纸的记者想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一问题把他绕住。这位记者问他：“您说我们承认台湾政府。是不是说我们是把台湾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来承认的？”

基辛格博士回答说：“我已经一再强调了这样的立场，即两个中国政府都认为他们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我们同台湾的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

基辛格努力使报界相信总统的此行访问具有巨大意义。他提醒这些精明的记者说，我们这两个国家已经彼此隔绝了二十五年之久，这不仅仅是在外交的概念上，在其他各个方面，如文化、新闻与学术上均是如此。自从尼克松就职以来，这可能是亨利唯一一次指出总统具有政治品质的机会了。然而，中国之行对于亨利·基辛格来说，却是他的一次绝妙的“特技表演”。

除了亨利·基辛格以外，还有谁能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排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会面，并能使这一切都严守机密呢？《纽约时报》赞扬

基辛格，说只有他在神秘性方面的才能能够与东方人相比。尼克松的这位密使的所有已经完成的使命中，没有哪一件比同中国人的会谈要求具有更大的谨慎、更多的智慧和谋略了。

1972年2月20日，那架被改名为“76年精神”号的“空军一号”飞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跑道上滑行起飞。学生、政府工作人员、支持者、电视台摄影记者、安全保卫人员、观看者和好奇的人挤满了机场向公众开放的各个角落，美国总统就这样开始了一次在现代史上最具有意义的旅行。陪同总统出访的人有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各方面人物；除了尼克松夫人、基辛格、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总统私人驾驶员拉尔夫·艾伯塔章以外，还有一批包括各方面专家的工作人员班子。

1972年2月21日清晨6点55分（北京时间），飞机轮子擦落在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上。飞机经过检修之后，又继续向北京飞去。上午11点30分，以周恩来为首的42名中国官员，在乐队起劲地演奏“星条旗”的乐曲声中迎来了美国总统。在机场还安排了由500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尼克松总统夫妇下榻在红色中国的国宾馆，离他们不远之处是总统助理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的住所。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抵达之后3小时，就开始了工作，并突然被安排前往与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会见。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罗杰斯和其他随行人员则听取了一位礼宾官员的情况介绍。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了盛大宴会。

第二天上午，总统前往参观了45公里外的中国长城和明十三陵。之后，总统和周恩来以及他们的译员和助手私下会谈了4个小时。尼克松总统不喜欢芭蕾舞，他宁愿看橄榄球而不喜欢听音乐会。然而那天晚上，他还是观看了东方式的皇家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此后两天，又在尼克松的住处举行了多次会谈。

此行访华的中心内容是基辛格博士和他的中国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举行工作会议。他们都是真正的外交家，共同担负着拟定一份联合公报的任务。

自从共产党军队迫使蒋介石败退并建立新中国以来，已经快22年了。从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第七舰队派遣到台湾海峡算起，也已经20年了。

现在，又要求7.5亿中国人同2亿美国人和平相处，因为全世界亿万人民有赖于这种和平。越南战争至少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台湾也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下去。亨利·基辛格仍将继续是美国第二号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可能还不止是一段时期。基辛格同其他大多数男人一样，喜欢在外出旅行时有漂亮的女人陪着。国际上层社会的许多人，不论他们到哪里，都宁愿让他们的老相识随行作伴，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喜欢试试新伴侣。

亨利第二次去中国时受到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因为他此行的任务是着手拟定尼克松总统的旅行日程，他还随身带去了几名30岁以下漂亮的女秘书。

在华盛顿，一位美貌动人的女接待员、女秘书或者女办事员，通常还会做很多本职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当总统或者其他高级官员到他们上司的办公室时，她们都应打扮得漂漂亮亮，衣着入时，并且应该做好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准备。已故的博比·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他总是习惯于突然去巡视司法部的各个办公室。而情况往往是，还没等他视察完第一个办公室，他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各条走廊。

那些从来不脱掉上衣总是一本正经的头头们，这时就急忙甩掉上衣，松开领带，卷起衣袖，努力作出一副专心工作的样子。不止一位漂亮的女秘书会立刻跑到盥洗室去取下束缚物，显示出没带胸罩的体态，这样就可能从巡视的肯尼迪那里得到几句亲切的话。在五角大楼，不止一名女打字员由于向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展示了她那双漂亮的大腿而被提升到一个好的职位。国会的一位助手或者是私人承包商，他们去五角大楼只是为了得到了一点消息，或者是希望催一催过期未付的帐单，他们总要向大楼里的女士们送些小小的礼物的。

基辛格在进入白宫工作以后享有的名气使他必须有一个与此相称的办公室，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华盛顿有很多正值妙龄的可爱少女，也有一些虽然已不能称之为妙龄，但仍然可爱的女人，她们在白天是女秘书，而到夜里就是一些重要人物的情妇。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比起美国的其它大城市，在暴力、犯罪和可供约会的女人方面，称得上是独占鳌头。

华盛顿的娼妓，由于受到“山姆大叔”的那些既是女雇员，同时又贪婪地追求男人或者客串卖淫的女士们的排斥，而生意清淡。

基辛格做得恰到好处。在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办公室里，那些顾虑重重的保守派雇用 50 多岁的女人，她们的工作能力以及她们那已不再具有性感的体态能够保证她们的头头享有好丈夫的名声。而一批风度优雅、装束入时、聪明漂亮而又乖巧机灵的 30 岁以下的姑娘则得到机要秘书的头衔。

24 岁的朱莉·皮诺和 29 岁的黛安娜·马修斯形影不离她们的上司。而这位上司则是无所不去的。她们二人都经过了安全审查，虽然基辛格手下的其他合作者们经常更换，然而她二人似乎能一直干下去。

她们同上司的亲密以及对上司习惯的了然如指掌，在公开场合似乎更为明显。不熟悉亨利的人，都尊敬地称他为“基辛格博士”，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基辛格是宁愿把哈佛的这顶博士帽子弃掉不用，而只被别人称作“先生”的。朱莉和黛安娜也都身着《妇女家庭杂志》式的服装，和基辛格一起参加了 10 月的中国之行。

在用了好几名助手逐字句地整理出基辛格那次中国秘密之行与周恩来进行的 24 个小时的最初谈话的记录之后，基辛格叫来了他的这两名女秘书。她们两个人用打字机把总共 35 个小时的会谈记录打印出来，以供总统和基辛格能够仔细研究与推敲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语气的变化，为国家元首访问做好准备。中文翻起来很快，然而有些中文提法在英文中找不到确切的表述文字。还有一些提法，则表现出很多中国人在阐述他们自己的哲学时的那种既正派又近乎于谦恭和宿命的风格。基辛格的两位称职的女秘书却能帮助重新描绘出一幅基本准确的图景来。有人曾建议把会谈拍成电影，以便让尼克松和他的心理学顾问能够看到东道主的举止神态，然而这种做法过于商业化和离奇古怪，不符合周恩来的朴实的口味，因而被否定了。

据一位消息灵通的记者讲，基辛格很担心他经常与迷人的女电影演员在一起的名声。他认为有必要以一副较为守旧的形象出现中国人面前。“中世纪美国”是不会容许吉尔·圣约翰之流的身影出现在为总统特使送行——他是去执行一项高度敏感的使命——所拍摄的照片上的。在这样的时刻，基辛格还为他 1964 年的离婚以及一个离婚率不高的国家的官员对他的离婚有什么反应而感到担心。他的稳重而落落大方的举止实际上只是为了掩饰一个人面对一项重大任务时所常产生的不安全感而已。

基辛格把他的年轻女性助手班子看作是年轻妇女的卓越代表。朱莉和黛安娜习惯了他的甜言蜜语，拒绝接受他的奉承话，说他会把这些话“讲给所有的女孩们听”。朱莉给人的印象是那种刚进入社交界，很注意自我修饰的姑娘。为了供她上中学、读大学、去欧洲旅行以及购买赛车之类，已经使她父亲花掉了一大笔钱。她的父亲是华盛顿的知名人士，是史密森学会的一位领导人。朱莉作为亨利的私人女秘书，干着一位工作繁忙的单身汉会交给他的可信赖的女助手去做的一切日常事务。她替他结算支票存根簿（都是4位大数），为他储备食品（尽管基辛格几乎总是在外面吃饭），并负责把要洗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她还在他的盥洗室内准备好花露水和剃须膏。最近，有一家生产剃须刀片的大工厂想找基辛格，希望在他们的广告中用白宫来取代垒球运动员的商标，但他闯不过朱莉这一道关口。

黛安娜·马修斯是标准的弗吉尼亚姑娘。对她这种年龄来说，她的工作年限可以说是很长了，级别也不算低，她的职衔是亨利·基辛格的事务秘书。这两位姑娘的名字很快就被列入大使馆、企业界和私人社交活动的客人名单之上，主持这些活动的主持人们相信一句古老的格言，这就是：接近一个人必须先打通他的女秘书。

基辛格这两位随从女官都已跟随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了两年。朱莉在1971年7月曾陪着她的上司悄悄离开巴基斯坦前往红色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而黛安娜则留了下来，以便为胃痛的故事增添一点真实感。

在10月的访问日程中，还加进了一些观光项目。中国的礼宾官员非常老练地看出白宫这两位女秘书能为陪同总统进行正式访问的帕特·尼克松夫人起开路的作用。

朱莉在参观一所中医院时失去了镇定。中国人请两位姑娘穿上了白大褂和戴上大口罩，之后，陪她们进了手术室。那里正用针刺麻醉为一名病人做肺部手术。中国的这种被称作针灸的医疗方法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现在正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迅速地开创着阵地。然而，当针灸医生把银针插入病人的穴位并用劲地捻动它们时，这位来自马里兰的神经敏感的年轻姑娘受不住了。朱莉晕倒了。

基辛格从未因其同下属的关系而得到过好评。他撤换他的助手比他的女朋友更换衣服还要勤。至少，他的一位重要的老助手离开了白宫亨利的办公室而到疗养院去了。另外一位则因适应不了基辛格的工作节奏而被调去担任一项无声无息的外交工作。

在那次访华期间，基辛格是一位严厉上司的名声达到了最高点。黛安娜和朱莉不得不把每次正式会谈的全部记录都抄写清楚，并在会谈之间为总统准备好临时性的备忘录。黛安娜那使用的是传统的格雷格式速记法。使商业学校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感到遗憾的是，朱莉干着报酬极高的私人秘书的工作，而这只因她用打字机打字打得快。

当这两位女秘书从中国归来之后，《妇女家庭杂志》请她们发表一些观感文章。这需要经过基辛格和总统本人的批准。白宫对其工作人员班子的成员用第一人称写文章的做法是不甚赞成的，然而，这一次的请求却得到了总统关键助手们的仔细研究。虽然最初的反应是一致的，但新闻秘书办公室的一个人还是说服了这些助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他们支持发表这篇文章。这个人指出，两位高雅端庄的女秘书能说些有关她们上司的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而这有助于抵销基辛格贪恋女色的名声，同时也有助于改善他对

待下级冷面无情的谣传。另一方面，《妇女家庭杂志》在关键的大选之年，是一本能使美国妇女对总统的中国之行发生兴趣的最合适的杂志。

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终于准许基辛格的这两位女秘书把她们的访华观感在“妇女们信赖的杂志”上发表，与拉尔夫·纳德的揭发文章和索菲娅·罗兰的烹调技术课程一并出现在这家刊物上。

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有文化的美国人能够随同白宫这两位妙龄少女的脚步一起走入“竹幕”的后面。女秘书们展现了外交上一些有趣的细枝末节，诸如中国人在早餐时给她们端上酸牛奶，她们还吃到小芝麻饼和甜莲子粥等等。杂志的编辑和白宫都没有透露这两位小姐由于她们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而得到了多少钱。杂志社只承认，为给这两位女秘书拍照而给她们定做的服装事后全留给了她们。

在她们对长城和中国各大公园的回忆之中，随时可见她们对自己上司的溢美之词，以及述说白宫为什么认定美国某些最好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以此制定行动方针的理由。

尼克松总统动用了麦迪逊大街的全套公共关系技巧，把他的中国之行的意义说成是为了促进和平。让基辛格向新闻界作一次非正式的通报的这出戏，又给这段故事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总统本人将在适当时机通过电视网报告这件事的全部细节。这样一来，公众就会忘记尼克松曾口头攻击过共产党中国，并曾要求美国永远同美国的台湾盟友站在一起。使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引人入胜的插曲以及巴基斯坦之行、胃痛和悄然访华的故事。这些，甚至可以让那些最有声望的报纸发生兴趣。这样一来，也许会避免使这些报纸发表一些关于尼克松策划的外交上的大转向的评论文章。

就在两国领导人握手、微笑并暗示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恢复外交关系的一个月之后，中国总理开始猛烈抨击美国对越南的立场。

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奇怪并复杂的庞然大物，它动作迟缓。然而当白宫的公告造成任何一种政治开放的机会时，它却会在突然之间向前冲去。这一次，那些通过商品的进出口规定捞到几百万美元好处的人，在尼克松从中国返回48小时之后，就开始行动了。

美国商业界人士开始讨好红色中国的经济顾问们，试图从中国在使用日本商品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之中捞取好处。说来也奇怪，尽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损失，但它却毫不犹豫地吞进日本生产的各种产品，只要价格比美国自己的产品略低就行。然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战争的记忆和不信任感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着影响。

亨利·基辛格曾告诫过新闻界，这次会谈并不能解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只是一系列的初步会谈，不可能期望两国关系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然而甚至就连屡屡告诫进展将是缓慢的基辛格本人也没有料到，在尼克松总统搭乘的“76年精神”号座机的马达在华盛顿机场尚未完全停止转动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竟会转过来抨击起越南的军事行动和在巴黎的外交官来，从而使尼克松总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美国的政治研究家们一致认为，尼克松的政治背景和他的智慧不足以制定一项只靠单方努力就可以重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的计划。完全可以这样说，是历史赋予总统这位万能的助手基辛格以智慧，使他成功地处理了美国这次放宽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的政策问题。当中国进入

联合国而国民党台湾代表怒气冲冲地离开联合国的时候，一些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似乎是美国总统的访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形象。

在纽约，在台湾代表团经常光顾的饭店和酒吧里，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很快被摘取下来。并没有立刻换上毛泽东的照片，然而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中国大陆风光的照片，美国商业界的小人物是没有时间去搞国际政治的。

当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游览长城时，中国的一位秘密警察正在华盛顿访问。他是来与国务院安全官员商议中国外交官不久即将到纽约的问题。有人说，只有纽约警察才对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外交官员们的安全关心。然而实际上，涉及国家元首的和有争议的大使们安全问题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共同作出的。幸运的是，在新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当中，就个人来讲，没有一个人是名声显赫的人物，因此，国民党政府的拥护者们和一般的示威者们估计不会搞一些出轨的事。只有当卡斯特罗或者赫鲁晓夫来纽约时，政府机关才会认真考虑是否可能会发生暗杀的危险。

在两周之内，联合国内任务最繁重的要属印刷部门了。它们不得不莫名其妙地保证立刻使台湾代表的名字完全消失，并且使红色中国发言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联合国总部的一切有关国际活动的读物上。

中国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没有打算重新关上。无论是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是作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国，都是一位受尊重的客人。

越南协定在巴黎签署几个星期之后，基辛格于2月15日到达北京。在他到达中国的第三天晚上，大约在11点15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刚告结束，周恩来望着桌子对面的基辛格很轻松地说：“现在我要说一件可能使你感到意外的事。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毛主席愿意见你。行的话，我想你要回一下宾馆，10分钟后我去接你。”这个邀请，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意外。毛泽东通常是只会见国家元首的。10分钟后，周恩来的轿车开进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前的环形汽车道，他们两人便一同乘车前往毛泽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住所去了。

主席讲了两句英语来欢迎基辛格：“请坐。随便坐吧。”大部分对向是主席在讲话，从广阔的、历史的观点谈到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基辛格也提出了他的看法。基辛格感到，毛泽东是想同华盛顿建立较为接近的关系的，但他没有明确说什么。谈话间，中国摄影师进来把场面拍摄了下来。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准备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同时拍了将在全中国放映的电影。这是向群众表明，他们敬爱的领袖对于同美国和解是继续有信心的。谈了差不多两小时后，毛泽东送基辛格到门口，互相道别。

周恩来后来证实了基辛格的感觉，即毛泽东愿意允许美国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在没有建立大使馆的情况下最高级的外交代表形式。基辛格原来预期的是低一些的代表形式，如贸易或文化代表处；毛泽东愿意要高一些的形式，使他感到高兴，但是他真正感到意外的，还是听到周恩来说，中国要在华盛顿设立一个“联络处”，尽管蒋介石在那里还保持着正式的大使馆。

5月中，戴维·布鲁斯大使到达北京，建立自1947年以来第一个驻在美国的中国使团。美国派驻中共那里的最后的官方代表机构，是1944年至1947年间设在毛泽东在中国西北部的首都延安的，这位75岁的美国外交官在北京

受到的礼遇，表明中国在政治上的灵活性。中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即从长远来讲，历史的发展是有利于它的。正如当时在北京的斯坦利·卡诺所报道的：“他们正在普遍引用毛泽东以前的一句语录，大意是美帝国主义正坐在一座‘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火山’之上。”这不能看作是指水门事件，虽然那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水门丑闻的材料了。

5月末，中国大使黄镇到达华盛顿，当时他是中国大使中唯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到达后不到24小时，他已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金包装潢的扶椅上了。他同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不寻常的，同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有的还不得不等上一两个月才能跨进白宫呢。尼克松就布鲁斯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向黄镇表示感谢。总统对黄镇说：“布鲁斯大使担任过的高级职务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大使都要多。”接着他表示希望黄镇在华盛顿好好安顿下来。他开玩笑地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就把基辛格博士撤职。”

基辛格11月份的访问是他第六次访华，但作为国务卿则是第一次。他在“赎罪日”战争之后，不胜疲惫地在中东转了一圈，然后进行这次访问。相比之下，中国则令他感到轻松愉快，兴致勃勃，他11月10日到达北京。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向周恩来祝酒时回顾说：“我们此行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初次进入中国国境时的兴奋心情。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直到总理指出，才知道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更多地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是由于中国有什么神秘。”这时，他早已掌握了使用筷子的艺术了。

那天晚上合影时，基辛格对周恩来说：“你可不知道，不用谈什么242，多好啊！”他指的是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第242号决议，中国总理笑了。乔冠华副外长接着问道：“那么，338号和339号决议又怎样呢？”这两个是10月里安理会通过的关于中东停火的决议。基辛格回答说，他曾听说在联合国讨论中东问题期间，乔冠华同苏联的雅科夫·马立克辩论时曾经“拍桌子”。乔冠华答道：“不过我没有用皮鞋来拍。”这话是讽刺苏联，他是指1960年联大会议上尼基塔·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桌子的著名事件。

基辛格在11月份同毛泽东的会见，长达2小时又45分钟，这是不寻常的。《人民日报》像2月份那样，在第一版突出登载了他们会见的照片。不同的是，这次报纸报道说，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使用“友好”的字眼来形容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这是第一次。人们解释，这是北京重视它同华盛顿关系的一个信号。

经过三天半的会谈（其间夹着一些参观游览），基辛格和周恩来商定了公报的措词。公报暗示两国不久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当时有人揣测，基辛格正在力劝周恩来访问美国。对于这种揣测，周恩来一笑置之。他问美国记者：“只要那里还有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我怎么能去呢？”

尽管照了相，有说有笑，还有一些善意的表示，但这次访问还是存在着一股不安的潜流。中国人很关心水门事件，他们担心水门事件可能会损害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总统。一个月前，周恩来曾对《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说，他希望尼克松总统能够克服他目前的困难。中国总理又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他说：“这类事在你们的社会里过去有过，毫无疑问，将来还会发生。最好不谈这个问题吧。”但是中国官员在1973年秋

天同美国记者私下谈话时则较为明确：他们担心由于水门事件而造成的任何对总统的削弱，都会有利于“某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还有一个官员这样说：“世界上还有比水门事件更重要的事呢。”

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基辛格在宴会上设法让周恩来总理放心，他表示就美国方面而言，发展中美关系是长期的。他说：“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不论哪一个总统执政，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随同基辛格访问的美国记者把他的保证解释为水门事件不会妨碍华盛顿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努力。这位国务卿却否认他的讲话是为了使中国人对水门事件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不良影响加以放心。他坚称，他想说明的只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得到两党支持的。

基辛格在2月的北京之行以后，精神振奋，白宫关于设立联络处的惊人宣布，被认为是基辛格的又一杰作，成了压倒一切的头条新闻。但在11月份第二次访问之后，他那高涨的情绪却似乎带有把握不定的味道了。他对记者说，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再去北京。而且，他也确实无法断定处于水门事件冲击下的华盛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中国的访问，基辛格是难以忘怀的，尤其是对他的谈判对手周恩来充满了由衷的敬意，他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

与毛泽东的会见，也令基辛格难以忘怀。他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了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而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

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泽东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第十二章

超级国务卿

1973年8月21日，美国西部白宫圣克利门蒂。

基辛格同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戴维正在濒临太平洋的小别墅里，朱莉·艾森豪威尔打来了电话。她问他的两个孩子是否愿意到尼克松的别墅那儿去游泳。一会儿，她又来电话，问基辛格是否也愿意一起去。基辛格一家3口穿上游泳衣，半个小时后就在总统的游泳池里戏水了。

几分钟之后，尼克松也来游泳了。总统对基辛格说：“咱们俩游到那一头去好吗？”于是两人就游到游泳池浅水的一头。尼克松半浮在水上，基辛格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半身浸在水里。总统说：“明天我要提名你担任国务卿了。”

实际上，基辛格早就干着国务卿应该干的事了，这项任命，只是让基辛格成为名符其实的超级国务卿罢了。当然，基辛格十分盼望这项迟到的任命。他丝毫也不想掩饰这一点。

8月23日，基辛格举行了一次露天记者招待会。他在加利福尼亚灿烂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显得轻松，自信。他在会上保证说，他执行对外政策的情况将对国会、全国公开，当然也对国务院公开。他说：“我们必须造成一种新的一致局面，以便能在今后10年或20年中给我们的对外政策以新的推动和新的鼓舞。”

当时尼克松总统已被“水门事件”缠得头昏脑胀，基辛格也难免嫌疑。没有人怀疑基辛格将被确认为国务卿，可是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作证并不容易。从9月7日的公开作证开始，到9月17日的秘密作证结束，总共举行了整整4天会议。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党和共和党，鹰派和鸽派——都赞扬基辛格的才华以及他对美国对外政策所做的贡献；但是他们也仔细地向他盘问了他的秘密外交作风问题，他对轰炸柬埔寨和窃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记者的电话这两件事的默许态度。

听证会在参议院旧办公大楼的国会会议室举行，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宣布开会时就表达了国会对于“秘密地和以行政命令制定政策以及违反美国国民性格的政策”所积累的不满情绪。主席还指责基辛格在窃听丑闻中的作用，把这个问题形容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序问题和相互信任的问题”。其他参议员在质问这个被提名的国务卿时，都集中在几个同样的主题——保密，轰炸柬埔寨，窃听。

基辛格宣了誓，然后很温顺地为使用电话窃听辩解说，这是作为一种堵塞未经授权而泄露秘密材料的办法。他并重复他的说法，即他的作用只是沾了一点边，仅仅提供了有可能接触那些泄了密的材料的那些人的姓名。他说，名单是交给胡佛和米切尔的。他加了一句话，这种做法“在那时被认为是合法的程序”。

基辛格在谈到一个有关问题时，否认他知道存在过“管子工”这种活动。他对委员会说，他不知道当时在埃利希曼手下工作的戴维·扬是搞国内安全工作的“管子工”成员。他没有提及他曾听过扬同海军少将韦兰德谈话的录音——这个事实只是在4个月以后才揭发出来，一时引起了人们对基辛格是否可信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此外，他答应的外交政策将不以保密作为特点。

他重复了他要同国会取得新的一致性的保证，并就美国对外政策的内容和方向问题同美国人民重作探讨。

外交委员会对于基辛格在非法窃听电话中可能有牵连非常关心，因而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来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一道研究基辛格的手脚是否干净。委员会肯定了这一点，于是在9月18日以16票对1票通过向参议院建议确认基辛格为国务卿。唯一的反对票是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投的，以此作为对“基辛格在不必要拖延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在1971年孟加拉悲剧中所起的作用，作象征性的抗议”。9月21日参议院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参议院以78票确认了对基辛格的任命。

第二天上午，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就职典礼。出席观礼的有总统、内阁成员和基辛格的家属。亨利·基辛格在首席法官沃伦·伯格主持下宣誓就任了美国第56任国务卿。

但没有人想得到，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即将考验新任的国务卿。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下午2点，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进攻以色列的“巴德尔行动”开始了。这时，亨利·基辛格就任国务卿后刚满两星期。对穆斯林来说，10月6日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巴德尔之战的1350周年，那次战役使穆罕默德胜利进入麦加，使伊斯兰教从此远播四方。对犹太人来说，10月6日也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犹太历史上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对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来说，10月6日同样有其特殊意义。阿拉伯人的联合进攻掀起了一代人时间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使基辛格受到了炮火的洗礼。它直接对基辛格个人及其外交手腕提出了挑战。他，一个犹太人国务卿，能妥善处理这场危机吗？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挽救他同俄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装备使之发动进攻的国家搞缓和政策吗？

基辛格并不是中东问题专家。他在1968年12月出任尼克松的顾问之前，一个阿拉伯国家也没到过，以色列也只去过两次。但在苏美关系问题上，他可是个专家。对大多数国际问题，他总是能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去寻求解决办法，中东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他认为，俄国和美国有义务设法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和解。

在1967年6月初，纳赛尔把联合国驻西奈的监察人员赶走后，企图封锁以色列控制的埃拉特港。以色列没有束手待毙，便由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将军命令空军袭击埃及。不到一天，埃及的空军全部被歼；不到一星期，阿拉伯人战败了。在这次“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控制了整个西奈、那路撒冷老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对阿拉伯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对支持他们的苏联来说，也是如此。只是由于美苏双方极大的克制，由于约翰逊总统和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热线”通话，相互作出保证，大国才没有卷入战争。

20个月以后，尼克松出任总统时，中东仍然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地区。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在他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发出了警报。他宣称：“从美国方面说，我们需要提出新的倡议，需要新的领导，使中东的局势安定下来。我认为中东是个火药桶，非常富有爆炸性……我认为，如果中东再爆发战争，很可能引起核大国之间的对抗，这是我们希望避免的。”

如果说，越南是尼克松最伤脑筋的问题，那么，中东则是他感到最危险的问题。他决心作出一种积极的姿态。他在就职之前，就派了威廉·斯克壮

到中东地区到处进行宣扬，说美国将采取“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这使阿拉伯各国首都为之兴高采烈，使特拉维夫为之忐忑不安。同时，尼克松任命了干练的职业外交官约瑟夫·西斯科担任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西斯科很快拟就了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政策文件。

据西斯科解释，他的政策有几重目的：必须遏制俄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必须让阿拉伯国家相信尼克松的态度是绝对客观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必须耐心说服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来——只在边界上作一些“非实质性”的调整。美国必须直接出面安排一种“真正”的和平，同时必须拉苏联参加这一建设性的努力。

尼克松、罗杰斯、理查森、莱尔德、赫尔姆斯等大多数高级官员都称赞西斯科的这一建议，说它同西斯科以前提的一些建议一样，很明确，有见地。

但基辛格对这一政策是抱有怀疑的。在他看来，西斯科的政策要想取得成功，要靠两条：第一，要有苏联的大力合作，但他怀疑克里姆林宫是否愿意越过他们之间的鸿沟（须知他们至今还没有直接说过一句话），并接受（即使是勉强接受也罢）这样一个“强加的”解决办法。

平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重要政策问题时，基辛格从来不作壁上观。但是，在中东问题上，他却根据尼克松的旨意让罗杰斯和西斯科去张罗，从而避免官僚内部发生争吵。后来，基辛格冷言冷语地说：“你总得让官僚机构有一些他们可以称为他们自己的东西嘛。”他还有意识地在中东问题上尽量少引人注目，以免成为阿拉伯极端分子宣传上的靶子——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一些巴勒斯坦组织曾先后针对阿瑟·戈德堡、尤金·罗斯托和沃尔特·罗斯托进行过激烈的反犹太宣传。

然而，尽管基辛格出于种种原因在讨论这方面的重要问题时不得不一反常态而居于靠后的地位，但他仍然坚持美国对以色列负有“历史性的义务”，说保住以色列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他从不掩饰他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深切关怀。他向一个密友说：“唉，谁要是有我这样的经历，谁也不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生存产生某种非常特殊的感情啊。”他从未忘记他失去了“集中营里的许多亲友”。他告诉朋友们说，他把以色列看作是“残存难民的安身立命之所”。残存者之中，有一位名叫库尔特·弗莱希曼的，是基辛格的童年好友。1971年，基辛格听说弗莱希曼没有能实现访问以色列的生平宿愿就在伦敦去世，便给犹太人全国基金会送去一张支票，让他们在那路撒冷附近约旦山中选一片地，种上300棵树，纪念他当年菲尔特镇的故友。

对基辛格说来，中东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两层涵义的问题。一层是阿以争端，更上一层则是美苏之间可能发生对抗。国务院的专家们一遇机会就要讥刺基辛格，说他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历史的冲突“几乎一窍不通”。他们认为中东的冲突是阿以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加上阿拉伯人之间激烈、残酷的冲突。基辛格对此一概不加分辩。他常常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所知有限，但也经常带着挖苦的口吻说，这么多专家，有这么渊博的知识，这么深邃的眼光，这么丰富的经验，可是对改变中东地区那种恼人的气候有过什么作为呢？

基辛格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局”上——即超级大国的战略、克里姆林宫的意图、力量的平衡以及局部冲突引起大战的可能性等等。他认为，苏联和美国都不想在中东打仗，但是，由于两国站在中东斗争双方中的各一方。因此两国就有可能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特别是约旦问题，它使基辛格不寒而栗。

约旦的问题多少是个地理上的问题。它是一个小小的沙漠王国，混居着贝都印人和巴勒斯坦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在 1948 和 1967 年两次战争中逃出的难民。约旦处在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4 个国家包围之中，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侯赛因国王的政权都是威胁。1970 年夏，酝酿多年的小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在法塔赫的领导下，决心要摧毁侯赛因的亲西方政权，以便像利用黎巴嫩和叙利亚那样，把约旦也作为打击以色列的基地。侯赛因则决心要保持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的平静。突击队员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情绪越来越激烈，现在加紧进攻侯赛因的那个由英国人训练出来的阿拉伯军团。停火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破坏。

9 月 6 日，突击队组织之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西欧劫持了 3 架民航机，强迫降落在安曼东北 25 哩泽卡附近的一个英国人废弃了的小型机场上。于是，这个危机终于成了头条新闻。当时人民阵线扣押了 475 名人质，多数是从欧洲度假回国的美国人。恐怖分子威胁说，如果不把扣押在西德、瑞士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释放，他们就要杀死那些人质，炸毁飞机。

侯赛因想反击，但是面对着这场针对他的王位发动的正面挑战，他似乎无力应付了。人民阵线对国王军队加强了恐怖袭击活动，于是内战扩展到了约旦全境，那些人质在沙漠里受着酷热煎熬，他们不知道下一分钟扣押他们的人会不会由于形势逼人而突然蛮干起来，把他们全都枪毙。这时，联合国召开了紧急会议，但是无法解决这一危机。最后，到 9 月 12 日，人民阵线把人质解到泽卡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然后把 3 架飞机炸毁了。在其后的几天内，大多数入质被释放了，但是还有 55 名犹太乘客扣在人民阵线手里。后来，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和以色列军事威胁的帮助，侯赛因在约旦境内粉碎了突击队运动。这以后几天，到 9 月 29 日，那些犹太乘客才获得释放。

9 月 15 日，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艾尔利大厦举行了为莱尔德授奖的正式晚宴，基辛格、帕卡德、赫尔姆斯、西斯科和穆勒等一批高级官员都参加了。8 点半，白宫给基辛格打来一个电话。原来伦敦唐宁街 10 号直接传来了消息，说侯赛因已宣布约旦处于军事管制状态，把他的文官政府换上了将军来领导，这是国王决定消灭突击队暴乱的信号。英国感到局势危急，基辛格调来了一架白宫的直升飞机，同几个同僚一道飞返白宫，到达时已是夜间 9 点半。

基辛格立刻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别会议。会议开了约一小时。总的说来意见是一致的。据一个与会者说，大家认为这种行动“好像是约旦局势的收场”。据另一与会者说，大家认为这“显然是对侯赛因最严重、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挑战”，即将爆发的内战可能很快就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正式会议结束后，基辛格和西斯科又继续讨论到午夜以后，这时总统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初步情报，配备苏联顾问的叙利亚坦克部队正在向约旦边境推进。尼克松接了一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基辛格给拉宾打了电话。局势显得不妙起来了，但是谁也不知道不妙到什么程度。

9 月 16 日，尼克松、基辛格和西斯科飞往芝加哥，向中西部的一批报刊编辑介绍情况。这时，这些当官的脑子里尽是约旦问题。

尼克松说，“这是不公开的谈话”，就是说，他的话不能引用。但是，

《芝加哥太阳时报》违反了这条规定。出乎意外的是，后来该报反而受到白宫的表扬。理由倒也简单：尼克松曾说，如果叙利亚或伊拉克威胁侯赛因政权，美国可能不得不干预约旦局势。他是希望莫斯科、大马上革和巴格达能听到这个含蓄的警告的。

西斯科和基辛格介绍了“背景情况”，这就是说，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政府官员”的看法。有人特别追问西斯科，美国有没有干预约旦的计划。西斯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没有干预的计划。”但是他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补充：“当然，要考虑对付一切意外事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这也是正常的例行公事。”

西斯科丝毫没有吐露他个人对约旦问题的心事，只把整个局势说成是“可以挽回的”；但他却对到会的人大谈苏联人在破坏苏伊士运河沿岸就地停火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个月来他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指出苏联是破坏停火的“共谋者”。现在，这种犹豫消失了。他说：“苏联人完全在场。苏联人深深地卷入了阿联的事务。他们派去了技术人员，派去了顾问，还派去了有作战任务的人。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没有他们的共谋，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基辛格在谈话中对苏联的意图作了推测。他说：“苏联在中东停火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费解。我很想找出它的动机……为什么埃及人和苏联人要破坏停火，从头一天起就那么猖狂地破坏停火呢？我真是想不通。”

没有一个编辑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违反协议的情况的确“那么猖狂”，国务院和白宫为什么过了几乎一个月才说出来呢？

9月17日，约旦的内战发展得更加严重了，侯赛因那个新的军人政权在安曼和北部的一些城市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想以此来重振王室的声威。叙利亚的坦克更加逼近约旦边界了。尼克松召集基辛格、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西斯科、穆勒和黑格等高级顾问，研究下一步采取什么步骤。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叙利亚坦克越过边界，美国要不要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用什么方式？

莱尔德的顾虑是，美国刚在柬埔寨使用过军队不久，又要在中东用兵，这样做是否合适。基辛格也有这种顾虑，但是程度不同。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防止侯赛因崩溃，必要时就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他毫不怀疑，如果突击队在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苏联人的支持下推翻了侯赛因国王，以色列就会大举进攻阿拉伯人，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立刻就会受到威胁。穆勒明确指出，美国没有多少兵力能够用来进行干预。西斯科则强调了这样一个颇有矛盾的核心问题：美国如果进行干涉，从眼前看也许能挽救侯赛因，但从长远看倒是害了他，使他在阿拉伯人当中信誉扫地；因此，与其用美国军队来救他，不如考虑用以色列军队来救他。

那天晚上，尼克松同基辛格和西斯科碰头，一起准备第二天果尔达·梅厄来访的事。这位72岁高龄的总理刚飞到纽约，便引起了以色列对尼克松政府如何失望的种种传说，说双方火气都挺大，互相信任不够。这时尼克松才认识到，如果美国要让以色列去挽救侯赛因，他得先争取梅厄夫人。于是，他决定批准以色列要求的5亿美元援助，并提前送去18架“鬼怪”喷气战斗机。

9月18日，梅厄夫人在华盛顿会晤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并同罗杰斯和西斯科会晤了两次。他们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危机，但是尼克松并不主张以色列

出面干涉。他把关于援助和飞机的决定通知了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同时劝她不要看不到同埃及进行对话的好处。梅厄夫人保证以色列遵守运河沿岸的停火规定，但她断然拒绝同开罗举行和谈，除非把埃及和苏联非法地偷偷移向运河附近的那些导弹基地拆除、撤走。

正是在华盛顿进行上述这些讨论时，基辛格才从拉宾和年轻有为的约旦驻大美使阿卜杜勒·哈密德·谢拉夫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批叙利亚坦克确已越过约旦边界，正在向约旦西北部的伊尔比德推进。

当晚基辛格同拉宾通了几次电话，从各个方面研究了正在扩大的危机。

基辛格让西斯科打电话问苏联人：消息准确吗？叙利亚已经侵入约旦了吗？苏联人向西斯科保证。传闻不确，叙利亚并没有侵入约旦。

9月19日，拉宾和谢拉夫分别打电话告诉基辛格，至少有100辆叙利亚坦克已经越境进入约旦。

那天是星期六，可是白宫从来不曾这样忙过。基辛格主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是一次中间没有休息的会议。会议是在情况室举行的。情况室设在白宫的底层，全部隔音。室内放着一个长方形会议桌，可以围坐14个人，地上是隔音地毯，嵌板条的四壁挂着许多地图，用间接光源照明。最重要的是，它同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负责追踪世界各国军队调动情况）以及国家安全局都有电子联系设备。在这场错综复杂、极端严重的战争赌博中，基辛格统一调度军事、外交、政治各方面的全部活动。

傍晚，消息传来，又有不少叙利亚坦克越境进入约旦。基辛格对苏联人生气极了。他们作了保证，可是说话全不算数。他建议美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总统表示同意。这种戒备属于部分戒备，不同于1973年10月弄得全国惶惶然的那次全面戒备。这次是，首先命令82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同时把这个消息有意识地透露出去。然后下令驻在西德的空降部队开往机场，经过高速公路时故意做得显眼些，为的是让苏联人明确无误地收到这个信号。基辛格说：“我们希望他们知道这件事。”在这个存心炫耀武力的过程中，第六舰队实力扩大了，它的舰只徐徐驶向黎巴嫩和以色列。

尼克松采取了支持这些军事行动的措施。他一面严厉警告苏联人，要他们约束叙利亚人；同时私下向侯赛因保证，叫他不必担心以色列人。

公开和私下发出的信号，苏联人都照收无误。苏联驻华盛顿代办尤里·沃隆佐夫（当时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正在休假）跑来找西斯科，对美国进入军事戒备和听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这两件事提出批评。他的语调带有宣传的味道，至少西斯科是这么认为的。这位美国外交官告诉沃隆佐夫，不要搞宣传，还是谨慎为好。西斯科强调说，问题在于约旦有“外人插手”。这种行动最好别再搞下去了，因为侯赛因如果被推翻，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变化，而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9月20日，星期日。这是危急多事的一天。先是基辛格从以色列方面得到消息说，叙利亚的装甲部队和步兵正“大举”进入约旦。还有100多辆坦克随同叙利亚的一个步兵“师”也越过了边界。侯赛因倾全力对付叙利亚人，抵抗了好几个小时。

罗杰斯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叙利亚的“入侵”是“不负责任的、轻率的”行动。他要求叙利亚撤兵。

西斯科把沃隆佐夫召到国务院。西斯科尖刻地问他，苏联的保证还算不

算数？他警告说，如果叙利亚继续进攻，以色列也许被迫进行干涉——虽然以色列并没有授权他这样说。他还警告说，美国可能被迫进行干涉。这些警告都是事先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在于压苏联人去约束叙利亚人。西斯科当时知道，苏联军事顾问随叙利亚部队一直到约旦边界，但没有越境。这意味着，至少在叙利亚策划进攻时，苏联人是参与了的。西斯科对沃隆佐夫说：“记住，你要非常小心地向克里姆林宫报告，在这种形势下，关于以色列进行直接干涉的问题，美国进行直接干涉的问题，我们不能给你任何保证。”

基辛格呆在情况室里，在总统的严密指导下指挥一切行动。事后有一位观察家说：“他在处理这样一种严重危机的过程中，经受了真正的战火的洗礼……他感到，这是对该地区力量对比和对整个西方的一次严重的直接挑战。他知道苏联人已经卷进去了，因此，他知道我们也不得不卷进去。他干得很出色。他统筹这个问题的外交和军事两方面，他干得出色极了。”

有人问一个高级官员：基辛格是否“喜欢”舞弄美国的强权？这位官员带着惊讶的表情大声说道：“岂止喜欢？亨利崇拜强权，绝对崇拜强权。对亨利说来，搞外交没有强权就不行。”有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谈起，基辛格是怎样伏在大地图上，把模型战舰和航空母舰从地中海的这一头挪到另一头，同海军将军们争论，阐述军事策略，然后拿起电话，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改变第六舰队的部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士，竟摇身一变而为陆军上将兼海军上将的人物了。在那次危机中，他简直可以说是个副总司令。

在这些紧张的讨论当中，存在着两派观点。罗杰斯代表谨慎从事的一派，强调外交行动比军事威吓或军事行动更为重要。他的观点符合常理。他的一位部下说，他“没有以玩枪为乐事的癖好”。基辛格则代表强调实力的一派，认为如果美国想保卫本国利益而不准备显示实力和使用实力，它在克里姆林宫、中东或世界各地就永远树立不起“威信”来。在辩论这一类问题时，尼克松大都站在基辛格一边。

就是那个星期天晚上，纽约希尔顿饭店的大舞厅里，举行了一次为以色列推销公债的晚宴，有 3000 位客人应邀赴宴，果尔达·梅厄是人人瞩目的明星。她在宴会上即席讲了话。她提醒大家说，如果她的脚不疼，她就讲长些；如果脚疼，就讲短些。结果她讲了 1 小时零 5 分钟。她的脚没有疼。梅厄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们自己不为自己的自由与安全而战斗，就没有人会为我们战斗。”她的话引起满堂听众喝采。

拉宾坐在同梅厄只相隔几个座位的地方，他以敬佩的神情注视着他的总理。这时有一个助手递给他一个条子，上面写着：“速给白宫基辛格回电话。”这时已经 10 点多了。

拉宾走到一个小前厅，用饭店的电话同白宫通话，不时可以听到从大厅里传来的杯盘声和一阵阵的喝采声。基辛格的声音有点紧张。他说约旦要他转达一个紧急信息：以色列能否向约旦提供空中支持，来对付正在向前推进的叙利亚坦克？

拉宾立即提出两点看法。他说：第一，他手头没有最新的情况，但他有办法得到；第二，他从来没有认为基辛格仅仅是“邮递员”或“通讯员”，他希望了解美国对约旦这一不同寻常的要求持什么态度。基辛格是否倾向于支持以色列打击叙利亚坦克的想法？其次，如果基辛格有这个意思，战争升了级，美国又怎么办？

基辛格对拉宾说，局势是“危急的，十万火急”。他的话使人感到一种

大难临头的气氛。但是他承认，拉宾的这些问题都是应当提出的。他和拉宾一致同意，过 45 分钟再谈。基辛格记下了拉宾的电话号码。

当拉宾回到舞厅时，梅厄夫人注意到了他，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这两个以色列人溜进了前厅。拉宾向她报告了基辛格打来

的电话。她马上决定要同她不在国内时代理国务的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通话。她要阿隆同以色列其他领导人紧急研究约旦的要求，并派出一架小型摄影侦察机到战区拍照。此时中东正是拂晓，几小时后飞机就可以拍到照片。

基辛格按照预定时间又打来了电话。他对拉宾的问题没有提出“考虑成熟的答案”，但他强调局势紧急，因此建议拉宾立即飞往华盛顿。最后一班飞机已经起飞了。基辛格说，大约午夜 1 点时，军事空运局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空站将有一架空军喷气机等着，拉宾可以坐那架飞机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时候白宫将派车在那里接他。基辛格再次强调侯赛因要求的“紧急性”，他希望以色列迅速答复。

拉宾再次同梅厄夫人磋商，梅厄夫人又同当时在场的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磋商。午夜 1 点，当拉宾乘车急驶拉瓜迪亚机场时，梅厄夫人也乘车急驶肯尼迪机场，那里有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等着送她回以色列。

9 月 21 日，星期一，凌晨快到 3 点的时候，拉宾才回到华盛顿林山区他的家里。这时基辛格还呆在白宫的情况室。西斯科则呆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这三个人通过“保密”电话商谈。拉宾告诉他们，以色列内阁随时可能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空军已做好袭击叙利亚坦克的准备。拉宾毫不怀疑，只要耶路撒冷开放绿灯，以色列喷气机就会一举摧毁全部坦克。基辛格再次强调局势的“紧急性”，西斯科也这样说。拉宾说，他理解这一点，但他仍然想知道，如果埃及人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进攻以色列，美国怎么办？基辛格和西斯科都说，他们理解拉宾所担心的事。他们将在早上再同他联系。拉宾这时就同耶路撒冷通电话，报告他同美国人会谈的最新情况，然后他就小睡了一会儿。基辛格和西斯科那一夜通宵未眠。

侯赛因又传来一个口信：伊尔比德已落入叙利亚人手中。《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本杰明·韦尔斯写的报道说，在被突击队包围的安曼，侯赛因从王宫通过普通电话线同美国使馆通话时“惊恐万状”，再次发出求援的呼吁——这次是向美国和英国呼吁。他说了一句密码似的话：“我的上边还好，下边很糟。”暗指他的空军未受损失，但装甲部队已经溃不成军。

据最新情报，约旦境内现在已有 300 辆叙利亚坦克。在约旦东北，伊拉克有 2 万军队跃跃欲试，准备干预。这时侯赛因的处境真是危险极了。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还扣着 55 名飞机乘客作为人质，像是准备采取激烈行动的样子。美国驻在西德的 5 个师剑拔弩张，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第六舰队所辖的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特混舰队，已由 2 支增加至 5 支。

英国人回想起 1956 年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那次干预，犹有余悸。约翰·弗里曼大使通知罗杰斯，英国将不进行军事干预。他希望美国也不要这样做。很明显，西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干预。同样明显的是，尼克松已经下定决心不让别人推翻侯赛因，不让中东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他深知他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他本来可以把这件事诉诸民众，像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那样，但是这次危机发生在柬埔寨问题 4 个月以后，他决定尽可能保持沉默。罗杰斯建议对苏联人采取一种新的外交做法，如由苏美采取联合行

动使该地区的激烈情绪平静下来。尼克松在基辛格的强烈支持下，否定了这个建议。相反，他们再次通知沃隆佐夫，要是叙利亚坦克不后撤，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到那时候，什么做法都不能排除。“把你们的人撤回去”，这是尼克松毫不含糊的信息。

很清楚，在这个冒险事业中，美国只有一个盟国：以色列。尼克松指示，由基辛格担任美方的主要代表，跟拉宾共同协调美以行动。这时公众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罗杰斯和斯科身上，但是，无形之中，在舆论不知、国务院不党的情况下，谈判一项在约旦危机中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空前秘密谅解的重担，就悄悄地落在基辛格和拉宾身上了。

基辛格当即找来拉宾，于是两人正式开始工作。（拉宾后来相当自豪地开玩笑说，进出行政大楼的秘密通道，他知道的比特工人员还多。）

在达扬许可下，拉宾向基辛格介绍了以色列的全部军事计划。他每天向基辛格送两次最新的以方情报摘要。要点是，当时以色列正在计划对集中在伊尔比德地区的叙军发动钳形攻势。以色列驻在戈兰高地附近的装甲部队——准确地说，200 辆坦克——将向东移动，然后再转到南面，向伊尔比德推进。驻在西岸占领区纳布卢斯附近的装甲部队将朝正东推进，对伊尔比德发动进攻。到时候，以色列指望约旦的装甲部队从安曼向北推进。以色列空军将炸毁伊尔比德周围的叙利亚阵地。以色列军队和约旦军队之间有必要进行协作。同时，以色列将向侯赛因保证，一旦军事行动结束，以色列军队就撤出约旦。1967 年战争后的以约边界将不再向约旦方面伸展。叙利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他没有详细谈这个问题。

拉宾告诉基辛格说，有几十辆以色列坦克那天正从南部向西岸地区推进。若干架涂有标志的侦察机正在叙利亚阵地上空进行侦察。

拉宾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如果以色列应侯赛因的要求决定出击，美国准备怎么办？基辛格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作出答复。

星期一傍晚，沃隆佐夫拜会斯科，暗示苏联可能改变态度。他提出警告，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并透露俄国正在约束叙利亚，希望美国也要约束以色列。拉宾深信苏联人是真担心尼克松的下一步了。看来俄国人感觉到，尼克松既然敢在柬埔寨那样胆大妄为，那末他也可能在中东那样胆大妄为的。

这时，有证据表明约旦已经制止住了叙军长驱直入的前进。侯赛因的坦克表现很好，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国王在内。

以色列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一个新问题是：叙军侵入约旦受挫后会不会增援？在约叙边界的叙利亚一边，现在至少有 200 辆坦克，而在叙利亚内地，还有 500 辆。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同叙利亚部队一起越过边界的苏联顾问，现在会不会接到新的指示而随军南下？

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一项决定。如果叙利亚境内的那些坦克向前推进，不管有无俄国人在内，以色列都要进行干预。拉宾对基辛格向他所提的要求作了部分回答，但不是全部回答，因为以色列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可能使美国卷入中东战争。拉宾在白宫与基辛格会晤时，详细阐明了以色列政府的态度。斯科参加了当晚的部分紧急磋商，但是没有全部参加。

拉宾严肃地通知基辛格，一旦叙利亚向约旦增派军队，一旦约旦军队果真开始崩溃，以色列将同意侯赛因托美国转告的要求。以色列将下令空军袭

击叙利亚坦克。但是，以色列保留一项这样的权利：如果以色列认为有必要，将派战斗部队进入约旦。此外，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不限制在约旦境内。为了实现挽救侯赛因亲西方政权这一“政治目标”，可能还需要对叙利亚境内进行空中和地面袭击。最后，拉宾强调，以色列需要“美国保护伞”的涵义，但是他明确表示：除非基辛格能提供尼克松总统的牢靠保证，必要时美国决心使用武力来对付苏联从苏伊士运河或从地中海对以色列采取的任何行动，否则，以色列无法搭救侯赛因。基辛格提供不了这样的保证。

夜深了，战场上的形势开始逼迫总统作出决定，这可能是尼克松不得不作出的最危急的决定之一。叙利亚又有一小批坦克越过边界，看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可能已在进行。约旦军队无力把叙军从伊尔比德撵走。突击队对国王军队的进攻也更猛了。侯赛因又一次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于是美国决心采取行动了。

基辛格和拉宾再次会晤。这位以色列大使再次强调，他的政府希望美国不介入中东战争；但他重申，以色列需要尼克松保证，在以军开进约旦或叙利亚时，美国将对苏联实行威慑，防止苏联干涉。基辛格再次向总统请示。

这次尼克松同意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谅解是明确肯定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以色列将对进入约旦的叙军发动进攻；如果埃及或苏联军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将对埃及和苏联进行干预。局势太紧急了，把这一异乎寻常的谅解写成文字的时间都没有了。两国同时分头行动起来了。

以色列大批坦克向约旦河开去。在戈兰高地，到处可以看到备战情况。在以色列的所有军用机场，喷气机发动了起来，导弹摆好了架势，炸弹装上了弹舱。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驶到离以色列海岸不到 60 浬的地方。一架有美国标志的小型军用运输机飞进特拉维夫时，有一艘苏联拖船在观看。苏联人大概对这次飞行进行了追踪。几小时后，这架飞机飞返航空母舰。基辛格对于放出这个表示美以协同行动的信号特别感到得意。西斯科告诉沃隆佐夫，以色列有能力出动部队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决心把侯赛因从叙利亚和突击队的围攻下解救出来，也是毫无疑问的。

9 月 22 日，星期二，紧张局势突然缓和下来。在美以协作的保证下，侯赛因向叙利亚人发动了全面攻势。他的坦克向北直捣伊尔比德，他的“空中猎鹰”战斗机对伊尔比德周围的叙利亚装甲部队进行了猛烈轰炸。到傍晚时（华盛顿是中午），有消息说，有几十辆叙利亚坦克开始调头朝北向边界驶去，这使基辛格感到宽慰。还有消息说，一些苏联外交官已在星期一晚间赶赴大马士革，要叙利亚结束入侵约旦的行动。

当晚，印度驻美大使馆埃及利益照管处负责人阿什拉夫·古尔巴勒博士，在他的华盛顿住宅举行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政策有了转变。基辛格参加了那次宴会，这样，如果苏联人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沃隆佐夫就可以找基辛格交谈。这位苏联外交官看到基辛格时显得局促不安，好像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去接近他。最后，在喝咖啡的时候，沃隆佐夫把基辛格拉到一边，急急忙忙向他强调说明，苏联正在尽全力来制止叙利亚。基辛格用怀疑的眼光盯着这位苏联使节说：“我们上次交谈的时候，你就告诉我说，叙利亚人不会增派部队了。”沃隆佐夫辩解道：“我们当时不知道叙利亚人会越过边界。我们自己的军事顾问到边界就停下来了，没有再向前进。”基辛格打断他的话说：“事情是你们和你们的受援国惹出来的，得由你们去收拾。”他没有透露，当时他已经知道叙军已开始调头向本国边界撤退了。

9月23日，星期三，苏联人又出现在华盛顿的酒会上，他们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约旦局势那么大惊小怪。当时叙利亚的最后一批坦克正在从约旦撤出。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的速度同当初准备采取行动时一样迅速。基辛格和拉宾握手相庆。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未经公布但很重要的谅解，已经同约旦危机本身一起成为历史了。但是两人都意识到，他们已创出了一个先例：美国并没有同以色列签订正式防务条约，但同这个国家却可以搞联合军事计划，甚至达到答应在苏联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时提供“保护伞”的程度。如果美国在1970年可以这样做，那么，这种有约束力的安排日后也就可以重演了。

由于基辛格和拉宾建立了这种特殊关系，许多以色列人都把基辛格当作“好朋友”看待，尽管基辛格只把以色列看成是范围更广的美苏战略争夺中的一个特殊部分。1971年年中，在谈判一项关于重开苏伊士运河的临时解决办法时，罗杰斯指望拉宾作出“单方面的让步”，甚至威胁要在一段短时间内停止运交喷气式飞机。基辛格为此出面进行了调解。到下半年，罗杰斯和拉宾之间的争吵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问题。这时，基辛格在总统的同意下向拉宾保证，美国将继续运交飞机，国务院不会再施加压力了。这次调解为梅厄夫人12月初拜访总统铺平了道路，还为以色列在1972年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奠定了基础。拉宾曾不顾外交惯例，谈他如何敬佩尼克松和基辛格，如何对麦戈文感到担心。他帮助使许多过去一直拥护民主党的犹太人这次改投了共和党的票。

在那些日子里，基辛格不愿把他同中东问题的关系宣扬出去。他虽然同拉宾见过好几十次面，讨论或辩论最敏感战争与和平问题，但在公开场合，他却只有一次对拉宾超过了点头打招呼的程度。这一次是在1972年秋天，离总统选举只有几个星期。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为了庆祝以色列独立25周年，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了一场演奏会。麦戈文到会了。尼克松自己没有去，派了基辛格和罗杰斯出席。共和党、民主党和以色列要人们都坐在楼座正中的包厢里，俯视着楼下那些彬彬有礼的听众，其中有杰出的议员、记者、律师、官员以及保安人员。休息时，麦戈文起立接受全场热烈鼓掌。音乐会结束后，听众纷纷退场，只有两个人还惹人注目地站在总统包厢里，面对面热烈地交谈着。这两个人是亨利·基辛格和伊扎克·拉宾，当时音乐厅里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公开显示的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约旦危机过去了，基辛格也成了中东问题的专家。那么，10月6日爆发的又一次中东危机，基辛格又将在外交舞台上如何表演呢？

第十三章

闪电战的幕后

10月6日的战争使基辛格感到意外。星期六清晨以前，他的行动依据是，中东局势尽管动荡，但还是可以驾驭的。几个月来虽然已经有战争迫在眉睫的明显迹象，但是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对这种迹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1972年11月中旬，即尼克松总统在竞选中以压倒优势取得连任的胜利之后一星期，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把大多数苏联军事顾问从埃及赶走之后四个月，萨达特收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封信，信中拒绝了萨达特希望得到更多先进武器的要求，这类武器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民“希望支持和缓政策”，因此他劝告萨达特要“承认目前的局势”，意思是要维持该地区的现状。勃列日涅夫的意思是清楚的：中东如果发生战事，可能损害苏美之间的和缓。

萨达特拒绝接受这个劝告。按照他的想法，战争是改善阿拉伯人处境的唯一办法。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中东，他就能使美国对以色列采取新的政策。11月14日，萨达特通过国内唯一的合法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说，在六个月以内，肯定不出一年，埃及将对以色列发动战争。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勃列日涅夫得到了更多关于萨达特11月14日决定的情报，这位苏联领导人转而采取了一项较为冒险的政策。在竭力主张苏联既可以从苏美和缓又可以从中东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强硬派的压力下，勃列日涅夫决定向埃及提供更多的先进军事装备。于是只见苏、埃两国官员奔走于莫斯科和开罗之间，商量供应新武器的具体条款。在几周的时间内，又有许多俄国飞机、坦克、架桥设备和电子装置源源运抵埃及。美国情报专家当时警告说，过去的武器数量极大。他们认为，如果埃及的意图仅仅是防御性的，数量未免太大了些。但是，即使基辛格曾经听到过这种警告，他也没有怎么重视。

1973年2月23日，萨达特的“基辛格”——一个身材高大、道貌岸然、名叫哈菲兹·伊斯梅尔的人，在华盛顿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这位埃及人的目的是要摸清楚美国是否愿意压以色列放弃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据伊斯梅尔宣称，会谈是“热烈的、客观的和富有成果的”。

3月1日，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到达华盛顿，她想了解美国是否打算针对苏联最近运给埃及武器的行动采取相应措施。尼克松过去曾一再保证要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军事力量平衡，因此他答应在以后四年里再向以色列提供48架“鬼怪”飞机。

总统的这个决定是在3月中旬透露出来的，这项决定证实了萨达特的看法，即战争是促使美国改变对以色列的立场的唯一办法。于是他便着手同政治上处于两个极端的两位阿拉伯领导人协调行动，制定一项共同战略。这两位领导人，右的方面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左的方面是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两人都拥有举足轻重的本钱。费萨尔有石油，这是阿拉伯人未曾试验过的一种武器。他第一次决心用石油武器从以色列手中夺回阿拉伯的领土。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梦想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里做祷告更使他神往了。阿萨德则有人力和激情，他一心只盼跟以色列大战一场。就是这种要打

仗的主张加强了他在大马士革的政治地位。

4月初，萨达特对《新闻周刊》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说：“动手的时刻到了。”下面是他们的对话中的有关部分：

问：“换句话说，为了要举行会谈，就非打不可吗？”

答：“至少如此。正如你所说的，时代变了。这里，一切也都在起变化——方向是战斗。”

问：“从你的谈话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认为恢复敌对行动是唯一的出路，是吗？”

答：“你说得很对。我国正在认真动员一切力量，准备再打——打仗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美国官员们读了萨达特的谈话之后忍不住说：“虚张声势，不过说说罢了！”他们说，萨达特早在1971年就发出过类似的警告——说什么“决定的一年”到了。这一年过去了，却未见埃及发动进攻。于是，萨达特的警告没有人信。

5月3日，阿萨德去莫斯科进行了24小时的访问后回到国内。为了打仗，他需要更多的武器。苏联答应大大加快运交计划。据报道，在一个月之内，叙利亚陆续收到了大量苏联最新式的T—62坦克和厉害的新式反坦克导弹，另外又得到40架米格—21喷气战斗机以及用来保卫大马士革的成套防空装备，其中包括雷达和萨姆导弹，此外又增派了许多苏联顾问。

基辛格认为，苏联执行这项交货计划是“不负责任的”，但他没有正式向苏联人提意见。当时，水门事件太使他分神了。再说，他认为，阿拉伯人即使重新武装起来，也不会去跟以色列人进行较量。

6月12日，萨达特飞抵大马士革，同阿萨德进行紧急磋商。他们在先前策划这场战争时曾一致认为，初秋是进攻以色列的有利时机，但他们对于战争的目的还有重大的分歧。是按照阿萨德的要求，执行所有阿拉伯激进派的口号“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呢？还是按萨达特的意见，先把以色列赶出它占领的某些阿拉伯领土，然后利用费萨尔的石油作为经济武器来压美国，要它迫使以色列人退到1967年的边界呢？经过长时间的商讨，萨达特终于使阿萨德同意了他的比较有限的目标。

在整个夏季，随着苏联武器源源运到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的军政领导人制定了作战计划。发动进攻的日子是由55岁的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选定的，他从穆斯林历史中寻求启示，找出了10月6日这个著名的巴德尔战纪念日。以色列人说，埃及人选定10月6日的真正原因，是要利用一年里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因为在以色列，这一天几乎什么活动都完全停止。后来埃及人否认了这种说法。

在备战的最后阶段，萨达特得到了约旦国王侯赛因一定程度的合作。9月10日，侯赛因到达开罗，同萨达特和阿萨德举行了两天最高级会议。这位约旦领导人一开始就强调说，他要限制他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不参加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进攻，但他将对以色列摆出要开辟第三战场的架势，从而牵制以色列军队，阻止其通过约旦领土从侧翼进犯叙利亚南部。侯赛因和阿萨德让萨达特下达最后的准备出击令。

9月13日，以色列为萨达特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借口。4架以色列喷气机在地中海上空巡逻（以色列人说是“例行巡逻”），即使实际不在叙利亚领空内，至少十分接近叙利亚领空。叙利亚的米格机立即迎击。以色列就派飞

机增援。这场空战还没有结束，至少已有 8 架（也可能有 13 架）米格机在空中被击毁。以色列损失了一架。阿萨德立即打电话给萨达特，催他开始“巴德尔行动”。当夜萨达特便下令作出击的最后准备。

9 月 22 日，萨达特通知勃列日涅夫说，战争将在 10 月 6 日开始。据说，这位苏联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从他的观点来看，这项计划显然是有利的。如果掌握得当，这场战争可以损害西方国家，使美国处于守势，打击以色列人——然而却不会破坏和缓局面。

一直密切监视着叙利亚和埃及调兵遣将的中央情报局，9 月 24 日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异常现象。其一，埃及人在大规模地调动整师整师的军队。其二，他们在以空前规模储备大量的军火和全套后勤物资。最后，专门搞电子情报的国家安全局从伊朗南部美国的一个秘密基地收到一些信号，这些信号表明埃及人已建立了一个极其周密的野战通讯网，其周密程度远远超过“演习”的需要。

9 月 25 日，苏联的运输船只进入地中海后向埃及驶去。船上装的是“飞毛腿”导弹，这种导弹改装起来可以发射核弹头。“飞毛腿”导弹的最大射程是 185 哩，也就是说，它的弹头可以从苏伊士运河以西的阵地打到以色列本土。

那天早些时候，叙利亚的坦克开始改变其通常的防御态势。中央情报局认为，“叙军改变部署的目的何在，值得严重注意”。

9 月 26 日，达扬视察了戈兰高地前线。他是最先对叙利亚军队调动表示关切的以色列领导人。他对以色列部队说：“叙利亚沿边境一带，有数以百计的坦克和在有效射程内的大炮，还有同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人的防空系统同样密集的防空系统。”达扬仍然认为阿拉伯人不敢进攻以色列，但他对叙利亚军队的调动极其关切，因此，加强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沿线的巡逻。他特地命令以色列的一支精锐部队第七装甲旅离开贝尔谢巴驻地开赴前线。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要不是第七旅骁勇善战，戈兰高地本来会在战争的头几天内就落到叙利亚人手中的。

9 月 28 日，萨达特在纪念纳赛尔逝世三周年讲话中最后说：“兄弟姐妹们，也许你们已注意到，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讲到。这就是打仗问题。我是故意不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而且我们是下了决心，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不惜牺牲，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不想许任何诺言，我不想谈任何具体情况。但是，我必须说，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收复失地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真主保佑，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9 月 29 日，基辛格看了中央情报局送来的情报，叙利亚不寻常地在戈兰前线附近加紧调动坦克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让手下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同以色列大使西姆哈·迪尼茨核实一下，并征求他的看法。迪尼茨是一位 45 岁的外交官，出生在特拉维夫，曾在乔治敦大学获得国际法的学位。当时，基辛格的估计是：以色列在中东搞的情报系统最出色，如果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策略感到可疑而不放心的话，他们是不会不愿告诉他的，迪尼茨在一小时内回了电话。他说，叙军仍处于“防御态势”。他说，除非叙利亚人参加由埃及人领头的联合进攻，否则他们是不会发动进攻的。这位大使还说，到那时为止，以色列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阿拉伯人打算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配合进攻。基辛格对他说，美国很希望以色列及时提供关于局势的最新情报。

在随后的一星期里，不断得到的情报显示埃叙确实打算立即发动联合进

攻；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相信这一点。

他们都同意政府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即尽管阿拉伯人在停火线的本国一边进行广泛的军事调动，但他们不至于愚蠢到想发动战争。基辛格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当时认为，阿拉伯人很不团结，政治领导人又很平庸，因而无法联合起来对以色列发动有力的进攻。

此外，基辛格在联合国同一些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进行了几次长谈以后断定，阿拉伯人的目的是举行一轮新的谈判，而不是一场新战争。看来他们迫切想让他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充当中间人。既然基辛格已经通过谈判突破了对华关系，开始了同苏联和解和对话，并在南北越之间作出了某种安排，他们认为，他现在应该把自己的谈判魔术应用到中东了。

虽然基辛格听到这个看法后很得意，但他还是劝阿拉伯人不要指望出现什么“奇迹”。基辛格是愿意出一臂之力的，但他仍然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不想让人们空寄期望。9月25日，在宴请13位阿拉伯国家的外长和大使的午餐会上，他保证美国方面将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并说明：“必须着重寻找出在这一地区实现和解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他说：“我们愿意朝着实现和平的方向努力。我们愿意表现出谅解精神，并且希望你们也这样做……现在需要做的是，找到办法把目前你们不能接受的情况变为你们能与之相处的局面。”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发出了同样谨慎而乐观的调子。他对记者说，阿拉伯人并不指望会产生什么“奇迹”，“美国倒是竭力想求得某种公正的和平解决……我们希望，将来会得到某种解决。”从他的讲话中，记者或基辛格都没有得到情况吃紧的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埃叙联合进攻以色列使基辛格完全感到意外。他一直认为，策划进攻的可能是以色列，而不是阿拉伯国家。

9月28日，一帮自称为“巴勒斯坦革命之鹰”的恐怖分子伏击了载着苏联犹太人的一列火车。这些苏联犹太人是前往以色列途中在维也纳附近的舍瑙堡宿夜的。巴勒斯坦人扣留了5名犹太人和1名奥地利海关官员作为人质，要求禁止犹太移民通过舍瑙堡。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马上屈从了他们的要求。梅厄夫人专程前往维也纳，想说服克赖斯基改变决定，可是她失败了。10月3日，以色列内阁在沮丧的气氛中开会，听取了梅厄夫人报告她在维也纳是怎么失败的。谁都不知道该对这类威胁作何反应，除非对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采取报复行动，并在讹诈面前毫不退让。

基辛格几天前从迪尼茨同他谈话的口气中已经觉察到，以色列人极为恼怒，因此他担心以色列可能认为必须对难民营发动一系列突击，甚至必须进攻埃及或叙利亚，以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恐怖行动。他劝迪尼茨要忍耐，他解释道，如果在这个地区继续互相采取暴力行动，就可能迅速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这无论对以色列还是对美国都没有好处。即使以色列再获大胜（他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也不会更早取得和平解决。他说，阿拉伯人决不会在处于软弱屈辱的地位时进行谈判。此外，苏联也不会让阿拉伯人再次遭到重创，如果苏联以任何方式插手帮助阿拉伯人，美国就不得不站在以色列一边进行干预，以保住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然而美国却无意在越南战争后这么快就卷入一场新的军事冒险。最后，基辛格指出，如果战争重起，不管是谁发动的，都势将影响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

肯定他的论点是否说服了这位以色列大使。而当他自己手下的情报官员给他送来关于阿拉伯人异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的情报时，他却以为，阿拉伯人不过是在为了应付以色列可能发动的进攻而作准备罢了。

10月1日，以色列政府要求美国加快运去在3月份就答应了每月交付一次的“鬼怪”飞机。提出这个要求更多的是想在这个地区保持军事力量平衡，而不是担心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10月2日，叙利亚动员了后备役部队。埃及也开始沿苏伊士运河全线进行紧张的、在某些方面是明显的战争准备。

10月4日，战争爆发前48小时，基辛格在联合国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国务大臣奥马尔·萨卡夫讨论了中东问题和日益严重的能源问题。从当时的情况看，毫无会发生战争的迹象，也不存在要切断石油供应的威胁。

那天下午，基辛格问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以色列是否同意跟埃及进行“私下交谈”，也许在11月以色列大选之后，由美国（基辛格或西斯科）充当中间人。埃班说，他将乐意再到纽约来共同探索和解的新途径。

那天深夜，苏联人开始撤出数百名家属——先从开罗撤，然后从大马士革撤。基辛格最初的想法是，萨达特又撵走了一批苏联顾问；可是情报专家都不同意这种猜测，于是他放弃了他的想法。情报专家们认为，撤出家属肯定是不祥之兆。基辛格此时不免感到惴惴不安，他问他们：撤着是否意味着战争？他们马上给了他一个初步的答复。他们说，始终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目前还“不大像”。中央情报局答应在48小时之内提出比较成熟的判断。

10月5日，攻击日的前一天，国家安全局从伊朗南部的基地收到苏伊士战线那里发出的即将开战的明确无误的信号；同时，叙利亚坦克编队中增加了大批T—62坦克，突然改为进攻队形。

上午11点，以色列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将军取消了军人的一切休假，并告诫他的参谋部说，现在可能要征召后备役（构成以色列的大部分陆军和空军）。他把已退休的艾里尔（“艾里克”）·沙伦将军从贝尔谢巴附近的农场召了回来。白发苍苍的沙伦看了埃及军队集结（包括供跨越运河之用的装备在内）的照片情报之后断定：“我认为一两天之内就要打起来。”

华盛顿时间下午5时，以色列使馆代办沙列夫正在渴望的，要转给基辛格的详明电报到了。这是一份反映出耶路撒冷混乱的文件。电报陈述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准备可能是阿拉伯人害怕遭到以色列进攻的结果，他们的军事准备或者可能预示着埃及和叙利亚或任一方已计划进攻以色列。

电文指示沙列夫代表总理去要求基辛格向埃及和叙利亚保证：以色列并无侵略意图。另一方面，沙列夫应当让基辛格明白，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它将作出强有力的大规模反击。总理要求，国务卿特别要把这些话转达到埃及、叙利亚和苏联，以引起他们注意。

如果对沙列夫的电报就此结束，那么一切就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进展。但是，沙列夫还要个别转送一份附加信息给基辛格。这份附加信息就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它认为：叙利亚部队的移动反映出大马士革对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打击已有所预料。至于埃及部队，以色列的情报分析则认为：它正在从事大规模军事演习，将于10月7日结束。

沙列夫被告知，先去通过斯考克罗夫特把电文的全部内容转告基辛格。沙列夫立即照办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这位基辛格身边老练的助手收到

电讯时，注意到了电稿正文和情报分析之间的不一致。电稿正文上，在阿拉伯人害怕以色列进攻的推测这个基本估计以后，才作为第二个可能性提到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可能。在以色列的情报分析上，却并未强调阿拉伯进攻的可能性。作为一位军人斯考克罗夫特对以色列情报的高水平很欣赏，毫不犹豫地对付了这两种要受到优先考虑的看法——没有强求忙碌的国务卿立即处理这份文电。事实上，直到星期六早晨，基辛格才看到这份电报。可是，为时太晚了。

对外长埃班和他的政治秘书贝特索来说，赎罪日应当是在广场饭店大睡懒觉的一天。这些官员经过从以色列赴纽约的疲劳旅程，经过参加联合国大会，与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一起对付过闹哄哄的会议后，需要休息。埃班放下百叶窗，使阳光不照进房内，取掉了电话挂钩——这只是防止那么个人在那么个地方忘记这天的神圣。可是，在布置那一切之前，他却没忘记打电话给他在赫兹利亚的妻子苏士尔，保证不让任何事情打搅他的赎罪日休息。

贝特索是第一个知道这珍贵的休息日将不会兑现的人，因为，上午近 6 时，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

“贝特索先生！贝特索先生！”一阵听口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声音传来。

“谁呀？”这位昏昏欲睡的秘书低声问道。

“以色列的一份紧急电报。”

贝特索渐趋苏醒，若有所思：一份紧急电报？在赎罪日？他回忆不起有什么悬而未决的急事需要用这么份电报，他一边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移向门边，一边想：总是耶路撒冷的某个人想显示出他的过份忠于职守。

贝特索不知道前一天给沙列夫的详明电报已收到。他给了一点小费给信使，收下了电报。电报是内阁阁员伊斯雷尔·加利拍来的。电文说：我们已得到确凿无疑的报告：“埃及和叙利亚打算于下午 6 时发动一场战争。”

贝特索这时还只穿着睡衣，便急忙穿过走廊，来到埃班的房门前，气喘吁吁敲着门。可是，没有回答。明显地，这位外长正信守诺言，睡得鼾声如雷。贝特索便无所顾忌地用力踢房门，引得住在这家豪华旅馆里的受惊的人们都把头伸出门外张望。最后，他终于设法把这位外长从梦中叫醒了。

埃班看着这份电报，穿着睡衣坐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他指示贝特索与在华道夫饭店的基辛格谋求一次紧急接触，不到 10 分钟，贝特索把电话听筒递给埃班，电话线的另一头就是美国国务卿。当时是纽约时间上午 6 时半，以色列时间中午 12 时半。

埃班把刚收到的电报念给基辛格听。基辛格已从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那儿收到了同样的电报。他答应埃班说，他查一查后就回电话。10 分钟后，电话回来了。基辛格的声音中流露出紧张。他说：他刚与埃及大使谈过，这位大使指控说，以色列海军正在两个地方发动进攻。基辛格尽管强调了自己对此事的不相信，但仍要求埃班查明：埃及的指控是否有些真实性。

这样，埃班现在必须挂电话到耶路撒冷外交部。他可以与外交部秘书长莫德凯·格准谈话。这位秘书长当即回答：“埃及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突然，格准中断谈话，要埃班在电话上等着。紧张的几秒钟后，秘书长的声音又回来了，且带着踌躇和忧伤：“恰好在这个时刻，有人递给我一张便条：战争已经打响了。”

至于基辛格，战争爆发前的光阴则消耗在疯狂激动，但又是敷衍塞责的

外交接触中。他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在比斯坎湾佛罗里达白宫的尼克松总统，第二个电话挂给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基辛格要求莫斯科尽一切力量阻止埃及和叙利亚的行动，他同时提议，两个超级大国约定：“如果战争要爆发，两国都不介入。”多勃雷宁答应与克里姆林宫协商后给予回答。不久，他回了电话，向基辛格保证：苏联对这两个要求统统接受，并将依计而行。在后来的日子里，基辛格还会清楚地记得多勃雷宁的这些漂亮话——然而，就是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苏联安东诺夫运输机向开罗和大马士革源源输送大量武器装备；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莫斯科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备的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下一步，基辛格发了一个海底电报给沙特阿拉伯国王弗萨尔，要求他对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尽力施加影响。然后，他又打了个电话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德·瓦尔德海姆，把形势向他作了简要介绍。

但是，直到战争爆发时，基辛格仍对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比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更加关心，最初，他打了个电话给沙列夫，要他向以色列政府转告“一个美国总统的请求”，要以色列千万不要发动战争。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基廷大使把同样的警告转告给果尔达·梅厄。

事实证明，基廷的警告是多此一举。梅厄夫人当时正在召开“厨房内阁”会议（会议真是在她的厨房里召开的）。她同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管部长伊斯雷尔·加利会商。她拒绝了参谋长埃拉扎尔的紧急要求。埃拉扎尔主张先下手，对埃叙集结军队进行袭击，以制止阿拉伯人的进攻。他当时认为阿拉伯人肯定要发动进攻。

然而，达扬和梅厄夫人确信：这样的措施会得不到以色列的主要同盟国——美国的支持。他们否决了埃拉扎尔的建议。

梅厄夫人和达扬决定反对先行打击，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明智的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在这一点上，他俩在操舵。但他们并不知道：关于如何抉择的讨论已经是书生空谈了。仅稍迟一点，就发现前线地面部队软弱得不能执行一次成功的行动，更别提先发制人的出击了。空军只作了下午1时的准备。结果是，这已经离战争爆发不到1个小时，而不是5个小时。而这些以色列人正错误地把选择的讨论建立在5个小时的基础上。

战争爆发的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基辛格回到华盛顿。他确信战争是阿拉伯人发动的了。扎那特关于以色列先动手的说法，使五角大楼里的少数人改变了观点。可是到了傍晚，当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危机气氛中再次开会时，更多的情报使美国高级官员们相信，是埃及和叙利亚破坏了停火，而以色列不过是对侵略进行了反击。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国务卿外，还有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西斯科、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是由这个小组制定的。

当晚，他们命令美国第六舰队司令派4艘舰只——攻击型航空母舰“独立”号和3艘驱逐舰——从雅典驶往离以色列海岸500哩的克里特岛。他们命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大使馆准备撤退家属。他们还考虑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但当时没有作出决定。

会后，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和英国大使克罗默勋爵，探询苏英两国政府是否反对举行安理会会议。克罗默勋爵没有正面答复。多勃雷宁看来不赞成。

10月7日，星期日，基辛格得到总统的同意，要求举行安理会会议；可是由于苏联的保留态度，美国没有马上呼吁停火。当时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澳大利亚人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同各大国代表进行了磋商，看他们能否在议程上取得一致意见。

众所周知，基辛格对联合国从来兴趣不大，因此他注视着战场形势，他知道决定他的外交策略的是这个。他查看了最新情报。他听说，以色列的后备投人员已经抛开了赎罪日的宗教仪式，奔赶全国各地的集结地点，然后跟着部队开往戈兰或苏伊士前线。但在一两天内他们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开战之初，过去被誉为战无不胜的以色列人，却迫处守势；而过去被嘲笑为不堪一击的阿拉伯人，则采取攻势。叙利亚的坦克在戈兰高地兵员不足的以色列防线上突破了一些大缺口，要是没有第七旅，他们就会长驱直入以色列，直捣1967年之前的以色列国土了。叙利亚的大炮把重型炮弹一直打到了加利利湖附近的以色列村庄。虽然以色列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叙利亚的喷气机不敢交锋，但苏联新设置的防空系统开始时仍使以色列空军遭到重大损失，其严重程度是以色列人从未估计到的。在南线，消息更为惊人。在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数以千计的埃及部队用突袭方式越过苏伊士运河，使以色列人完全措手不及。这样，埃及部队就自1967年以来第一次在运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尽管以色列人进行了反击，可是随着桥头堡的扩大，著名的巴列夫防线在埃及的强大攻势下终于瓦解了。

基辛格一向以为，缓和会鼓励苏联运用其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来防止战争。可是阿拉伯人这次对这个犹太国家的联合进攻，却一夜之间就动摇了他的这个估计。事实正好相反，苏联人不仅事先知道要爆发战争而没有提请人们警惕这个“对和平的威胁”，反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的两三周内给开罗和大马士革运去了大量军火，从而直接帮助阿拉伯人取得了初期的胜利。基辛格既生气又伤心：对苏联是生气，对自己是伤心。多年前他曾写道：“检验政治领导人的水平，是看其能否在事变发生之前对之作出充分的估计。”他重新翻阅了战争前的情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人必定以为和缓与战争两者是可以兼得的。可是这个结论已经是马后炮了。基辛格不能肯定，水门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人的判断。

虽然他对苏联人生气，但是他明白，要制止战事的发展和使有关国家坐下来谈判，他还需要得到他们的合作。苏联是中东的一个重大因素。几年来，基辛格一直希望，有朝一日两个超级大国会同心协力促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达成和平协议。如今他感到，这一天已临近了。他顶住了主张谴责苏联人的政治压力，而保持着同多勃雷宁的联系。

那天，基辛格同这位苏联使节谈了几次话。有一次，他交给多勃雷宁一封总统致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信中呼吁实行停火和承担起制止战事发展的责任。尼克松提醒苏联领导人说，他们两人1972年5月在莫斯科和1973年6月在华盛顿签署的两项特别公报中曾保证，双方“竭尽全力，防止出现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各种冲突或局面”。当天夜间，多勃雷宁交勃列日涅夫给总统的复信，同意在联合国考虑停火问题，并表示希望能制止战事再发展下去。基辛格对这次信件往来比较满意，因为这似乎表明苏联在中东的要求不高；而如果苏联的要求不高，阿拉伯人的要求恐怕也是这样。

阿拉伯人在战争的头两天虽然赢得了初步胜利，但是基辛格仍像过去一样相信，以色列即使先遭到袭击，也会迅速动员本国力量击退敌人的。他估

计，以色列至多过三四天就会迅速取胜。

下午6点，基辛格在国务院接见了迪尼茨。这位以色列使节刚回华盛顿，带来了梅厄夫人要美国提供一些武器的要求。这项要求主要是指她一星期前提出的要美国提前运交48架“鬼怪”喷气战斗机以及坦克和电子装备。

迪尼茨解释说，以色列在埃及战线上要对付2000辆坦克，在叙利亚战线上要对付1000辆坦克。他相当详细地告诉基辛格，梅厄夫人已决定拒绝埃拉扎尔提出的抢先袭击的建议，而达扬已表示支持总理的决定。这位国防部长曾同意埃拉扎尔的主张，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先发制人是有道理的；但从政治观点来看，他反对那样做。基辛格赞赏地说：“那个决定是正确的。”迪尼茨回答说，“对”，可是“在装备方面，那样决定就要求美国承担一项特殊的责任——不能把我们丢下不管”。

对于以色列的求援，基辛格并不想抛弃道德责任。但是，基于几个理由，他没打算满足那些需要。

基辛格认为：未在战场上造成决定性悬殊时，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可能危及与苏联更有希望的合作，危及与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关系。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为了将来的考虑。如果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援助，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恐怕早就开始了威胁美国的石油禁运。这次，基辛格与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这点上完全一致。尼克松正忙于听取水门录音带，把这一切开始的活动都留给了他的国务卿。

但是，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对迪尼茨根本没说。恰恰相反，在一些电话会谈和无休无止的会晤中，基辛格总以休戚相关这类词句和空口诺言给这位大使充饥，以此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基辛格确信，如果他能再拖住迪尼茨几天，战争就会结束，那时，美国站出来，就会在阿拉伯人的眼中清白无瑕，与苏联的缓和就会维持下去。

然而，基辛格瞒着迪尼茨的那些东西却一古脑儿告诉了多勃雷宁。他主动告诉这位苏联大使说，以色列为催促军援，在他身上施加压力。作为回报，基辛格要求莫斯科尽力为停火施加影响，控制给自己同盟国的补给，以防止战争逐步升级。正像基辛格诱惑迪尼茨一样，多勃雷宁也以苏联愿意合作的诺言给基辛格充饥。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多勃雷宁诱惑了基辛格。当然，多勃雷宁也同样玩着拖延时间的把戏。对以色列的军需补给每拖一天都会带给埃及、叙利亚以及苏联的外交以明显的好处。

10月8日清晨，两条战线上都打得很激烈。据可靠方面人士说，这时施莱辛格同他的高级助手进行了磋商，他拒绝了准许以色列飞机在美国着陆装运军火和零件的要求。那天上午，埃拉扎尔曾表示，以军很快将转入进攻，他这样说的部分根据是预计美国会增加军火供应。迪尼茨获悉施莱辛格拒绝以色列的要求后，感到不可理解。他打电话给基辛格说，苏联帮助它的朋友一点也不感到为难，美国对援助以色列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愿意呢？基辛格说，他要查一查。他在同五角大楼交换意见后，给迪尼茨回了电话，宣称已允许“少数以色列飞机”在美国基地着陆装运军火，“不过要把尾翼漆一下”，也就是说，把尾翼以色列的六角星标记涂掉。不用说，这是美国政府想避免得罪阿拉伯人和石油公司的说客们。

下午1点1刻，基辛格又打电话给迪尼茨。他有好消息告诉迪尼茨。他说，总统已经“原则上同意”给以色列补充飞机损失——当时以色列的飞机损失相当惨重。迪尼茨表示感谢，接着再次提出了运输军火和零件的问题。

下午3点1刻，迪尼茨打电话问基辛格：美国什么时候把新补充的“鬼怪”飞机开始运交以色列？当时飞机的损失已比预料的数目高得多。基辛格答称，那是个敏感的问题，他正在亲自同五角大楼商量。

下午5点，迪尼茨又来了电话。他刚同梅厄夫人通了电话。梅厄夫人认为“最优先要办”的事，不仅是运交已要求的飞机和坦克，而且由于战事激烈，以色列损失惨重，还要提出一份新的购买武器清单。基辛格说，他将考虑这份新清单；同时他透露说，他从五角大楼只弄到了2架飞机，不能再多了。他说，坦克问题就更难办了。从美国库存中提取这批坦克要花费“好几个星期”。迪尼茨问：坦克能否从美国在西欧的基地调拨？基辛格说，他要了解一下。迪尼茨问道：既然总统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为什么这批飞机还那么难搞到？基辛格暗示，他“在五角大楼遇到官场的麻烦问题”。迪尼茨当即要求同基辛格面谈。

下午6点40分，迪尼茨被引进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室。他告诉国务卿说，亨利·杰克逊、伯奇·贝赫、查尔斯·珀西等打算竞选总统的几位参议员都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以色列获得武器。迪尼茨说，他不知道这种公众的呼声还能压住多久。以色列要飞机、坦克，而且迫切需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从早到晚源源不断送到基辛格办公室的情报表明，以色列要转入攻势还很困难。基辛格原来估计以色列不出3天就能打败阿拉伯人，现在他认为需要5天的时间。最后，国务卿对迪尼茨说，以色列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得到那2架“鬼怪”飞机。怎么是2架呢？迪尼茨大叫起来。以色列需要好几十架呀！基辛格说，要不是他亲自说项，以色列恐怕连这2架都得不到呢。这是因为五角大楼反对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交付任何“鬼怪”飞机。基辛格言下之意是，他正在美国官场中为迪尼茨作战。

基辛格在同迪尼茨进行电话交谈和会晤的这段时间里，也同多勃雷宁进行了一系列电话交谈和会晤，但他对多勃雷宁采取了不同的论调。他说国会要美国迅速援助以色列，重新估计政府同苏联搞和缓的政策。基辛格对苏联大使说，现在亲以色列的行动可多啦，是他在压着。他吁请苏联合作制止阿拉伯军队挺进，促成中东停火。他得意地引用了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在莫斯科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祝酒词（勃列日涅夫当时说，苏联赞成“我国邻近地区内的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得到公正、持久的和平……和有保证的安全”）。多勃雷宁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勃列日涅夫的方针。基辛格以为，这说明苏联人已在采取“和解的姿态，正在劝说阿拉伯人采取克制态度”。

但是当天晚上，基辛格在“地上和平会议”上的演说中，转弯抹角地向苏联人提出了警告。他坚定地说：“我们将抵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任何地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是无法使和缓局面维持下去的。”基辛格确信，多勃雷宁当夜定会把他这一字斟句酌的警告报回克里姆林宫。

基辛格的警告对苏联的政策没有产生效果。10月9日，星期二，国务卿收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情报。其中一个情报说，开往叙利亚和埃及港口的苏联物资供应船只增多了。另一个情报主要是讲苏联军舰在地中海猛增的情况。还有一个情报说，勃列日涅夫已经改变了他的温和调子。这位苏联党魁在一封致阿尔及利亚好斗的领导人阿里·布迈丁主席的信中，力促阿尔及利亚人民“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支援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以色列侵略者强加于它们的艰苦斗争”。勃列日涅夫似乎是在怂恿阿

尔及利亚参加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战争。在基辛格看来，这是同劝说阿拉伯人采取克制态度背道而驰的。

基辛格和迪尼茨那天第一次会晤的时间是上午 8 点 1 刻。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又来到国务卿在白宫的办公室，再次提出要美国供给飞机和坦克的紧急要求。他说，以色列至少已经损失了 15 架“鬼怪”飞机和 45 架 A—4 “空中之鹰”飞机、1 架轻型攻击轰炸机。这就是说，总共损失了以色列历来从美国获得的飞机总数的 20%。苏联人提供给埃及和叙利亚的机动的新式萨姆—6 地对空导弹命中率极高。以色列急需类似美国战斗机在北越上空对付其他萨姆导弹那样的电子干扰设备。究竟是什么原因卡住了运交工作？基辛格再次表示了一番同情。他中断了这次会晤，说他会紧急通盘处理这个问题的。

上午 11 点 3 刻，基辛格打电话给迪尼茨，又说他在同政府机构打交道时遇到了许多麻烦，意思是：在实现以色列的要求方面，他是在单枪匹马地同五角大楼斗，在此之前，基辛格为了联系方便，已让安装了一条直通以色列大使馆迪尼茨办公室的保密专线。国务卿请大使在当天傍晚 6 点 1 刻再来白宫。

那天下午，基辛格就以以色列要求供应的问题同尼克松进行了磋商，因而在傍晚就告诉迪尼茨，总统已经同意了以色列的“全部”要求。损失的全部飞机和坦克都将得到补充，包括干扰装置在内的全部电子设备都将配齐，还允许以色列运输机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欧欣纳海军航空站着陆，以装运“麻雀”和“响尾蛇”两种空对空导弹以及其他先进武器装备。基辛格仍然指望以色列人在星期四前能了结战事。他认为，总统答应补充以色列的“全部”损失，一定会使以色列士气大振。

那天一整天，国会由杰克逊带头，对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给以色列运送更多的军事物资，所以迪尼茨感到，可能是这种压力促使总统作出了那个决定。

晚上 8 点 3 刻，基辛格打电话给迪尼茨说，施莱辛格可以在星期三同以色列人讨论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显然，总统在此之前是施加了一些压力的。

10 月 10 日，星期三凌晨，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都收到了苏联向大马士革和开罗进行空运的第一批明显的信号。空运的规模究竟多大还不清楚。

上午 10 点 3 刻，基辛格打电话给迪尼茨，两人讨论了苏联向叙、埃空运的问题。这两个外交家显然都感到忧心忡忡——基辛格是因为空运这件事怎么也无法表明苏联的“克制态度”；迪尼茨则因为他的敌人能毫无困难地得到援助，而他却还得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花功夫“把以色列飞机上的犹太六角星一个个涂掉”。国务卿转换了话题。战争打得怎样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对以色列将迅速转入反攻并获胜的乐观估计。迪尼茨提供了最新情报。在戈兰战线，虽然已经制止了叙利亚人前进，但仍有激烈的战斗。以色列的坦克损失极大，主要是因为叙利亚配备了苏联武库中最新式的、命中率特高的反坦克导弹。在西奈战线，埃及人摧毁或包围了以色列在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埃及军队 2 万多人，连同 400 辆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已经越过了运河，正在修筑工事。此外，以色列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也极大。埃拉扎尔所说的反攻还搞不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储存的军火日益减少。迪尼茨愤慨地问道，供应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总统不是批准了吗？以色列必须马上得到供应。基辛格再次答应迅速作出答复。

于是基辛格打电话给施莱辛格，请他尽快安排租用民航机把美国的军援物资运往以色列。国防部长对这个意见并不热心，但也没有反对。施莱辛格究竟愿不愿意帮忙，当时基辛格并没有把握。

上午 11 点 20 分，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迪尼茨。从安曼获悉的情报说，侯赛因国王已决定派遣少量约旦部队开进叙利亚境内去帮助实现阿拉伯人的目标。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希望以色列不要因此而进攻约旦。他请迪尼茨在当天下午 3 点半来白宫。

傍晚前，国家安全和中央情报局收到了中东发来的紧急报告，内称，苏联最大的运输机安东诺夫—22 正在担当苏联空运的主力，这种噪音很大的庞然大物大体上每隔一定的时间就有一批飞到大马士革和开罗。这说明空运已是“大规模的”了。情报机关的报告上绘出了安东诺夫—22 从基辅飞往布达佩斯、又从布达佩斯经贝尔格莱德到大马士革或开罗的航线图。已有 21 架安东诺夫—22 到达叙利亚，还有 2 艘苏联大型运输舰已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朝战区驶去。据估计，每艘装载着 3600 吨军事装备。这些报告引起了基辛格的注意，他立刻打电话问迪尼茨，以色列大使能否在晚上 8 点来白宫。

当晚的会晤进行了 1 小时 15 分钟。双方集中讨论了苏联呼吁停火的问题。迪尼茨再次表示反对。这位以色列大使颇为恼火他说：“苏联现在装扮不成爱好和平的人了，这场战争就是他们挑起的。当初是，他们明知道阿拉伯人马上要进攻而不通知你们，也不加制止。现在是，他们又在唆使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来打以色列，并且进行大规模的空运。而在这一切之后，他们竟要求冻结现状！”基辛格没有反驳这位大使的论点，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迪尼茨走后，基辛格就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劝他推迟发出停火呼吁。

那天深夜，基辛格接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中央情报局获悉，苏联在东欧的 3 个空降师已处于戒备状态。既然欧洲没有发生危机，基辛格只能认为，这些部队进行戒备，可能是要调到中东去。可是，为什么？苏联的受援国打得好，事实上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好。而苏联的直接干预只能招致美国采取反措施，这就可能升级为一场核战争。为什么？基辛格后来这样说，那是“一个万分危险的局势，比 1970 年的约旦危机还要糟得多，危险得多”。他打电话给迪尼茨，建议星期四上午 7 点 3 刻会晤。他没有把苏联的戒备动态告诉他。

迪尼茨的汽车在上午 7 点 40 分开进了国务院外交官员入口处的环形车道。倦眼朦胧的大使和沙列夫两人匆匆穿过静悄悄的门廊，走过旋转不息的巨型地球仪。那里有几名记者，因为完全事出意外，没来得及赶上去提问题。不一会儿，电梯把他们带到了七楼国务卿办公室。然后，迪尼茨和基辛格用一个多小时集中讨论了一个问题。即让五角大楼紧急向以色列提供飞机、坦克和电子设备。

夜间，基辛格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必须要苏联住手，这不仅是为了援救以色列，而且在他看来，也是为了使全世界免于了一场大国对抗。苏联的空运和戒备使他改变了原以为以色列能够速胜的看法。正如他错误地判断了战争爆发前的情报一样，他也错误地估计了阿拉伯人的意志和能力以及苏联人的两面派作风。现在他决心开始大规模空运美国军事物资以给以色列了。为了表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并确保它的盟国能发动胜利的反攻，美国在空运方面必须同苏联旗鼓相当。基辛格确信，以色列人得到美国的大量武器和支持后，定能扭转战局，恢复这个地区的军事均势，从而

使美国在外交上拥有影响这场战争结束后谈判的能力。当时基辛格在战略上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使阿拉伯人相信：他们决不能靠苏联的武器取胜，如果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任何目标，到头来还得同美国打交道。

后来基辛格解释说：“我们曾想在第一周内举行会谈。当这一点没有做到时，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运去大量武器装备，让我们开辟出一种新的局面时再说吧。”

基辛格让迪尼茨去找施莱辛格商谈运送武器装备问题。他暗示，这回施莱辛格会通融一些了。

下午四五点钟，基辛格在是否必须纠正中东军事力量不平衡的问题上同施莱辛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基辛格再次催施莱辛格租用20架美国运输机，给以色列空运急需品。施莱辛格拒绝了基辛格的要求，他以同样激烈的意见反驳说，美国对以色列的空运哪怕是少量的，也会大大激怒阿拉伯人，从而使他们有可能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这场争论只是在基辛格的观点得到总统的支持之后才算解决。尼克松命令施莱辛格租用20架运输机。

傍晚，基辛格打电话给迪尼茨，告诉他关于租用飞机的消息。接着，迪尼茨提请国务卿注意，以色列每天，甚至几乎每小时，都在求美国增加供应军用飞机，尤其是“鬼怪”喷气机。据估计，以色列在战争的头5天中已损失了75架飞机，其中“鬼怪”飞机也许达28架之多。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星期五将有2架“鬼怪”飞机运交以色列，星期六有2架，星期日还有2架，总共6架。迪尼茨向基辛格指出，以色列所说的飞机运交数量决非这么几架。基辛格说，他理解以色列的问题，但以色列也应当理解他的问题。迪尼茨向那路撒冷发了一个调子悲观的报告。当时他差不多已经决定，如果星期六之前他得不到运交大量飞机、坦克的坚决承诺，他就要把此事“公诸于众”——就是说，他将鼓动美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在国会、企业界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压政府采取行动援助以色列。

10月12日，星期五，局面开始脱离基辛格的掌握，梅厄夫人的忍耐到了终点，基辛格的缓兵之计现在暴露无遗。那天，她寄了一封绝望信到华盛顿，恳求美国立即地、直接地、大规模地空运武器和装备。这次，这封信没发给基辛格，而是直接发给了尼克松总统。

尼克松现在也正准备采取行动，已逐渐清楚苏联人目前在于些什么。他的桌子上摆满了关于空前规模的苏联空运的情况通报。他对莫斯科的一切接近，无论直接的或是通过基辛格的，要求“保持不干涉”已由几句安慰话作为回答。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他被当作一个白痴任人玩弄。苏联人只不过想赢得时间，加之他的水门纠纷正好使他在这件丑闻中失去了他的副总统，这使他们更相信，他们可以继续把总统不当作一回事。

尼克松正好也收到两份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来的贺词，两份都预先通知：如果开辟对以色列的空运补给线，费萨尔就实行他的长期威胁——对美国禁运石油。

这次，这些威胁被当成了耳旁风而未予理睬。尼克松看到：现在的形势不仅正在危及他自己的宝座，而且在危及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如果战争在以色列败北，或是在它被削弱的情况下结束，苏联就会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永久支配力量。

这种认识激起了尼克松的好斗精神。10月13日，星期六，他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次他的命令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立即地、大规模地、

无任何限制地使用美国军用运输机，把军需直接运往利达机场。

像奇迹一样，基辛格在过去 7 天念咒招来的五角大楼的全部官僚狼獾们统统消逝了。突然间，施莱辛格和克莱门茨卷进了带有显著效果的行动。关键是他们永远没有力量，没有权力，或者说，没有意志来违犯总统的指示。同样清楚的是，直到那时，总统的忠实顾问提醒他们注意总统指示时，他们一直是始终如一地按照总统的指示在行动。

如此这般，星期六下午迟些时候，国务卿便打了个电话给在纽约的埃班，通知他：所有障碍已经排除。根据基辛格的说法，67 架运输机现在已经插上蓝天，飞行在通往利达机场的航线上。同样的消息也告诉给了迪尼茨大使，他即刻把这消息转告了耶路撒冷。

几个小时后，巨型喷气式飞机低沉的隆隆声响彻头顶。特拉维夫地区的公民都听到了，但没一个人抱怨这种声音。小汽车停在路上，公寓上的窗户打开了，人们来到实行灯火管制的街道上。

他们的眼睛转向天空，转向渐近的飞机上闪烁摇曳的指示灯。一些人正在叫喊，其他的许多人则对出租飞机什么也不知道。亚速尔群岛，或五角大楼的狼獾们正在低声祈祷：“上帝啊！愿您保佑美利坚！”

第十四章

穿越核战阴影

10月14日，星期日，被尼克松总统挑选来继任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职位的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早餐前在白宫听到了向以色列空运军事装备的消息。福特现在离总统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隔，总统一死或一被弹劾，他就要成为总统了。为了同这种新的地位相称，他在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便俨然摆出一副全球战略家的姿态，评论起了基辛格对中东危机的处理办法：“我希望我们很快取得军事解决，然后就能够为谋求外交解决而努力。军事上不解决，外交上就没法解决。”

基辛格所希望实现的“军事解决”，无非是一种僵持局面。他从一开始就认为，空运要这样精心安排：一方面要帮助以色列重获军事主动权，但不要太过头了；另一方面，还要促使苏联人接受一项合情合理的停火计划，以便打开谈判，从而全面解决中东危机。国务卿怀着这个打算，敦促五角大楼再给以色列运去10架“鬼怪”飞机，使其总数达到24架，并进一步动用国防部的军火贮存，务必要使美国空运的武器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比得上苏联，而且要超过苏联。

不出几天，当一架架C—5大型运输机（每一架都标志着美国的决心）接二连三隆隆地飞抵特拉维夫时，基辛格的战略便开始在这场战争的军事和外交两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10月15日深夜，以色列突击队（为防止被人发觉，涂黑了脸孔）乘木筏在大苦湖北渡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西岸。10月16日，以色列装甲部队像一支钢楔一样突破了运河东岸的埃及防线，然后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到了西岸（以色列称之为“非洲”）。以色列军几百人，配有几十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以惊人的行动越过运河进入“非洲”，苏伊士前线的战局于是突然为之一变。

从开战的第四天起，以色列方面就认真研究了这个过河作战的计划，不过暂时搁下了，因为达扬和埃拉扎尔担心军火、装备不足，没有让西奈战场的以军司令沙伦将军发动这个冒险行动。直到星期六晚上，迪尼茨报告空运已经开始的电报送到梅厄夫人手上时，才着手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以色列军渡河后，埃及人起初企图摧毁以军的桥头堡，或者想贬低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桥头堡不断向纵深扩展，以军一支往北向开罗—伊斯梅利亚公路推进，一支往南向开罗—苏伊士公路推进，沿途摧毁了几十个萨姆导弹发射场。萨达特这时才意识到他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军队的补给有被切断的危险，并且随时都会遭受以色列的致命打击。于是他拼命设法阻止以军继续前进，但没有成功。尽管双方伤亡惨重，以色列的攻势仍在继续发展。以色列军队在进入“非洲”72小时后，已经到达运河以西40哩的地方，离开罗不过50哩了。

不出基辛格所料，空运也促进了外交方面的活动。10月16日，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秘密飞抵开罗，与萨达特进行了三天紧急磋商。他带去的四点“和平”方案，显然是在以色列军队过河前拟就的。方案的要点是：

（1）就地停火；

（2）经过若干小调整后，以军撤到1967年的界线；

(3) 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讨论和批准最后协议；

(4) 苏联和美国对整个协议、包括停火承担“保证”。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315

柯西金一到埃及首都，人们便清楚地看出，苏联人在他们的盟国处于攻势、而对战区空运和海运补给品又只有他们一家的时候，他们并不那么急于要求停火；但是等到美国开始空运，以军转入进攻时；他们就拼命要求停火了。在开罗，柯西金企图说服他的盟友相信就地停火的好处。在华盛顿，多勃雷宁在同基辛格的长谈当中，大体上也讲了同样的意思。可是，正如萨达特在以色列军队还在运河西岸的情况下不想停火一样，梅厄夫人也不愿意在埃及军队固守运河东岸的情况下停止战斗。交战双方都抵制停火的主张。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苏联和美国断定，冲突继续下去有危及对它们双方都有利的缓和政策和把它们卷入战争的极大风险，那时萨达特和梅厄也就难以再拒绝停火了。

柯西金同萨达特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偶而激烈的谈判。在最后一次谈判中，这位埃及领导人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开罗同意停火而以色列不同意，甚或更坏些，先同意了然后又大肆违反，怎么办？据埃及方面的消息说，柯西金告诉萨达特，苏联随时准备帮助实施停火，必要时甚至可以单独干。萨达特知道这不是空口担保，苏联3个空降师已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可用于中东。于是，埃及总统勉强同意了苏联的建议，条件是，苏联不论有没有美国的协助，都必须保证实施停火。10月18日傍晚，柯西金离开开罗。他意识到，苏联人现在需要让美国去压以色列接受停火建议了。

那天晚上，多勃雷宁在华盛顿把一份关于由联合国主持停火的苏联提案草案交给了基辛格。国务卿万没有想到这个方案会提出如此极端的要求，包括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出它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耶路撒冷老城在内）。因此基辛格立刻就拒绝了。他对多勃雷宁说，这种建议草案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天上午10点，多勃雷宁向国务卿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邀请，请他飞往莫斯科去“就中东问题进行紧急磋商”。这位苏联党领导人研究了柯西金的报告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萨达特的军队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阿萨德的军队处境更糟。他估计，他们需要立即停火。如果基辛格拒绝这一邀请，勃列日涅夫本来是准备派葛罗米柯去华盛顿的。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以色列人正在向大马士革进军。他们的大炮只离该城20多哩，炮弹可以打到市郊。在南线，以色列人继续在埃及心脏地区扩大桥头堡，把兵力增加到300多辆坦克，1.3万军队。苏联盟友的处境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须先制止以军前进，然后再迫使它后撤。

基辛格几乎立即就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的邀请，可能会迫使苏联人直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建议，这样的提案肯定会一致通过。其次，他基辛格去苏联，又可以多为以色列争取到72小时的时间来改善军事地位，因为他估计，他在莫斯科至少要呆48小时，路上还要花24小时。再者，基辛格想从一开始就亲自掌握谈判。虽然在不到一个月前，他曾作过保证说，作为国务卿，他将把“政策制度化”，但是他不能改变他在所有谈判中（特别是发生危机的时候）指挥一切的作风。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据他的一个心腹说，基辛格确信，“苏联人越来越急，越来越恼火”，说不定会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来制止战斗”。国务卿认为整个形势“危险得要命”，他后来

曾多次重复他这一估计。

基辛格在请示尼克松后通知多勃雷宁，他决定在当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之后就动身去莫斯科——这个宴会国务卿不愿失约的。原来基辛格已定10月下旬访华，多勃雷宁在华盛顿外交界的主要对手中国大使黄镇这晚特为他设宴饯行。于是把动身去莫斯科的时间定在午夜1点钟。消息要等到临近起飞时才宣布。

黄镇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宴会轻松愉快的。将要伴随国务卿访华的全体美国官员和新闻记者都受到了邀请。少数国会代表也受到了邀请，为首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福特。基辛格迟到了不过30分钟——对他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很快就把黄镇拉到一旁，看样子是告诉他关于他即将去莫斯科的事。但在祝酒时，基辛格和黄镇都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莫斯科之行的消息。饭后，基辛格又私下同曼斯菲尔德、艾伯特和福特谈了一谈。然后，当这位国务卿走向他的小轿车时，一个记者拦住他问道：“先生，中东有什么新消息吗？”基辛格看了他一眼，无表情地说：“没有，什么也没有。”不过30分钟之后，白宫就宣布了基辛格要动身去莫斯科的消息。

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7点半，基辛格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国务卿在飞行途中收到两份电报：一份来自白宫，另一份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白宫的电报极不寻常，总统在电报中授予基辛格以“代理权”，可以代表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任何协议。尼克松知道，基辛格原是准备把在莫斯科达成的所有协议都带回华盛顿请他审批的，这是标准的办事程序。但他此时正打算在那个所谓“星期六晚大砍杀”中解除水门事件第一任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这一行动又迫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威廉·拉克尔肖斯辞去司法部的两个最高职务）。这样一来，总统或许是觉得自己为内政所困，无暇思考紧迫的外交问题，或许是担心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于是决定省去那套正常的外交程序，而授权基辛格代表总统采取当机立断的承担义务的行动。国务卿接到白宫的电报，感到有点意外，但没有提出疑问。

第二份电报来自利雅得，它简直像是一枚经济上的氢弹。但由于基辛格满心想的是中东的战争与停火问题，因此没有特别重视。原来这个公认亲美的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表示谴责美国给以色列空运武器和总统致国会的特别援助咨文，竟突然宣布对美国实行惩罚性的石油禁运。几个月以来，费萨尔就警告说，他要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斗争中使用石油武器了。而且，他在中东战争爆发前同萨达特秘密会谈时，也答应要使用这一武器。10月17日，产油国表决要减少石油产量十分之一。10月18日，阿布扎比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0月19日，利比亚采取了行动。10月20日，轮到沙特阿拉伯了。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也都跟着干了起来。那以后的好几个月里，石油禁运使得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方式颇受损害，结果迫使基辛格不得不加紧在外交上谋求和平的努力，以说服阿拉伯国家撤销禁运。但在莫斯科的那个周末，基辛格却有更紧迫的目的。他想利用苏联担心以色列的攻势的不安心情来安排一项停火，从而导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

基辛格抵达苏联首都后不到两小时，就被接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他们两人开始探索结束战争和拯救缓和政策的办法。同时，双方密切研究战场局势。勃列日涅夫回顾了柯西金访问开罗的结果，并强调指出，

必须立即停火。他警告说，局势极为严重。基辛格同意他对形势的严重估计，也同意必须停火，但坚持停火必须同和平谈判联系起来，否则停火肯定会再次受到破坏。他们一直谈到后半夜。这次谈话虽然毫无结果，但是基辛格却得到这样的印象：勃列日涅夫既然如此急于想保持那怕是缓和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苏联已经同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料他在星期日下午举行下一次会晤时定会作出重大的让步。星期日凌晨快3点的时候，基辛格才终于有机会给在白宫的黑格打了个电话，想问他几个头痛的问题。

星期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同基辛格又会谈了4小时。在前后两次会谈的间歇当中，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大马士革进军，同时继续在苏伊士运河西岸进行侧翼包围战。这两个谈判对手搞出了一项停火安排的细节，这项安排将导致埃及直接谈判。这对国务卿来说是非常满意的结果。他知道，这时实行停火，以色列人是不会高兴的，因为他们再有几天就可以打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然而他也知道，以色列人对终于有了同埃及直接谈判的机会，却会感到高兴。基辛格以总统的名义向梅厄夫人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她接受停火。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我们很难拒绝，我们实在没有选择余地。这是美国总统本人的呼吁，而现在以色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国了。”

勃列日涅夫只是在作出了苏联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单方面保证停火得到遵守的承诺后，才使得萨达特同意与以色列直接谈判——这一点是埃及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的。

在同勃列日涅夫就苏美要求停火的联合呼吁的具体措辞达成协议后，基辛格先同葛罗米柯商谈，以后又同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的驻苏大使商谈，然后给纽约的斯卡利大使发出特别指示，让他提出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要求。10月22日（星期一）清晨，安理会会议一致通过了超级大国要求就地停火的呼吁。第338号决议将在12小时内，即最迟在中东时间下午6点52分以前生效。

基辛格上午10点离开莫斯科。在飞回华盛顿途中，他在耶路撒冷停了5小时，在伦敦停了2小时。他到耶路撒冷是为了解释停火条款，这次去使他深受感动。他到达时，机场上有成群的人向他欢呼。他同以色列军政领导人会谈以后感觉到，他们的确很想结束战争，但他们需要有一个什么人（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外国人）出面替他们结束战争。基辛格眼下干的正是这个。

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基辛格一直密切注视着停火的情况。不出基辛格所料，发生了一些违反停火的事件，但他相信这些事件是可以控制的。他认为他直接插手促成埃及和解的时刻可能很快就会到来。10月23日，星期二，凌晨3点，基辛格回到了华盛顿。

那天上午，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里刚吃完早饭，就接到苏联大使馆一个气势汹汹的电话，指责以色列大举破坏停火。幸而基辛格是一个靠少睡觉和处理大难题起家的人，于是他便打电话给迪尼茨，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基辛格曾得到梅厄总理的保证，说以色列一定遵守停火。他已把这个保证转告了苏联人。现在苏联人可能怀疑基辛格耍两面派，这样就会严重影响他充当中间人的作用。迪尼茨辩解说，破坏停火的是埃及，而不是以色列。基辛格用强硬口气要求迪尼茨转告梅厄夫人，美国期望以色列能遵守停火条款，他还说，要“认真地”遵守。

国务卿然后找自己的情报专家核对了情况。他们证实迪尼茨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补充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埃及刚一破坏停火，以色列人便马

上加以充分利用，乘机在运河西岸扩大了他们的占领区。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被围困在运河以东、与埃及的苏伊士城隔岸相对的埃及第三军军长，不顾开罗发出的具体停火命令，企图突破以色列的包围圈。对埃及发动进攻仍然憋着一肚子火的以色列人，在打破了埃及人这一突围企图之后，便在运河两岸加强军事压力。特别在西岸，以色列部队不断向苏伊士城这个战略目标逼进。如果该城落入以军控制，埃及人就再也无法对第三军运送补给品了。不消多时，以色列就可以一举摧毁埃军中这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了。

基辛格决心制止以色列部队的行动，保住第三军，从而确保军事僵持局面。以色列有军队驻在西岸，埃及有军队驻在东岸，彼此互相牵制。从战争的头几天起，基辛格所执行的政策一直是不鼓励以色列人再次取得 1967 年那样的决定性胜利。因为那样的胜利并不能取得和平，而且会造成足以导致另一场战争的紧张局势。此外，基辛格还认为，在当前的外交气氛中，让以色列方面明显获胜，只会使以色列更加孤立。而既然美国同这个犹太国家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在中东势必会出现一场新的反美浪潮。这样一来，石油禁运也许就不再是一种战术武器，而会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永久性的政策了。最后，基辛格要想在中东成为人们所接受的调解人，他就必须表现得不偏不倚，而能否解救埃及第三军将是对他本人及其政策的一次考验。

基辛格同迪尼茨谈了多次，他是又哄又压，有逼有求，时而好言相劝，时而厉色相待，总要这位以色列使节无论如何能理解他的说理，接受他的政策。与此同时，他告诉多勃雷宁，希望苏联也能约束一下埃及人。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指出，不管哪一方继续破坏停火，结果只会害了双方，而且还害了缓和这件大事。

在公开场合，美国政策发言人既不指责以色列，也不指责埃及。一位发言人说：“说实在的，我们岂不知道，停火这种事，要一生效就十全十美，是办不到的。”

傍晚时分，破坏停火的事件减少了，可是基辛格的焦虑却增加了。在情报专家提醒他注意两个突然的情况之后，他决定推迟对中国的访问。情报专家发现，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空运武器的飞机突然大幅度减少，从每天 70 架次左右减少到 6 架次。另外，他们还截获了从乌克兰发出的电讯，表明苏联有一些陆军和后勤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

那天晚上，基辛格和多勃雷宁进行幕后活动，安排联合国发出第二次停火呼吁。安理会几乎连续不断地开会。

10 月 24 日，星期三，华盛顿时间凌晨 1 点，第二次停火开始生效。但是就在这次（48 小时内第二次）命令停火之前不久，以色列人宣布，他们的部队已经达到苏伊士城郊，把埃及第三军完全包围起来了。基辛格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不过，这一次他给迪尼茨打电话时，嗓门没有像往常那么大。他声音柔和，非常柔和，但迪尼茨听得出他极为不安。他警告这位以色列外交官说，停火必须遵守，他还要求迪尼茨允许那些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第三军输送粮食、水和医疗用品的车队通过。

当天上午，基辛格同迪尼茨和多勃雷宁又作了谈话之后，出席白宫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会上，他了解到了苏联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又有 4 个苏联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使动员部队总数达 7 个师，约 5 万人。五六艘苏联运输舰驶入了地中海，使该地区苏联海军舰艇总数增加到 85 艘这一空前数目。另外发现约有 12 架安东诺夫—22 运输机正飞往开罗。分析人员怀疑

这些飞机可能是在运载部分上述空降部队。在苏联南部已经设立了一个空降部队司令部。最后，从截获的苏联特别军事命令来看，苏联人可能在准备对中东进行干涉。

基辛格同多勃雷宁进行了几次紧急的电话交谈。国务卿想了解多勃雷宁的谈判立场是否变硬了。但他并没有察觉到这种迹象。

下午3点，萨达特致电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紧急呼吁苏美联合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到中东去，主要是为了监督苏伊士前线的停火。他谴责以色列继续破坏停火。基辛格拒绝了他的呼吁，反对派遣大国部队到局势动荡的地区，认为这只能加剧既有的紧张状态。

下午4点15分，多勃雷宁到达国务院基辛格的办公室，商讨停火后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的事。在谈话的过程中，斯卡利从联合国打来了两次电话，一次是通知国务卿，安理会将在当晚开会；另一次是说，“不结盟国家”已经开始响应萨达特的呼吁。基辛格立即警告多勃雷宁，美国反对苏美联合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这位苏联外交官说，就他所知，他的同事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科夫·马立克并没有接到支持派遣这种部队的指示。多勃雷宁走了。

过了一会儿，多勃雷宁在下午7点零5分打来电话说，他刚才出于无心提供了一个错误情况，原来马立克的确接到了要他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组织大国警察部队的建议的指示。基辛格怀疑是苏联在积极鼓动这个建议，于是就用相当坦率的语言要求多勃雷宁告诉莫斯科，美国强烈反对这个主意。

基辛格然后报告总统说，苏联人看来有变卦之势。尼克松重申，他本人也反对大国派遣维持和平部队。

7点25分，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主要是转达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谁知苏联大使竟又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新问题，他说，马立克可能不等不结盟国家提出派遣大国部队的建议，自己就先提出。多勃雷宁辩解说，以色列人在继续破坏停火，而苏联和美国有责任维护停火嘛。基辛格重申反对这一建议，并警告说，美苏两国之间可能要出问题。

当晚9点25分，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有一封“十万火急”的信给尼克松。就是这封信，在几小时之内造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对抗。多勃雷宁一般是不会在电话里口述信件内容的，可是这次，他说“太紧急了”，只好破例。他慢慢地把信念给基辛格听，一个秘书在分机上听着，用速记记下了这封共有四段的信全文。

信的抬头用的是“总统先生”这个异乎寻常的冷淡称呼，而不是勃列日涅夫通常所用的“我亲爱的总统先生”。整个语气显然很强硬。勃列日涅夫谴责以色列“悍然向苏美两国挑战”，“严重地”破坏了停火。然后，这位苏联党魁重复萨达特的意见：“让我们共同……紧急派遣苏联和美国的部队到埃及去吧。”停火必须“立即”得到遵守。勃列日涅夫接着扔了一颗外交炸弹。他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觉得在这件事上不能同我们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面临有必要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决不能容许以色列破坏停火而不受惩罚。”

基辛格看得出信中耍滑头的地方——“考虑……问题”，但又担心勃列日涅夫果然当真。这位苏联领导人只是在答应两个超级大国或苏联单方面保证停火的条件下好不容易才使萨达特同意停火并同以色列直接谈判的。他还从基辛格那里得到了以色列会遵守停火的保证。可现在，才过了四天，以色列就封锁了通往苏伊士城的道路，紧紧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并威胁要毁灭埃

及陆军的这支精锐部队，这么一来，说不定就会搞垮萨达特政权。基辛格相信，勃列日涅夫决不会“容忍”以色列在对埃战争中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基辛格也知道，美国也不能容忍苏联单方面进行干涉。这样下去，美国和苏联势必发生正面冲突。

10 分钟后，基辛格给多勃雷宁打了个电话，核对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信的内容。他在电话里念了信的全文，然后问：“对吗？”多勃雷宁回答说：“对的。”这位苏联人加上一句说，他必须立即得到回音。国务卿还是有礼貌地请他不要对美国“施加压力”。

基辛格随即打电话给就在楼上的尼克松。国务卿向总统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说，美国也许要使自己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以此作为制止苏联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的一种对策。总统表示同意，并授权基辛格负责作出美国的反应。总统还说，如果发生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

基辛格匆匆召集了三个专家小组来研究勃列日涅夫的来信，估计苏联的意图。与此同时，索南费尔特同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在白宫开会；西斯科同一批中东问题专家在国务院开会。戴维·波珀（当时是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则同几个联合国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一边是这几个研究小组分头迅速研究手头已有的情报，一边又由基辛格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总统高级顾问的紧急会议，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到会的有施莱辛格、科尔比、穆勒、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他们深夜 11 点在白宫开会。

这时，基辛格已收集了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存在着“苏联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极大可能性”。他把专家的意见告诉了总统的高级顾问。然后他把勃列日涅夫最近的来信以及眼前这一封信的抄件发给到会的人，让大家来综合研究。结果，他们一致的结论是，当晚的那封信调子跟以前“截然不同”，“粗暴”，“露骨”，“把话说到头了”。

当同僚们继续商讨美国如何作出适当的反应时，基辛格又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要他确保，至少在美国未就勃列日涅夫来信作出答复以前，莫斯科务必要“贸然或单方面”采取行动。

美国的答复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军事戒备。鉴于专家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着苏联空降部队会很快空运到中东的“极大可能性”，所以国务卿立即决定美国也必须使自己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包括陆、海、空军，常规部队和核部队。施莱辛格同意基辛格的决定。两人都认为必须让苏联明白，苏联想使以色列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变成劣势，美国对此是要反抗的。

午夜 11 点半，施莱辛格指示穆勒通知三军参谋长，命令大多数美军司令部进入戒备状态，但不是全部。例如，拥有重要海空救护系统的海岸警卫队，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入戒备状态；还有，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在大西洋中部上空沿着美国—以色列航线飞行的加油飞机，也没有北调去处理可能出现的 B—52 轰炸机加油事宜。两小时后，凌晨 1 点半，施莱辛格回到五角大楼，又扩大戒备范围。设在马拿马的南方司令部也包括进去了。载有几十架 A—4 喷气攻击机的航空母舰“约翰·肯尼迪”号，被派往地中海。五六十架 B—52 轰炸机奉命从关岛飞回美国。驻在北卡罗来纳州布罗格堡的有 1.5 万人的第 82 空降师也加入了戒备，该师接到通知，要在星期四早上 6 点以前作好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准备。最后，整个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了戒备状态。战略空

军司令部对苏联最关紧要，因为它控制着核打击力量。

按美国的军事戒备分为五级：从五级戒备状态到一级戒备状态；五级最轻，一级意味着战争。那天晚上，在实行戒备的过程中，大部分美国武装部队处于三级戒备状态。对太平洋司令部来说，戒备状态没有变化，因为该司令部平时总是处于三级戒备。战略空军司令部通常处于四级戒备，那天晚上提高了一级。携带核弹头导弹的“北极星”潜艇舰队通常处于三级、二级戒备之间，那天晚上处于三级戒备。在地中海巡逻的第六舰队，平时就处于二级戒备，那天晚上保持在这一级不变。

美国对勃列日涅夫答复的第二部分是外交方面的。国务卿为总统起草了一封复信。他先同施莱辛格和黑格商量，最后由尼克松批准。信中，美国重申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的谅解条件，即两个超级大国合作谋求中东和平。复信驳斥了勃列日涅夫所谓以色列正在“悍然”破坏停火的说法。事实上，到星期三深夜为止，双方破坏停火的事件都还不多。复信指出，形势并没有非要苏联或美国派遣武装部队到中东去不可。一个超级大国采取“单方面”行动这种想法，将会引起全世界的重大关注。美国不能同意苏联采取这种行动，这种行动只能危害美苏缓和的整个局面。作为对策，尼克松在复信中极力主张派遣由联合国会员国中无否决权即非核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美国答应这方面同苏联合作。美方复信没有提到美军处于戒备的事，因为认为不必要。一个官员说：“戒备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我们知道，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电子情报系统收到的。”

说来也怪，基辛格把危机看得这样严重，可是那天夜里他身为国务卿却根本没有去见总统。尼克松这个人，就连一些心腹顾问也觉得他有点“落落离群”的；这次，当顾问们在楼下开会的时候，他也还是呆在楼上自己的家里。基辛格只跟这位行政首脑通了一次电话，其他情况都是由黑格转达的。最后一次传话是在凌晨大约2点钟，当时决定早上7点30分基辛格再同总统和黑格会晤。

基辛格在离开白宫前，就着手通知美国的各盟国。他打电话给克罗默勋爵，勋爵显然情绪不佳。据说这位英国大使当时回答说：“亨利，何必还来告诉我们呢？去告诉你们的朋友苏联人吧。”基辛格随后又打电报给在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指示美国官员们通知北约组织全体盟国，美国武装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由于北约组织的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结果盟国几小时后才接到通知。基辛格最后打电话通知的是迪尼茨。

上午7点，基辛格观看了电视新闻。据他后来说，当他知道美军处于戒备状态这件事已为公众知晓时，他简直“惊讶万分”。他本来期望，这一消息会慢慢地传开——这儿一支部队进入戒备，那儿一支部队进入戒备；美国人民再过24小时才会知道世界范围的核戒备状态。而那时，也许会发生重大危机，那么，宣布进入戒备状态也就会被看作正确的了；或者是，危机到那时已经过去，那么，戒备也就会解除了。对公众封锁这种消息，对政府或国务卿来说，都不是什么新手法了。

当基辛格为了在上午7点30分同总统会晤而赶到白宫时，中央情报局已经送来了一份来自埃及的惊人报告，说苏联人可能已经把核武器运到埃及。几天以来，美国侦察机一直在跟踪一艘开往塞得港途中载有放射性物质的苏联船。10月25日凌晨，该船靠了码头。情报专家推测，船上的放射性物质是一个核弹头，甚至很可能是几个核弹头。这些核弹头运到埃及，是准备装

在年初运到埃及的“飞毛腿”导弹上的。专家们没有得到关于这些放射性物质是否确已卸下的确切情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使基辛格更加有把握断定，苏联人准备派遣空降部队到埃及。核武器可以为一支相当大的苏联部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基辛格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苏联人认为以色列已拥有核武器，并打算使用核武器来进攻埃及，因而把自己的核武器运进埃及。美国政府这时还没有关于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可靠情报，于是基辛格立即命令对以色列的核能力进行研究。

面对苏联在中东的直接干涉，为了强调美国“实行边缘政策”的决心，基辛格随之在电视中提出了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

我们各方面都拥有核军火库，可以毁灭人类，我们双方都负有特殊责任，务必使对抗保持在不威胁平民百姓生命的范围内。

两种威胁都见效了。克里姆林宫指示马立克中止关于派遣美苏联合部队监督停火的提议。这样，又出现了安理会第 340 号决议这一方案，这项决议决定建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由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外的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队组成。”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立即命令驻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离斯开塞浦路开赴开罗。这支联合部队由 900 名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典士兵组成。他任命芬兰少将恩苏·辛拉斯伟为这支部队统帅。

两个超级大国“穿越了核危机的阴影”，吓死人地舞弄了一阵核武器后，又回到了浑浑沌沌的缓和中来了。第二天，10 月 26 日，施莱辛格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商量后，解除了设在已拿马的南方司令部以及阿拉斯加司令部的戒备。当天晚些时候，他又解除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戒备状态。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宝刀重新入鞘了。

以色列尽管现在已有效地包围了第三军，但还是严肃地对待基辛格的警告，停止了进攻。10 月 25 日，只听到寥寥几声枪炮声，声音来自想回到运河西岸的某些埃及士兵，不久南线也安静下来了。

在美国，新闻界和政府机关的批评家对基辛格的核警戒发动了一场事后评述。在水门事件气氛中，他们对声称来自苏联威胁的真实性表示深深的怀疑。但是，基辛格正在朝前看。看着地图上以色列和埃及部队被双双锁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态势，他正沉思默想着美国新的中东政策的第一步。

第十五章

中东旋风

演这场戏要求有这么个角色：个儿高高的，身材瘦瘦的，具有传统的外交风格，会检阅阿拉伯仪仗队，精于吃抓饭，通晓阿拉伯的一套规矩，还得是个祖籍欧洲、信奉新教的美国人。基辛格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可是，经过几个月的飞去飞来，遍访拉巴特、突尼斯、阿尔及尔、开罗、卢克苏尔、阿斯旺、亚喀巴、安曼、拉亚克、大马士革、利雅得——当然还有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地之后，基辛格竟一举而成为中东的英雄。萨达特吻他，称他“兄弟”；法赫米拥抱他；萨卡夫拉着他的手；费萨尔和他谈话；侯赛因亲自带他坐皇家直升飞机游乐；阿萨德跟他有说有笑；达扬赞扬他在使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领土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开罗半官方报纸《金字塔报》把他誉为“超人”，利雅得半官方报纸《阿拉伯半岛》周刊称他是“和平调停人”。

1973年11月，基辛格为了给中东带来和平，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非凡的外交努力，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抓住赎罪日战争余波未平这一有利的历史时机，把他的精力、声望和才智投入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撮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达成协议，同时劝说费萨尔国王和他的朋友对美国解除石油禁运。他打算让以色列撤退，但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他赞成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但要考虑到现实和责任。于是，已经名噪一时的基辛格越发显赫起来，有些美国人竟说他不是“国务卿”而是“世务卿”了。连周恩来有一次也风趣地说，日本人曾称基辛格为“中东旋风”。

基辛格看到16天战争的伤痕，看到那条很容易重新燃起战火的犬牙交错的停火线，意识到他的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军队正在攸缩它对埃及第三军的包围圈，似乎一心要夺取早先由于基辛格10月22日的停火呼吁而没有拿到手的胜利。只是在国务卿向梅厄夫人提出警告，说再这样下去美国可能放慢援助之后，以色列才允许护送125辆载运救济物资的车队通过停火线到达苏伊士城。埃拉扎尔将军一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由于以色列不顾美国的压力，拒绝开辟一条通往苏伊士城和第三军的固定走廊，萨达特威胁说，“我的健儿们”如有不测，就要“采取行动”。美国很快就解除了戒备状态，但苏联的大约5万空降部队继续保持戒备状态，埃及领导人随时都可以向他们求援。

基辛格立即安排了去阿拉伯世界的首次旅行。萨达特已同意他在11月6日飞赴开罗会谈一天。第二天，萨达特电告基辛格说，他将派高级特使伊斯梅尔·法赫米前往华盛顿进行一轮初步会谈。基辛格告诉萨达特说，法赫米此行“时机不成熟”。萨达特的答复是，很抱歉，他已经在路上了。

当时基辛格不愿接待法赫米，是因为他已经邀请了梅厄夫人在这时访问华盛顿。他从迪尼茨那里了解到，梅厄夫人需要尼克松总统再次作出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埃及和以色列同时计划同美国商谈，是个意外良机。这为国务卿第一次提供了充当中间人的机会，来全力保持停火和促使埃以之间进行外交接触。这两个交战国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都怕自己沦为大国的工具，所以双方都欢迎基辛格的这番努力。

萨达特对基辛格的种种表示早已心领神会。他相信这位国务卿是能够创

造奇迹的。他认为，由于基辛格不必担心被人加上反犹太主义的罪名，因而可以成为能够说服以色列放弃其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的第一位国务卿。

从梅厄夫人方面说，她深知以色列依赖美国的程度很深，所以她说，以色列对美国在调解方面所作的真诚努力，既不能也不会从中作梗。显而易见，以色列从 1967 年战争以来所采取的战略已经弄巧成拙。萨达特非但没有乞求以色列进行谈判，反而拿起武器，越过运河，一举打破了中东的军事和心理均势。梅厄夫人还记得基辛格在 1970 年 9 月的约旦危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她但愿，基辛格作为国务卿能够说服阿拉伯人同以色列和睦相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阿拉伯人曾四次企图把她的国家赶下海，但都没有成功。

10 月 29 日，法赫米飞抵华盛顿，当时基辛格刚刚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法赫米是一位举止文雅的埃及外交官，爱吸古巴雪茄。他即将接替扎耶特担任埃及外交部长。有一位议员指出，埃及和苏联关系密切，他想知道“为什么法赫米要到这里来”。国务卿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因为他虽然可以从苏联那里得到武器，但只有从我们这里才能得到领土。”这一简单的现实，后来成为基辛格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底牌。

10 月 31 日，总统刚刚接见了法赫米，梅厄夫人就飞到华盛顿。第二天，她会见了尼克松，并得到了他的保证。后来她引述总统的保证说：“以色列的安全和幸福是美国很关切的一件事。”一向钦佩以色列“胆量”的总统，很乐于同梅厄夫人交往。总统含笑说：“总理夫人，您知道，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有一位犹太人当外交部长。”梅厄夫人回答说：“是的，可是我的那位外交部长讲起英语来可没有外国口音。”

在以后的三天里，基辛格往返奔波于法赫米和梅厄夫人之间，常常为了设法缩小两方的分歧而忙到深夜。

埃及要求以色列退到 10 月 22 日停火线。法赫米警告说，如果不答应，埃及就不能同意交换战俘。在停火生效后 72 小时之内交换战俘，是基辛格在莫斯科达成的不成文的谅解之一。法赫米还说，如果不答应，埃及也不会同以色列直接进行谈判。这种谈判是停火呼吁中明确规定的条件。

梅厄夫人争辩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 10 月 22 日的停火线究竟在哪里。她还坚持说，如果不交换战俘（这在以色列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问题），如果不同埃及直接进行谈判（这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在外交上的要求），以色列就不撤退。

交谈中断了一会儿，因为 11 月 2 日晚基辛格要在国务院欢迎叙利亚副外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当时伊斯梅尔正在联合国，他是应国务卿的邀请到华盛顿来的。这个小小的迹象表明，甚至像叙利亚这样富于战斗性的阿拉伯国家，也愿意同基辛格一起进行范围越来越大的努力，促使三个主要交战国开始谈判。

一个美国官员说：“现在我们是三套马戏一齐演，国务卿一会儿会见法赫米，一会儿和果尔达·梅厄谈话，现在是会见叙利亚人了。”

在这三套交谈中，国务卿没有拿出美国的以埃和解“方案”，但是他的确提出过美国对于弥合双方分歧的一些“设想”。譬如，他建议把法赫米要求以色列撤到 10 月 22 日线的意见提到涉及面更广的谈判中讨论，以使以色列分阶段撤过运河，退入西奈。这个撤退肯定会使被困的第三军解围，并消除由于有一支以色列军队驻在运河西岸而造成的尴尬局面。当然，基辛格的言下之意是，这要付出代价，但代价不算高：埃及官员须同以色列官员当面

谈判并交换战俘。

当这些“设想”第一次向梅厄夫人提出时，就遭到她的坚决反对。她问道，为什么进行侵略的是埃及，它的军队倒可以留在运河东岸，而以色列却要撤出运河西岸呢？到底谁是被侵略者，谁是侵略者呢？再说，一仗打了下来，是谁把刀架到埃及部队的脖子上了？是谁打到“非洲”了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调整战线时偏要以色列吃亏呢？尽管基辛格可以理解她的论点，但是他仍然认为以色列最终还是从运河西岸撤退。他解释说，以色列在25年中打了四场代价越来越大的战争之后，应该打破这种周期爆发战争的局面，为和平冒一次风险。基辛格从来没有硬把这场谈判的性质——至少是在谈判初期——说成是公平的，他明知情况并不公平；以色列会有所失，而埃及将有所得。但是，从长远看，他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得失相当的平衡局面。这种平衡不是光用领土来衡量的，而是用双方在谈判桌上和后来在讨价还价的场所的共同经验来衡量的。这种平衡迟早会使双方认识到，除了老是打仗以外，也许还有别的出路。

不难理解，梅厄夫人不同意基辛格的论点。基辛格敦促她以较低的条件放弃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的战术性军事优势。以色列并没有发动这场战争，其部分原因是基辛格本人事先提醒以色列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基辛格还劝梅厄夫人调整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战略，以适应他的公平谈判想法。这就要求既要对他人的信任，又要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而在11月初，这二者都没有多少。但是，基辛格感到，他在劝梅厄夫人考虑开辟一条通道，穿过以色列防线给苏伊士城和运河对岸被围困的第三军运送救济物资方面，他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有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美联社提供的基辛格和梅厄夫人在布莱尔大厦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两人都面带倦容，心情沉重。一位记者问基辛格：“情况真是这么糟吗？”他慢吞吞地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的一位助手后来说：“他们经常是这样的。”

但是基辛格同法赫米打交道，运气要好得多。尽管国务卿未能说服法赫米放弃以色列必须撤到10月22日线的主张，他却在一项临时性安排上取得了进展。这项安排是，在以色列同意开辟一条向苏伊士城运送物资的通道之后交换战俘。基辛格希望到开罗后能说服萨达特，让他对埃及要求以色列撤到10月22日线这一问题采取一种更有远见的看法。

到11月4日（星期日）梅厄夫人和法赫米离开华盛顿时，基辛格总算拟就一项考虑了埃以双方观点的非正式的六点方案。他希望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两国进行谈判的基础。对国务卿来说，奔走于梅厄夫人和法赫米之间，是他中东外交的头一道难关。有一位记者天真地问道：“你觉得有意思吗？”他苦笑着说：“我跟越南人谈判时，我不知道我当时干得怎样。但是，那时越南人只有三方。现在阿拉伯人有四方，再加上犹太人的一方，简直跟但丁的《地狱》故事差不多。”

1973年11月5日晚上9点40分，基辛格的蓝白色喷气机穿过云层，降落在拉巴特国际机场。这是基辛格在去中国和日本途中访问阿拉伯世界的第一站，这次要访问五个阿拉伯国家，为时四天。当国务卿踏上摩洛哥国土的时候，两盏强弧光灯把漆黑的夜晚照得如同白昼。基辛格一下飞机，就得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到非洲，第一次访问一个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检阅仪仗队。身材高大的柏伯尔部队穿着迎风飘拂的红白色相间的斗篷，戴着黑色头巾，站在从座机一直辅到贵宾休息室的红地毯两侧。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不自然

地跟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塔伊比·本希马谈着话，缓步走过他们面前时，他们持枪立正。基辛格显然不知所措。他说了几句见面寒暄的话之后，就和本希马进入一辆黑色高级轿车，行驶 20 分钟，来到郊外哈桑国王那个有高大沙石围墙的王宫。

国务卿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发表的谈话中，说明了他在中东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他说：“你们把我看作是催化剂好了。”基辛格还谈到了他对未来所抱的希望。他说：“我们头一回有机会既同阿拉伯世界进行真正对话，又同以色列进行认真对话。”拉巴特的主要报纸把他描绘为一位“祈求和平的朝圣者”。

基辛格离开王宫前，正式检阅了皇家卫队。这是一个很滑稽的场面。军乐队演奏了一首进行曲，可是基辛格的步伐既跟不上音乐的节奏，也跟不上护卫他的那位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举着一把闪闪发光的笔直佩刀的军士长。检阅完毕后，基辛格停下来，环顾四周看看还要做什么，然后怯生生地把右手伸向军士长的右手，而当时那位军士长的右手正举着佩刀立正待命，佩刀离他的鼻子还不到 2 吋远。这是尴尬的一瞬间。军士长很快明白过来，把刀插入鞘内，向国务卿敬了礼，然后才同他握了手。此刻，基辛格想必在心中暗暗记了下来，查一查应该怎样检阅仪仗队！

开罗是基辛格这次阿拉伯世界之行的主要停留地。在从突尼斯到开罗的 4 小时飞行中，基辛格曾两次跑到座机后舱，去找他允许随行报道这次旅行的 14 位记者聊天。这次基辛格同记者们交谈时，情绪乐观。他同哈桑国王和布尔吉巴谈话后已相信，至少有些阿拉伯领导人赞成“采取行动”去跟以色列达成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1973 年 11 月 6 日，基辛格的飞机在开罗机场着陆时，基辛格极其悲观，他害怕在解释以色列关于对第三军的供应方案时，萨达特会发火。基辛格想象着：如那样的话，他就将不得不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

头天晚上刚回到开罗的新任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带领一小批埃及官员出了灯光遮暗了的机场大楼，通过一长条斜坡，然后走向停机坪；这时基辛格乘坐的飞机正在徐徐降落。摄影师和记者蜂涌到舷梯下，引擎的轰鸣声一停，他们就打开电视照明，顿时一道耀眼的灯光照亮熙熙攘攘的人群。基辛格出现在机舱门口，他俯视下面的灯光，很快认出法赫米就站在舷梯脚下，他的脸上顿时堆满笑容。他快步走下舷梯，向他的埃及同行走去。他把左臂搭在法赫米的肩上，右手频频做手势，相互交谈深夜抵达机场的乐趣。国务卿真是活跃极了，他简直把法赫米当作久别重逢的兄弟，把开罗当作棕榈泉了。

基辛格和法赫米登上一辆黑色本茨轿车，驶向开罗闹市区的希尔顿饭店。路上花了 20 分钟，足够基辛格饱览这个担心战祸再起的首都的景色。各种机动车的车灯都涂成了深蓝色或黑色。马路上偶尔才可以看到几盏街灯。虽然已是深更半夜，政府的办公大楼还是由武装部队守卫着，而且还有沙袋垒起的机枪掩体。军用车队隆隆开过城区，往东面的前线开去。饭店的走廊里空空荡荡，只看见一些保卫人员和新闻记者。窗户都涂成了深蓝色，玻璃上纵横交错贴满了纸条。基辛格在便衣保卫人员的护卫下进入顶层的一套房间。从那里，他可以俯瞰尼罗河这个几千年来使埃及文化延绵不绝的生命源泉。

基辛格说：“我想明天去看看金字塔。”

法赫米回答说：“你不看也不成啊。”

然后，两人就国务卿在开罗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活动反复磋商、安排了约一小时。

“欢迎！欢迎！”

萨达特的男中音讲话声在塔赫拉宫的宴会厅里回响。开罗的这个门卫森严的别墅，原先是属于法鲁克国王的某个妃子的。基辛格笑逐颜开，伸出右手向这位穿着军服的埃及领导人走去，他们握手足有一分钟，然后在一大个大沙发上坐下来，这时摄影记者纷纷拍照，记者们凑上前去，想听到一点东西。

“一路上好吧？”

“好极了，总统先生。”

“欢迎你到这里来。”

“谢谢，总统先生。”

这两位政治家从上午刚过 10 点开始，谈了三个半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独会谈。这是基辛格的一贯作风。埃及和美国的所有其他高级官员西斯科、法赫米、艾瑟顿以及萨达特的亲密助手阿什拉夫·古尔巴勒，都被请到花园去了。他们先是欣赏了一会儿喷泉和垂柳，然后把藤椅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中东的一般性问题。记者和摄影师在三四十呎外形成了一个大圈圈。人人屏息而待，只有小鸟吱喳在叫，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不时有人朝王宫的二楼看看，这时萨达特正同基辛格在那里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呢。

大约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沉寂的气氛突然打破了。有一个保卫人员走进王宫里去，接着又有一个进去了。其他的人都朝着中间的大回廊走去。大家都站了起来。最后，萨达特陪着基辛格走到花园里来，记者们一涌而上，官员们则退到后面。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开始了。这时，基辛格显得异常腼腆，对萨达特表现得很尊敬的样子，讲起话来音调很低。而萨达特却满面春风，神态开朗。

一个记者问：“基辛格博士，谈得不错吧？”

基辛格和蔼地答道：“这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会谈。”

“基辛格博士，你还会到开罗来吗？”

“会来的，只要情况需要，我就来。”

一阵不甚自然的冷场。

一个美国记者问：“总统先生，美国现在会削减对以色列的空运军用物资吗？”

萨达特微微一笑说：“这个问题应该问基辛格博士嘛。”

基辛格插话说：“幸好，我没听见提的是什么问题。”

这番对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大大超过这句话本身应当引起的笑意。接着又是一阵难堪的冷场。

“基辛格博士，埃及和美国会恢复外交关系吗？”基辛格笑一笑，有点窘，一句话也没说。这时萨达特主动回答说：“别急，今天傍晚你们就会得到消息的。”

果然，傍晚时，麦克洛斯基在希尔顿饭店大厅里举行的人群拥挤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两国“原则上”，已恢复外交关系，两周内将互派大使。阿什拉夫·古尔巴勒博士将出任驻美大使，在国务院工作的阿拉伯问题专家

赫尔曼·艾尔茨将出任驻埃及大使。这样一宣布，萨达特就向苏联人表明，他可以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了。麦克洛斯基还宣布，西斯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中东问题专家哈罗德·桑德斯已经飞往耶路撒冷。他们乘坐埃及飞机到达塞浦路斯后，换乘以色列飞机前往目的地。

麦克洛斯基丝毫没有透露基辛格和萨达特会见的详细内情，但是塔赫拉王宫发生的情况表明，基辛格在很短时间内已取得了一项成就。他说服萨达特暂缓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到 10 月 22 日线，而把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放到谋求埃以军队全面脱离接触这一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虑。这次谈判一度相当棘手。萨达特曾坚持，只有以色列军队从运河两岸撤走才能脱离接触，而不是像梅厄夫人在华盛顿建议的那样，双方都撤到战争以前的防线：埃及军队撤到西岸，以色列军队撤到东岸。萨达特告诉基辛格，埃及军队绝不放弃东岸，必要时他们将重上战场，解救第三军，这时俄国会帮助他们的。

基辛格劝告萨达特要有耐心，赞扬他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试试看。基辛格对萨达特的论点一点也不反驳。基辛格从内心深处是接受这种逻辑的——他也认为以色列最终总得从运河两岸撤出。而且，所谓外交就是为的要避免出大乱子。在以色列撤到 10 月 22 日线这一问题上，基辛格推迟摊牌，从而为巩固停火和为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铺平道路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把这次同萨达特的首次长谈看作是他的外交活动中的一次“出色的突破”。他说：“这次长谈给埃及的外交政策以及这个地区的整个发展趋势带来了重大的转折。”基辛格对这位埃及领导人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萨达特表现得“十分明智”，“应该给他记上一大功”。

基辛格同萨达特会谈之后，前往开罗郊外瞻仰就在沙漠边上的吉萨金字塔。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亨利同人面狮身像在一起！

基辛格背着手，朝着那座最大的金字塔缓缓走去。这座金字塔是为了纪念 5500 年前统治古埃及的一位法老基厄普斯而修建的。基辛格一边目不转睛地欣赏这座建筑奇迹，一边听着向导在一旁讲解这座金字塔的历史。他的一个助手打趣说：“他看得这么仔细，准是也想为自己造一座！”基辛格流露出相当敬畏和惊异的神情。“他们造金字塔的时候，还没有车轮工具呢，不是吗？”他还说，“他们竟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来，我简直难以相信。”基辛格的兴致使埃及记者们洋洋得意。有个记者问：“基辛格博士，您对我国历史很熟悉吧？”国务卿用外交辞令回答说：“我一直陶醉于埃及的历史——陶醉于它的永恒感。”记者们把基辛格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的。基辛格顺着石阶爬到金字塔的入口处，盯着阴暗的洞里说：“这要是作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倒挺好，是不是？”采访国务院新闻的记者们笑了。基辛格向下望着石阶说：“这对有心脏病的人倒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人们大笑起来。

基辛格回到沙地上后，坐在一张好莱坞导演惯用的好种椅子上，看了贝都印牧民的骑技表演。随后，当他走近人面狮身像仔细端详时，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抢最好的角度给他拍照。一个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像一个阿拉伯酋长吗？”基辛格没等他说完就说：“岂止觉得？我就是嘛！”他看看人面狮身雕像，沉思地问道：“咱们俩谁是真正的人面狮身兽啊？”记者们又是一阵拥挤，竞相拍照。“等着我上电影吧，我现在要找的是一位女主角啊。”

基辛格一向喜欢跟记者们开这种玩笑。他是报上的好题材，他也知道这一点。他的妙语趣谈和他为中东问题进行的严肃努力，同时刊登在中东大部分报纸的头版上。他深知这种报道在外交上的价值。就是这位美国国务卿，

一个犹太人，却深深沉湎于阿拉伯文明，一心要想解决阿拉伯的问题。

讨好和打动对手，一向是基辛格的特有风格。当时担任《金字塔报》主编的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法赫米主持的一次晚宴上同基辛格在一起，后来为一家法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追述了基辛格当时说的话。

他说，国务卿是把中东问题放在他的圭球谈判范围内考虑的。基辛格以权衡的口气说：“我知道，我碰到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复杂问题，比同苏联达成谅解还要难。”然而，基辛格自我陶醉地表示，他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他自谦地说：“我有一个弱点。现在我已经小有成就，我不想丢掉它。这关系到我的声誉。”

基辛格承认，他对“阿拉伯浪漫主义”有点担心。他提醒说：“和平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東西，要花时间才行，得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点具体的东西。国际政治并不是魔术师变戏法。”

基辛格故意贬低美国情报系统，以示尊重阿拉伯。他承认说：“我们对你们兵力集中的规模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对你们战斗力的预测也是错误的。”

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是美国空运“拯救了”以色列的看法，表示不能同意。他坚持说：“即使以色列人得不到我们运去的那些武器，他们也不会陷入你们想象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境地。他们在得到我们的援助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越过苏伊士运河进行反攻的准备了。”

有一点是基辛格直言不讳的：美国永远不会让苏联在中东用武力取胜。他直截了当对海卡尔说：“有一点不要产生错觉，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美国都不会让苏联武器取得战胜美国武器的巨大胜利，哪怕是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问题同以色列，同你们，都不相干。”

11月8日（星期四）上午，基辛格同法赫米热烈拥抱告别后飞往安曼，稍停，续飞利雅得。按照他的日程，他不在以色列停留。他这次到中东转一圈，部分目的是要为自己充当“一视同仁”的调解人树立威信。他在飞行中跟记者们说，西斯科将在约旦首都再同我们会合。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见得着他的话。”

基辛格摸不清以色列对六点方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设想，梅厄夫人为了和平是准备冒点风险的，但不会冒太大的风险。基辛格在华盛顿就曾劝她考虑，是否能够允许埃及通过以色列防线，把粮食和医药用品运给苏伊士城的平民和在运河对岸被围困的第三军。对以色列来说，这意味着放弃任何迫使第三军投降的计划。即使假定以色列愿意放弃这样的计划，也还有另外的问题。达扬和将军们担心开辟这样一个通道会把驻在运河西岸的以色列军队分成两半，使他们容易遭受埃及军队的痛击。

有个记者把话题拉到1969年12月那个没有成功的“罗杰斯计划”上，他问：“你是不是要把你的方案称做‘基辛格计划’？”基辛格咧着嘴笑了笑，回答说：“这要看以色列人是不是买账了。”这个记者盯着问：“如果以色列人不干，是不是可以改称‘西斯科计划’呢？”基辛格嘴咧得更大了。

基辛格怀着不知以色列会作出什么反应的心情，来到安曼国际机场。在机场，他受到了他以前的哈佛大学学生扎伊德·里法伊首相的欢迎。穿过停机坪，就是一队精神抖擞、身穿咔叽制服、头戴红白格子头巾的约旦仪仗队。仪仗队后面是机场大楼，屋顶上布满机枪手。他们戒备森严，生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闹事。基辛格即使看到这种特别的保卫措施，也没有重视。因为这

是他三天里第二次检阅仪仗队，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某种尊严才是。当里法伊陪同他在哈佛时的教授走过中东最优秀的阿拉伯军队约旦军团的这支精锐队伍时，约旦军乐团吹着风笛，敲着铜鼓，演奏起一首雄壮的英国进行曲。这一次，基辛格还是跟不上节拍，跟不上军士长的利落步伐。

基辛格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后，就乘车前往山上侯赛因国王的一所可以俯瞰安曼全城的王宫。他和国王就此行谋求和平的任务商谈了约一小时。然后，双方官员坐下来进餐，共有九道菜。就在此时，国务卿获悉西斯科在那路撒冷遇到了障碍，不能到安曼来同他们会合了，也许能在利雅得赶到。

别人都乘轿车前往飞机场，只有基辛格是乘直升飞机去的。国王亲自驾驶，缓缓飞越城市上空，最后在离基辛格座机约 50 呎的停机坪上降落。国务卿走下直升飞机时，吓得脸都发青了。他后来在飞赴利雅得途中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为了表示尊重，我宁愿走路。”

头天晚上，西斯科从开罗经塞浦路斯到达耶路撒冷不久，就同梅厄夫人进行了长达 4 个半小时的会晤。关于开辟通道的方案，他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梅厄夫人的同意。但是，那天上午，这位总理同保守的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磋商，有些领导人却故意刁难，提出了许多难题。因此，梅厄夫人要同她的内阁磋商后才能再同西斯科谈。这就又得花费时间。下午三四点，梅厄夫人和西斯科再次商谈，这次持续近 2 小时，达扬和阿隆都在场。讨论了一会儿，西斯科总算打消了他们的某些顾虑。联合国将沿通道设立检查站，监督运往苏伊士城的非军事物资，通道本身仍由以色列军队控制。此外，当物资运到苏伊士城时，以色列军官有权进行检查——仅仅是为了查明车队抵达苏伊士城之前有没有偷偷塞进军事物资。梅厄夫人同意西斯科同埃及人商定最后的具体细节。美国的这位谈判人从梅厄夫人的书房中走出来时，向等候的记者们微笑示意，主动地说了一句：“我是乐观的。”然后，上车急驰机场。

一架美国陆军飞机停在机场，等候西斯科前往利雅得，但是驾驶员了解到，那里不准这架飞机降落。利雅得方面的解释是，从以色列起飞的任何飞机，沙特阿拉伯都拒绝给予着陆权。这个问题耽搁了好几小时，最后还是基辛格的一位随行人员说服了费萨尔国王宫廷里的一个人，把这次降落作为一个例外，才算了事。

从安曼飞往利雅得的途中，基辛格不时闯进记者舱跟他们说笑一番，这显然是为了减轻他对费萨尔那个极端反犹的王国将如何对待他所感到的不安。有一次，他对三个他知道是犹太人的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三个最后下飞机。”又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只有祖籍欧洲、信奉新教的美国人才能在这里着陆。”他的眼睛扫了一下记者，然后问：“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有几个人把手举起来。“好”，他决定，“那你们先走。”有些人神经质地笑起来了。有个记者说：“亨利，如果你能下去，我们也能下去。”实际上，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经撤销了对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的入境限制。

在这段飞行中，国务卿不愿谈实质问题。他对西斯科到那路撒冷去的任务能否完成没有把握，也拿不准费萨尔对他，以及对他要求解除石油禁运会作出什么反应。所以他再一次设法用幽默的话来回避问题。他微笑着说：“我本想和他们享受一下利雅得的夜生活，但据我所知，这里的夜生活下午 4 点钟开始，过一小时就结束了。”

基辛格的座机低飞掠过原始的土房，在风沙弥漫的利雅得机场徐徐降落的时候，沙漠上已经暮色深沉，眼前一口油井也看不到。外交大臣奥马尔·萨卡夫，身穿随风飘拂的白袍，头戴黑头巾和金色头圈，隆重迎接基辛格。他同基辛格热烈握手，介绍基辛格同一些阿拉伯官员见面，然后陪他去休息室。记者们注意到萨卡夫拉着基辛格的手。在穆斯林国家，一个穆斯林拉着另一个穆斯林的手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这个场合，这种姿态似乎就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了，也许这是给其他沙特阿拉伯人的一种信息，表明基辛格是可以接受的人。甚至萨卡夫和基辛格坐在一张柔软的矮沙发上边喝咖啡边同记者闲谈时，这位外交大臣还时常伸出手去拉拉基辛格的手。国务卿后来说：“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啦，在利雅得，外交大臣拉我的手；而有一次在戴维营，勃列日涅夫亲我的嘴。”

基辛格在皇家宾馆稍事休息之后，就乘车前往红宫，第一次会见费萨尔国王。国务卿被引进一间挂着深色帷幔的长方形房间。基辛格汪香烟缭绕中可以窥见国王坐在屋子尽头的宝座上。两个体格魁梧的侍卫指引着基辛格朝国王走去，他们身穿黑袍，头缠黑白相间的头巾，手里拿着阿拉伯宝剑。国务卿走到国王跟前，同国王握了手，国王淡淡一笑。基辛格挨着费萨尔坐了下来。这时，他注意到，屋子两厢坐着几十个王子，一律穿着黑袍，不少戴着墨镜，有的在喝咖啡。基辛格应国王之请，站起来同每个亲王都握了手。随后，基辛格和国王同意饭后进行单独会谈。那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国务卿想给国王留下一一种认真和诚恳的印象。他一上来就告诉费萨尔，国王同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任总统的来往书信他都看过。他说，他相信，根据这些文件，费萨尔国王完全有理由对美国的政策感到失望。约翰逊曾向国王担保，以色列会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敦促实现这种撤退；甚至尼克松也是这样主张的。然而，什么也没有兑现。另外，赎罪日战争爆发时，美国马上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物资。就在这个时候，费萨尔最后决定了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基辛格对国王的立场表示同情，但他提请国王注意某些“新的现实”。

基辛格把尼克松说成对以色列撤退“承担了责任”。他说，他个人相信，现在已经有可能解决问题。他把跟海卡尔说过的一席话告诉了国王——他的强烈自负感使他相信他能够和平解决阿以分歧，他要求费萨尔采取合作态度。譬如，国王是否支持召开和会？费萨尔说，支持。国王是否支持解除石油禁运？基辛格解释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禁运继续下去，在美国就要激起反阿拉伯情绪，那样一来，他在外交上为了促使以色列逐步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进行的努力，就会更加复杂化了。

接着，费萨尔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他非常反对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他反对苏联和以色列，但他撇开近代史不管，对两国的政策不加明显的区分。对费萨尔来说，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是一个钵子里的豆子。他说，是犹太人在苏联把共产主义运动接过去，领导了1917年革命，最后建立了苏联的。后来，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进一步推行“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费萨尔眼睛直瞪着基辛格说道，而现在，犹太人“正在世界各地夺取当权的地位”。他告诉基辛格，犹太人打算统治全世界，但是他要用他的石油武器叫他们住手。他孽说，犹太人是《古兰经》中唯一没有给说几句好话的人，这一点决非偶然。

基辛格一声不响地听着。费萨尔继续说，犹太人必须放弃所有属于阿拉

伯的土地，包括那路撒冷。对他来说，这才是关键所在。他想在去世之前到那路撒冷的伊斯兰大清真寺去祈祷。他警告说，他历尽了那么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之后，现在要运用他的石油武器，直到迫使以色列从那路撒冷撤退为止。这是不是说阿拉伯人一天不收复那路撒冷，就一天下解除石油禁运呢？费萨尔的回答比较含糊，基辛格得到的印象是，一旦以色列开始撤退，就可以解除禁运。

他们的交谈结束时，国王已显出倦容。基辛格在告辞之前，透过“烟霭缭绕”在欣赏墙上的一幅画。他问道：“陛下，这是阿拉伯沙漠吗？国王那副一向冷酷的脸上添了一道尴尬的色彩。他回答说：“不，那是我们神圣的绿洲。”基辛格对这不小心的错误表示歉意。后来他说：“我猜想，为了那句话，使他至少推迟了一个月解除石油禁运/基辛格同费萨尔国王进行了异乎寻常的长谈后，回到宾馆。这时西斯科刚刚赶到。国务卿想审阅一下六点协议，但时间已经不够了。有三位沙特阿拉伯大臣来进一步商谈，然后进餐。等到基辛格和西斯科能够坐下来把会谈内容整理归纳一下时，已经过了午夜。这包括向华盛顿、开罗、耶路撒冷和莫斯科发电报的问题。最后，快天亮了，一切都已就绪，只差以色列内阁最后同意。等到内阁同意时，基辛格已经在飞往德黑兰和伊斯兰堡路上了，这是他在去中国途中要作短暂停留的两个地方。

六点协议规定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将军们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上 101 公里处进行谈判，这项协议是以基辛格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信件的方式处理的。具体规定如下：

- 双方将“认真遵守”停火；
- 他们将“立即”开始会谈，商讨根据联合国主持下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和分开的协议，解决各方回到 10 月 22 日阵地的问题；
- 苏伊士城将“每天得到粮食、水和药品的供应”；
- “不得阻碍”非军事物资向东岸运送；
- 沿开罗—苏伊士公路将建立联合国检查站，以色列军官有权检查运去东岸的物品；
- 最后，一俟检查站设立后，立即“交换所有战俘，包括受伤的战俘”。

虽然达成这项协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仍然还只是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协议的措词有含糊的一面，双方都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另外，也有明确的一面，足以使埃以之间开始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解决几个随时可能触发一场新战争的紧迫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解的进程中，看来埃及准备先走一步。没有人会低估进程中的困难或危险，更不用说基辛格了；但是，每个人都珍视这个机会。基辛格已经赢得了一点时间，好集中精力进行下一步工作——召开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和平会议。

11 月 11 日，在开罗—苏伊士公路 101 公里处的联合国帐篷里，一位以色列将军和一位埃及将军举行了会晤，以实施基辛格的六点协议。这个地方原先是以色列占领下的一个检查站。以色列方面的阿哈隆·亚里夫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军官，埃及方面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加尼·贾马斯是一位高级军事战略家。他们的会晤几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以方要对运往苏伊士的“非军事”物资进行检查，埃方则认为协议没有给以色列人这种权利。埃方要限制以色列对开罗—苏伊士公路的控制，以方却说虽然协议规定联合国在

公路沿线设立检查站，但公路本身仍应由以色列控制。

当时正在访问中国和日本的基辛格，进行了三天远距离的幕后活动，才打破了这个僵局。11月15日，两位将军就弥合双方分歧的程序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联合国部队沿公路设立检查站的同时，埃以双方交换了战俘：埃方释放了238名以色列人，以方释放了8000多名埃及人。这项措施为12月下旬召开日内瓦和会开辟了道路。

随后，亚里夫和贾马斯继续商谈，主要围绕着双方提出的针锋相对的脱离接触方案。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到12月初，将军们显然已无法达成协议，结果“101”谈判只好中断。这时埃及人开始埋怨基辛格说，萨达特误认以色列将退到10月22日线，是上了他的当。基辛格辩解说，事实恰恰相反，他一直认为以色列在12月31日大选之前是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的。由于出现了这样的误会，基辛格不得不再次打点行装，进行五周内的第二次中东之行。

国务卿希望能够保持外交上进展的势头。他认为，在谈判的现阶段，为埃以双方寻求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除打仗以外的新的解决办法，是最重要的事情。12月召开和会就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基辛格希望开成一个讲求实效的会议，参加国包括四个主要交战国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以及背后分别支持这四个国家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将代表起保护作用的机构联合国，作为这次会议的正式东道主。

基辛格12月8日从华盛顿动身，取道北约国家地区途经布鲁塞尔时，会议是否召开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当时既未向参加国发出正式邀请，也没有订出一个日程。显然基辛格的第一项任务是，明确会议能在可行的预定日期12月18日前后召开。除此而外，他还负起另外两项的连带关系的任务：一项是说服以色列领导人，现在该从其占领的大部分阿拉伯领土上开始撤退了；另一项是说服沙特阿拉伯领导人，现在该解除石油禁运了。

基辛格第一次去中东的时候，连飞越阿尔及利亚的领空都不行。这一回，他却应邀飞到阿尔及利亚同胡阿里·布迈丁主席进行了会晤。这位阿尔及利亚革命领导人，被一些人描述为“实用主义狂热分子”。12月13日，在滨临地中海的一座高山别墅里，基辛格同布迈丁举行了会晤，从那里可以俯瞰阿尔及尔海湾。这次会晤表明，对于美国在阿以冲突中起中间人这样一个新作用，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布迈丁身披黑斗篷，在一间光线暗淡、陈设简朴的房间里接见了国务卿。

布迈丁用法语问道：“国务卿先生，你讲法语吗？”

国务卿用英语答道：“我听得懂，也能够看，但讲不好。”

照了几分钟相之后，记者和摄影师们便很快走出房间，宾主二人单独谈了2小时，身边只留一名记录和一名翻译。他们讨论了两国关系，决定开始“新的对话”，以求完全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两国自从1967年中断关系以来，各自在对方首都只设立“留守处”，保持一种低级形式的外交接触。两人还讨论了中东的和平前景，基辛格在召开日内瓦和会这一点上取得了布迈丁的赞同。

阿尔及利亚外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在机场为基辛格送行时说，国务卿与布迈丁的会谈标志着阿美关系的“转折点”，阿尔及利亚支持他在中东谋求和平的努力。基辛格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开罗时的感受是，眼下看来，情况还算不错。

在四小时的飞行途中，基辛格听说，《金字塔报》在一篇社论里对他进行了攻击，说他使用了模棱两可的外交手法。显然，这家报纸反映了萨达特对“101”谈判仍未能促使以色列撤退感到的失望。这篇文章说：“玩弄聪明的外交手法，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使每一方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解释以适应自己的需要，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金字塔报》接着强调石油与和平问题的联系，它说：“要全面解决，就要既限制使用阿拉伯石油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也要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篇社论把基辛格弄得啼笑皆非，因为它把他讲成是一个对阿拉伯人这样讲而对以色列人又那样讲的人。国务卿对记者们说：“那怎么行呢？在这边这样讲，到那边又那样讲，这是愚蠢的权术政治。”

当天晚上，基辛格飞抵开罗。他同法赫米热烈拥抱后说：“我很高兴又回来了。”这两位外交家接着驱车前往开罗以北18哩叫做巴拉吉的一座宽敞的别墅。当基辛格被引进一间大会客厅时，萨达特满面笑容说：“欢迎，欢迎！你好吧？”国务卿笑着抓住萨达特的右手。当两人握手时，摄影记者连忙为他们拍照。这时基辛格回答说：“好极了。见到你太好了。”穿着一身军服的萨达特让基辛格在一张矮沙发上就座。这时保卫人员示意记者们离开大厅。

萨达特和基辛格商谈了2个半小时，一直谈到午夜以后。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两人又接着谈，还是他们单独谈。他们让西斯科、法赫米等助手在一所茉莉飘香、古榕成荫的美丽的花园里消遣时光。他们只得仍在柳条椅上晒太阳，枯坐以待。

4小时之后，照例又是保卫人员先打破了沉寂的气氛，然后是摄影记者们走动起来，最后是官员们走过来。萨达特同基辛格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两个人都面带笑容，神情轻松。这回是基辛格先开口，他流露了萨达特想要以色列撤退的迫切愿望。基辛格宣布说：“我们一致认为，使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把它们隔离开，这应当是和会第一阶段的主要议题。我将到另外几国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点有些什么看法。”他当着萨达特的面，还是谨慎地避免提到“以色列”的名字。接着萨达特说：“我对我们这次长时间而有成效的讨论确实感到满意。”

一位记者问道：“您是否认为圣诞节以前在脱离接触方面会取得进展？”

萨达特回答道：“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另一个记者问道：“希望在以色列大选前取得进展，合乎现实吗？”他想探听一下。这时基辛格不安地动了一动。萨达特接过这个问题回答道：“以色列大选不关我们的事，那是他们的事。反正我们要去参加和会，希望我们能本着和平的精神继续下去。”

“你们会同以色列直接商谈吗？”

萨达特说，埃及代表会同以色列代表“坐在一间屋子里”。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指的是直接谈判，那就不对了。”

接着，基辛格同法赫米一起急忙驶往机场。他已经比原定飞往利雅得的时间晚了2小时，一路跟随基辛格飞往沙特阿拉伯首都的记者们很清楚，国务卿对他这次同萨达特进行的长谈是满意的。他从埃及方面得到的东西是，埃及同意了出席和会，提出了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建议，愿意协助说服叙利亚派代表去日内瓦，并愿意同其他阿拉伯国家讨论是否有可能解除石油禁运。国务卿指出，由于叙利亚是否参加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召开和会可能要

推迟“一两天”。不过他又嘻嘻一笑说：“我估计，和会已经在望。”记者们都记得1972年10月26日他曾说过越南“中平在望”，可是过了3个月，美国方面的枪声才停下来，因此他们叽叽咕咕起来：“难道我们就这样老是在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之间飞来飞去吗？”基辛格正经地回答说：“不会。就是一两天的事。”

351

基辛格把希望寄托在萨达特身上。他说，这位埃及领导人有一种“一种长远目标感，一种现实感。他本可以像埃及一些报纸那样采取蛊惑人心的做法。然而他愿意听一听别人的意见，看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是很有头脑的。”

基辛格一离开开罗，萨达特就派了一名高级助手阿什拉夫·马拉恩前往大马士革和波斯湾沿岸产油的酋长国，把他同美国国务卿长谈的情况告知这些盟国。

12月14日天刚黑，基辛格再次到达利雅得。萨卡夫在机场迎接了他，在简短的答记者问的时间里，这位沙特官员再一次拉着基辛格的手，然后同车前往皇家宾馆。当晚，基辛格和费萨尔在国王书房里进行了会谈。书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香烟缭绕。国王还是那么冷峻。基辛格开了几句玩笑，想使气氛轻松些，但国王仍然无动于衷。

他们单独会谈了两小时，大概在解除石油禁运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不久以后，一位美国官员推测说，1974年初取消禁运的可能性“大于50%”。另一位官员认为可能性还要大一些。甚至萨卡夫本人在第二天上午送别基辛格时，也为这种普遍高涨的乐观情绪加了一点温。他说：“我认为我们能够搬掉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每一块绊脚石。”他还补充了一句：“我欣赏这次同我的朋友基辛格博士的会晤，我是叫他亨利的。”

基辛格同费萨尔国王第二次会晤之后，便开始说国王是个“非常严肃的人，言而有信的人”。国务卿需要国王帮他一把，所以他说他欣赏国王所处的地位：治理着一个拥有占世界很大比例的石油资源的落后国家。基辛格还说，“一旦你理解了他生活于其中、行动于其中的那个天地”，你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

尽管预料到召开和会的日期要推迟，基辛格还是得到莫斯科的通知，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仍准备于周末到达日内瓦。基辛格还得到联合国的通知，说瓦尔德海姆虽然已推迟前往日内瓦，但保证开会时如期赶到。当时瓦尔德海姆正在阿以之间的一场小争执中感到左右为难。阿拉伯人希望联合国在和会上起强有力的作用，而以色列人只希望它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基辛格在致双方的外交信件中说服了双方，解决了这一争执。他告诉阿拉伯人说，瓦尔德海姆将负责向与会国发出邀请，并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他对以色列人说，不管与会国由谁邀请，不管开幕式由谁主持，实际上，真正管事的还是他和葛罗米柯。

基辛格在飞到大马士革时，他的估计是，“叙利亚的态度会很硬的”。自1953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那里作过停留以来，基辛格是到叙利亚首都的第一个美国国务卿。他的飞机甚至还没有完全停稳，就被一批身材魁梧、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式机枪的叙利亚士兵围了起来。基辛格走出机舱，迎面一股凛冽的寒风吹来。他受到一小批叙利亚官员的欢迎，他们很快就把他接到大马士革城里的总统府。基辛格沿途也许看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座巴勒斯坦难

民营，还有一些建筑物，其中包括苏联文化处，据叙利亚人说，它在战争期间挨了炸。

哈菲兹·阿萨德行礼如仪地欢迎这位国务卿。这位 1970 年夺取了政权的前空军司令，在那个由宗教狂热分子、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极端分子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古怪联盟中，被认为是一位温和人物。他赞成战斗性的反以色列路线，这当然不免要反到美国的头上。阿萨德和基辛格留给记者拍照的时间很短。个子高大、一头黑发、留着小胡子的阿萨德坐在沙发的一边，基辛格坐在另一边，谁也没有同对方多作寒暄。

记者们被请出房间以后，基辛格同阿萨德会谈了 6 个小时，比原定时间延长了 4 小时。国务卿对这位叙利亚的铁腕人物采取了一种开诚布公、别出心裁的态度。他说：“我走遍了中东，人们都对我说跟叙利亚人没法打交道。请告诉我，总统先生，为什么跟叙利亚人没法打交道呢？”阿萨德为之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一下才打破了冷冰冰的气氛。阿萨德好像逐渐进入了讨论的主题，然后又逐渐缩回去了。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又似乎陷入冥想，拨弄手指，闭上眼睛，哼着阿拉伯曲调。不管怎么着，两人总还是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他们同意在对方首都设利益照顾机构，以改善两国之间的联系。从 1967 年断交以来，双方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或代表机构了。他们回顾了在中东谋求和平所走过的道路。不出所料，阿萨德表明了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要求以军从戈兰高地全部撤出，而基辛格则强调和会，他希望阿萨德答应派代表团去。他把邀请书的草稿拿给阿萨德看，阿萨德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于是他就认为阿萨德已经接受这一邀请了。为了礼貌起见，他问阿萨德对邀请书有什么意见。

阿萨德回答说：“嗯，有点意见。邀请书写得不错，可是有一句话不好。”

基辛格说：“喔，哪句话不好？”

“就是说各方都已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那句。我们就没有同意这件事嘛。”

基辛格听了不禁目瞪口呆。在谈话中间休息时，他叫西斯科赶快同萨达特、葛罗米柯取得联系。这究竟是叙利亚采取了新的立场，还是我们把它原来的立场理解错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大部分美国官员和记者都留在国务卿的飞机上没下来。大家都好半天不见基辛格了，现在是饥乏交加，纷纷猜测国务卿出了什么事。“他成了第 128 名以色列俘虏了？”“他去会见阿拉法特了？”“叙利亚人把他绑架了吧？”“也许他被暗杀了吧？”直到深夜 11 点多钟，远处才传来摩托车声音。一位睡眼惺忪的记者说：“喏，要不是他来了，就是人家来抓我们了。”几秒钟后，基辛格从一辆轿车里走出来。他对记者们说，他同阿萨德进行了“广泛、有益的会谈”，双方“十分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他对叙利亚的记者挥手说：“美国国务卿不会再隔 20 年再来了。”

在此以后的 18 个小时内，基辛格又访问了三个国家。他先到约旦，在那里得到了侯赛因国王的保证，国王说，即使叙利亚不出席会议，他也将派里法伊首相去。接着，基辛格又到了黎巴嫩，不过他没有去贝鲁特，因为那里的反基辛格示威使保卫人员很伤脑筋，而是到了距叙利亚西部边境只有 4 哩路的拉亚克附近一个安全的空军基地。他为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在这里受到了黎巴嫩政府的赞扬。最后，他到了以色列，在那里他使尽浑身解数和外交手腕，总算得到了梅厄夫人同意召开和会和举行脱离接触谈判（他已答应萨

达特，和会后就举行谈判）。

以色列给基辛格提出一个特殊问题。基辛格知道，他不能在美国国务院奉行一项完全站在以色列方面的政策。但是，他也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也不能奉行一项可能导致以色列失败的政策。他对朋友说，如果他真被逼到这一步，他就辞职了事。早在 1947 年，当他还是哈佛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赞成权势集团的观点，认为在中东建立一个单独的犹太人国家，那就会像他后来所说的，将为历史种下“一个潜在祸根”。他当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约旦组成一个联邦国家，日子会好过得多”。可是他访问以色列后，看法却改变了。犹太人“居然顶住种种厄运”，建成了一个国家。他们创造了奇迹。无论是从个人感情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基辛格都决心要帮助以色列生存下来。

星期日下午四五点钟，基辛格飞抵特拉维夫郊外的戴维·本-古里安机场。10 月 22 日，这位国务卿带着一项停火协议来到以色列，曾受到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欢呼。可是到 12 月 16 日，以色列人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近两个月的事态发展使他们受到“创伤”。10 月初，他们还生活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世界，虽说谈不上理想，可至少还是安全的。到 12 月中旬，尽管他们的军队进入了“非洲”，还把占领范围扩展到戈兰高地以外、快到大马士革的地方，他们反倒感到孤立无援、岌岌可危。甚至他们的朋友基辛格，也奔走于阿拉伯国家首都之间，同阿拉伯领导人拥抱，干着他们担心他可能干的那种出卖以色列利益的无耻勾当。以色列报界对国务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敌意。梅厄夫人不得不在 12 月初把记者和编辑们训斥一通，说他们有一种“单挑出某个人、专门跟他过不去”的倾向。她说，基辛格“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美国，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也对基辛格抱有深刻的怀疑。

《评论》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 12 月 6 日对国务卿说，他也跟一些以色列人一样怀疑起来，国务卿“究竟是一位打扮成张伯伦的邱吉尔呢，还是一位打扮成邱吉尔的张伯伦”？

基辛格走下飞机时，受到了埃班、迪尼茨和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记者们被隔在栏杆外面。示威者被栏杆挡在几百码以外，有 18 个人由于想挤过栏杆，被抓了起来。基辛格、埃班和其他高级官员迅速登上两架军用直升飞机，20 分钟后便到达耶路撒冷。基辛格只打算在以色列停留 22 小时，结果谈判就用了 12 小时。他同以色列人进行的会谈是紧张的、激烈的、艰巨的，但最终还是有收获的。后来他把这次会谈成是一个“突破”，为日后日内瓦会议产生的脱离接触谈判铺平了道路。

12 月 18 日（星期二）凌晨 3 点，西斯科叫醒基辛格，说埃及和苏联已证实了他上星期六关于叙利亚可能不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印象。法赫米白跑了一趟，未能使阿萨德改变主意。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叙利亚正式宣布抵制这次会议，指责以色列和美国搞了“一些把我们引向茫茫荒野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埃及正式宣布，法赫米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去日内瓦，这时，基辛格便迅速采取行动来压倒这两件新闻。他路过马德里时，指使发言人乔治·维斯特宣布，瓦尔德海姆已经发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正式邀请书，随后美国和苏联从“有关方面”获悉，除叙利亚外，其余各国都接受了邀请，会议将于 12 月 21 日在日内瓦开幕。私下里，基辛格则四处放风说，叙利亚不参加会议实际上是一大好事，因为这一来，便少了那个唯一可能在开幕式上制造麻烦的阿拉伯国家。

12月21日，埃及、约旦、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的外长齐集于当年国联总部所在地国联大厦，在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了为中东谋求和平的漫长历程。会议仪式简单，却戒备森严。25年来，中东局势紧张，兵连祸结，阿以双方的部长坐到一间屋子里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们还不愿同对方握手，也不随便交谈一句话。由于安排座位问题，耽搁了45分钟。法赫米和埃班一度进行了宣传战。但谈判总算开始了。

1974年1月3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奉命飞美国，第二天上午11点走进国务院大厅。那天他同基辛格就脱离接触的概念讨论了4小时，第二天又讨论了4小时。当时国务卿对记者说：“双方的立场大为接近。”达扬的话则比较审慎，他说：“每个人都应当认识到，在这样长时期敌对和交战后，在埃以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之后，哪怕是向达成一项协议迈出第一步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都愿意在日内瓦最终迈出这一步。”

这场在会谈中以个人的名义请基辛格再去中东推动脱离接触谈判，这是达扬的希望所寄。国务卿却不想很快再去中东，他致电萨达特，问埃及政府对这种调解工作是否也感兴趣。萨达特在48小时内就回电说“感兴趣”。基辛格这才肯再作一次努力。国务卿决走在1月10日（星期四）午夜离开华盛顿。当时他的想法是设法帮助双方制定各自的谈判方针，使他们在日内瓦的代表有一次“折冲机会”，以便像达扬所说的那样，“最终”达成协议。基辛格计划至迟在1月16日回华盛顿。他准备同萨达特谈一次，同梅厄夫人谈一次，也许同萨达特再谈一次，接着同侯赛因国王谈一次，同阿萨德谈一次，途经布鲁塞尔，向北约组织介绍情况，然后回国。他对记者说：“我的目标就是促使日内瓦会议顺利进行。”

基辛格途经西班牙加油后，就直飞阿斯旺，再度会见萨达特。阿斯旺位于开罗以南400里，是一个避寒胜地。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要跑到阿斯旺去呢？”基辛格解释说，埃及领导人患支气管炎很重，医生劝他到南方上尼罗河亚热带养病。在埃及同美国的关系中，阿斯旺有着特殊意义。1956年7月，杜勒斯曾突然宣布，取消同英国和世界银行一起为建造需费4亿美元的阿斯旺高坝提供资金。而修筑这个高坝是纳赛尔总统梦寐以求的愿望。结果，这位埃及领导人改变了他的国家的外交方针。他转而要求苏联资助修筑高坝，尼基塔·赫鲁晓夫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这一行动打开了苏联向中东进行经济和军事渗透的大门。6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以私人身份参观高坝时，对纳赛尔说：“今天我看到了美国铸下的最大错误。”

基辛格不时踱入飞机后舱同记者交谈。飞机临近埃及时，他获悉梅厄夫人得了很重的带状疱疹，也许不能参加这次磋商了。他不禁大声说：“阿拉伯人绝不会相信这个。如果我们此行有点什么结果的话，确切的迹象将是大家看到我又咳嗽又搔痒。”

国务卿的喷气机飞过沙漠上空后，于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阿斯旺附近一个军事基地坎坷不平的跑道上降落。这是一个防卫巩固的地方，有防空导弹发射场、坦克和军营，只许少数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进去，不用说，基地的军事部署是为了保护阿斯旺高坝，防止以色列可能进行的空袭或突击队袭击。法赫米吸着一支古巴雪茄，从冷冷清清的机场大楼附近的暗处走出来，同国务卿热烈拥抱。这两位外交家同记者说了几句，便坐上一辆乳白色的本茨轿车驶往萨达特的别墅。这座别墅建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英国人在本世纪初建造的阿斯旺低坝。

当基辛格被引进会客室时，这位埃及领导人全副军装，笑容满面地大声说着：“欢迎，欢迎！”深沉而洪亮的嗓音一直响到院子里。这本来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但是，萨达特和基辛格却把它变成了一个一小时半的工作会晤。

基辛格回到了他的下榻处新瀑布旅馆，这旅馆看起来像是 60 年代初苏联人盖的。法赫米前来同他共进工作晚餐。院子的另一边是瀑布旅馆，这是一座濒临上尼罗河用沙石盖的宝贵的建筑物。高高的天花板，旋转的风扇，昏暗的酒吧间，看上去像是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的电影布景。两家旅馆都几乎是空空如也，战后局势的动荡使旅游的客人大为减少。但此后一星期，瀑布旅馆竟成了不寻常的新闻中心。

星期六早上，基辛格在去萨达特别墅之前，游览了一番。阿斯旺高坝是旅游指南介绍的必游之地，埃及人对此引以为荣。苏联人虽然已经离去，还有许多用俄文写的标语。有一个标语是“欢迎萨达特总统”，似乎阿斯旺是属于苏联人的，他们是在欢迎一个来参观他们的工程的外国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萨达特，对许多苏联人的这种傲慢态度显然感到愤慨，因此他决定采取更为独立的政策。基辛格游高坝，这本身就说明了萨达特的政策已见成效。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基辛格还乘船瞻仰了半沉在水中的法伊利古刹（Phi1ae）。这里是一个小岛，位于埃及东南部尼罗河中，该处有若干古代庙宇，建于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后 600 年间。有一位记者深为埃及古代建筑的这一奇迹所感动，他对基辛格说：“看了这个古迹使我兴致大发，我想以后再来专门游览一番。”基辛格回答说：“别着急，在谈判结束以前，我们会看够的。”

上午 11 点，基辛格瞻仰了阿斯旺的奇景后，乘车前往萨达特的别墅继续谈判。萨达特问：“高坝好玩吗？”基辛格回答说：“给我印象根深。我们过去的做法是不聪明的。”在随后的 3 个半小时中，国务卿和总统探讨了达扬对脱离接触的“想法”，也探讨了萨达特的想法。譬如，以色列在西奈准备撤到哪条线？什么样的武器可以运入已撤出的地区？可以运进多少？联合国在两个交战国之间驻扎多少部队？埃及是否同意重建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城市，是否同意重新开放运河，允许国际航运？（以色列要求的是得到某种保证使运河不再成为作战地区。）西奈脱离接触协议和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协议两者有什么关系？这两个脱离接触协议和全面和平解决又有什么关系？双方的意见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方案，但萨达特一定已经意识到，只要说服基辛格继续留在这个地区，就不难把双方的意见变为方案，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可以使分歧缩小并趋于一致。萨达特想做成一笔交易，但他想让基辛格出面安排。

萨达特提议说：“国务卿先生，你为什么把目标局限在只是得到一些方案呢？为什么不能设法在你离开这里以前结束谈判呢？”基辛格在同达扬和萨达特多次会谈后感到，双方“终于走到一个球场上来了”。他说他很愿意结束谈判，但是不知道以色列愿意迈出多快的步子。他不久就可弄清楚这一点了。

在从阿斯旺到特拉维夫的 900 哩、2 小时飞行中，基辛格显得异常乐观。他说萨达特的态度是“和解的，富于建设性的”。谈判“相当快就能见分晓了”。同萨达特的会谈比基辛格原来想象的“还要细致、还要有益”。他说：“我们有可能使双方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也许甚至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他似乎在修正他原来的目标。

埃班在机场迎接了国务卿。他们立即登上直升飞机前往耶路撒冷。基辛格问道：“梅厄夫人的身体好些了吗？”埃班说，她的身体很不好，无法参加当晚的工作晚宴。

国务卿对总理作了短暂的礼节性拜访，然后同阿隆、达扬、埃班、迪尼茨等以色列高级领导人共进晚餐。他告诉他们说，萨达特建议，与其在日内瓦只是交换一下双方的谈判方案，不如搞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人认为萨达特的想法很好，当天夜里，以色列内阁就委托基辛格“把以色列提出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方案转交萨达特”。

1月13日（星期日）上午，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分成小组，对方案再加推敲。他们开始查看地图，标出部队部署的确切位置。例如，在运河东岸，有5万埃及军队，400辆坦克、大炮和导弹。以色列人认为埃及人要先“削减”东岸的军事力量，他们才同意撤到运河以东20哩的线上。讨论的问题错综复杂，午饭时间继续谈，一直谈到下午才结束。

傍晚，基辛格冒着风雨，乘直升飞机到特拉维夫郊外达扬的住宅参加一个招待会。即使在这种场合，也是先谈正事再行宴乐。埃拉扎尔提着大公文包，一进挤满了人的客厅就对基辛格说：“请过来，我把那张地图给你带来。”国务卿微笑着说：“小心点，这里可有记者。”基辛格、西斯科、达扬和埃拉扎尔在一个小书房里密谈了25分钟。他们从书记里走出来时都显得很高兴。一位记者问道：“进行得怎么样了？”基辛格赶忙答称“无可奉告”，然后 he 就把话题又开了，说阿拉伯领导人法赫米如何吻他，萨卡夫怎样拉他的手。国务卿说：“在以色列没有受到好的礼遇是因为埃班没有吻我。”过了不到一小时，基辛格又飞往阿斯旺。西斯科突然走进记者舱，他说：“欢迎你们参加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穿梭飞行！”

2小时零20分钟后，基辛格的飞机又在阿斯旺军事基地的那条坎坷不的跑道上降落了。法赫米迎接了他，基辛格对埃及记者说：“我希望，我从以色列带来的方案将成为就部队隔离问题达成协议迈出的一大步。”

基辛格和法赫米随后乘车前往新瀑布旅馆，他们在那里对以色列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审议，两人商谈到午夜以后才结束。在埃及，只有萨达特才能作出重要的决定，这是人所共知的。法赫米问国务卿是否愿意访问卢克苏尔，埃及最令人神往的陵墓就在那里。基辛格谢绝了，他以断然的口气说：“我不完成此行该办的事，就不去卢克苏尔。”法赫米别无他法，只好安排1月14日上午基辛格再会见萨达特。

上午10点，万里晴空，阳光灿烂，萨达特在他的花园里凉台下阴凉的地方迎接了国务卿。虽然当时气温在华氏70度以上，他还是穿着全副军装。这两位谈判对手先让摄影记者拍照，同新闻记者打趣几句，然后就进入别墅商谈了4小时。西斯科和法赫米等人则呆在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基辛格正式提出了以色列的方案和地图。他对所有的条款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此时此刻，只能确切无误，不能含糊其词。萨达特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后拒绝了。以色列要求埃及作出明确的保证，例如，苏伊士运河应成为畅通的商用水道，消除它在军事上的潜在作用；先允许以色列货物通过，以后还让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通过运河；对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曼德海峡解除封锁。萨达特对基辛格说，他对以色列提出的这三个问题都可以作出个人保证，但他不能明确让他的政府承担责任。在他看来，那种做法看来有损于他的国家的主权。

萨达特还告诉基辛格，以色列关于埃及“减少”运河东岸“驻军”的想法，他不同意。他说，他准备减少东岸的人力和火力，但不是减少到达扬所建议的那种程度，基辛格对限制武器问题的描述是：“难于上青天啊。”

看来萨达特很想成交，但基辛格可以感觉到，这位埃及领导人讨论“以色列的方案”，不论政治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困难。国务卿认为，此时应该进行某种创造性的外交，他请萨达特考虑这样一个设想：美国原先断然拒绝“兜售”一个“美国方案”，现在则愿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双方部队沿苏伊士前线脱离接触的“美国方案”，这个方案综合了埃方和以方草案中最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东西；另一个是“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记录了萨达特向基辛格所作的各项个人保证，它显然是“美国方案”的支柱。二者合在一起，构成谈判的基础——外交家称之为“权限”。在基辛格的心目中，这种做法意味着美国没有承担什么有约束性的义务，但却有助于埃及克服由于不得不用以色列方案作为谈判基础而在感情上产生的障碍；反过来，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如此。萨达特接受了国务卿的建议，他乐观地估计会出现突破，在几天内达成协议。基辛格说，他也希望如此，因为他想在星期四晚上结束这次在阿斯旺和那路撒冷之间的穿梭飞行。订出这个时间表也是一种有意施加压力的手法。

下午，基辛格、西斯科、萨达特、法赫米和贾马斯拟出“一个美国方案”和“一幅美国绘制的地图”。其后，基辛格和法赫米在瀑布旅馆充满阳光的阳台上一起散步。他们同记者们说笑了一番，然后就按英国人的老习惯“喝下午茶”。上尼罗河对岸的沙丘上，雄伟壮丽的阿迦·汗陵墓，特别显眼地在日影中闪闪发光。基辛格侧身对着他的一位助手说：“量一量那座陵墓，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也需要一座。”法赫米听了哈哈大笑。基辛格凝视着尼罗河上的风帆点点和斜晖中的陵墓，颇有所感他说：“我爱沙漠。”

黄昏时分，基辛格和法赫米审议了“美国方案”（它包括脱离接触方案、谅解备忘录和一幅地图），然后乘车前往萨达特的别墅，以便在国务卿返回耶路撒冷以前，对之进行最后的、仔细的逐项审查。审查进行得十分令人满意，纵然基辛格知道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尽管他想的作用已经改变，不再只是一个带着方案和地图奔走于那路撒冷和阿斯旺之间的高级信使，但他拒绝在谈判中给任何一方充当律师。他告诉萨达特，他将把埃及方面的观点准确地转达给以色列方面，但他不能代埃及讨价还价。同样，当他在大约一两天内重返阿斯旺时，他也只是公公正正地把以色列的观点带去。如果不是这样，在今日充满猜疑、怨尤的中东，他的奔波操劳是注定要一败涂地的。

基辛格回到以色列，已是星期一将近午夜时分。这时暴雨未息，他只好从机场乘汽车前往那路撒冷大卫王饭店。路上走了近2小时——倒是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使埃班初步了解他同萨达特讨论的情况以及他的新做法。到饭店后，基辛格和西斯科同埃班、迪尼茨以及以色列的一位重要外交官伊弗雷姆·埃夫龙一起审议了“美国方案”的要点，然后安排了1月15日（星期二）的会谈日程。

那天夜里，大家都没有睡多少觉。

第二天早上7点，迪尼茨同梅厄夫人进行了磋商，梅厄夫人又同阿隆、达扬、埃班和仰利利反复磋商。他们对基辛格的新做法的初步反应是好的，虽然总理了解，利库德反对派将攻击任何以不成文的谅解（哪怕只是部分地）

为基础达成的协议。

上午9点，迪尼茨向基辛格说明了以色列的初步反应。随后，美、以官员用3小时审议了“美国方案”的细节。基辛格对萨达特可能接受什么和不能接受什么作出了判断，但是他没有力萨达特的态度发议论。中午，基辛格中断了正式谈判，去参观了以色列现代博物馆，里面收藏着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和死海残卷等无价之宝。他在这里不仅凭吊了历史，而且引起了思乡的感情。博物馆的教育部主任乔埃尔·希夫坦是基辛格童年时在菲尔特一块儿玩耍的朋友。他们一起观赏几幅残卷时，基辛格对希夫坦说，他的希伯来文差不多忘光。这时已是下午1点1刻，基辛格匆匆赶到埃班家里出席“工作午宴”时，已经晚了。这次午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下午4点，基辛格拜会了梅厄夫人，她的身体虽然恢复得比较慢，但在逐步好转。他倾听了梅厄夫人关于生存与安全的议论，他说达成脱离接触协议是保全二者的一个好办法。这次谈话用了一个半小时。下午5点半，梅厄夫人召开了关键性的历时5小时的“厨房内阁”会议，这时基辛格回到饭店等候以色列作出决定。他知道，他取得的进展已经远远超过他原来的最高期望。他不仅已使埃以之间开始进行扎实的谈判，而且感到双方都希望他促成一项协议，而不必让日内瓦的低级官员会谈判。

基辛格利用以色列内阁开会的时间考虑了双方存在的巨大分歧。在埃及，基辛格是同萨达特一个人谈判。只要萨达特点头，就用不着再征求别人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谈判倒也干净利落。而在以色列，基辛格有时好像是跟整个国家谈判。他必须取得梅厄夫人的同意，这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不够，他还得使内阁同意他的观点，此外，他还得让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报界也同意才行。这种谈判拖泥带水，耗费时日。总之，埃及和以色列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独裁政权，一个是自由民主政权。基辛格最大的成就都是同独裁者或强有力的人物打交道取得的，他的最大困难则是同民选的领导人打交道。

晚上10点半，除了梅厄夫人，以色列的领导人都来到了基辛格的住所，讲明他们最新作出的让步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放弃要求埃及公开宣布不再同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他们对国务卿说，在他三顾阿斯旺、重返以色列时，内阁将就脱离接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美以两国高级官员重新对脱离接触的全部规定进行文字上的加工和推敲时，已是午夜以后了。他们的正式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

这时，基辛格决定同总统通电话，这是他这次出访以来第一次这样做。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出国旅行时经常都用电报同尼克松保持联系。这次破例，是因为谈判进展得非常快，而美国即使不作协议的保证人，至少也得充当作为协议基础的那些“谅解”的见证人。基辛格这位雄心勃勃的外交家，同尼克松这位困守愁城的总统，在电话中谈了30分钟。

1月16日，星期三，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基辛格和埃班无法乘直升飞机，只好改乘汽车前往机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先到梅厄夫人的住宅，以便把以色列的最新想法纳入“美国方案”。国务卿觉得以色列的立场已经变得“温和”，交易已经快做成了。一路上，埃班这位外交家成了旅游向导，他指着那路撒冷郊外的拉特伦修道院说：“就是那个地方，只允许一人说话，其他的人都必须肃静。”国务卿微笑着回答说：“啊，这跟国务院的规矩一个样。”他们到机场同记者谈了几句话后，基辛格就请埃班到他那架“阿斯旺——耶

路撒冷特快”上去坐一会儿，以便等达扬从国防部送来新地图。基辛格向随行者说：“埃班认为，谁要是以支持到99%，谁就是以色列的敌人。”埃班笑着说：“他说得对。”

基辛格转而一本正经地说，双方的“分歧”已经“大大缩小了”，他们都本着“公平正义的精神”对待谈判。基辛格说，如果“能够保持这种精神”，那么，“我们最后就有可能实现和平了”。

达扬终于带着地图来了。他们在基辛格的座舱里进行了短暂的秘密交谈后，国务卿陪着达扬和埃班回到记者那边。基辛格说：“我们在考虑，是否也把埃班带去。”埃班和他的妻子1948年曾在瀑布旅馆度过蜜月。“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向萨达特解释埃班的想法。现在恐怕该轮到他向萨达特说明我的想法了。”大家笑了起来，这时埃班下机而去。

基辛格在上午11点40分起飞，过了2小时又20分钟，国务卿在五天内第三次到达了阿斯旺。他在飞机上对记者说，二访那路撒冷是“非常有成果的”。他估计说：“差不多75%的问题已经解决。”他接着说：“我们还得解决剩下的大约20%到25%的问题。我现在的劲头越来越大。现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很难办。如果我们在两小时内回以色列，你们就知道，我已经把以色列的想法告诉萨达特，他拒绝了，谈判就此破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的话……”他笑着只说到这里。

阿斯旺依然是风和日丽，与耶路撒冷的凄风苦雨恰成对照。法赫米在机场迎接，两位部长照例互相拥抱，随即乘车急驰萨达特的别墅。埃及总统兴致勃勃地欢迎了基辛格，对他们二人的饭量开了几句玩笑。基辛格看了看自己的腰围，喃喃他说：“你比我的运气要好些。”然后基辛格和萨达特就按照老规矩到别墅去谈判，留下助手们在暖洋洋的花园里。他们磋商了一个半小时，基辛格努力使萨达特同意了把运河东岸的埃及军事力量减到他们认为以色列能接受的程度；8个营，即7000人左右；除留下30辆坦克外，所有的导弹和坦克一律撤出。近傍晚时，基辛格和法赫米在新瀑布旅馆磋商，对当天早些时候谈定的安排作了进一步加工。晚上8点，基辛格再次到萨达特别墅去，两人进行了一小时关键性的交谈。9点半，终于谈妥。国务卿立即飞回以色列。他对记者说：“剩下的路只有10%了，看来我们是能够走完这段路程的。”有一位记者问道：“你同以色列人的谈判很费周折吧？”基辛格打断他的话说：“双方都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保护，谈不上什么很费周折。”另一位记者问道，那么你是否觉得你现在“太一视同仁”了？基辛格坚持说：“我们同以色列的友谊并没有受到损害，如果和平真的降临这一地区，那么，同一方友好，不一定非得同另一方作对嘛！”

国务卿的飞机再次在暴风骤雨中降落。时间已近午夜。基辛格离开这里总共才12小时。当他同埃班乘车前往耶路撒冷时，他再次向埃班简要地介绍了他同萨达特谈判的情况。此时，国务卿已是精疲力竭，但他抵达大卫王饭店后，立即同迪尼茨会商，安排星期日的日程。迪尼茨离去后，他又同阿斯旺、华盛顿、莫斯科和联合国联系了一下，以确保履行协议时不致出现不可克服的问题。

1月17日（星期四）黎明，耶路撒冷的气温陡降。基辛格睡了3小时醒来，发现全市已被一场大雪覆盖。基辛格原订上午9点乘车前往梅厄夫人私邸作最后一次会晤，现在只好作罢。基辛格的轿车既无下雪时行驶的轮胎，也没有防滑链。达扬于是调用了—辆军用吉普车，同阿隆和埃班一起坐

车先到总理家，听取她的最后指示，然后经过刹车打滑、猛然开动、冰上滑行等等，总算在上午 10 点半到达旅馆，同基辛格举行了一次进入高潮的会谈。会谈持续了两小时。最后，埃班从国务卿的住房里走出来，咧嘴笑着，但又故弄玄虚地宣布傍晚将发表一个声明。有人问道，是一项协议吗？埃班回答说，是一项声明，但没有透露更多的东西。基辛格仍想去拜会梅厄夫人。说来凑巧，到午饭时雪停了，这就使军队有充分的时间把旅馆到梅厄夫人私邸的路面上的积雪清除。国务卿同她谈了一个半小时，试图解决剩下的问题。近傍晚时，基辛格对伊弗雷姆·卡齐尔总统作了礼节性拜会，这时总理在她的厨房里主持了两个半小时以上的内阁会议。由于下雪，有五个部长不能来耶路撒冷。到会者“一致”同意脱离接触协议的条款。晚上 7 点，埃班、迪尼茨和埃夫龙带着好消息来到基辛格的下榻处。但是这笔交易还没有完成。仍然有几个问题须在埃及解决。晚 7 点 3 刻，根据基辛格的指示留在阿斯旺的桑德斯打电话给国务卿，说萨达特已最后同意了协议。这时基辛格才一屁股坐到柔软的安乐椅中，不胜疲惫地对西斯科说：“乔，开几瓶香槟酒！”

耶路撒冷时间晚 9 点（华盛顿时间下午 3 点），尼克松总统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他宣布：1 月 18 日，星期五，在开罗至苏伊士城公路上 101 公里的地方，以色列方面的埃拉扎尔将军和埃及方面的贾马斯将军将签订一项关于双方部队沿苏伊士运河前线脱离接触后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总统说：“这是中东走向永久和平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有些记者立即猜测总统又在想分散大家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但多数观察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美国在调解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的一次努力。

晚上 9 点半，在大卫王饭店，埃班为困顿不堪的国务卿举行了一次小规模晚宴。埃班在谈到基辛格所起的作用时说，这是“国际和解方面的一个范例”。国务卿深知历史上风云变幻之道，回答得谨慎，用一种低得跟耳语差不多的声音说：“在中东究竟是一个插曲，还是一个转折点，几个月后才能见分晓。”至于当晚他可以说的是，脱离接触协议在阿以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埃及和以色列破天荒第一次将签订一项推进和解事业的协议。基辛格后来承认：“两个月前，如果有人担心埃及这次出击是要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我是会同意这种看法的。现在看来，埃及是准备试试能否和解得了。”

脱离接触协议的基本条款规定，以色列撤出苏伊士河西岸和东岸，南面要达到苏伊士湾。以色列将把军队撤入西奈半岛约 20 哩的地方。这 20 哩狭长地带将分成三个区。紧靠运河的那个区由埃及人控制，可驻军 7000 人；中间的缓冲区由联合国控制；还有一个区由以色列人控制，也可以驻军 7000 人。双方的军队和武器装备都是对等的。以色列人将继续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

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7 点半，基辛格乘车经过耶路撒冷积雪的街道前往梅厄夫人私邸。他在一旁看着梅厄夫人代表她的国家在协议上签了字。梅厄夫人然后转身对国务卿说：“我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相信，你在这个星期里创造了历史。”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室外，有一批以色列摄影记者在雪地里等着。他们当中有一位用新词哼着一首以色列古曲《大卫，以色列王》，只换了一个词。他哼着：“亨利啊，以色列王，愿你长寿永昌！亨利啊，以色列王，愿你长春永昌！”以色列原来对基辛格的重重疑虑似乎顿时烟消云散了。当天早晨的《耶路撒冷邮报》有一整版连环画，画着基辛格穿得像和平天使一样，坐在一门沉寂的大炮上。

上午 10 点半，基辛格再次飞往阿斯旺。国务卿透露说，“那剩下的 10 %的问题”牵涉到“限制武器的某些定义”。三小时后，国务卿站在萨达特身旁，这位埃及领导人正在一份有梅厄夫人签字的脱离接触协议上签字。（事实上，头天晚上萨达特已在他的那份文本上草签，代表埃及对这笔交易拍了板。）然后，基辛格和萨达特一同走到凉台附近的阳光下，以便让记者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公开保证：为设法使叙利亚和以色列也能达成一项类似的脱离接触协议而作出努力。萨达特庄严地宣称，他将“负责为在叙利亚前线实现脱离接触而努力”。基辛格也同样庄严地宣称，他将一如在埃及战线方面所做的那样，“为在叙利亚战线脱离接触而进行同样的努力”。

萨达特陪同国务卿从花园走到已经等在那里的那辆轿车旁。他们站了一会儿。萨达特把他的双手搭在基辛格的双肩上，慢条斯理他说：“国务卿先生，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兄弟。”埃及总统然后吻了基辛格的双颊。

不到一个月，基辛格又回到中东，着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脱离接触谈判，这是短短的 4 个月中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在开罗停留休息时，基辛格和萨达特又举行了一次露天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脱离接触问题，你将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些什么建议呢？”萨达特这时把手臂搭在基辛格身上。这位埃及领导人回答说：“要信赖我的朋友亨利。这就是我告诉阿萨德的话。要信赖我的朋友亨利嘛。”

第十六章

倾倒好莱坞

伴随着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基辛格的周围美女如云，桃色新闻不断。而基辛格如鱼得水，潇洒自如。

吉尔·圣约翰小姐是一位与国际上流社会许多重要人物有浪漫关系的女明星，而柯克·道格拉斯夫妇是美国电影圈子中的场面人物，他们喜欢举行一些有影视界和政界的著名人士参加的聚会。在有关越南问题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巴黎秘密会谈的中间，基辛格就曾抽空出席了在演员道格拉斯家中举行的一次晚会。

在这次晚会上，最漂亮的女人要算是流行歌星与影星弗兰克·西纳特拉先生手臂上挽着的这位吉尔·圣约翰小姐了。弗兰克·西纳特拉是吉尔小姐的好友。吉尔在报界的代理人曾断言，吉尔具有很高的智商，她除了是美国的性感象征之外，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她在1968年的大选中支持麦卡锡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她的政治信念。

在美国，只有这位有着一头棕色卷发的、脸上架着宽边玳瑁眼镜的大学教授基辛格才能从上流社会的一位非官方的头面人物弗兰克·西纳特拉手中夺走他的女伴。基辛格和吉尔约会了一次之后，一场田园诗般的爱情戏就开场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吉尔在加利福尼亚各处抛头露面时都同亨利在一起，而亨利在首都华盛顿也总是同吉尔形影不离，她的袒胸露背的服装吸引了赛马俱乐部和“普罗旺斯”的所有人的注目。好莱坞的广告商理查德·古利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了，因为他每天都能向报界提供有关吉尔与这位总统助理俩人之间关系的最新情况。

基辛格具有一种特别的本领，他总能邀请到一位漂亮的女人陪他一起出席某次活动，并且在当报界获悉此情况时，又总能突然“忘掉”他的邀请。那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即将在墨西哥隆重举行，基辛格计划出席大赛的开幕式。他不仅仅要作为总统的代表，同时也作为足球的狂热爱好者出席那次活动，要知道，在德国时他还曾经是一名相当不错的球员呢！好莱坞广告商古利抓住了这一时机，向美国报界提供了一条关于基辛格博士将在吉尔·圣约翰小姐的陪同下出席观看足球大赛的消息。基辛格急忙出面辟谣，于是发生了一场可笑的，关于谁将携同谁出席什么活动的闹剧，实际上，这无论对于谁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吉尔·圣约翰小姐很像是哈罗德·罗宾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男人们都在拼命地追逐着她。她那华丽的服饰、她的化妆、她的珠宝首饰、她的豪华轿车以及她的住宅，还有她那高傲的气质，都在深深地打动着所有男人们的心。基辛格这位已经充分表明自己是一名政治攀高能手的人，当然不能不对这位可爱至极的圣约翰小姐的魅力作出些反应。

在那之前，吉尔曾经接触过的唯一一位政界人物是得克萨斯州的副州长本杰明·巴恩斯。本杰明的保守党的支持者们要求他不要在家乡得克萨斯州境内携同这位惹人注目的红发女郎公开露面，他没有理睬他们的这种劝告。

吉尔小姐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政界并不是一位无名人士。她是西海岸反尼克松的一位女领导人。当尼克松住进圣克利门蒂夏宫的时候，电台曾播出吉尔小姐的一篇评论，她在其中表示：“尼克松搬到奥兰治县（加利福尼亚州

最反动的地区)居住要更合适些。”

当基辛格对吉尔小姐的女性身段发生兴趣的时候,吉尔小姐却希望同基辛格讨论越南战争问题。她是一个活跃的和平主义者,在同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就曾攻击基辛格同越南战争问题打交道。然而,在过了几天之后,当一位记者纷纷向她提出她同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基辛格的关系时,她一改往日的口气,基辛格就变成了一个“出色而彬彬有礼的,既热情周到又慷慨大方的美男子”了。

也许吉尔小姐拥有一批替她起草讲话稿的优秀撰稿人,或者如人们所说,她确实具有极高的智商。

一位好莱坞女明星在标新立异地打扮自己的同时,又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很高的敏锐性,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吉尔小姐在事业上的成功使得她有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去浏览群书、四处旅行并侈谈政治。在这些方面,她要比许多30岁以上的女人更有韧劲。

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克辛·切希尔在该报(1970年7月19日)的报道,当吉尔同基辛格有了那段罗曼史之后,她曾为报纸把她同乔治·汉密尔顿相提并论而感受到了伤害。人们说汉密尔顿从他同林顿·B·约翰逊总统的女儿林达·伯德的关系中得到了好处。吉尔声称,她同亨利的关系是建立在讨论一些知识性问题的基础上的,比如他们曾在一起讨论国际重大事件,也曾探讨一些诸如国际象棋棋艺等等问题。关于国际象棋,吉尔曾对一家电影杂志的一位记者表示:“我更喜欢同亨利·基辛格而不是同肖恩·康纳利一起下国际象棋。”

吉尔·圣约翰小姐经常说,一位姑娘总是希望凭她个人的美德而不仅仅只凭借她的外表来讨人喜欢。当吉尔小姐与基辛格教授面对面地坐在查森餐厅的时候,她的某些个人美德是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的。她是性感的最高象征,在那些对她怀有敬意的人们当中,就有基辛格。

与基辛格有罗曼史的另一个美女莎莎·嘉波尔,则是另外一种风韵的女人。她在《关于如何猎取一个男人,保住一个男人和摆脱一个男人》一书中自称“我是一个绝妙的家庭主妇。每当我遗弃一个男人,我总是留下他的房子。”

莎莎曾对记者说,她愿意嫁给亨利·基辛格,“他永远也不会同我结婚,这个讨厌鬼……,他认为我对于他太女性化了!”

每当美国总统夫妇举行一次晚会时,他们总是按照老习惯,精心挑选影视圈子里的一些重要人物出席活动以便晚会更加生动有趣,使客人满目生辉。1969年,尼克松夫妇在旧金山举行晚宴款待南朝鲜总理时,邀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几位老相识,其中就有曾经当过演员而当时是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和前民主党人弗兰克·西纳特拉。晚会还缺少点女性魅力,他们就把莎莎·嘉波尔的名字列入了应邀请的客人名单之中,因为在西部,再没有比雍容华、珠光宝气的莎莎·嘉波尔更美艳动人的女性了。因为她的胸脯特别饱满,人们戏称为“军用救生背心”。

白宫社交秘书打电话给莎莎·嘉波尔在贝莱尔的寓所,邀请她出席一个晚宴。接电话的是莎莎与康拉德·希尔顿所生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嘉波尔·希尔顿(她是一个演员,在不演出的时候,希尔顿的这位女继承人总是喜欢替人接电话)。可是,弗朗西斯卡并未接到邀请去出席尼克松夫妇的这次晚宴,莎莎只好一个人独自赴宴了,因为总统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很特别的、在餐

桌就座的客人顺序表”。

嘉波尔一时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她从来都下放过任何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她外出总是带着许多随行人员，其中经常有她的母亲乔·嘉波尔伯爵夫人、她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她的代理人、她的公共关系顾问、她的秘书、随从以及女理发师等。莎莎同白宫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位匈牙利后裔的超级女星可以带一名随行人员陪同前往。她选中了洛杉矶的一位漂亮的律师，有关方面对这位律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当莎莎到场的时候，他只能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

莎莎简直不能够想象总统夫妇竟会为她被安排在亨利·基辛格的身边就座而相视一笑。她的这位白宫情人享有“超级男子汉”的美名，因为在他身边总是有好莱坞的美貌女郎相伴。这次，为他准备了莎莎·嘉波尔这位训练有素的老手。

礼宾官担心在这次总统晚宴的来宾座位安排上发生差错。尼克松这位博学的密友怎能忍受三个小时的女性饶舌呢？基辛格是一位核能与世界危机问题专家，是一位研究未来政局的学者，而莎莎的兴趣却似乎只集中在蒂法尼斯的化妆品实验室上，这样的一对将如何彼此适应？然而，礼宾官这次错了。他们俩谈得十分投机，原因很明显：莎莎除了是个天生丽人之外，还是好莱坞最聪明的明星。

莎莎事后评论说：“第一眼看上去，他并没有什么特别能打动人的地方，然而当他一开口，简直就是卡莱·格兰特第二……他具有一个女人想要的一切。”她感到自己已完全被那个人征服，尽管她说她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当晚宴快结束时，一位身青海军制服的军官把总统的一张便条交给了她，便条上写着：“您觉得基辛格先生如何？”

莎莎在一张餐纸上反问总统：“谁是基辛格先生？”

总统用他那无法模仿的，带有许多花饰的笔体，又给她写了张回条，上面还划着一个小小的指示箭头：“就是坐在您身旁的那个男人，您整个晚上都一直在向他卖弄风情呢！”

莎莎决心调查一下亨利·基辛格究竟是什么人。她十分起劲地干着这件事情。她感到自己已被深深地打动，并且对这个人发生了兴趣。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亨利给莎莎以及莎莎给亨利通过许多次电话。莎莎就午餐、晚宴、影剧和“今后”的事情向亨利征询意见。她对亨利的唯一怨言是：“这个该死的骗子总是在最不恰当的时候走开……总统也这样说……总是在最不恰当的时候走开！”

亨利在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不很有名的女演员之后，在他的眼中莎莎无疑是一个极其聪颖的女人。而以往的情况似乎是，基辛格在好莱坞的朋友们每次替他约会的女伴，虽然她们的胸脯一个比一个高耸，然而她们的头脑却一个比一个糟糕。莎莎至少到过许多地方并且读过许多书，她和亨利都有一种中欧人的习性。一段时间以后，特工机关就准许亨利同莎莎约会时可以不带警卫人员了。说到底，一个男人同这位世界上最性感、最具魅力的小母亲在一起，呆在一套有七间卧室的房子里，还能搞出什么别的麻烦事来呢？

在两个人第二次一同外出之后，莎莎就把亨利变成了她的社交场合上的保护对象。她很自然地和他的服饰着手（嘉波尔习惯于厚颜无耻地向所有同她在一起的男人提出关于服饰颜色的搭配、剪裁样式、面料和领带等等方面

的建议)。她宣称，在总统助理的服饰上需要增加一点生气，以抵消一些他那满头卷发、鼻梁上架着玳瑁眼镜的一副老派守旧的气质。莎莎决定用活泼的栗色作为基本色调，并坚持要她前一位相好贝弗利·希尔斯的专用裁缝罗恩·波斯特为亨利置装。然而这位教授最终并未换他的行头。

基辛格与嘉波尔之间的电话罗曼史也遵循着一种很特别的格式。往往是莎莎就晚间活动提出某种独出心裁的想法，基辛格在通话几分钟之后就又打电话给她，恭维她的想法聪明并且为此祝贺她。每当基辛格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新出版的杂志的封面上时，莎莎也一定会在当天打电话给基辛格，奉承他一番，开几句玩笑，并且邀请他前去。

有一次，莎莎在拉斯维加斯准备演出时，她提醒亨利要出席她的演出的诺言。旅馆的广告代理人已经在想象拍摄这样一张照片，上面是兴高彩烈的莎莎前夫康拉德·希尔顿和亨利·基辛格一同站在舞台上，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应该是：“莎莎·嘉波尔的过去与将来”。

然而基辛格没有露面，他只是送去了玫瑰花，莎莎和她的一伙人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打听到：她在“弗拉明戈饭店”演出的那一天，亨利在出席一个会议，他正在巴黎，试图结束一场战争。

糟糕的是，基辛格同莎莎举行婚礼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他还喜欢许多别的女人呢！如果白宫的完婚重点对象是亨利·基辛格的话，那么，他们还得再努力几次，舍此之外毫无办法。

与美女在一起的时候，被复杂的国际外交事务搅得筋疲力尽的基辛格博士无疑感到轻松和愉快。然而，事情并非那么完美。一位主演过色情影片的揭发女影星朱迪·布朗就曾经让能言善辩的基辛格处于说不清的尴尬境地。

这位很有才华的女明星声称她与尼克松的基辛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基辛格教授也承认一些，但更多的是否认。给人的印象是这位女士想“名扬天下”。基辛格肯定他说，那些火爆的爱情场面只局限在她的那些报界代理人的打字机上。

朱迪说她无法相信这位好好博士能说出这样难听的话来，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呀！除此之外，还说他在狂热地爱恋着她。

根据基辛格对女人的最新口味，朱迪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她在一篇题为《一位女星述说她与亨利·基辛格的秘密约会》的文章中，零乱地讲了一些具体情节，文章刊登在一家不那么俗艳的电影杂志上。她的优美的身段似乎很符合亨利的要求。根据一些电影杂志的报道，她身高1.62米，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和一头习惯于披落在肩头以下的长发。确切一点说，她的头发不是褐色的……而是“桃花心木”那样的赤褐色。她的身段真是妙不可言，她的胸脯就像一些猥亵书刊中的漫画画的那样，她的服装又突出了她的迷人之处。她让人感到亨利就喜欢他这样。“亨利，总是说我极富性感，他喜欢我修饰打扮，我也总是让他整整齐齐。”她的颧骨很高，在许多广告照片上，总是展现一种湿润而挑逗的微笑。她轻而易举地挑动春那些欣赏着她的人。

朱迪引起基辛格的注意很可能是由于她在丹麦色情影片《三个人的游戏》中扮演了纵欲的第三方。海关总署查禁了这部影片，后来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它的拷贝。后来，朱迪又拍摄了《笼中女人》和《玩偶之家》等优秀影片。

很难确定亨利与朱迪一同外出的频率，以及他们的约会已达到的深度。朱迪的进攻与亨利的反攻不太协调一致。然而，谁也不怀疑亨利已经突破第

一道防线而深入到了大后方。

按照亨利的说法，布朗只持续了三次晚宴。然而朱迪·布朗却说，基辛格在赠送礼物和作出种种许诺之中整整持续了一年。朱迪经历的是一条通常的道路：她从“密西西比大学小姐”开始，一直走上贝弗利山；她还曾去丹麦拍过电影呢！在认识亨利之前不久，她同她的伴侣、职业骑手并在后来成为了经销商的杰里·克伦普莱尔离了婚。她辞退了她的代理人，离开了电影制片厂。她一时感到很茫然，于是决心作一名“严肃”的女演员。有一天，“我接到塔夫脱·施里弗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对我说，基辛格正在城里等着呢！问我是否同意与他共进晚餐。”在搞清楚了亨利·基辛格是什么人之后，她就答应了。

“一周之后，电话铃响了，是基辛格从白宫给我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同他共进晚餐……“定在周四好吗”，“我连想都没想就对他可以说。当我放下电话听筒之后，我就后悔接受这次邀请。我得对亨利·基辛格说些什么好呢？”

朱迪的代理人急忙将基辛格——布朗的私情当作热门新闻传播开来，这消息并没引起很大的震动，朱迪只不过是基辛格的长长的女伴行列中的一员，单凭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是不足引起人们的关注的。

然而，最终造成了影响的是朱迪对基辛格的抱怨。朱迪责怪基辛格要求她“深居简出”，而他倒跟吉尔·圣约翰以及马洛·托马斯那样一些更容易使人接受的女人一起公开露面。基辛格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男人也需要精神上的伴侣。人们相互探询的是，一个来自曼哈顿的贫穷犹太青年，而现在成了鼻梁上架着玳瑁眼镜和获得博士学位的男人，竟能满足一个丑闻百出的女演员的各种欲望。

根据朱迪的说法，关于保守秘密的问题，在第一次约会时就提了出来。出于对亨利的爱，朱迪同意“隐姓埋名”，这对于二位向往成为大明星的女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比不吃饭还要残酷得多的牺牲。一天夜晚，亨利带朱迪去贝弗利山夜总会，饭店甚至还赠送给他们一瓶葡萄酒。威廉·怀勒还走到他们的桌边与他们交谈了几句。根据朱迪的回忆，“所有这一切都使亨利着迷。我认为几乎可以说所有好莱坞的人和事都使亨利陶醉，他喜欢魅力”。一个饶舌的侍者也回忆说总统助理是一位只有在有秘密约会的时候才光顾的客人。看来，亨利在受到别人的控制。

当时朱迪去了洗手间，一名安全人员走到亨利跟前并把饭店门前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聚拢起一支摄影记者大军的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亨利只嘟囔了一句：“我怕的就是这个。”朱迪、基辛格以及安全人员悄悄地由厨房的一个门走出饭店，来到饭店后面的一条小街上。据说，刚一来到外面，朱迪就大声喊道：“你倒说说，如果你不喜欢招摇过市，那你为什么要和女明星们搅在一起？”

据一些材料说，基辛格当时用一句粗话回报了她。

有一次，朱迪在她的房间里对基辛格说，你不能“又想吃鱼又怕被鱼刺卡着”。可这正是基辛格社交生活中的一个最具吸引力与最令人快感的选择。

她对他说，如果还想继续幽会，他们必须不再回避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不再采取为躲避摄影记者而从后门溜掉的做法。

亨利转身向门口走去，并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回答了她：“很好。如果是这样，我相信我不会再贪恋鱼腥了。”

朱迪在睡了一觉并与她的报界代理人进行了一次交谈之后，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在会上长时间地表白了她作为基辛格生活中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而感受到痛苦的心情。她说：“为了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为了毫不知羞耻地否认那些关于我们一同外出的问题，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亨利对我的谨慎也表示感谢，这我清楚。”

“可是我现在已经感到厌烦。我也有自己的爱情。他应该明白，现在到处都登载着有关他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消息，这使我很痛心。特别是，我还确切知道玛格丽特·奥斯默和马洛·托马斯这些女人对于他实在算不了什么。亨利竟也和托马斯一起出去，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托马斯告诉她她在电视台工作，于是他问她：‘你做什么工作？’他也许以为她是个女秘书。第二天，他们的照片就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之上。上百万人在谈论亨利·基辛格与马洛·托马斯，这很糟糕。我已厌烦充当他生活中的一个无声无息的人，扮演一个神秘女郎的角色。”

记者招待会承揽了一切。仅仅几天的功夫，朱迪的照片就出现在国内所有最重要的报刊和杂志的版面之上，其中包括那些最严肃的和那些最俗不可耐的报刊杂志。朱迪吐露了给她打击最大的是“玛格丽特·奥斯默”。《洛杉矶时报》登出了基辛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金发女制作人奥斯默的照片。在亨利·基辛格最初几次的巴黎秘密之行中，奥斯默曾有一次充当过他的受人尊敬的掩护人。

朱迪开始用另外一种颜色，用深红色涂抹自己的指甲。她把这种颜色称之为“基辛格红”。

朱迪不仅和盘托出了一切，她还添油加醋，并且已经开始预言未来。她肯定地说亨利还会返回到她的身边。他早就答应过她，“他们将一同去所有的饭店，还将准备允许记者拍下他们喜欢拍的各种照片”。可以想象得到，摄影记者们在一定时机都会走开的。亨利显然不准备去丹麦。

关于基辛格的桃色风波的最初一些报道，是因夜总会事件而引起的。人们在问，有谁能够提醒那些摄影记者们的注意呢？基辛格没有这样做，饭店不敢这样做，这意味着什么？这位总统助理开始一个一个地对付这些议论，他从问题着手，最后用责备结束了这一切。他肯定他说他们“只出去过三次”。然而糟糕的是，几名好事的专栏作家列出了一长串基辛格同朱迪曾一起去过的场所的单子，从而否定了基辛格的这种表白。在这张单子上，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的寓所，一个叫做“棕榈之春”的地方“查森餐厅”和夜总会等一些好莱坞的场所都赫然在目。

亨利重新开始表白……从责怪到一口否认。随后他去了中国，心平气和地参加了国际会谈，他摆脱了必须为自己进行的辩解，他未损伤一根毫毛。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桩小小的风流艳事，而基辛格却是一位总统密使呢！

在亨利批评朱迪“想出风头”之后，朱迪承认她对整个这件事已经感到厌倦。她说：“翻开报纸看看是一件事，而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全是自家后院发生的事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而基辛格的女伴则一个比一个更迷人了。

好莱坞女演员中一位最末流演员（然而在电视女演员中却名列前茅），曾是基辛格博士的一位女伴。据说，她与基辛格约会的牵线人是好莱坞的总经理塔夫脱·施赖伯，施赖伯原本一直被看作是基辛格与朱迪·布朗之间的信息传送人。

托马斯小姐曾在没经政府审查的电视系列片《日落脱衣舞 77》中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夏季剧目《黑纱》中，她的羞处被展露得淋漓尽致。

托马斯小姐对她的朋友们说，基辛格先生是一个“极讨人喜欢的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一个颇具男性魅力的同伴”。她还特别指出，眼下，他们之间还不存在任何有关结婚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默契。蛮有意思的是，谁也不曾出来提结婚问题，可她却经常出面否认。

这段罗曼史后来因为托马斯小姐卷入一桩案件而告结束。

基辛格的漂亮女伴总是不停地变换。

挽在基辛格手臂上的那个女人，当然是他的最新的女伴了。她容光焕发，美艳异常，一身华丽的服饰和佩带的珠宝手饰更使她光彩四溢，满座生辉。一般来说，在与基辛格一同出入之前，她们都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女人了。

闪光灯在不断闪烁，基辛格装出一副讨厌这种热烈气氛的样子，然而实际上，他是很喜欢这一套的，他的一位助手曾就此暗示过记者。基辛格真正担心的倒是，由于东道主的疏忽，或者由于他的为数不多的对手中某个人出乎意料到场并独享新闻媒介的注意，从而使他的到场未能引起记者们足够关注这件事。

在一些特别的场合，白宫的一个电话会推迟一部重要影片或者一场音乐会的开始，因为基辛格被“重要事情”拖住而不得脱身。最重要的一次要算是那回在纽约举行影片《教父》的国际首映式了，为了等候基辛格，使开演时间足足推迟了半小时。

芭芭拉·霍沃同报纸上塑造的基辛格女伴的形象不尽相同。她的穿着谈吐都很恰如其分，甚至考虑问题也很妥当。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或者在某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芭芭拉会在任何一个给她提供这种机会的人面前嘲讽尼克松政府。芭芭拉·霍沃是一位勇敢而又固执的姑娘，她曾公开批评白宫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妻子。比如，当许多白宫官员的家庭搬到华盛顿弗吉尼亚大街超豪华的水门建筑群之后，芭芭拉就把水门称作“狂人方舟”。

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顿·B·约翰逊执政时期，芭芭拉是一位重要而又不安分的女主人；她的晚会从来不会使人感到无味，在必要的时候，她会弹一首钢琴曲，显露一下大腿或者随着最后一支舞曲起舞。

芭芭拉从另一位女主人珀尔·梅斯塔斯身边夺走了她的客人，这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说到底，芭芭拉具有任何一位渴望成为女东道主的女人所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良好的关系和一个有钱的丈夫。芭芭拉的丈夫是华盛顿的一个承包商，是约旦后裔，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芭芭拉曾说，她丈夫的父母肯定会以为他们在婚礼后是骑着骆驼离开教堂回家的）。霍沃有两个孩子：埃德蒙和巴德。根据芭芭拉的说法，基辛格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

在霍沃家族的鼎盛时期，芭芭拉几乎是事事如意。她是一位尽心尽意的女主人，负责组织舞会或者慈善性活动。华盛顿官场的重要人物以及学者文人和影剧人士都来出席这些活动，为她捧场。然而，芭芭拉的丈夫却是从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些晚会与活动的，他承认他心疼他的钱袋。尽管如此，他妻子的各种关系对他的生意还是很有用的。

芭芭拉加入了肯尼迪总统的政府，成为那些为抬高“新边疆”计划的身价而游说四方的“时髦人物”当中的重要一员。然而直到1964年以前，她并没有真正出名。1964这一年，她被选作“林顿女士”之一。她猜测她被挑中是因为约翰逊政府缺少能干的人而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她参加了那场滑稽的

竞选活动，乘坐伯德女士（约翰逊夫人）的专列，带着小旗、小册子和烈性威士忌，走遍美国南部8个州，谁要，就散发给谁。芭芭拉每天上百次地反复哼唱“喂，林顿！”于是，她成了所有那些姓伯德并且欣赏她的幽默感和美丽面孔的女士们的夜谈伙伴。根据《妇女家庭杂志》报道，她甚至成了约翰逊的妻子伯德夫人和女儿露西的女理发师，尽管她没有像佩吉·戈德华特的专门来自菲尼克斯城戈德华特时装之家的女私人理发师那样出众的手艺。

为了酬谢芭芭拉对伯德夫人发式提供的服务，她被委派作五次首场舞会的协调人。伯德夫人还委派给她一项棘手的外交使命，这就是替她的女儿们置办好在父亲就职的那一天要穿的全套服装：女孩子们当时都留在一个很远的寄宿宿舍里。给芭芭拉提供一笔无限制的预算，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就这样，第一夫人等于公开承认了她对芭芭拉的偏爱。

这一切，给芭芭拉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接近约翰逊家庭的机会，她对白宫这家人的一些具体琐事的回忆是不可言喻的。她想起，有一次在晚餐上，第一道菜给总统上了一盘清淡的汤，“总统连勺子都没伸就转向约翰逊夫人并对她说，洗盘子的水应当送到厨房去，那里会派上更好的用场”。芭芭拉的办公室和家中保留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芭芭拉自己拍的，而不是向约翰逊或者他的家人要来的。

芭芭拉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只靠呼吸白宫里的稀薄空气而产生良好的幽默感的。一天晚上，总统穿着一条十分宽大的裤子，同芭芭拉开着玩笑，让她今后不要再给他的女儿们，而应给他提供点关于时装的建议。她立刻回答说，她很高兴能向他提出一个有关他的裤子的劝告：“当您裤子的后部磨坏时，您尽可以用它蒙盖游廊上的长沙发椅。”总统只笑了一笑。

在首场舞会上，约翰逊坚持在镜头前面同芭芭拉跳舞。芭芭拉事后向报社记者谈了她的感受，说她好像置身于“猪猡的天国”之中。

当芭芭拉·霍沃中断了她同性格暴烈的约翰逊—伯德一家的关系之后，上层社会人士也纷纷缩了回去，竞相远离了芭芭拉，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她碰面。一位记者说，芭芭拉就像一束凋谢的花朵，在晚秋之中很快地倒了下去。引起芭芭拉更大愤怒的另一件事情是，她被从《华盛顿社会名人录》上除名，而这个名册对于那些名列其中的人们来说，至少总还意味着些什么。芭芭拉痛苦地表示，这就好像让她离开克莱因地下室一样。

然而，她保留了一位重要的女友，这就是首都华盛顿过去曾红极一时的人物之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上了年纪的女儿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夫人。整整半个世纪，朗沃思夫人曾统治华盛顿上层社会，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当约翰逊家庭中断了同芭芭拉的友谊之后，朗沃思夫人仍继续对她的女友敞开着几扇重要的大门。

在基辛格开始向芭芭拉献殷勤之前的一段时期，她几乎受到了为众人所排斥的惩罚。她决心重建生活，于是，她减掉了几公斤体重，摆脱掉了她的丈夫并且放弃了一幢很大的房子，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在她的新朋友们中间，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像“妇女解放运动”女英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一些“真正的人”，这位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就是基辛格一再声称未和她睡过觉的那个女人。

在芭芭拉同亨利·基辛格发生罗曼关系之前，人们一直说她是一位精明的新型女性。她能同杜鲁门·卡波特讨论同性恋问题，同巴里·戈德华特谈

论公职官员的秘密性生活问题，她甚至能说服在镜头面前表现缩手缩脚的基辛格同意在她的电视节目中露面。

这简直是迎头一击。白宫一直很注意基辛格在一些场合露面并且是用那明显与众不同的口音讲话。有一头卷发，佩戴玳瑁眼镜，又是个犹太人，这本已经够惹人注目的了；然而这还不够，他还要用德国人的口音讲话并且评论美国总统想些什么。要知道，尼克松可是一贯热衷于维护他那典型的中西部美国人的形象而下受侵犯的。

在电视制作中心，所有的人都知道基辛格与芭芭拉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是在节目制作结束时开始的。有人肯定他说，有人撞见他们俩人手拉着手，在节目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在化妆室互相开着玩笑，就像一对茫然无知的青春少年。然而，芭芭拉的制片人担保说他们俩人的行为一直很得体。不管怎么说，基辛格还是把他的对她感兴趣的信息传递了出去。这位已离异的时髦女士完全明白这个信息中的含义。她还想到，如果能成为她曾多次公开攻击过的总统的主要助手的亲密女友，将是二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几天之后，就开始了电话往来，一些不很贵重的然而却纯属个人的馈赠礼品也随之送来送去。从这一刻起，没用多少时间，芭芭拉就又能在国内轰动一时的重大活动中，与她的伙伴们平起平坐了。

记者们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在文章中加上了芭芭拉在基辛格的陪同之下重新进入白宫，而与此同时约翰逊却从白宫的另一个门走出去的这一妙笔，恢复了芭芭拉的政治地位。芭芭拉也粲然一笑他说：“我回来了……”

由于芭芭拉在电视节目中的成功以及她天生的聪明与俏丽，更由于她经常与基辛格一直出出入入，芭芭拉获得了新的地位。《纽约时报》说她是首都华盛顿的最合格的社交女性，并且说她能同这位道德人物以及全国最著名的单身汉亨利·基辛格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芭芭拉这位电视女演员讲话很随便，她的许多电视节目以及对记者举行的招待会成了暴露亨利·基辛格许多个人生活隐密的根源。她谈过基辛格的石溪公园附近的寓所的装饰，说它实在像“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度假公寓”。她把总统主要助手房间的家具描绘成是“格兰德·雷皮兹饭店风格的现代化家具”。她还对她的朋友们说，基辛格的卧室有一种消毒剂的气味，寓所中唯一一间似乎用过的房间是图书室，那里摆满了书，还有一些精巧的装饰品。

她未能透露的一个秘密是基辛格的经济状况。公众并不一定要了解基辛格的薪金和用度，然而一些自称是知情的人猜想可能与大企业经理的报酬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每年5万美元左右，此外还有许多附加收入。很难想象当基辛格结束中国秘密之行后请总统和他一起审核开销帐目的情景。不知怎么地，叫人听上去总感到不那么诚恳，比如：“巴基斯坦饭店的开销我记在了我的迪纳俱乐部的信用卡上，我还忘了加上在中国洗衣的费用了。”从另一方面讲，亨利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像他的百万富翁的弟弟那般奢华排场。他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曾给他带来很大的收益。白宫官员出入公众场合也不付报酬（如果付报酬，人们是不会认可的）。亨利保住了自己经济状况的秘密。然而，根据他经常出入的旅馆和饭店的服务人员讲，他在付小费方面倒有点小气的名声。

亨利的地位使他成为各种各样攻击的目标，这是很自然的。他为保住政治名誉而付出的最高代价可以说是他奉行的“傻瓜主义”了。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高级政府官员、律师、演员甚至音乐家的身上。他们是任何一个可能提

出各种要求的人的目标。刁钻的债权人拿出荒谬的帐单，然而当事人由于害怕惹起一场不利于自己的张扬因而受着羞辱而不敢提出抗议。有一个女人至少曾期望从基辛格身上得到比出头露面更多的东西，然而她却一无所获。亨利还不具有为驾驭世界政局所必须的老练经验，因此他在私生活中也是怯懦的。这个女人仍在巴黎，她同基辛格的关系——可能是真正的，但也许是编造出来的关系——无论对她的发展还是对她的钱袋，都没带来任何好处。

基辛格受到安全人员的严密保卫，除了尼克松以外，他是唯一有权拆看标明“呈总统亲启”字样文件的人。他受到尼克松的高度信任并被赋予巨大的权力。

幸好芭芭拉·霍沃不需要十分严密的安全措施。身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她的工作就是传播消息。

当有人批评芭芭拉话说得太多的时候，她表示：“在这个城市里，一切都是秘密，这太沉重了。我不想打听任何原子秘密，然而在政界，大家都脸对脸地挤在一起，挨得那么近，以致能一下子猜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她的一句最具讥讽意味的名言是：“亨利，但愿你能像悄悄来往于北京那样，悄悄地出入于好莱坞！”这是她在公众场合讲的一句话。她总是急急忙忙地去袒护基辛格对女人的爱好，特别是当涉及一些名气不大的女演员的时候。她曾说：“不管怎么说，当一个人同果尔达·梅厄一起度过了一整天之后，他没有理由再同英迪拉·甘地度过一整个晚上。他需要的是像吉尔·圣约翰那样的女人！”

到最后，她又试图把有关基辛格的那些最久远的流言蜚语一一否掉，她断然声称：“亨利没有时间去消遣。”然而，亨利却有时间和她一起出现在华盛顿的夜间活动场所、晚会、剧院和音乐厅，人们经常在这些地方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什么呢？对此，芭芭拉说：“我喜欢有身份并有风度的人，他应具有一定的使命感，充满自信而又不失亲切与温柔。请你们给我指出一个有地位有风度的老妓女来，那我就在她的面前脱下我的帽子。”基辛格是一位具有独特风度的上层人士，至少，他在他所干的大多数事情中是始终如一的。

她还说过：“我对那些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男人不感兴趣。”基辛格不仅承担责任，而且他就是这个国家的也是世界的权力的中心。同其他人一样，芭芭拉认为亨利是华盛顿少数几位有特色的人物之一。他懂得怎样关怀她，随时乐意同她进行聪明的交谈，而且是她涉足任何场合的政治的与社会的保证。

从亨利的角度讲，动机就更明显了。芭芭拉聪明漂亮，并且可以弄到手。除此之外，她也喜欢他。

她的政治见解可能构成一种危险。她不隐瞒自己是一个“左派自由民主党人”。她使尼克松政府成为许多苦涩打趣的对象。除此之外，她还对“妇女解放运动”表示同情。这似乎表明亨利在选择女人上的某种任性。她们或者绝不聪明，或者很聪明，然而却都公然宣称自己是基辛格上司的敌人。

然而，芭芭拉是一位高雅而又迷人的女人，和她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风波，或者她在记者面前出现什么令人难堪的差错。她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保护人，而这总是很有用处的。此外，她还可以被用来当作向记者提供情报的理想人选，借此去平息那些可能流传开来的不利传闻。

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能改变亨利已有的、专爱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的名声。

芭芭拉是亨利交往的女孩子们中的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显露出一种成熟的魅力。她是华盛顿社会的一件珍品，亨利希望得到这种类型的女人，芭芭拉很合他的胃口。

亨利所拥有的众多的女友，至少是那些他准备带出去见见世面的女人，她们的形象是各不相同的。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提高或者改变基辛格在社会上的感人形象有所帮助。亨利交替变换着他身边女人的形象，就像是在不断更换一件又一件贵重的外衣一样。

带有政治目的的性关系在任何国家的首都，都是一种活动的手段。美国首都华盛顿正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的城市。不需要任何说客，承包商或者访问大使都会找到一位职业女郎或者训练有素的业余爱好者陪伴在侧，并且在他们从事自己的工作时，会以马泰·哈丽的方式从他们的口中套出所需的情报来。

一位总统助理自然是首要的目标。

一个野心勃勃的非洲国家代表处不断派一个名叫莫尼奎的美丽混血女郎参加华盛顿所有的预定有基辛格出席的活动。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认为华盛顿对他们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莫尼奎有可能会帮助总统的这位助手发现这一问题，因为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足以能打开美国贷款、多余食品的输出以及为在联合国拥有更大力量而提供的援助的大门。

这位女郎是法国人与北非人的后裔，她特别漂亮，她身上的服饰和佩戴的首饰都是这个年轻的非洲国家代表处根据基辛格的爱好而考虑确定的。然而，另一个非洲国家领事馆的一位敏感的代表了解到了这一阴谋，并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基辛格的一名安全警卫人员。于是发生了一场令人困窘的国际事件：勾引基辛格的这位女郎被驱逐出境，理由只是她的护照出了问题。

在一次例行的酒会上，很可能遇见各种高级政府官员，他们都试图摆脱开自己的妻子，这是和一位讨人喜欢的女秘书准备另外一场“午后演出”的好时机。美国国会山的6家饭店经营日间顾客的生意要比作老主顾的生意兴隆得多。

在大厅的另一端，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难以描述的人，他正被许多漂亮的人儿包围着。这是个中年人，带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有着一头卷发。这个人深深地沉浸在与大厅中最令人瞩目的那位美人儿的谈话之中。于是有人问：你怎么可能？

晚会的规格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对其他客人的印象。一会儿以后，有人可能会问这位美丽的女士：“为什么是基辛格？”她回答：“他非常有趣……谈吐也好。他很聪敏地开了个头，而且后来表现得十分出色。没过多久，他就开门见山了。”

基辛格提问题很有风度。他对他的攻击目标说：“我只不过是哈佛的教授，是个移民”——她于是产生了兴趣，事情就如此这般地到了决定性时刻——“尽管我现在置身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和所有这些漂亮的人们在一起，并且身边还有一位漂亮的女郎和我谈着话，但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白宫。假如我不是总统的最亲密的助手，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我可能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授，可能会独自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用着晚餐。”

白宫对基辛格工作之余的活动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然而，国务院的一位礼宾官员还是对基辛格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暗示了基辛格出席一些外交活动应由有地位的女士陪同的意见。基辛格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很快“引进”了两位“合乎条件的女士”，以应付某些特别的场合。

第一位是南希·马金尼斯，她是基辛格在纽约的惯常女伴，他们俩是在洛克菲勒时期认识的。南希是纽约州州长的调研助手，负责发现并筛选可能对基辛格有用的素材。在基辛格与洛克菲勒 1968 年迈阿密海滩“共和党”会议期间一起投身于为洛克菲勒争取选票的那些日子里，她一直同他们在一起。

基辛格并不适应他所处的环境。他攻击的代表多为职业政客，而不是学者文人。亨利回忆说：“我喜欢这样。”他坚持表示他对竞选运动并不特别感兴趣，他曾说：“用三天把它做完是一回事，然而整个一生都如此度过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次会议之后，当洛克菲勒班子的助手们为失掉那些已经许诺的选票泄气时，当他们彼此打气，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时，南希总是在场。当这一切都结束了之后，南希继续留在了她的位置上。她是基辛格的一位完美无瑕的女伴。她从不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使基辛格相形见绌的念头。当他们一起出席一个晚会或者首次演出的时候，她总是退后半步，高高地、安静地站在那里，让亨利一个人独享人们的全部目光。

然而，她的谨慎小心有时也会导致产生相反的效果。有一次，亨利和南希出席纽约《教父》首映式时迟到了，当摄影记者们的照像机闪光灯开始闪烁的时候，南希消失在人群之中。基辛格简短而热情地向女演员艾丽·麦格劳表示致意，于是摄影记者们发起狂来。结果是，几家重要报纸很快就发出了有关麦格劳与基辛格爱情的报道。“证据”便是亨利同艾丽在一起拍下的照片，人们根据这些照片会得出基辛格是携同艾丽一起出席首映式的结论。

一些热衷于小道消息的记者对基辛格的活动进行监视并由此而想入非非。至少有一位“监护女巫”曾预言亨利将同南希结婚。然而不管怎样，“如果基辛格对她是真正认真的话，她退居次要位置也是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洛克菲勒办公室拒绝提供有关她的任何情况。

在亨利的群芳中间，马金尼斯小姐是身量最高的一位：她要比她的临时同伴亨利足足高 5 公分。她的穿着打扮很老式，经常展现一种有礼貌的微笑。她也兼当亨利与他的老上司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人之间的私人联络人。

第二位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她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新闻节目的制作人，名字叫作玛格丽特·奥斯默。她只有在需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时方才出现。她往往同基辛格一起突然在一些文化活动中露面。

奥斯默是一个混血儿，她同亨利在西海岸拥有的那些女人一样，十分迷人，而且据说也很聪明。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剧目期间，她挎着基辛格的手臂一同出席了该年度那次最重要的社会活动。

那一次，基辛格正在巴黎履行他的有关越南战争的秘密使命，她在巴黎一家饭店充当了基辛格的“掩护人”，她的名声由此而大噪一时，然而在当时，她并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基辛格愿意同那些在他自己的工作有机会结识的女士们一道出去。玛格丽特接受了为迈克·华莱士的《60 分钟》节目制作一套有关基辛格传记的

任务。在当时电视新闻联播节目的 56 名记者当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她与基辛格决定见一次面。当基辛格同他这位皮肤晒得黝黑的、能干的新崇拜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玛格丽特感到自己博得了基辛格的好感。

除了社交关系之外，亨利与玛格丽特之间的交往还给他们各自的工作带来了好处。不管怎么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很使白宫感到不快，玛格丽特正好可以成为其间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当白宫的新闻秘书们为某件事欢欣雀跃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正为消息不通而睡不着觉。尽管电视台不干预其采访记者们的个人私生活，然而上面已经会意，应鼓励奥斯默与基辛格的关系，他们或许期望能借此获得某种特权，以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呢！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因此，每当玛格丽特提出请假时，她的头头们一下子都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但愿那些有关的上司们都能通融照顾，那么，亨利和玛格丽特就永远不会成为命运不佳的情侣了。

除了众多的女影星之外，还有许多势力试图控制亨利的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亨利的某些社交爱好是命中注定，然而华盛顿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女东道主们、那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大使馆的那些礼宾专家，还有那些负责联播节目的头头们也在其中帮了基辛格很大的忙，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是由于女影星们，还是其它原因，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那就是：亨利在最大限度地享受着他的频繁而又多彩的社交生活予以他的一切好处。

然而，只有南希，才在人们的疑惑中，得到了基辛格。

那个时候，许多人把赌注压在了芭芭拉·霍沃的身上。

霍沃对亨利将要结婚的传言持怀疑态度。她说：“同一个身后总跟着一大帮保镖的男人谈情说爱，简直就像坐在装甲车中散步一样，使人倒胃口。只要他干着这份工作，他就不可能结婚。”

然而芭芭拉大错而特错了。1974 年 4 月，当亨利赴莫斯科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谈安排日程回国之后，一位记者大胆地问他打算不打算结婚，亨利微笑着回答：“当然。”

此秘密婚约的另一方不是别人，正是南希·沙伦·马金尼斯。他们两个人是 1969 年在迈阿密海滩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基辛格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时认识的，南希当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这次大会失败了（洛克菲勒没有被提名），他们二人的友谊却没有冷下来，南希成为了亨利对这段短暂政治活动时期的一个最新鲜的记忆。

南希·马金尼斯是一位谦逊朴实的女人，她从不抢基辛格的镜头，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打在她的同伴身上。她是那样谦逊，在影片《教父》的首场演出时，记者们的闪光灯完全疏忽了她而把艾丽·麦克劳认作了基辛格的女伴，他们争先恐后地抢拍下了麦克劳同基辛格在一起的镜头。

基辛格的婚姻就像他参加巴黎和谈的旅行一样保守着秘密。就连基辛格的弟弟瓦尔特本人也只是在结婚的当天上午 9 点半才得知这一消息。基辛格的婚礼是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举行的。在举行前一小时，在国务院大楼最高一层的麦迪逊大厅里，为这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基辛格的几位助手和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大家吃了点小食品，喝了香槟酒。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手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待为新婚夫妇的幸福祝了酒。穿着深蓝色西装的基辛格只简单地说了句：“谢谢大家。”

婚礼也非常简单。参加婚礼的有南希的母亲和弟弟戴维，还有基辛格的弟弟瓦尔特夫妇，还有他的一位老朋友卡莱尔·莫。南希是第一次结婚，而

亨利已经是再婚了。他们选定去阿卡普尔科度蜜月。因此，婚礼仪式一结束，他们就乘由他们的共同朋友纳尔逊，洛克菲勒提供的一架私人喷气机去了那里。

毫无疑问，会有一批秘密警卫人员跟随着他们。国务院在基辛格朋友的那幢别墅里接上了专线电话，这样，基辛格就可以随时了解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了。

蜜月一过，新婚夫妇就回到了华盛顿。基辛格准备从他的单身汉寓所搬出去，搬到石溪公园附近去住。

但是，桃色新闻并不因为基辛格博士的结婚而消失，对于没完没了的关于基辛格风流韵事的渲染与传说，在基辛格看来，并无多大的坏处。有时，还会有一些好处，给他的秘密外交行动更增添了诱人的魅力。

尾声

昨夜星辰

1974年8月6日。

华盛顿白宫。

被“水门事件”缠得精疲力尽的尼克松总统不甘心就这么不光彩地辞职，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指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

国务卿基辛格紧绷着脸，毫无笑容地坐在尼克松的身边。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一声不吭，抽着闷烟，一圈一圈的烟雾从嘴里喷出来，弥漫着椭圆形办公室。

其他阁员们一言不发，整个会议，就似耶稣的最后晚餐一般沉闷。

基辛格意识到，如果尼克松总统坚不辞职，必然引起国会对总统的弹劾。那么，一个被弹劾的现任总统是无法很好地履行总统职责的。

因此，基辛格对这位不记前嫌，让自己登上一个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能达到的权力顶峰的美国总统说：“需要尽快结束危机，否则美国的对外政策将受到严重损害。”

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位国务卿是暗示自己应尽快辞职。

第二天晚上，白宫的林肯休息室。基辛格与尼克松总统一边交谈，一边喝着白兰地。

尼克松心情沉重。

基辛格明白，要使一位前总统接受屈辱的刑事审讯，显然令他难以忍受。

“总统先生，历史将会铭记你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基辛格这样说，并非仅仅是为了宽慰尼克松。在尼克松任上，中美关系解冻、美军撤出印度支那、中东和平、美苏高级会谈等等，都是尼克松政府的建树。

尼克松此刻只感到孤独与悲哀，他绝望地说：“这要看谁在写历史了。”

基辛格没有能慰藉尼克松，心中也涌出一股难言的哀痛。

已是子夜时分。

借酒浇愁愁更愁！

尼克松送基辛格离开休息室，穿过总统宅邸的长长走廊，在林肯卧室门口停了下来。

尼克松望着基辛格，犹豫了一下，方才建议：“亨利，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吧！”

基辛格默默地点了下头，随尼克松走进卧室跪了下去。

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的一节短诗突然萦回在基辛格心头：

难以忘怀的痛苦

点点滴滴

坠入心头

直至无比仁慈的

上帝给我们绝望的心灵

带来智慧。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正逗留在白宫办公室时，黑格告诉他说，尼克松将在上午11时会见福特副总统，正式宣布他计划于次日辞职。

基辛格忙碌起来，他为即将就任的新总统起草了致各主要政府首脑的函

件，还检查了新总统按地区分批会见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的计划。

中午 12 时半，不出基辛格所料，福特给他打来了电话，表示了挽留基辛格继续做国务卿的态度。在电话中，福特说，“请同我一起度过这一困难的时刻”。

基辛格以能言善辩著称，此刻似乎受宠若惊，嘴舌忽然笨拙起来，很久，才向福特表达明白自己接受他的这番好意，并说：“你知道，全世界都有赖于你，副总统先生。”

基辛格还在 60 年代就认识了杰拉尔德·福特。那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大学主持国家安全政策讲座，福特是一位客座讲师。后来，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成了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阿格纽副总统辞职后，尼克松提议福特继任副总统。

下午 3 时，基辛格前往行政办公大楼总统办公室拜访了福特——即将上任的总统。

当基辛格离开总统办公室时，他多年来第一次在会见总统后没有了紧张的感觉。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每次同尼克松谈话，事后总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些什么药。尼克松谈话时，从来不透露他全部的意图。同他谈话固然令人高兴，但也让人伤透脑筋，甚至觉得他有点咄咄逼人。”

对于福特，基辛格认为：“在这个几乎绝望的时刻，能领导我们重振国家的公众领袖再没有比福特更好的了。”

第二天中午，当离任的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直升飞机消失在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天际时，刚被尼克松辞职演说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基辛格呼出了一口长气：美国经历了一场宪法危机，总算没有出现灾难。当他目送福特夫妇进入白宫时，基辛格暗暗祷告：

为了我们大家，愿这位善良的人福星高照，愿他意志坚定，愿美国在他的领导下重获信心。

尼克松下台了，基辛格一方面任国务卿，另一方面继续兼任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直到 1975 年 11 月，福特总统才撤消了基辛格的安全顾问职务。

对此，基辛格怨气冲天，曾有辞职的想法。

基辛格有理由感到不满意。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基辛格与尼克松组成了最佳搭档，在外交权力的行使方面，与尼克松一起独断专行，无论是各军政部门或国会参众两院，都无法对他所推行的一套秘密外交方式施加重大影响。然而，在福特当政时期，基辛格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了。1975 年秋天，在苏联与古巴干预安哥拉的事件中，基辛格提出美国向安哥拉国内反对苏、古干预的组织提供援助的要求，被国会所否决。

福特当了 2 年零 5 个月总统，基辛格也就继续当了 2 年零 5 个月国务卿。

没有了尼克松，基辛格再没有震惊世界的举动。

但基辛格却获得了美国文职官员的最高奖赏——自由勋章。

福特还加封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1976 年 11 月，福特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败于卡特，白宫易主，基辛格离开了使他大显身手的白宫。

然而，这位哈佛学者在外交界中仍然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他并没有完全退出世界政治舞台，而仅仅是站到舞台的边沿而已。

平时，基辛格与他的夫人南希·麦金尼斯住在乔治城的家里。

但是，基辛格仍然密切注视着国际局势，每当遇到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时，他并不保持沉默。

1979 年秋，基辛格博士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一卷——《白宫岁月》，叙述了自 1968 年 11 月至 1973 年 1 月之间美国外交、国际局势和他本人的活动情况。

这本书不仅给基辛格带来巨额的版税收入，同时又为他增添了在美国和世界外交界的声誉。《巴尔的摩太阳报》认为此书是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参加无穷无尽的国际座谈会的入场券”。

1981 年秋，基辛格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二卷——《动乱年代》，进一步展示了他在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内所取得的卓越外交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使他在离开白宫之后，在外交界中仍然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

1980 年，又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当卡特总统与里根州长激烈角逐总统宝座的时候，人们纷纷猜测基辛格想再次出任国务卿。

11 月 6 日，里根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卡特后的第三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大使馆举行十月革命 63 周年纪念晚会。在等待与多勃雷宁大使握手的行列中，基辛格向一名记者否认了有关他的一些传闻：“不，我并不准备出任新总统的国务卿或驻北京大使，我真不知道这类议论是怎么传起来的。”

基辛格正要回答另一个记者的问题时，辞职后的尼克松总统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把基辛格从行列中拉出来，推着他向队列之首走去，口里说着：“亨利，你跟我来。”

多勃雷宁满面笑容地迎接他们，并摆好了姿势，让记者们拍下了精采的镜头。

基辛格依然像当年一样让记者们着迷。

1981 年 10 月 6 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美国派出了以国务卿黑格为团长、离任的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以及前国务卿基辛格与国会领导人为团员的代表团赴开罗参加萨达特的葬礼。

当代表团的车队越过尼罗河前往吉萨去看望萨达特总统的遗孀时，基辛格望着匆匆闪过的街道，追忆起当年他在中东穿梭外交时与萨达特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如今这位伟大的总统去世了，他也不不再是国务卿。空旷的街道，飞扬的尘上，使基辛格不禁感叹起人生的无常。

萨达特的孩子们迎候在院子里。当他们看到基辛格时，萨达特的小儿子哭出声来。基辛格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涌出眼眶，他用力地拥抱了孩子们。然后，基辛格拥抱了萨达特的遗孀，低声地安慰她。

第二天，基辛格穿上防弹背心，和几位美国总统坐上一辆从华盛顿空运来的装甲轿车前往外国代表团的集合地，为萨达特总统送殡。

基辛格来到萨达特遇难的地方，只见弹痕犹在，血迹斑斑。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来到了萨达特的墓穴。

即将覆盖墓穴的黑石上，铭刻着古兰经里的一行侍名：“为真主而死的人们，虽死犹生，并将永远得到真主的庇护。”诗句下面刻着萨达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以及一句铭文：“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正义而死。”

基辛格默默地向萨达特的遗体致哀。

他知道，自己在中东刮起的旋风离不开萨达特，没有这位埃及英雄的支

持，就不会有中东的和平，也不会有自己成功的穿梭外交。

一年以后。

华盛顿马里奥特大舞厅。

在写着“欢迎 72 届同仁”的巨幅蓝色旗帜下，亨利·基辛格与为尼克松政府工作过的 200 多名同事又聚在了一起，庆祝尼克松连任总统 10 周年纪念日，也是基辛格与尼克松首次访华 10 周年纪念日。

中国，是令基辛格与尼克松十分向往的地方。无论他们是在国务卿、总统任上，还是离职下野以后，他们对中国的若干次访问，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盛情接待。

14 年悠悠岁月过去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更加强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

1996 年 3 月 30 日，73 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说：“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于台湾问题，基辛格博士 1996 年 3 月 31 日在德国的《星期日世界报》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避免同中国进行对抗。

“对中国来说，台湾不是外国，而是中国的一个岛屿——它于 1895 年被日本侵占并由此开始对中国领土的蚕食……中国对这种被认为是分割行动（指台独倾向）的反应，犹如当年美国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企图脱离美国的反应，最后导致美国的内战。对北方各州来说，当时涉及的不是自决问题，而是国家统一问题。”

显然，基辛格博士的眼光依然如年轻时一般敏锐，对中美关系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依然那么明智。

这颗外交巨星，依然在天空中闪烁！

